

非 虚 构

写 作 指 南

李梓新 / 主编

《智族GQ》
总主笔
何滔

知名
战地记者
周轶君

《人物》
前副主编
张卓

网易非虚构写作
平台负责人
关军

《正午故事》
主笔
郭玉洁

带你找到属于自己的写作法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序 每个人都可以进行非虚构写作](#)

[第一章 如何寻找故事？什么是值得写的非虚构题材](#)

[写作是一件很个人的事情](#)

[发现可写的故事主题](#)

[偷拍父母的390天](#)

[这个患儿的母亲，拯救我麻木的医生日常](#)

[第二章 开始你的采访，找到你的故事素材](#)

[特稿记者如何找选题、做采访、写作](#)

[采访是非虚构写作的关键](#)

[网络女主播的爱恨江湖](#)

[我问在缅甸的华人，这七年生活有什么变化？](#)

[第三章 如何写好人物？](#)

[如何写好一个人物故事](#)

[挖掘人物的欲望、细节和冲突](#)

在中国，为iPhone镀金的美国人

我的外婆是龚自珍家族的后人

的哥父子，“卖手腕子”的两代人

第四章 文章结构的魔力

我是怎么判断和编辑稿件的

好结构成就好故事

一个家庭的下岗人生：1998—2017

当美国老年人在写作，中国老年人在做什么？

第五章 建立你自己的语言风格

寻找自己的语言，先从清理开始

好的语言风格应该符合三个原则

望明蛇馆

一场由杜蕾斯引发的教育风波

第六章 什么是好的故事细节

散文写作的视野和想象的读者

好的细节可以让人身临其境

逃避计生三十年

试管婴儿的造人工程

第七章 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

关于文章的修改和写作者的价值观

好文章是改出来的

江夏里：一座上海老房子见证的知青两代

两位西方85后，把中国乡村清朝宅邸打造成“老家”

抛下一切，到新疆当军嫂

序 每个人都可以进行非虚构写作

“非虚构写作”这一概念自2015年前后在中国广泛兴起，成为一种写作现象。事实上，它脱胎于媒体的特稿写作，更有三十年前报告文学的遗迹，并不是一种全新的现象。但时至今日，“非虚构写作”之概念尚未完全厘清。在我看来，仍然存在“窄义”和“广义”之分。

“窄义”的非虚构写作，仍然大多数为专业媒体机构所生产，讲求特稿体例，重视多方信源，通常需要较长的操作时间。而“广义”的非虚构写作，则把这一写作类型开放给更多普通写作者，也更与国际上的非虚构写作概念接轨：只要无主观意义上的虚构或者加工，无论日记、书信、散文、回忆录等文字，均可视为非虚构写作。

我认为，将非虚构写作权利开放于大众，在当下中国有巨大意义。

首先，中国普通大众的写作，基本被局限于中小学的作文训练，毕业后便迅速与社会现实生活形成断层，仅有一小部分“文学爱好者”进行小说、诗歌等写作，散文这种文体也逐渐不受欢迎。而当代中国有太多生动精彩的真实故事，特别是个人故事，没有得到很好的记录和整理，殊为可惜。

其次，传统媒体的衰落已经呈大势所趋。越来越多的媒体机构无法承担特稿生产的巨大成本和投入，而砍掉了调查报道

或者特稿部门。这使“窄义”的非虚构写作进一步凋零。同时，传统媒体的特稿写作方式，也面临着读者口味变化的挑战。近年来，随着新媒体发展，读者对内容的要求已经比较多地倾向有写作者个人化的痕迹，即使在非虚构作品中亦然。

在这种情况下，大众的非虚构写作已经超越了媒体记录的功能，而成为一种与社会学、文学、历史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跨界交叉的尝试。对于个人而言，其意义更远超写作本身。越来越多的写作者认为，写作对于心灵疗愈、连接他人，传播知识以及当下所流行的社群组织，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个喧嚣的时代，写作是一种令人沉静的表达方式，它也在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所以，如果以“广义”的非虚构写作来定义，成立八年的“中国三明治”早在2011年便开始倡导普通人的非虚构写作，号召各行各业、各种身份的写作者来写下发生在他们身上或者周边的真实故事。

但正如我们在几年的非虚构写作过程中遇到的那样，很多人想写却不知道如何动笔。这也是我们开设“三明治写作学院”的目的。我们认为，写作技巧肯定是可以习得的。一方面是参考名家作品和写作心得，另一方面当然是不辍的练习。

在这本书中，我们邀请到了非虚构写作领域的专业导师，比如关军、郭玉洁、周轶君、覃里雯、张卓、何韬、张春等，结合他们多年的写作生涯，从题材、结构、人物、语言风格、故事细节等方面，为非虚构写作爱好者提供指导。这些导师代

表了当今中国尝试非虚构写作的前沿力量，希望可以给对非虚构写作有兴趣的普通读者带来启发。

为了让读者更清楚地了解“非虚构写作能不能教”这个问题，本书还收录了我们自2015年开始发起的非虚构写作计划——“破茧”计划——中普通人的优秀作品。16个故事来自身份各异的写作者，有医生、大学教师、边防军嫂、公司白领、学生等等。他们所带来的故事，其题材和震撼力，比起专业媒体，有非常接地气的独到之处，更具有独特的表达力。

每当我到美国或者英国的书店选书时，总能在入口不远处的书架上看到一大排的“non fiction”（非虚构）书籍。它是图书的重要门类。其中，“memoir”这种个人化的真实故事写作，更是产生出大量书籍。而在中国，还没有合适的词语来翻译这种文体，通常只能译成“回忆录”。这个字面带来的意思似乎是要到老年才能写作，但事实上，memoir更强调的是一段个人独特的经历故事，能对他人有启发意义即可。而中国的非虚构题材的书籍，总体上比例还是偏低。

三明治写作学院在做的事，就是让更多的中国人把自己的真实故事记录下来。如果这些努力能够启发更多人写作，这就是我们这本书，以及所做事情的价值。

李梓新

（“三明治”创始人）

第一章 如何寻找故事？什么是值得写的非虚构题材

写作是一件很个人的事情

周轶君（著名战地记者）

我觉得写作是一件很个人的事情。就是说，你喜欢写作这件事情确实是天生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如果有这一点点天赋之后，就一定可以写作，或者一定可以写得好。下面我聊一聊我自己的经历，以及背后写作的故事。

我不是学新闻的，大学时我选择了阿拉伯语专业，这当中有一个曲折的故事。在学外语之前，其实我最感兴趣的是中文。我小的时候，我们很少能够接触英语的东西，我这个年纪的话，一开始接触中文还是比较多。有一段时间我完全着迷于中文的文学。

一开始的时候，我的志向是去考北大的中文系。那年特别巧，或者说也不太巧，我毕业的那一年，北京没有在上海招第一批录取的学校，有一些比较好的学校根本不在上海招生。那时候上海实行自主招生，因为希望把优秀人才留在上海，所以把北大、清华、人大这些比较好的学校，都放在第三批录取，这导致了后来那些学校撤走了所有在上海的招生名额。

我自己还给北大招生办写过一封信，希望他们在上海增设一个招生名额，看我能不能考过那个分数线。对方居然给我回了一封手写的信，信上当然是说，很抱歉，没有办法增设。但是那个年代的机构，还是比较尊重个人，真的会手写一封信来回答。

不管怎么说，我因为没有机会去念中文系了，数学又很差，所以就读外语，才会很偶然地选中了阿拉伯语系。因为它是四个字嘛，其他英语、法语、德语都是两个字。

那个时候学阿拉伯语，其实完全没想到将来要干什么，当时最大的动力是想去北京。所以我三批志愿报的都是北京的学校。那时我父母挺伤心的，因为他们希望我留在上海。

20世纪90年代北方的文化非常兴盛，有王朔、窦唯、张楚等，可能对你们当中很多人来说太遥远。但北方的文化对我有着致命的诱惑。所以不管学什么学科，都想去北京。那时候的北京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现在的北京，我不太敢认了。那个时候的北京，至少天还是蓝的。而且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那时候靠近郊区，有很多让人觉得时间很慢的地方。

从新华社到凤凰卫视

我是比较幸运的，大学毕业时，因为综合排名比较高，所以有机会考外交部。但我一直知道自己不是那块材料。因为去

外交部，比较好的选择是去做高级翻译。我知道自己不是特别好的翻译，翻不好别人的话，但很想讲自己的话。

大家当时都特别惊讶，后来就谣传我在新华社一定认识什么人，才敢这样放弃去外交部的名额。后来我就去新华社，国际部也不要我，因为我是女生，做国际新闻他们觉得没有什么前途。因为国际新闻的话，通常要去比较动荡的地方，一个女生不太合适。

那时候，驻外女生一般会被派到人比较多的大站、大分社。当时我听说加沙只有一个名额，本来要去的男生好像不是特别愿意。我就主动请缨。我其实没有太多的考虑，因为学阿拉伯语之后，对那个地区会有比较多的了解，听了很多那个地区的传说以及来自战地记者的经验，就特别会有血液涌动的感觉，非常想去。

那个时候巴以冲突还比较激烈，那个地方永远上演着生与死的故事。我特别想去这个极端的环境，去看看人的生活状态。所以当时去的最初目的不是跟任何所谓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有什么关系，我是想去看人的状态。那个时候自己又喜欢拍照，所以觉得一个人的分社，既可以做文字，又可以兼做摄影，很有意思。

对于生死危险的话，这种事情我考虑的确实不是特别多。我刚刚到加沙的第一天晚上，跟前任记者交接的时候，就经历了一次空袭。那对我来说确实是挺震撼的。但我当时就一个想

法，不会那么倒霉嘛，你刚去，你想看的一切都还没有展开。所以我当时还是比较相信自己会有运气继续下去。

在加沙的那两年，对我来说是非常宝贵的经历。一方面就是从人生的阅历上来讲，你经历的那种孤独，见证的各类冲突、各种主义，各种人的理想也好、谎言也好，你都会看得更清楚一些。另外一方面，在写作、做记者的技能方面也确实有了很大的提高。

当时我的状态，差不多就是白天出去拍照，晚上回来写文字。那时候20多岁，精力也好，就会写得比较快。那时候给新华社写东西，其实有好几个“婆家”——就是给好几份刊物供稿，还有好几个频道等着要稿件。那时候，人的精力真的是使不完，我可以持续写到很晚。我记得有一次，我连续工作了38个小时，经历一次空袭，整个晚上没有睡觉，在发稿，白天还要再写特稿，其间真的可以不睡觉。还有一次，我一直工作到早上7点钟，想去睡觉了，然后一想不如看个电影吧，就自己拿着DVD光盘在那儿看。那个时候，人好像真的不需要休息。现在是不行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李安的电影《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那部电影，很多人都说拍得没那么好。我也承认，可能跟之前的那些电影比起来，不大容易理解。但对我来说，却是特别能感同身受。

因为我在加沙期间回过一次北京，以及后来回来的时候，都有那种感觉，完全在两个世界里面。比利·林恩的那种孤独

感，和他说想回到战场，那里对于他们来说更安全。那种感觉在我身上也非常强烈。但是很快，我就适应了重新在北京生活。

机缘巧合，当时我和凤凰卫视有一些联系，他们希望我去那里工作。而且按照他们的模式，我可以短期地去不同的地方。我当时一心想再回去那些地方，所以就觉得这个机会很有吸引力。

但电视表达并不是我最好的表达方式。所以我刚开始做电视的时候，用了比较长的时间去习惯。而且可以说，电视表达对写作是有破坏力的。因为如果你讲的跟你写的是一样的话，那你的写作就是失败的。

你写的，一定是那些你讲不出来的东西。

战地记者经历对写作的影响

我的战地记者经历，与其说对写作有影响，不如说是对观察有影响。

我想我们写作之前，最重要的事情还是观察。你会训练自己看待一些问题的方式。我当初跟差不多同龄的记者做分享的时候，他们也来问我写作方式。其实我那时候没有受过什么训练，就是凭自己的感觉去写，拍照也是一样。

我常常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是有效细节？”别人会觉得我写的东西里有很多细节，场景的描述，人物的相貌、穿戴

等，当他们同样这么去做的时候，为什么就不对了呢？就是因为有的细节是无效的。通过这个细节你想传递什么？我所有的场景、人物的描写，背后都是有信息在里面的，而不是单纯的“太阳落了，金光万丈”。段落过渡也好，别的也好，都是有一定的安排在里边。你哪怕是为了调整写作节奏，也是一种安排。如果跟你想表达的整件事情无关，那这个细节就是无效的，它只会让你的文章变得拖沓。所以学会使用有效细节是件重要的事情。

怎么才能找到有效细节呢？还是观察。我要写这件事情，那么整件事情的框架想表达什么？我观察到的这个细节是不是在框架之内？如果在，这个细节就是有效的；如果没关系，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改别人的稿件时，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简洁、简洁、简洁，准确、准确、准确”。

“简洁”容易理解。很多时候，我不能忍受同一个句子里面有两个“的”。我发现，年轻作者写东西，习惯用自己的口语或者脑子里想的话。我改稿做得最多的事情是合并同类项。

所谓“准确”，就是你表达一种意思，描述一个物件，讲述一件事情、一个情感等都要做到准确。当然，表达准确的情感比较难。有一个例子就是使用动词的不准确。我不知道是不是互联网的关系，因为写评论也好，写别的也好，口语化的问题都非常严重。口语当中使用的动词常常是不准确的。比

如“我有什么什么”，那一个句子里他都会写成“这所大学有多少多少人”“这个国家有一些什么什么”。

“有”字是非常弱的动词，它可以改变成其他的动词，比如“这个国家设立了多少多少机构”，总会有一些更加精准的动词去表达。我们现在对动词的使用非常弱，经常是用一些口语、常用词、通俗词带过。但是一个句子里没有动词，就跟人没有骨头一样，不好看。

我有次在节目当中推荐《古文观止》，当时一起做节目的人觉得我有点装，为什么拿出这种书来说。我只是想要表达，中文的动词是非常有意思的。我曾经跟一个法国的汉学家讨论，有什么是非要用中文来表达的？他是法国人，中文非常好。我一直不明白外国人为什么要学汉语？他就说你们中文的动词非常有意思，比如“托”和“握”一个杯子。这两个词在法语和英文中都没有办法去表达，他就认为这个动词是非常精准的。还有“想”，即“think”，英文当然对照的有不同的“想”，但是中国人的“想”，有“念”“掂量”等，这种表达的层次是非常丰富的。

当然，是不是为了那么丰富、精致的东西，就要下很多苦功学中文？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我只是想说，我们现在常常忽视了动词的使用。动词的使用会使你整个句子变得有骨头，会跟别人的看起来不一样。它能够撑得起来，非常有力，而简洁有力的表达才是最好的。

关于写作的困扰

我近几年写作频次稍微少了一点，是因为我有些困扰。

现在写东西、写评论的人太多，大家都有意见，满天飞的都是意见。那我常常会觉得，还会缺我一个人去说吗？因为我的原则是，我不懂的东西，我是不会去说的。哪怕是在我的领域里面，只要有一点不懂，我都很怕去写。

我之前在剑桥上学的时候，有一位教美国历史的老师，他是非常厉害的专家，一辈子研究美国历史。我问他，能不能跟我聊聊中美关系？他说，这怎么可以，我是研究美国历史的，中美关系不在我的研究范围内。你看就这一条界线他都不可以过。他的意思就是说，聊天可以，但你不可以把我的意见当作观点去发表。他说，我真的不懂。所以对他来说，在学术里边，楚河汉界是很清楚的。

在我们今天，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难得。大家跨界，随便评论，意见满天飞。我常常觉得，是不是大家都满足于这种二手知识？

很多人说，这种现象是因为老百姓喜欢听这样的意见，觉得浅显易懂。我常常怀疑这种说法。因为真正的观点，其实并不见得是大家听不懂的。而且如果是真正懂的人，他看问题的框架就已经跟业余者是不同的。所以我常常觉得现在其实比较喧嚣。我也写得比较少了。

当然有很多朋友跟我说，你不能够放弃写作，你还是要继续去写。

2014—2016年间，我一直在尝试非虚构写作。这一块，其实对我来说是很累的，你需要去采访，去经历，你写的时候更累。有时候写一篇文章，真的就要几个月，而且是每天固定的时间，去图书馆里面坐下来。最痛苦的是刚开始要写的时候，从一张白纸开始建构。那个时候就是抓耳挠腮，特别痛苦，不知道怎么继续下去。有时候对着一张空白的屏幕，真的不知道自己要坐多久。而且必须要把网络切断，不然的话，你一定会干一些其他无关的事情，然后时间就过去了。那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真的像蜕皮一样。

当你这篇文章写得七七八八了，最后去润色，去打磨时，那个过程我觉得非常开心，因为这时你已经写得比较满意了。修改的时候，因为东西都在那里了，你就不用花太大力气，反而会比较享受那个推敲的过程。

我的写作习惯

每次出去我都会带笔记本，而且我的经验是，我去采访会穿那种裤腿侧面有口袋的裤子，笔记本刚好能塞到里面去，所以一定要有随时可用的笔和纸。

很多时候，笔记本上最重要的除了自己记录的东西，我还会放上当地的地图（缩小版）。还有，让当地人帮你写一些东西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会帮你补充很多细节。

举一个例子来说。有一次我去伊朗采访，听到一群年轻人在唱歌。虽然我听不懂他们在唱什么，但因为波斯语跟阿拉伯

语发音很像，有一些字我明白。当时我跟他们讨论，这首诗到底唱的是政治还是爱情。后来我就请他们把这首诗写在了本子上。我后来再找人翻译出来，才知道他们想要说什么。他们说，古代的情诗都在唱诗人的不得志，其实是有政治含义的。

所以我说，让当地人写出来，就能帮你补充细节。很多时候，当地人给你画东西也好，写东西也好，将来对你补充细节是非常有用的。而且我的笔记本是这样来使用的，我去一个地方就用一本。在这一本的封面上写上地点和时间，而且差不多用同样的本子，你放成一叠就会很容易找。

过去写东西，当然是用纸。那时候写日记，就像写散文一样。但是现在都是在电脑上工作，很少用笔。现在写字都不像以前真的像写字的样子。我觉得用电脑的话，思考的速度会快一些。但比如看到一段特别好的文字，我还是会抄录。那个写的过程，好像把那段文字再咀嚼一遍，那种味道很特别。但是现在的节奏，很少容忍我们这样去做，所以我基本上是用电脑。我不觉得用电脑对思路有很多阻塞，除了互联网的干扰，其他没有什么。

我经常是拿着笔记本电脑躲去星巴克，或者是在飞机上写。我有一阵子发现坐飞机时特别有灵感。现在又懒了，因为飞机上可以看电影。我想各位如果真正喜欢写作的话，有时候真的要适应断网的状态。当然如果你自制力比我好得多的话，你可以不断。

除了阻止你去浏览各种网页，我觉得断网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减少你受别人的影响。因为互联网时代，各种东西都传播得特别快，有时候你看别人的东西，坏的东西会占据你的头脑，影响你的思维。所以有时候你稍微断一断，不管是一天当中的哪段时间，这对于回归你自己、找到你的特色是很有益的。

过去的写作与现在的写作

近几年，我常常觉得写作环境不是很好，当然这只是我们被互联网改变的生活中的一个小侧面。以前的作家是不会马上看到评论的，他们看到的评论也是几个比较权威的机构发布的。

任何一个普通人对他的看法，很难被放大。他或许会知道一些，但不会知道很多。而且过去那些权威的评论者对民意会有相当大的引导。但是现在的写作者随时要面对即时评论，如果你真的在意的话，这会非常影响写作。当然，你可以说，我根本不在意。但问题是，现在除了评论，还有阅读量，等等。

现在很多时候我们会根据热门的话题来决定说什么，这跟过去的写作方式完全不同。而更可惜的是，在我刚开始写作，或者刚开始对文学感兴趣的时候，我喜欢的那些作家，要么在这个时代里倒掉了，就像过去的偶像现在已经变得名声不佳了，背负很多误解，还有就是以前我喜欢的一些人，他们的写作方式、经验已经不大可能复制了。

你做新闻的话，不可能不看法拉奇的《风云人物采访记》，这是我想给大家推荐的书之一。我有两本小册子，居然丢了一本，非常可惜。就是发黄的那种，非常薄，是很久以前出版的。

作者法拉奇那个时候的写作，可以先用7天的时间跟被采访者接触，之后两个人才开始坐下来对谈。而且她之前会看很多材料，有的人说她看过的材料有一米高、一吨重，总之她看了很多材料。她的采访，简直是一门艺术。她之前会有很多对人的描述，之后是两个人的问答。那种技巧，真是气势磅礴，问答间像两个人在舞剑一样，非常精彩。

第一，她那时候有很多时间和空间去做功课。第二，那时候没有电视，现在的采访大多是在电视镜头下进行的，被采访者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想说的是，现在回过头去看，你以自己当年喜欢的一个领域的大师为偶像——你过去可能认为，在这个领域里，最牛的人就应该是这样子的——你想到做到像他一样，或者你想效仿他那样去做，就能做得很好，但现在不可能了，因为所有的条件都变了。

法拉奇那个年代，我定义它为“手工业时代”，可以做出很多独一无二的东西来。而我们现在是“工业时代”，需要的是大量复制并追逐利润。所以现在很难去复制手工业时代的那些写作方式。如果法拉奇在今天继续采访的话，我想她得到的关注，或者是她能做的，可能跟她当时完全不一样了。

现在的新闻写作跟过去不太一样了。现在是读图时代，很多人说喜欢看图。还有的时候，我听到太多人说要做视频，好像每个人都想看视频，不想看文字了。

其实我也很困惑，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因为对我来说，如果看到一个视频，我未必想打开。因为如果是文字，我会很容易、迅速地找到它的重点。你点开，然后翻一翻，滚动一下，差不多就知道重点在哪里，有没有你要的东西。但视频的话，你没有办法预测下一秒是什么，你看不到它的全貌。差不多头两分钟看完，觉得没有东西，就不会再看了，或许后面有好东西，但我也看不到了。所以我怀疑，视频真的是未来的主流吗？我觉得对于传播来说，文字是更快捷的一种方式。

在这个年代，如果大家对写作还有兴趣，你首先要问自己，想拿写作来干什么？你要知道这条路非常难走，也非常奢侈。我有个做电影导演的朋友，他说看侯孝贤的电影都会觉得，天哪，那是个农业时代。人跟人的关系都是土地的关系。现在呢，放眼看去，工业时代中人与人的关系是流水线的关系。所以我们面对的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想写作，你可能真的要想清楚自己想干什么。

当然，很多人并不是以写作为职业，很多时候只是想表达，想通过写作把自己呈现出来。

“破茧”计划是非常有意思的。我觉得它最具革命性的一点是，改变了写作的话语权的归属。过去写作的话语权是在作家手里的，你想描述某一种职业的人，那么你能只能去体验或者

采访他，把他的经历写出来。但现在写作的话语权交到了每一个人手里边，每个人都可以去表达自己。

我觉得通过局内人，就是在这个行业中的人来写的话，肯定要比外面的作家写来得好。这种写作的话语权的转移是非常具有革命性的。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珍惜这一点，真的能够写出来的话，是非常了不起的。

发现可写的故事主题

万千（三明治主编）

相信在每个人的生命里，某一刻都曾有过想把自己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写下来的念头。

可是如果自己想记录的这个故事，并不只是想要留存在日记本里自我追忆、欣赏，而是希望能够吸引读者来阅读的话，那么就要回到故事的起点——主题——来谈起。

自2011年3月，三明治成立以来，我们从一开始关注“上有老，下有小”的夹心层一代开始，带动各行各业的朋友尝试写作，到后来发展成为一个更综合的、立体的、鼓励中国人通过写作进行自我表达的文化平台，在8年的时间里，已经积累了上万篇真实的中国故事。

聚集在三明治平台周围的写作者，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在与文字无关的各行各业里工作，比如医生、律师、经理人、企业管理者等。他们可能从来没有参加过媒体行业里传统的选题会，对自己写下的故事是否能够被读者关注并不自信。所以往往，我们在和这些写作者沟通的时候，第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如何寻找故事？什么是值得写的非虚构故事？”

一个故事的选题价值基本上分为以下几点：社会性、时代性、世界性、文化价值、情感共鸣。

三明治曾发布一篇《我妈参与的“中国式卖血”十年》，作者写了自己母亲在他小时候就和村里其他女性一起去邻村血站卖血的故事。里面写道：

我们村当时有50多户人家，总共120~150口人。妈妈告诉我，最多时，一起出发去“卖血”的能有十几人，相当于除去老年户，将近一半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里，当妈妈的都参与了。

沿路聚齐后，妈妈们首先要穿过整个村子，这常常引起此起彼伏的阵阵狗吠。狗在这时显得很讨厌，她们的本意是想安静地通过，不想让其他昏睡中的村民醒悟到今天又有人去隔壁县城了。

出了村，还要步行3.5公里才能到达县城边沿固定的上车点。这条通往县城唯一的泥土路在我们村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虽没有路灯，但对经常走这条路的妈妈们来说不是问题。在漆黑里，她们能熟练地跨过有积水的坑、脚尖能巧妙避开陷在路中间的石块。

这段路程是整个过程中较轻松、欢快的一段。她们成群结队，聊着八卦、互相打趣地穿过一片片庄稼和爬过几个小山坡，到达上车点。

接着要乘坐血站的车去往最终的目的地。血站的车是现在还可以看到的那类乡村公交，小而破。血站的业务当时很火，只有十几个座位的车往往要挤上五六十人，有时还会因实在挤

不上车，只能懊恼返回家的情况。上车点到隔壁崇仁县城血站只有50公里，但是路况不佳加上严重超载，这段路往往需要走上两个多小时。

妈妈回忆说：“那时候整个过程最怕的是路上坐那破车，一上车就吐，一路吐到血站，抽完血后一路再吐回去，吐到现在想到都想吐。”

这样的故事其实就是有社会性的，在这些详细的描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日常生活令人惊异的、被现实弯折的一面：一个在母亲眼里看来再平常不过的清晨，一个有说有笑的旅途，竟然是去“卖血”赚钱。这对于读者而言无疑是种冲击，从而思考起背后的链条。

在这个故事里，作者也写到自己心理的转变，由一开始想到自己上学的学费是母亲通过卖血得来的，会感到羞耻，但是在工作之后，他开始关注这个话题，也关注村里现况，这让他对这个事件有了更多的理解。

一个故事，是一把钥匙，它会带领我们打开人心的大门。

但是我们也经常碰到写作者提问，说自己的生活很平凡，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事情，是不是就不值得记录了？

如果一个写作者永远在等待外部世界的变化，或者等待命运抛给他一个石破天惊的选题的话，他是永远下不了笔的。选题永远不是“新”的，甚至很有可能早就被前人总结过，关于家庭、爱情、寻找自我、转变、冒险、谜题、神秘等等。

我们也会发现有些作者“野心”很大，当他想要写一个选题的时候，会希望这个故事能够囊括他想要表达的方方面面。但是我们经常劝诫写作者，故事主题要聚焦，不能泛泛而谈。在你下笔之前，先试着问问自己，能否用一句话概括出自己想要通过这个故事表达的事情。

美国作家杜鲁门·卡波特曾经在接受《巴黎评论》的访谈时说过：任何艺术形态的最高强度都是由一副深思熟虑的头脑来实现，对故事烂熟于心的作家才能写好故事。当一个写作者去构思一个人物故事的时候，其实你需要去经历漫长的深思熟虑的过程，把所有的细节，归纳成一个主题，然后反反复复地去写。你要对故事的主题有非常确定的概念，把故事烂熟于心，你才能写好它。

可能有人会问，普通人的生活故事，意义在哪里？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写作，更像是我们提倡的“生活写作”，我手写我心，去捕捉日常生活，从日常生活中寻找故事。但是可能读者受到传统媒体或者非虚构特稿的影响，认为只有那些存在激烈冲突的、有重大意义的，或者特别离奇超出常规经验的故事才有传播的意义。

但三明治始终相信，生活写作所挖掘的普通人的故事，无论对于写作者本身，还是对于未知的读者，都是有价值的。就算没有读者，或读者很少，作为写作者而言，表达就是一种对自我的再次确认，是对自己的嘉奖。

每个人都可以写作。你可以写一个人物的故事，主角可以是你的亲人，也可以是“熟悉的陌生人”。你也可以写一段令自己难忘的经历，也许是一段旅行，也许是一份工作。

另外，在几乎所有和写作相关的项目里，我们发现都有作者会记录下有关死亡、失败、身体虐待、情感虐待、羞辱和痛苦的感觉等等。书写，并不是为了揭开伤口，而是用写作为自己疗愈，从过去的回忆中走出来，更坦然地面对自我。

人们所写的故事是有力量的，永远不要忽略普通人讲述故事的力量。我们希望大家带着这样的意识，去重新审视自己的日常生活，找到那个打动你的人物或者事件，作为自己“非虚构写作”之旅的开端。

偷拍父母的390天

李赛

我曾连续偷听、偷拍我妈和我爸，390天。

2014年12月21日

我：妈，你怎么总是这么天真？

妈：我心理年龄24岁。

我：为啥是24岁？

妈：因为那年我认识了你爸。

2015年5月11日

我妈每次上班都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临走还得摆个 pose（姿势）。

我总是捧臭脚，说：“你这明明就是30多岁啊，太给我压力了。”

我妈抱怨：“你爸连眼皮都不抬一下。”

我爸说：“我一看你就腿软。”

2015年11月20日

吃饭时我爸摸着自己的脸，捧成了一朵花形，说：“我每天洗脸都想多摸自己一会儿，很少有男的像我皮肤这么细的。”

我妈也摸着自己的脸，说：“这叫小鲜肉。”

大部分时候，我靠在饭桌后面的沙发上，父母以为我在玩iPad（苹果平板电脑），其实我在相机里看他们。常常听着、拍着，我被狗粮浇得满头满脸。

现场没有打光，模特没有化妆，甚至连镜头在哪里都不知道。刚回家顺手放在凳子上的外衣，被三双筷子分食过的残羹，胳膊肘磨破又补上的毛衣，我穿过又穿在爸爸身上的坎肩……不经调色，它们被我默默地收进镜头里。

新加坡的摄影师李培炆拍过很多关于自己父母的黑白照片。他说，其实父母很相爱，可是肉眼看不到，需要拍出来。

作为一个只用过傻瓜相机的人，我拍的这些照片缺少构图，人物模糊，从摄影的角度看，可以算技术的废品。

但里面藏着肉眼看不到的爱。

我将幸福又微小的瞬间一把拽上了岸

我为何要偷偷进行这段地下工作，故事还要从住在一楼的奶奶说起。

2005年我家刚搬进这栋楼时，我还在上高中。早晨上学，常看见一层的爷爷骑着电动车，载着奶奶去买馒头。我礼貌地向他们问好，然后只见爷爷脚下一踩，蹬车便奔向朝阳。当时我并不知道，那一年正是爷爷奶奶牵手的第六十年。

上大学后，我只周末回家，对于楼下的消息，都是从妈妈那里听来的：爷爷去世了，奶奶骤然间瘦了很多……每次见保姆都是新人，奶奶仍旧不满意……奶奶又胖回来一些了……

有一天，妈妈无意中念叨：“咱家楼下的奶奶，现在还给老伴写情书，写完就放在枕套里。”

我倏地被钉在原地，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双婆娑泪目，贴近昏晕，对黑夜絮语斑驳岁月中的执手不易，向信纸托付无人应答的思念。

这会是怎样一段爱情？

我对楼下奶奶感情世界的好奇，源于我对爱情和婚姻的困惑。在过去的28年里，我没谈过一次恋爱，有时对着镜子看自己，我会想究竟是男人眼睛有问题，还是我有问题。

但，也许是我的问题。我不太相信爱情，两个人之间怎么能从互为陌生人到爱对方，像爱自己一样，甚至比爱自己还爱

呢？我不知道什么样的爱情才能抵抗生活琐碎的腐蚀，不知道怎样到晚年还能住在爱情里，而非婚姻的空壳中。

然而因为没尝过爱情的滋味，我又无比憧憬，那些经过时间沉淀的爱，尤其让我着迷。

于是，我让妈妈和奶奶打了招呼，在一个周六的下午两点，我带着笔、本和照相机敲响了奶奶的门。我想做个听众，让眼前这位走过八十载的老人一点点还原每个时代下她和老伴的爱情。

谈话从采访变成了陪伴，奶奶愿意讲什么我就听什么，尽管每次反反复复都是相似的内容。关于她对已故老伴的感情，我从未直白询问，总觉得过于残忍，就连枕套里面的情书我也只字未提。

我只偶然在她记事本上看到一句：老王，你放心，我不会变心，我一定尽快到那边和你相见。

一次陪奶奶聊完天，我上楼推开家门，父母被火锅的蒸汽围在中间，招呼我快来吃饭。而我涮了几块豆腐，就放下了碗筷。

看着眼前的父母，我忍不住想，等他们像奶奶那么大年纪时，会不会记不得以前的故事？也许不用等到暮年，他们当下给彼此夹菜的瞬间，第二天甚至下一秒都可能被遗忘，关照彼此已经变成他们的习惯动作。

每个瞬间都注定要消逝，时间将珍贵的瞬间锁进生活的缝隙，然后将钥匙丢进宇宙。父母是不会被写入宏大历史的平凡个体，没人会觉得他们看似重复的日子有必要记录下来，甚至父母自己都觉得，“每天都这么过，有什么好记的？”

除了我。

我想要那把时间钥匙，想等父母老到需要我搀扶时，给他们讲那些因为觉得太平常而忘记的瞬间。因为他们于我而言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是我愿意一辈子贴在心脏旁边的人。

于是我靠在沙发上，将下一秒就消失的幸福又微小的瞬间，一把拽上了岸。

那一刻，时间定格在2014年12月16日。

我在柴米油盐中看到他们爱情的模样

有件事我一直没闹明白，那就是我妈为什么会和我爸在一块儿。虽然他们当然得在一起，否则就没我了。

我妈从小到大都是好学生，我是听着她熬夜复习考全校第一的故事长大的。她不仅学习好，还端庄大方，56岁的人，每天早起都要精心打扮，画眼线刷睫毛膏，还用打火机烧热了牙签卷睫毛。

而我爸，一直是个“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上学时经常逃课、打架。他有一回和我吹：“想当年爸还是俄语

课代表呢！”我一听心里特激动，终于看到一个光辉的父亲形象了。没想到他接着说：“因为同学都不交作业，我当了课代表之后没人敢不交，谁不交我打谁。”

这两个差异这么大的人，是怎么看对眼，又是怎么一起走过了将近30年的？我一直很好奇，于是我开始在镜头里观察他们，虽然大部分是在饭桌上的日常。

一家三口一起吃饭，是在我偷拍开始前不久，才变成我家的日常。

我爸是厨师，自我记事起，饭桌上三人聚齐的时候很少，因为他总在给别人做饭。我和我妈要么吃我爸提前炒好的剩菜，要么吃点水果就把晚饭对付过去，别人羡慕我有个厨师老爸，我只能在内心苦笑。

直到2014年12月，我爸转岗，才终于能赶在饭点进家门。我妈也开始正儿八经地下厨房，洗菜、切菜，屋子里总是热气腾腾。忙碌了一天回家，做饭、吃饭，抱怨单位的烦心事，这种别人家的寻常事，对我却特别陌生。

所以，偷拍不仅是记录爸妈的生活，也是一天天填补我二十多年记忆缺口的过程。

他们聊天时，我精神集中地注意着每句话。就像习惯了把《新闻联播》当背景音，现在却要留意每条内容。我还要克服对自己记忆力的过分自信，听到对话后迅速跑到屋里打开本

子，记上去。有时因为入戏太深，没及时写下父母的精彩对白，过后竟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只能依据印象模仿。

在这390天里，我看到的他们的爱情是什么模样呢？

有天晚饭有牛肉，我妈为了减肥没吃几块，我爸心疼，夹了好几块给她。我妈连连说：“我吃了，我吃了。”我爸接话：“我没看到，我没看到。”

有天我爸下班来了条短信：“走着。”我妈就开始算计时间。一会儿楼下门铃响了，我妈宣布：“准备接驾。”

有天我爸说，在我和我妈去旅游的时候，他天天向我奶奶祈祷：“老太太，你要保佑她俩平安啊，不行你就上啊！”我就想了想那个画面：我奶奶从土里爬出来救我和我妈。

有天我指甲发炎化脓去医院挑破了，回家我爸看着我裹的纱布说：“我周四开瓶时手被划掉一块肉，当时就用两个创可贴堵上了，周五我还洗衣服呢。”我妈在旁边赶紧说：“你不是问我为什么找你爸吗？你看看！”

有天晚饭时我说，爸，你娶了我妈，简直是中了500万个500万。我爸说：“我和你妈的感情不能用金钱衡量。我们年轻时的浪漫都没和你说过。”

也许我无法见证他们年轻时的浪漫，却在这柴米油盐、拌嘴打岔中，躲在沙发上的镜头背后，看到了他们的爱情。

我的角度，没有人可以替代

饭桌上的故事就这样每天上演着，从2014年12月16日一直到2016年1月10日。因为后来我离开了北京，去昆明工作一年。

想家的日子，我就打开“偷拍”的文件夹。

2016年4月26日，是父母结婚29周年纪念日。我窝在距离北京3000公里的出租房里，把390张照片洗出来，一张张粘到黑卡纸上。春节假期我连门都没出，把在本子上记录的对话敲到电脑上，打印出来，裁剪成合适的尺寸贴在照片旁边。

在爸妈结婚纪念日前，一本承载着390张照片和28474字对话的相册，被寄回了北京的家里。

偷拍、偷听的记录，让爸妈在视频记录的镜头前掉了泪。他们没有想到我会把他们自己都忘记的对话、他们重复而不同的日子，偷偷记录下来。

离家之前，我交给我妈一个任务，让她在一个本子上记录我不在家时他们的生活。1、2月她还每天写，3、4月开始三天打鱼两天晒网，5、6月开始就直接蒸发……

我不在，他们的二人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的？

2016年2月18日，今天微信支付5元看了一部英国大片《虎胆龙威5》，非常好，我给你爸发了一个红包，20元，还可以看

3个，挺好玩。与时俱进，接受新事物。那天去串门还尝试了一回滴滴打车。

2016年9月12日，昨晚炖了猪蹄山药，拌了圆白菜，熬了一锅杂豆粥，蒸了两根玉米，最后老李喝了一碗粥，又吃了半个玉米。他在吃玉米时说：这玉米是甜的（他有糖尿病）。我说：没事，就吃半个，再说黄颜色的对眼睛有好处。老李说：哦，我说大家怎么都爱看“黄色”的呢，原来是对眼睛有好处。

第一次到南方生活，我水土不服，鼻子上长了一个大包，那段时间我妈的日记有着基督徒祷告般的结尾。

2016年1月27日。今晚吃的我单位的晚饭，鸡丁和圆白菜。听说你那边好几天都没水了，冷水和热水都没有，真是够苦的，体验一下艰苦也好，以后会更珍惜好日子。上帝保佑昆明的天气赶快暖和起来，上帝保佑你那儿赶快有水。上帝保佑你鼻子上的包赶快下去。我们一切都好。

只有很少几次，她表达了我爸的感情。

2016年4月26日，今天是我们结婚29周年纪念日，很开心能和老李同志共同走过这29年，虽然也偶尔有些不愉快，但这才是真实的家庭生活。现在看的电视剧《姐妹兄弟》中程洁说了这么一段话：女人结婚就像是第二次投胎，好了，就是进入天堂，否则有可能就是地狱。我觉得我非常幸运，上帝把我送入了天堂……

回顾29年，老李几乎没主动说过“我爱你”（除了喝多了的时候），但他说的最让我感动的话是“你干活我心疼……”希望我们的幸福生活长些，再长些，下一个目标是五十年金婚吧！

2017年1月，离家一年后，我又回到了北京。

现在的我已经不用偷拍了，我会明目张胆地抓拍一些让他们措手不及的瞬间。

父母看我拿iPad就会下意识地憋口气，有一次我在镜头里还看到我妈偷偷翘起嘴角。至于记录，有时候我妈还会提醒我：“这句话要不要记上？”

2017年4月26日，是爸妈结婚30周年。这个年份被称为珍珠婚，仿佛珍珠的形成就像婚姻，两个不同个体在机缘巧合下走到一起，经过日日年年的磨合，沉淀出迷人的光彩。

以前，家像一个舞台，父母从我出生第一刻起就在这个舞台上。我习惯了他们的声音，熟悉了他们的站位，慢慢地他们变成了背景。我只顾着演自己的部分，从没有认真看过这个舞台，以及身旁的两个角色。

当我脱下演出服，坐到台下，像第一次走进剧场的观众到处打量，才惊觉，建好这样一个舞台需要多少情感维护，才能看懂父母的戏份是多么精彩。

在他们手拉着手走向金婚的路上，我会一直在后面记录。

一天一张，一天一段。

这个角度没有人能替代。

这个患儿的母亲，拯救我麻木的医生日常

吴岳

每周二早晨，我都要比平时早起半个小时，在7点前赶到医院，参加例行的疑难病例讨论。

主任体谅大家辛苦，让食堂把早餐直接送到办公室，搭配基本固定：20个包子、10根油条、10杯豆浆、10个烧饼夹鸡蛋，还有一盆疙瘩汤。阜外医院的伙食口味绝对没得说，一共八九个医生参与讨论，分量也是足够的。尽管如此，早起半个小时依然是痛苦的折磨。况且，真正能调动起大家兴趣的疑难、复杂又有趣的病例，还是少数。

绝大多数能够来到阜外医院病房准备手术的患者，都是经过了各级医疗机构层层筛查的。诊断基本明确，该做什么检查、选择什么手术方式、术后多久撤呼吸机、第几天拔引流管、第几天拆线、出院之后多久复查，有一套规范的流程。

阜外医院是全世界最大的心脏专科诊疗中心，一年要做一万多台外科手术。在这里工作有时会有一种错觉，仿佛自己是一条巨型流水线上的机械手臂，来做手术的患者就是被送上流水线的待检机器。每个患者经历检查、手术、恢复、出院的流程，大多数恢复正常运转，重新投放社会，少部分病情实在太重，我们也无力回天。

医疗行业一直都被赋予仁心仁术、救死扶伤这样崇高的精神内涵，可作为一个一线住院医师，更多时候不过是单调机械地重复医疗行为。有一段时间，我就在这样的状态下工作。

直到赵彩娥、赵新健这对母子住进病房。

三胞胎中最小的那个得了先心病

那是赵彩娥第二次带着儿子来阜外看病，第一次是三年前，孩子刚出生不久。

赵彩娥来自山东菏泽农村，五年前来到北京，因为在家种地不挣钱，也因为年轻人对传统生活的不满和对都市生活的向往。来到北京后，赵彩娥在一家干洗店打工，并在那里认识了孩子的爸爸。一起生活两年后，赵彩娥怀孕了。

两人有结婚的打算，但因为孩子爸爸正在跟自己父母分家，独立落户的手续没办好，结婚的事就一直耽搁着。尽管出身农村，赵彩娥对待婚姻的态度却很前卫，她觉得只要认可这个人就能在一起生活，没计较领证的事。

孩子一天天把赵彩娥的肚子顶起来，赵彩娥的肚子比一般孕妇的大出许多。检查后发现，赵彩娥怀的是三胞胎。三个生龙活虎的小家伙的出世，冲淡了未婚先孕给这对年轻人带来的诸多压力与纷争，赵彩娥也沉浸在初为人母的喜悦中。

不过这种喜悦并没维持多久，就被新的、更大的忧虑取代了。

赵彩娥发现，最小的孩子每次哭闹一阵后，嘴唇就会变紫，有时甚至会翻白眼。邻居说，孩子可能有先天性心脏病。赵彩娥赶紧抱着刚满月的小儿子到我们医院看病。

心脏超声的结果很快出来，诊断是肺动脉瓣狭窄。单纯的肺动脉瓣狭窄一般病情较轻，有些甚至不需要治疗。但赵彩娥的小儿子很不幸，属于极少数很严重的情况，不仅肺动脉瓣狭窄，右心室和三尖瓣发育都不好，肺动脉也有狭窄。

人的心脏内部分为左右两部分，右心室先把血输送到肺里装配氧气，富含氧气的血回到心脏，再由左心室输出到全身各处去供氧，供完氧的血顺着静脉回流心脏，再被右心室送到肺里，如此循环往复。含氧量的高低决定血的颜色，含氧量越高，颜色越鲜红，含氧量越低，颜色越深、越暗。

如果右心室发育不良，肺动脉瓣狭窄，能输送进肺里装配氧气的血液就少，循环到全身各处的血氧含量就低，直观表现就是口唇、指甲发紫。如果孩子哭闹起来，耗氧量急剧增加，心脏和肺一时供应不上，就有可能突然晕厥。赵彩娥在家里看到的儿子哭闹后嘴唇发紫、翻白眼，就属于这种情况。

门诊医生告诉赵彩娥，她的小儿子不仅需要手术，而且需要不止一次手术。就算治疗成功，孩子长大成人的过程中也有可能伴随各种并发症，生活质量不会很高。至于长大以后的劳动能力和预期寿命，更是无法保证。

听到这些，赵彩娥觉得眼前一片灰暗。而更严酷的现实是，治病要花钱，这么复杂的病，总共要花上二三十万元。上哪去凑这二三十万元？两个在洗衣店打工的年轻人，一年不吃不喝也只能攒下五六万元。可孩子的病又不能等，眼看着小儿子一哭闹得厉害就翻白眼，说不定哪次缓不过来，孩子的小命就没了。

再说，除了这个生病的孩子，也得考虑另外两个健康的孩子，就算眼下能借到钱治病，接下来的日子怎么办？

卖孩子？还是养下去？

在北京，即便是养活三个健康的孩子都是很大负担，更何况还有一个要花几十万元治病。倾家荡产给小儿子治病，无论能否治好，将来的生活都会非常艰难。如果实在没处去凑齐这二三十万元，又非要三个孩子都能活，该怎么办？

走投无路的时候，有邻居给他们出主意：卖孩子。

赵彩娥打工的干洗店在北京一个高档小区里，有经济条件不错却生不出孩子的业主听说赵彩娥生了三胞胎，想要收养一个，拜托跟赵彩娥熟识的邻居沟通。“想要孩子的那家人也是真心实意，一定会待孩子好。”邻居说，“小儿子治病急需钱，那家人马上就能拿出来，卖掉的孩子，可以等断了奶再抱走，只是往后两家人谁也不能再提这事。”

这是赵彩娥万万没想到的一条路，孩子都是身上掉下的肉，有病的是可怜，没病的也舍不得卖啊。

孩子妈妈坚决不同意，孩子爸爸却听到心里去了，一个健康孩子能卖二三十万元，拿这笔钱给小儿子治病，如果治好了，虽然不能和卖出去的孩子生活在一起，好歹也都能活着。最差的情况，即使治不好，卖一个、死一个，还能剩一个。

孩子爸爸对卖孩子的想法越来越着迷，反复劝说赵彩娥把孩子卖了。到后来，赵彩娥都不敢让孩子爸爸单独把孩子抱出去了，万一真卖了，因为没结婚，孩子还没上户口，到时候要都要不回来。孩子爸爸看卖孩子没戏，就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拿出去卖，理由是给小儿子看病需要钱，不卖孩子就得把这个家都卖了。

赵彩娥觉得无法跟这个人继续生活下去了，便悄悄带着三个孩子回了山东老家。“就算没钱治病，也不能放弃不管，自己好好养，能养多大算多大。”她甚至有些庆幸没领结婚证，省却了很多麻烦。

回到乡下后有父母帮忙，三个孩子带起来也不算艰难。小儿子成了重点保护对象，不能饿着，不能冻着，更不能磕着碰着。三兄弟之间偶尔有打斗，但必须得让最小的高兴，不然一闹起来又要犯病。在全家的呵护下，小儿子犯病的次数不算多，生长发育上也跟两个哥哥差不多。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小儿子嘴唇紫得越来越厉害，而且由于从小一直被惯着，稍微有一点不顺心他就闹脾气，长大后懂的更多，闹得也更凶。在家晕厥过两次后，赵彩娥觉得再拖下

去也不是办法，这几年在离家不远的城市打工，攒下两万多元积蓄，她决定再带孩子来北京看一次病。

这一次，赵彩娥找到我所在病房的主任，主任对她说的话，和她两年前听到的差不多，她却听得更明白了。她记住了最重要的两点：

第一，让她觉得绝望的那二三十万元手术费，不是一次就得交上，做第一次手术用不了那么多；第二，无论从手术时机上考虑，还是从孩子现在的状态看，都不能再等了。

手术要分几次做，钱也分几次交。至于到底要做几次，每次间隔多久，都要看前一次手术后心脏血管发育的情况。复杂的先天性心脏病需要很多辅助检查，才能确定治疗方案，现在连第一次手术具体该怎么做还说不准。按以往经验，这一次估计七八万元就够了。

虽然这依然是个大数目，但已经不是那么遥不可及了。况且还可以申请公益基金会救助，病越重，家里越穷，能申请下来的钱就越多。一般一个基金会能资助一两万元，可以同时向两三个基金会申请。基金会资助，再加上向亲戚朋友借点，凑够七八万元应该不成问题。

住院期间走了两遭鬼门关

看病的当天，赵彩娥就带着孩子办理了住院手续。

由于病情很重，应该尽快完善检查，经过一番协调，最关键的心血管造影和导管检查第二天就可以做。

小儿造影检查刺激较大，可能引起病人情况不稳定，一般由护士陪同，带着氧气罐、急救箱备用。检查通常在中午结束，护士会提前通知医生去接病人，可那天刚到上午10点电话就打了过来，病人在导管室又晕过去了。

不到3岁的孩子，从小娇生惯养，突然离开妈妈孤零零地被放在造影床上，肯定会哭闹。一般情况下医生会给点麻醉，让病人镇静，减少耗氧。可这孩子实在闹得太厉害，药还没给进去，人已经不行了。

导管室医生和麻醉师立刻进行抢救，等我到达时，孩子的情况已经恢复平稳。导管检查当天肯定是不能再做了，甚至以后也都不敢再给这个孩子做：一根导管从大腿根顺着血管穿到心脏里，刺激太强烈，太危险了。

回病房的路上，我向赵彩娥解释刚才发生的事，她没有抱怨，一边不停地道谢，一边焦急地问：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通过心血管造影和导管检查可以看到心脏射血的动态图像，以便评估心室的发育情况，测量心脏内部和几个大血管的压力、氧浓度变化，这是最理想的检查。现在做不成，只能退而求其次，做CT（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看心脏的静态结构。因为CT和造影都是有放射性的检查，不能同一天做，再加上要协调各个病房的检查需求，因此CT被安排在周五。

就在这等待的两天中，孩子又经历了一次危险。

周三下午大概两三点钟，我正在办公室写病历，护士叫我去看看这个病人。因为上一次在导管室的抢救经历，这孩子已经被我们列为重点关注对象，稍微哭闹厉害了就得去床边看着。

我过去时，孩子虽然在闹，精神状态还可以，赵彩娥一直哄着，但没有作用。不一会儿，孩子的嘴唇又开始发紫了。我让护士把氧气接上，再给点镇静药，孩子太闹吃不下药，只能从肛门给药。就在取药的工夫，孩子的神志开始变差，声嘶力竭的闹变成有气无力的哭，等护士回来刚把药给进去，孩子就大小便失禁，药全都拉出来了。

看到常规处理没效果，病人情况还在恶化，我赶紧叫护士长和上级医生过来。我们病房的护士长干了30多年儿科，一眼看出来不对，一把抱起孩子就往监护室跑，裹孩子的小被子上还有屎和尿，也顾不上躲。

到监护室里孩子已经快没呼吸了，连上监护仪器之后发现血氧饱和度不到10%，正常人是100%，先心病孩子差的也有60%~70%。护士长赶紧给孩子扣上面罩加压给氧，一边自己操作一边指挥我联系麻醉科紧急气管插管，另外两个护士去准备插管所需器材、药品。麻醉科医生不到两分钟就赶了过来，准备喉镜的时候，护士长说，应该不用插了，孩子的自主呼吸已经逐渐恢复，血氧饱和度也在往上走。

这孩子，又从鬼门关走了一遭。

在生死关头，她没有犹豫地说“要”

疑难病例讨论是先天性心脏病病房延续多年的特色传统，由于先天性心脏病分类分型复杂，许多病名字听起来差不多，治疗方案和结果却千差万别。有些病手术机会尚存，即使经历痛苦，最终还是能够痊愈。有的根本没有手术机会，只能回家等着，能活多久算多久。更复杂的疾病需要分期手术，可就算经历三四次手术，最后也不过是能够长大成人，没有劳动能力，只是活着而已。

讨论有助于明确疾病的分类分型，判断有无手术机会，确定手术方式，也可以预估病情的发展。主任也可以借机考考年轻医生，然后延伸出一些还没来得及写进教科书的前沿进展，如果来了兴致，还会分享一些独门秘籍和私家经验，对年轻医生们来说，这是难得的学习机会。

可在患者家属眼中，所谓讨论，就是对孩子命运的审判。

在周二病例讨论时，主任就曾说过，这个孩子来得太晚了。一般右心室发育不良的患者，第一次手术的理想时间是6~18个月，具体的手术方式要看病人心脏血管的发育情况，第一次手术在1~2年后再进行评估，决定什么时候第二次手术，是第二次手术就能解决全部问题，还是继续分步走，安排第三次手术。从身体发育的情况来看，这个患者的心脏发育应该不算

太差，但是从症状的严重程度来看，又不容乐观，只有尽快完善造影或者CT检查，才能决定手术方式。

现在孩子三天内两次晕厥，CT、造影一个都没做成，再等下去，谁也承受不起，如果等周五做CT，孩子至少还要在病房等一个周末，风险太大。就在监护室抢救现场，主任、医疗组长和参与抢救的几个大夫进行了一次讨论，做出决定：尽量把CT提前到周四，如果条件允许，周五就手术。

等孩子情况平稳了，主刀医生跟赵彩娥进行了一次严肃的病情交流，把孩子现在的情况、下一步计划和将来可能出现各种可能性一一交代。

孩子病情本来就复杂，又拖到这么晚才治，缺氧发作频繁，有手术的指征。但由于检查不完善，对病情了解不确切，没法确定具体手术方案，也就无从预估风险，就好像即将奔赴前线打仗，却不知道敌人的实力，只能上战场见了面再说。

这意味着非常巨大的风险。如果病情过于复杂，有可能硬着头皮做完手术后，病人下不了手术台；也可能开胸后发现根本没法处理，再原封不动地关上，什么都不做，至少不会变得更差。

听这些话时，赵彩娥一直在抹眼泪。

但当被问到要不要做手术时，她快速地说了一个字，“要”。回答的干脆程度，让我们都有点担心，她是不是没听懂即将面临的风险。

主任又补充道：“你得明白有这么一种情况，手术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有可能上了手术台下不来，有可能进了监护室出不来，命全靠机器维持，坚持多久能看到希望，能不能坚持到胜利，胜利了会不会有后遗症，都不好说。你现在做这个决定，就得想好，万一真到了那一步，是砸锅卖铁继续往前走，还是以自己现在的能力治到哪一步算哪一步，超出能力范围就认命，到时候哪怕人财两空，也不再有遗憾了。”

“想好了，要做。”赵彩娥再一次确认自己的决定。

原本我只是想听听下一步的治疗方案，看看有没有自己的活要干，却意外地被眼前这个农村妇女朴素的笃定打动了。

她显然不是什么饱读诗书、懂得很多大道理的人，也不像经历过什么大场面。我还记得他们刚来住院时，这对母子简直就像从土坡里爬出来的，浑身上下蒙着一层灰，说起话来也是乡土气息浓厚。

或许是见过太多家庭在这一刻的犹豫不决，或意见不统一，或反复追问医生无法保证的事，这个浑身上下冒着土气的农村妇女干脆利索的决定，让我们都有点意外，也有点震撼。

手术前一夜是最难熬的

确定方案后，我们几个住院医师立刻忙碌起来，我负责写抢救记录。另外两个同事一个负责联系CT室，把原本安排在周五的CT提前到周四加急做，还有一个同事负责帮赵彩娥和基金会的联络人对接，确保申请救助的材料在手术开始前递交上

去。主任和组长一边期待CT结果尽快出来，一边先靠着仅有的两次心脏超声检查，讨论出几种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并一一制定对策。

万幸的是，CT很快就顺利做完。

看到CT图像，我们已经松了一口气，虽然患者的心脏发育不好，手术条件还是具备的，在之前预计的几种可能性中，算是最理想的一种，虽然分期手术不可避免，起码这一次操作起来应该不复杂。

最难熬的是术前一夜，最怕的是明明第二天一早就要手术，病人却在头天夜里犯病，没抢救过来。幸好这一夜小家伙睡得踏实，没再哭闹。

第二天一早，赵彩娥抱着孩子到手术室大门口，手术室安排了一个孩子年龄跟赵新健相仿的护士去接，专门负责哄着他玩，其余护士和麻醉师做动、静脉穿刺均一次成功，麻醉诱导药一给进去，孩子立刻被麻倒，不给他在手术室缺氧发作的机会。一旦麻醉成功，至少在手术室这段时间，病人的情况就由我们掌握了。

监测显示，术前患者血氧饱和度只有40%左右，严重低于正常人100%的水平，即使在麻醉状态下，不适当的手术刺激依然会让血氧饱和度进一步下降。一般比较简单的手术，是由一助开胸，等把心脏暴露出来以后主刀再刷手上台。由于这个患者

病情特殊，组长亲自上台开胸，我做一助帮忙，还有个进修医生做二助。

切皮，锯胸骨，剪开心包，都很顺利。探查大血管发育情况，跟CT报告一致，可以按照术前制订的方案实施手术。通过改变患者原有的管道连接，这次先让上半身的静脉血不经过狭窄的肺动脉瓣，直接引流到肺动脉去，等到条件合适时，将下半身的静脉血也通过管道连接直接引流到肺动脉里，发育不良的右心室和狭窄的肺动脉瓣就被完全绕过去，不再使用了。

看到血管发育的情况很好，我觉得操作难度不大，暗暗松了口气，小声跟组长说：“看样子应该没啥问题吧！”组长很谨慎地回答：“嗯，做起来应该不难。不过还是得小心，这么低的血氧饱和度，稍微有点不顺就很麻烦。而且不知道远端肺血管发育的情况，等做完了看看血氧饱和度能不能上来吧。”

由于手术并不涉及心脏内部操作，心脏跳动的情况下就可以完成。不过还是要建立好体外循环通道，一旦术中出现意外情况，立刻开动转机，能确保手术安全。体外循环建立好，切断上腔静脉，近心端缝闭，远心端吻合到肺动脉上。组长每一针缝得都不快，但是都很确切，没有需要回头补针的情况，每两个步骤间衔接也很紧密，所以整体进度很快。8点半开始手术，到10点多，关键步骤都已完成。接下来，就看血氧饱和度能上升多少了。

操作完成后，打开吻合口两侧的阻断钳。血氧饱和度数字没什么变化。“远端血管条件不好？吻合口不够宽？还是合并

其他畸形？”我心里盘算着，看组长倒是不着急，让麻醉师调节一下吸入氧浓度。又等了大概两分钟，血氧饱和度开始慢慢往上走了，40%，50%，60%，70%，还在走。组长说：“这回应该没什么事了，关胸吧。”

手术做得干净，关胸速度也很快，等缝完切口，血氧饱和度已经一路飙升到90%，接近正常人水平了，我跟组长说：“如果能一直保持这个水平，都可以不用做第二次手术了。”组长依然是一脸平和：“现在是麻醉状态，吸入氧浓度高，等呼吸正常空气就没这么高了。再说，现在够用，等过两年孩子长大了，耗氧量增加，就又不够用了。”

11点多手术结束，病人送到恢复室后，我打电话通知赵彩娥，告诉她手术过程顺利，她在电话那头依然没有多问什么，还是不住地说：“谢谢，谢谢！辛苦你们了！”

我从麻木的医生生活中被拯救

小家伙的术后恢复很顺利，虽然偶尔还会哭得震天响，但因为手术有了效果，不再那么容易缺氧了。每次查房走到他床旁，医生护士都喜欢哄一哄、逗一逗他，毕竟是自己辛辛苦苦抢救回来的，心里都希望他好。

有一天我值夜班，赵彩娥抱着孩子在走廊里玩，她看到我在办公室坐着，就进来咨询一下术后复查的事。那会儿小家伙已经快出院了，恢复得很好，一会儿抢我的笔胡写乱画，一会

儿把桌上摆的心脏模型拆开当积木玩，还让我拿听诊器跟他玩打电话的游戏。

过了一会儿，赵彩娥说有张新农合的转诊单需要我签名，我发现孩子是跟她姓，多聊了两句，才知道她之前的那些经历。这些经历不寻常，她讲起来却很平静，只在说到卖孩子的时候抹了一次眼泪，很快又不好意思地笑笑，就过去了。

我好奇三胞胎中另外两个叫什么名字，她说老大叫赵新天，老二叫赵新行，最小的这个叫赵新健，请别人帮忙取了几组名字，她觉得这一组最合心意。说完，她依然是有些难为情地笑。我不确定她是否确切明白“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话的意思，不过她的行为是这句话的实践。

聊着聊着就快到晚上9点了，护士叫我去晚查房，我最后问赵彩娥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我先带孩子回老家，等恢复得差不多了，就给他姥姥带，我还得出去打工赚钱。本来这次看病就借了点，而且，还得给下次手术准备呢。”她说。

从孩子出院到现在有半年时间了，我没有再见过这对母子。出院三个月复查时，赵彩娥曾给我打过电话，我当时在做手术没有接到。后来我在电脑上看到孩子的复查结果，恢复得很好。

这段时间里，我又接诊过很多先心病患者，比赵新健病情更复杂、更危重，或者家庭情况更困难的我后来也见过不少。

唯独这对母子一直让我念念不忘。大概是因为他们刚好出现在我开始工作不久后的困惑时期，他们的出现把我从那种机械化的劳役状态中解脱出来，让我重新发现做医生的乐趣。

我的工作内容并没有改变，依然是重复着问病史、写病历、拆线、换药这些最基础的临床工作。面对治疗，患者们表现各异，有人十分配合、充分信任，也有人会犹豫、恐惧，甚至猜疑，这时要耗费更多精力才能完成治疗。

可这是在给人治病啊，人不就是这样吗？等从手术中恢复过来，他们又会急着开始新的生活。小孩子好得最快，还没出院就惦记着坐滑梯、踢足球。老人们要慢一些，但心里也都盼着能早点不用子女照顾，甚至还能反过来再帮着他们带带孩子，做做家务。都是些再普通不过的小事，可一旦具体到某一个有名有姓的人身上，就会令人感动，叫人想去帮助，这就是医生的职责。

我开始愿意去了解那些不会被写进病历里的故事，这些疾病以外的部分，让患者成为一个立体的、有血有肉的人。

每一个病人的生命都有独特性，都值得被关注，他们不再是千千万万个出故障的待检机器，我也不再是流水线上的一个机械手臂。

（注：为保护当事人隐私，赵彩娥、赵新天、赵新行、赵新健均为化名。）

第二章 开始你的采访，找到你的故事素材

特稿记者如何找选题、做采访、写作

何韬（《智族GQ》杂志报道总监）

我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我们当时入学的时候，系主任几乎是用洗脑的方式向我们强调一点：“北大中文系是不培养作家的。”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当时信。

但经过六七年的职业写作，我现在不认同这种说法，我认为它把写作神秘化了，过于强调写作者的天赋、才华、灵感，而忽略了写作其实也是一门手艺、技术活，其实有许多可以通过学习掌握的技巧。

很多时候我们过于强调才华、天赋、灵感，导致我们写作时会陷入一种恐慌的情绪，会不自信，觉得：“我好像是一个没有才华的人，那我是不是不可以写作呢？”

我认为并不是这样的，套用一句烂俗的话，大部分人并没有到达拼才华、天赋的阶段。只要你扎扎实实地按照一些写作的技术去训练自己，你就可以写得比很多人都好。当然，你要是想写得非常好，那可能得依靠你的才华、天赋，但大部分人还没有达到那个阶段。（免费书享分更多搜索@雅书.）

我在这里把我自己的一些经验性的东西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简单聊一聊如何找选题、如何做采访以及如何写作。

如何找选题

想写一个好故事，首先需要想清楚：写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故事是值得写的？

《智族GQ》报道组曾经总结过一套找选题的衡量指标：

1. 问题足够重要，要建立与时代的关系。
2. 要展示复杂性，要在坐标系里表达，而不是孤立的一人一事。
3. 选题要有想象力，不要模式化。
4. 结论最好意外，有颠覆性。
5. 要有好的故事，不要堆材料说观点。
6. 要有正确的价值观，这一点也很重要。

《智族GQ》报道组进行特稿采写的时候，会去衡量一个选题能不能达到这六条。特稿是非虚构写作中的一个门类，对作者的专业性要求是相对比较高的。

经常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非虚构要真实，但又要具有文学性。但一有文学性，它就会有虚构。”实际上，很多事情

并不是二元对立的。我们创造的文字内容是处在一条连续的光谱上，不同的文字产品处于光谱的不同位置。最左端是纯粹的信息，比如数据，光谱的另外一端可能是纯文学作品。

非虚构写作处在光谱的中间地带，它既具备信息的真实性，又具备文学的审美价值。

我们要写一个好的故事，要有逻辑，但不止于逻辑，还关乎情感、审美、人性。写一个好的故事，内在逻辑非常重要。但不要被逻辑的框架遮蔽了故事背后活生生的人。故事最终的落脚点一定要落在人物上。人物的命运才是故事的核心。

好的非虚构写作视野广阔，主题宏大，但并不是一定要去直接书写这些大的命题。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好的特稿都有一个非常宏大深远的主题，但写作方式、切入角度一定是对抗宏大叙事的。

比如李海鹏的《车陷紫禁城》，批判北京的城市美学，写大城市的焦虑感，描述的却是一辆堵在车流中的出租车。他写举国体制，只是讲了一个举重冠军在贫病交加中孤独死去的故事。再比如《冰点周刊》记者林天宏的《回家》，在汶川地震导致的数万个死难故事中，只写了一对夫妻不顾震后山路艰险，坚持将死于校舍垮塌的儿子背回家的故事。

这不是孤注一掷，而是源自《冰点周刊》编辑部一段时间以来的选题思路：寻找时代的经典意象。具体到这场堪称“国

殇”的灾难，用《冰点周刊》时任主编杜涌涛的话说，“再广大的悲伤也比不上一个具体而微的悲伤”。

一篇好的非虚构故事一定是一个具体而微的故事，但并不是所有具体而微的故事都值得写，这其中还是有一定标准的。这个故事一定不止于故事本身，它要有一定的延展性，足够有意味，有丰富的意义指向。

比方说，你现在手头有两张纸，上面各有一个差不多大的孔，但同样是孔，它们生成的原因不一样。一个孔可能是被一根针捅破的，它承载的意义就比较单薄。另一个是放在阳光下，拿放大镜把阳光聚焦之后烧出的一个孔，它背后蕴含的东西就非常丰富。它背后是一个庞大星球的光线折射原理。它们指向的内涵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

故事要足够有意味，要有丰富的指向，这个“指向”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人性本身，能够帮助你去理解人性、社会、时代。能够引发读者共情的作品就是好作品。共情就是读这篇文章时，会深刻地唤起你内心的情感，并且让你觉得主人公的命运与自己的命运发生了联结，进而让你反观自身的情感、命运。这就是好的作品。

可以称之为“共情”的情感可以是多样性的。它可能是悲伤、喜悦、恐惧、愤怒，只要它能够有效地唤起读者的情感，而且这种情感是真正令你回味、思考的，而不是像网络小说或者爆米花电影，那种很直接但很短暂的情感。我所说的“共情”是真正击中一个人内心，唤起他深层情感的东西。

古今中外无数的故事，不同的故事有不同的主题、逻辑框架、发展进程，但实际上它存在一个共通规律，所有的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写的一定是一个遭遇困境的人，如何去应对他所遇到的困境。这是古今中外、古往今来所有好故事共同的特征。

把人物的困境细分，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即外部世界的困境和内心世界的困境。人面临的困境，从大类来讲就分为这两种。外部世界的困境非常好理解，比如这个人失恋了，被“炒鱿鱼”了，生病了，和朋友闹翻了。所有这些外部世界的困境最终都会归结于人内心的困境。在外部世界遭遇的种种问题会使这个人产生内心情感的冲击，产生痛苦、烦恼。这就是人内心的困境。

在书写“冰与火之歌”系列时，乔治·马丁引用了福克纳的一句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人类内心冲突是真正且唯一值得书写的对象。”

所以说好故事的共同特征，写的都是遭遇困境的人。这个故事一定是一个充满欲望、充满诉求的人，遭遇困境、努力应对、克服困境。这是古往今来所有故事的本质。在这个过程中，主人公不断地遭遇麻烦，最终故事的结局可能是战胜了困境，可能是被困境击倒，也可能是继续跟困境斗争，这些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在写一个好故事的时候，一开始要先搞清楚几个问题。如果这几个问题能搞清楚，写起故事来就会更加有把握，更顺畅

一些：故事的主人公是谁？他想要什么？为什么想要？他会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他将遇到哪些阻碍？他将采取什么样的行动面对这些阻碍？与阻碍抗衡的结果会是什么？

一个好的故事要写这个人遭遇的困境，最终要落脚于具体的人性，要聚焦于人的性格本质。故事的本质是一个遭遇困境的人以及他如何应对，核心是聚焦于人物的性格本质。

这两点怎么结合起来？人的性格本质是在面对困境时才得以体现的。当一个人面对危机、挑战、压力的时候，他最本质的性格特征是能够突显出来的。

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平淡，可能看不太清楚某个人真实的性格是什么样的。这几年真人秀节目非常火，真人秀节目吸引大家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嘉宾有应激反应。当他遇到一个紧急事件，他性格中最本质的部分会暴露给观众，而在日常生活中他习惯包裹自己的形象。也就是说，在应激反应中所暴露出的性格本质，能够真正吸引人，而这恰恰是故事吸引人的地方。

一个好的故事要突显人的性格本质。在面对困境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应对机制，而这种应对机制就反映了人的性格。以《裸奔者范美忠》为例，这篇文章从头到尾一直都在向读者展示范美忠这个人在面对困境时，他的应对机制是怎么样的，执拗、倔强、不愿意妥协。但如果只讲这个概念，读者是没有认知的，你只是给出了空泛的概念。但你去写具体的事情，他的这种性格就会更加清楚地显现。

比方说，文章中写到他讲课的方式，学校是不满意的。校长找一个老师谈话，对这个老师来说就是一个困扰，校长会对他讲课的方式提出质疑甚至否定。不同老师的应对方式不同，有些老师会非常积极主动地跟校长道歉，表示以后会改变讲课的方式，也有一些老师表面上会跟校长服软，但事后还是坚持按他的方式。而范美忠采取的方式是不愿意妥协，不愿意做出改变，校长不能接受，他就辞职。通过这种具体的事情，通过人物遭遇的困境、挑战，人物的性格本质在这个过程中就得以突显。

故事的精彩程度、丰富程度、冲击力，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个困境的质量和强度决定的。人遭遇的困境是有层次之分、有高低差异的。真正好的故事，设置的困境能够直击人性格、情感的本质层面，能够唤起人最本质的这些情感——爱恨、贪婪、恐惧、开心、忧愁，所设置的困境一定要触及人性的这些层面，才有可能唤起读者的情感共鸣。

如何采访

第一点，我想跟大家强调采访环境的重要性。

大家一定要树立起一个意识，采访不等同于聊天，不等同于跟对方交谈。聊天只是采访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这个概念大家一定要树立起来。

前段时间有个记者问了我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有代表性。他问我说：“我看你和另外一些特稿作者的文章里

有非常多的场景、细节，写得特别细。我在采访的时候怎么就问不出来呢？你能不能教教我，我应该怎么去问？”

我告诉他，这并不是问出来的，而是观察出来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它牵扯到我刚才说的采访环境的重要性。你必须要在采访环境里边，才能够得到很多的细节。

我们做采访的时候，经常会把采访对象约在一个咖啡馆里边。在咖啡馆里，其实你是得不到细节的，因为采访对象脱离了日常的生活场景。你只能够从谈话中得到信息，没办法从其他方面得到信息。这会使你的文章受到非常大的局限。所以你一定要把采访放在采访对象日常所处的环境中，你会观察到很多东西。

我以前写过一篇关于唐家三少的文章。唐家三少是中国赚钱最多的网络小说作家之一，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非常高产，一天要写8000字，已经保持了十年没有中断过。我当时采访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家住得非常远，希望找一个咖啡馆就行了。

但我当时就意识到，对于一个有这样写作特点的人，他的写作环境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一定要到他的环境中去，如果在咖啡馆，我是没有办法理解他的很多行为的。如果到他的生活、写作环境中去，我能够更好地理解他。我就坚持告诉他，一定要到他家去。当然最后他也同意了。

到了他家，我发现确实是不虚此行，是有所收获的。如果我在文章中只是写“唐家三少非常高产”或者列举一些数据说他写了多少书，我觉得这是非常干瘪的，是不足够的，需要更多的场景和更多的细节，而这些必须要在现场得到。

去了之后我就发现，他的写作环境非常有特点。他的书房里，一面墙是书桌，另外三面墙都是书柜，他的书柜里没有一本别人的书，全是他自己写的书，并且不重样的。而且这三面墙的书柜都存不下他的书，洗手间的浴缸都不用了，里边就是用来放他的书。你就可想而知，他写了多少书。

那么你把这种细节写在稿子里面，带给读者的冲击力，比你直接去写他写了多少书，作品的文字量有多少来得好。因为我们每天生活在各种数据里，其实大家对数据是不敏感的，但如果你把这个画面勾勒出来，一下子就会带给读者很强的冲击力。我就用这个例子来跟大家讲采访环境的重要性。

第二点是关于采访姿态的问题。

我们同行会聚在一块儿抱怨，哪个人好难采，好敷衍，老是走神，或者很抗拒采访。我自己的体会是，有时候我们没办法改变采访对象，但我们有办法改变自己。而且我觉得很大程度上，采访对象当时接受采访的状态，是由采访者的状态决定的，他会受到采访者状态的影响。

我举一个例子，有次采访结束之后，采访对象告诉我他前一天晚上失眠了，一晚上没睡着，因为他觉得接受我的采访是

非常重要的事，所以很紧张，紧张到一晚上都失眠。那么你就可以想象到，采访对象接受采访的时候心态是相对紧张、不那么放松的。

一个好的采访者应该要做的事情是，帮助对方放松。但我自己的经验以及我了解到的一些情况是，很多时候采访者非但没有使采访对象放松，反而让他情绪更加紧张。比较好的状态是，应该要让对方忘记在接受采访，你要让他觉得就是在跟一个朋友聊天，而不是在接受采访、做一项工作。

说回为什么不要跟对方约在咖啡馆，原因就在这儿了。人都是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情绪才会更放松。咖啡馆对于很多人来说，是谈工作的地方，而不是休闲放松的地方。人到一个谈工作的场景里，情绪不自觉地就会紧绷起来。这个采访效果就会打折扣，所以，你要把对方约在一个他熟悉的环境里。

为了达到让对方觉得是在跟他聊天的效果，我的经验是，上来之后就跟他闲聊，聊一些跟今天谈话主题不是那么相关的问题，然后非常平滑地过渡到采访的状态里，不要表现得煞有介事，要不经意地、自然而然地过渡到采访过程中。

我有的时候会见到一些反面案例，比如记者本来跟采访对象聊得非常好，气氛非常融洽、放松、亲切，突然这个记者说，我们别闲聊了，咱们办正事儿吧，开始采访吧。然后你会发现，这个采访对象一下子整个状态就绷住了。这种情况大家千万要避免。

有一个技巧是，你的前几个问题要表现出你跟对方很熟悉，比如聊聊他的近况、最近的一些动态、最近做了些什么事，那对方就会觉得这个人很关注我、对我很熟悉，他就会觉得跟你聊天心态会比较轻松，因为他会觉得不用跟你解释一些很基本的问题。或者你可以提起他的一些朋友，比方你可以说最近跟某某人聊过天，这个时候很容易拉近你们的心理距离，对方会觉得，你跟他的朋友很熟，这会让他感觉到你和他是有关联的，而不是一个纯粹的陌生人。

切记一开始千万不要问一些非常简单的问题，就是那种百度上都能查到的问题。如果问这种问题，对方就会觉得你没有好好做功课，才会问这些很基础的问题，他的心理防御机制就会马上建立起来。你最好让他感觉这个问题从来没有人问过我，我自己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好的问题达到的效果是，你要让对方觉得你在帮对方进行自我认知和自我了解。一个好的采访者应该让采访对象在接受采访完之后，觉得自己对自己产生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知，这是真正高质量的采访。

第三点，采访绝对不等同于问答，绝对不是你问他答的机械方式。

真正好的采访，双方应该是在进行交谈，你们是有互动的，是有相互之间的交流碰撞的，是有来有回、你来我往的，而不是你问一个，他答一个，那怎么能互动起来？很重要的一点是，在采访过程中，你要不断地追问，脑子里要随时处理他的回答，要根据他的回答随时提出新的问题。

这两点好处。其中一点是，因为我们要写一个故事，故事里不仅要获得他的态度，获得他给的信息，我们还需要很多的细节，这些往往是在追问中得到的。另外一点在于，当你进行不断追问的时候，对方会觉得你采访时肯用功，肯动脑子，觉得你很聪明，你在不停地努力尝试吸收、理解他讲的东西，并且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二次思考，再去提出新的问题。那对方会觉得很受尊重，也会觉得你是一个有很强好奇心的人，有了解他的欲望，这时候他就会更加尊重你、重视你，会讲出更多的东西来。这个特别重要。

写作的要素的搭配

关于写作，有一个很重要，但没有被太多人重视的点：关于四种写作要素组合搭配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具体，但也非常实用的写作技巧。

我记得我的主编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好的写作者应该具备一种能力，应该知道段与段之间怎么衔接。这听起来好像是非常原始的东西，但好多写作者都会在这个方面遇到困扰：我的文章到底怎么往下进行，段与段之间应该怎么接？

这是个非常基本，但也特别重要的问题。很多人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去做，然后会凭感觉去写。有的人感觉比较好，有的人感觉不行，写出来的东西就会有差异。

这其实是有方法的，而不是纯粹凭感觉的东西，首先你要明确你的文章是四种要素的组合。这四种要素是直接引语、间接引语、概述和描写。

直接引语很好理解，就是采访对象说的一些话。与直接引语相对的就是间接引语，它是作者对采访对象说的话进行二次转述。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梁希森相当自得的并不是自己的奔驰车——他已经不需要那么虚荣了——而是自己的简朴生活，以不爱花钱为荣。（李海鹏《一个农民富豪的乌托邦》）

这一段就是一个间接引语。它经过作者的转述，而且是在符合对方的原意下进行了二次处理。

往返于成渝两地间的火车每天从四川省隆昌县金鹅镇瓜子岩村旁驶过，隆隆的汽笛声让村民们烦躁不安，却又是他们的精神寄托之一：对于这个偏居川南的破旧村落而言，铁路负载着数辈人对繁华富裕的想象，以及改变命运的可能。但村中第一个考入北京大学的孩子在成年之前，却从未获得机会借此打探外面的世界。1980年代中期，这个戴着1000度近视眼镜的瘦弱男孩，为自己制定的首要任务不是应对初中课业，而是日复一日用拳头疯狂击打自家泥土砌成的墙壁。三年过后，他的心愿达成，练出一身紧实肌肉，足以对抗父亲及四个兄长的殴打辱骂。（何韬《范跑跑这七年》）

这一段就是概述，简单理解就是概括性的叙述。打个比方，概述是一部电影中的远景镜头，承载的信息、细节比较多，但相对来讲比较粗略，不那么细致。

牛仔裤松松垮垮，裤脚早已磨破。黑色羽绒服的下沿露出来了白衬衣的一角，另一角却藏在里面。十几个人中，范美忠是穿着最随意的一个。为了保证秩序，讨论引入了罗伯特议事法则：每人有两分钟时间提问，范美忠则有五分钟时间回答，一旦到时，必须停止，除非下一个人放弃提问。多次超时后，范美忠表达了反对。“这套规则是非常好的，但是用于开会，我们是讨论问题，并不完全适用。”

主持人表示，既已如此规定，就要执行下去。他再无异议，却加快了语速，陌生的人名和术语越来越密集地出现。他飞快地转动手中的纸杯，杯口已被捏扁。一脸茫然的面孔越来越多，但不在他的视线范围之内——他的眼神始终投往一个固定的方向，前方并不是某个提问者，而是人群外的一块地板。

这两段是描写，与概述相对应，描写里面有很多的场景、细节，相当于一部电影里的近景、特写镜头。你会发现描写的信息量是少的，叙事的时间推进速度会更加缓慢，但里面有更多的细节，会更加细致。

简单来说，概述的特点是信息密集，但是枯燥；描写的特点是信息量小，但是生动。

搞清直接引语、间接引语、概述和描写这四个叙事元素后，你据此倒推看一些稿子，就会发现最终在文本的具体呈现中就是这四种元素的排列组合。

区分作者水平高低的一个点，就在于这四种元素到底怎么组合。不同元素间的度怎么去拿捏，哪个多哪个少。这就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

这四种要素怎么搭配呢？首先，你会发现写作的特点是有一些变化的。我在刚入行的时候，编辑老师给我推荐了一本书叫《普利策新闻奖（特稿卷）》，但这本书最近几年被提得越来越少，因为它里面的作品都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典的普利策获奖特稿，那时候的写作特点跟现在的特稿写作特点相比，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你会发现，那时候的特稿里，描写是占主导地位的，通篇有非常详细的细节描写。但我们所说的更加现代的特稿里边，显著增加了概述的比重，压缩了描写的比重。我跟大家分析一下原因。

刚才已经讲到描写的特点在于，一方面信息量相对较少，另一方面节奏相对缓慢，这其实不太适应现代读者更加快速的阅读需求。现代读者希望在单位时间内获得更充足的信息，对信息的密度和叙事的速率有更高的要求。

在这个背景下，概述的比重相应就增加了。好处在于加大了信息密度，它在单位时间内提供给读者的信息量是更多的；

同时，改变了文章的节奏感，使文章增加了快慢的变化。描写比较多，文章一直是以比较舒缓的速度进行的，而你加入概述的时候，它叙述的节奏相对更快。比如一段概述里可能会写五年、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描写是静态的，在时间上没有什么推进感。而你把概述的比重增多之后，快慢结合，文章的节奏感、韵律感就产生了。

另外，直接引语要尽可能少用，因为一篇好的文章要有好的叙述腔调，要有质感。这种质感有的时候要靠作者对文字的雕琢、打磨实现。但直接引语的问题在于，直接引语是不可控的，采访对象讲话的风格、方式未必与你的文章协调，加入过多直接引语的话，就会稀释整篇文章的腔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尽量克制使用直接引语。

直接引语一般只在几种情况下使用。

第一种情况是，这句话可以非常鲜明、直接地体现主人公的个性，可能是他说话的方式非常有特点，读者一看到这句直接引语，就能强烈地感受到这是什么样性格的人。这句话可能只有他能讲，其他人是讲不出来的，或者别人讲同样性质的话，但是用另外一种方式讲，而他用的是一种独特的方式。

第二种情况是，如果采访对象透露了非常关键的信息，而你想把这个信息强调出来。你想提示读者这个内容非常重要，你可以处理得独特一点，用直接引语这种形式把它呈现出来。

第三种情况是，从写作的安全角度考虑，如果对方讲的一句话，你认为对文章的可读性、质感非常重要，但是没有办法核实他的话，又舍不得把这个细节丢掉，你可以尝试使用直接引语，用“某某说”“某某称”去把它写出来。假如之后文章出现了事实性的问题，相对来讲，你可以保护自己。

直接引语也可以处理为间接引语。从理论上讲，只要是根据采访对象口述的内容写出来的内容，都是对直接引语的转化。具体到怎样才不会显得干巴巴，就要采访者本人多读多琢磨，这个是文字功夫。

在你树立“文章的最终呈现方式都可以总结为这四种要素”的意识之后，接下来就是组合搭配的问题了。

组合搭配怎么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搭配方式会使你的文章有不同的质感。你可以尝试找到一种最舒服的方式，也可以去看一些好的文章。你可以用这套理论去对文章进行拆解，去看别人是怎么搭的。用这个思路去分析他的文章，把他的写法移植到自己的文章里，那样你就可以处理得更好。

有一个比较机械的办法，在你不熟练的时候可以先体验一下，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一些调整，形成自己的风格。

《南方周末》总结的一套叫作“广播体操”的理论，就是对直接引语、间接引语、概述、描写进行编码，然后按照“1234、2234”来回切换的方式进行搭配。

为什么是“1234、2234”，而不是“1234、1234”？原因就在于，这个“1”指代的的就是直接引语，直接引语要尽可能少用，所以在八拍里面直接引语只出现一拍。

采访是非虚构写作的关键

黄慧（三明治“短故事学院”负责人）

写作中为何需要采访？

非虚构写作需要通过还原和再现行动主体的人格形象，将他们的个体价值映射到更广阔的社会中。故事中的人物与事件必须是真实发生的，但是故事在我们头脑中浮现时，有诸多情节并不是完全清晰的，人物、事件、情节包含着大量模糊不清的东西，如果需要辨认事实本身，则需要非虚构写作中非常关键的步骤：采访。

写一个人物时需要作者与被写对象进行深度交流才能获得人物的关键情节，也需要与采访对象有一定时间的相处才能获得有效的细节。

在三明治的实践经验中，很多时候作者所写的故事都是自己熟悉的人物，那么也有可能出现某些场景或者是背景模糊的情况，有时候采访是为了获得，有时候采访是为了确认。

在三明治以往的写作辅导中，许多学员对于采访存在着轻微恐惧心理，多出于社交上的害羞或者害怕被拒绝。因此一个成功的采访从“采访之前”就已经确立了，你是否有足够的勇气，是否害怕被拒绝，是否有充足的准备等等，这都是采访的一部分。

在采访前，我们需要明确一点，如果不想被对方拒绝，那么如何说服对方接受采访是一个重要的环节。

如何说服对方接受采访

首先我们需要明白一点，采访对象没有义务接受我们的采访。除非面对的人是政府官员，探讨的是公共问题。除此之外，别人接受我们采访需要花费时间成本，他们并没有义务接受我们的采访。因此寻求采访的姿态很重要，但同时，采访并不是去索取什么，而是在采访与回答的过程中进行探讨与协商，是寻求真相与细节的过程。

在约访之前，我们可以站在采访对象的角度去思考：我的采访对于采访对象来说有什么收获？或许他通过采访传递了想表达的观点，或许他通过倾诉获得了情感的平衡，或许他唤起了公众对某个问题的关心？

一般而言，我们所要采访的对象有别于媒体，并不是公众人物，在这个阶段，作者需要向被访者表明自己采访的原因，其中包括写作目的，以及发表平台等。因此真诚表明你采访的原因，以及保证自己对事实的追求是最重要的。

采访前期需要准备什么

作为一个非虚构类的写作者需要尽可能去了解采访对象，故事必须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因此只有了解对方，了解故事，文章才能具备准确性，更多的细节也才能被看到，才能成为一篇合格的文章。在采访前，我们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去

了解采访对象或者事实本身，这样在采访中才能形成良好的对话氛围，还有可能挖掘出不一般的素材。

1. 了解你的采访对象

当我们写一个人物时，如果需要采访他的话，那么请尽可能挖掘与他相关的一切，他的社交网络，他的人际圈子，如果是公众人物，关于该人物的一切报道都要尽可能搜集查看。

所以在采访前，在尽可能查看完对方的相关资料后，拟写一份不同维度的采访提纲，之所以要不同维度，是因为写一个人物尽量要看到一个人身上的复杂性，这些复杂性能让人物更饱满，因此在列采访提纲时，可以通过不同的主题去列出采访提纲，比如他的生活、他的工作、他的价值观等等。这样才能更全面地了解采访对象。

2. 准备好采访的辅助工具

我们可以事先准备好一个笔记本，不用太大，笔记本可以帮助你记下一些关键词。但是很多时候，笔记本可能给采访对象带来压力，对方可能在谈论时有所顾及，因此在某些时候可以用录音笔，当然目前手机的录音功能已经完全可以替代录音笔了。

3. 与采访对象约定合适的采访地点

多数人会跟你说约到咖啡馆或者茶馆等场所，但这通常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采访一个人物，并不是仅仅看对方谈论

了什么，也要去观察他所生活的环境，这能透露出很多“秘密”，咖啡馆等场所抹除了采访对象的生活痕迹，无法让我们通过观察获得更多细节，因此，选择的采访地点最好在对方的家中或者是其工作场所，这样能获得更多有效的细节，也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物。

如何采访到丰富的细节

一篇好的文章是由大量的信息也就是大量的有效细节组成的。因此，采访的一个任务就是要获得有效细节。采访可以分为对话式和观察式采访。对话式采访就是问答式，而观察式采访主要是通过看与记录来获得有效信息。事实上，在采访中，这两种采访方式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混合在一起。电影《旅行终点》讲述了一位记者采访作家福斯特·华莱士的故事，在电影中记者不仅仅是采用了对话式采访，还跟访了华莱士几天，与他一起生活，参加其新书发布会，其间记者能看到更多故事与细节，这对于写好一篇合格的人物稿件来说是非常必要的。

在采访时要注意提问的方式，可以同时采用开放式和封闭式提问。在刚开始采访时，多采用开放式问题进行暖场，让对方说出更多，有利于下一步深度的访问。在关键的地方，比如事实很重要或者显现的是对方的态度等情况时，可以采用封闭式提问，进一步框定被访者的回答范围，这样才能确保你要的内容的确切性。

要学会控制谈话走向。当然一个好的采访是一种浸润式的交流，但是新手千万不能为了维护“面子”而任由对方说下去，而要学会反问、打断、再次提问等技巧，让你们所交流的内容尽可能围绕你的写作主题去走，而不是任由对方谈论。

采访中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作为一个采访者应该具备高度共情的能力，要去理解采访对象，理解并不意味着认同，而是站在对方的情景中去思考，同时也不能缺失作者自己的视角与审视，客观是无法完全做到的，但是我们尽量让自己的眼光不是建立在对事实与人性的复杂理解之上的，这个态度在采访中也应该是一直持有的。

采访是一个斡旋与探寻的过程。“斡旋”是在于你与采访对象建立了一个“场”，这个“场”成不成功，要看采访者对人物、所写的主题是否具备清晰的认识，是否具备复杂而审慎的判断力，以及对“把控”与“理解”之间的拿捏是否得当都会影响“交流场域”的建立。

采访是一门沟通的学问，需要通过多次的练习来获得一定的经验。如何打开话题，怎样让采访对象放松，如何识别一些话术，遇到大谈“理念”的采访对象如何将其拉到具体的“行动”上来……这些技巧并不能通过翻阅书本习得，而是需要我们走到人群中，去现实的世界，与人建立真正的交流。

网络女主播的爱恨江湖

张露萌

“我落到今天的地步，一半是因为遇人不淑，一半是因为家里有人。”一袭红衣的阿May坐在粉红色的椅子上，欲言又止，忍着不让泪水染花了妆容。

阿May口中的“家”并不是她的这间房子，而是她电脑屏幕上的直播间。阿May的一举一动通过网络实时传递给进入她直播间的观众，而她自己的情绪就被视频旁边公屏上滚动的言语左右着。

她视为“家人”的那群人，在她心中的地位仅次于亲人，可她甚至不知道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模样。在这二十几个月的时间里，陪伴阿May度过每个夜晚的，是一个个或熟悉或陌生的网名。她会自觉地把这些网名分类：管理员、土豪、游客、黑粉……她的“家人”就是管理员们，而成为管理员的必要条件是送给她一定价值的虚拟礼物，随着明星等级的提高，管理员的门槛也随之升高，标准由主播自己制定。在阿May直播间的鼎盛时期，“管理费”一度达到15000币，相当于人民币150元。同一平台的所谓“大主播”，管理费一般在200~500元之间。

连阿May自己也说不清楚，她的真实世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只剩下这个虚拟直播间。她跟父母和妹妹的聊天内容，也总是逃不出那几个相熟管理员的名字。跟阿May关系比较亲密的管

理员，他们的微信消息阿May会秒回，对现实中的朋友她都从未如此上心。

主播的收入与玩家送的虚拟礼物价值直接挂钩，管理员们是阿May的衣食父母；论感情，有句话叫“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阿May已经习惯了每个“家人”的讲话方式，哪怕谁恶作剧式地改了马甲和头像，她也能在几句话之内分辨出真身。

久而久之，阿May对“家人”产生了重度依赖，她把喜怒哀乐都牵系在他们身上。

大哥

亮哥是阿May直播一年来认识的第一个“大哥”，他仅用10天就在阿May的直播间连升几级，冲进了她的30天榜单前五名。

玩家的财富等级跟消费金额相关，早在直播之初，阿May便可以将玩家的财富等级和相应的消费金额背得滚瓜烂熟：比如消费人民币15000元以上即可获得公侯伯子男等爵位，拥有与级别相应的特权；达到128万元即达到神级，不但有官方为玩家私人定制的座驾，而且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甚至连主播都无法将其踢出直播间。

等级高的玩家进入任何一个直播间都会被人高看一眼，主播自然要使出浑身解数来留住他，有些主播会直接送给他管理员的身份示好，她们知道“土豪”一旦出手，可不止一两百元那么寒酸。

阿May从不“免费”送管理，哪怕玩家是个“神”，她也会在对方给她送出礼物之后才卡上管理。她不知道如何“抱土豪的大腿”，记得有一天的后半夜，直播间里进来一个“神号”时，她整个人都是蒙的。直到那位叫“六哥”的大神在公开屏幕上说话，她才意识到自己直播间里真的来土豪了，笑容僵在脸上，话说得像个刚开播的新主播：“哇，原来大神的留言都是特殊字体的啊！带框框的！”

在接下来的几十分钟里，阿May卖力地唱歌跳舞、表演才艺，忙出了一头汗，六哥自然没让她失望，一口气刷出了20多万币的礼物。

阿May直播间的管理员不停私信她，让她讨好大神，吸引他日后常来。阿May知道大神的要求没那么简单。果不其然，六哥离开直播间没多久，便加上了阿May的微信，给她发了个定位。原来他是在同城里找到的阿May——她通常都排在重庆市的前两位。

比起占据直播半壁江山的东北，和网红聚集的北上广，重庆并不是直播大省。阿May论样貌和身材都不输其他大主播，她觉得自己只是差一点运气，和几分撩人的功力。

在这行里，要想红，除了玩得起，放得开，话术也要跟上。为什么东北主播人气高？他们是天生的段子手，东北方言自带幽默属性，几乎人人都听得懂，能说道会疼人，把玩家逗得开心，人家自然心甘情愿为你充值刷礼物。

阿May深知自己的弱点就在这臭脾气上，即便幽默欠奉，若是懂得撒娇卖萌，情况也许都比现在好很多。她只能用直播时长弥补，唱歌、喊麦、跳舞、做游戏，样样拿得出手，才艺加努力，才换来了如今重庆主播圈里的小有名气。

下播之后的阿May并没有赴约，她显然知道六哥的目的是什么，2000多元钱不足以让她出卖自己。

自此阿May对“神号”更加避忌，他们认为他们有钱任性又花心，反而格外偏爱小等级的玩家，连没充过值的平民号进直播间她都主动欢迎，把他们视为潜在的管理员。包括亮哥在内的许多管理员就是从小等级升上来的。

亮哥在短短十天内就以“升神”的实力奠定了在阿May直播间的大哥地位，此前阿May的超级榜（总榜单）第一名郑爷也仅仅刷到6万多人民币。郑爷是最长情的管理员，从阿May开播不久便只追随她一个主播，一年多来从没给其他主播送过哪怕一朵5分钱的玫瑰花。但以亮哥的升级速度，不出两个月，便可以踩在郑爷头上稳坐超级榜头把交椅。

连麦

亮哥的出现，让阿May仿佛终于看到出头之日了。

从做主播的第一天起，阿May就过上了日夜颠倒的生活，晚上10点左右开播，一直播到清晨，每天的直播时间在6个小时以上，最长的一次，她连续播了16个小时，早饭跟午饭都是捧着碗坐在镜头前狼吞虎咽搞定的。

白天睡觉时很难进入深度睡眠，阿May时常做梦，有时梦到直播间一个管理员都没有，公屏上除了红色的系统通知，一片静默，甚至没人跟她打声招呼。她会在梦中信以为真，惊醒后盯着上铺的床板自我安慰，那不过是自己吓自己。有时她会梦到家里来了土豪，上千元的礼物不断地飞，特效在屏幕上一个接一个地放，挡住了她的脸，挡住了公屏上一串“666”的惊呼。阿May明知道那是梦，却不愿醒来。

如今梦境似乎照进了现实。

很快，直播间里从管理员到普通玩家，都唯亮哥马首是瞻。亮哥一声令下，带头刷礼物，其他人也激情澎湃地充值、刷礼物、卡管理，在公屏上高喊“一起上”“嗨起来”。此时的阿May只需要放着嗨曲儿，唱唱歌，喊喊麦，间或摆几个性感撩人的姿势，就足以让直播间沸腾了。

亮哥在阿May的直播间几乎呼风唤雨，连阿May也对他百依百顺。亮哥说去找其他主播PK（比拼），阿May就去连麦，亮哥说今天不想充值了，阿May就乖乖在自己直播间里唱歌、聊天，亮哥说累了想睡了，阿May就跟他一起下播。

连麦PK是主播们之间经常玩的游戏，她们有几个专门连麦的QQ群，通过QQ视频将其他主播的图像转播到自己直播间，然后在10分钟之内进行双人或多人PK，以收到的礼物价值高低排名，高者惩罚低者，惩罚的内容由赢家决定。

“土豪”级别的玩家多数从游戏场上转战而来，寻求有别于游戏世界的半虚拟半真实的刺激，一掷千金换来红颜一笑。许多玩家就以看连麦为乐，主播们厮杀得你死我活，他坐看取乐，怎一个刺激了得。管理员们自然是见不得自家主播输的，于是往往倾囊而出，一边自己刷礼物，一边还招呼着自家兄弟“卖血卖肾也给我上”。

对于像阿May这样的小主播来说，连麦是赚取人气的捷径。几个主播之间形成互动，也常常会带动其他直播间的玩家来自己这里刷礼物。阿May自然懂得如何博眼球。她有一项独门绝技——“虎牙杀”：多少人被她笑起来露出的两颗虎牙吸引，就再也离不开她的直播间。

22岁就误打误撞地跨进了直播的门槛，“清纯”是阿May的本钱。回想入行的前几个月，阿May从宿舍搬出来租房住，而直播的收入有时连电费都负担不起，更别提房租。她那时只会对着镜头唱歌。她只会一首接一首地唱歌，有新人进来就求他刷5000币卡个管理，或者花钱点一首歌，录一首MV（音乐短片）。她不知道怎样才能增加人气，直到学会了连麦。

其实每个主播心里都明白观众想看的是什么，只是有人放不下身段，有人怕因为违规房间被封丢了饭碗。所以大家都明里暗里做着“踩界”的直播，关键就看谁“踩”得稳、准、狠。

阿May只能凭着“虎牙杀”吸引来几个像亮哥这样死心塌地的管理员，卖笑，卖萌，卖脸蛋，卖身材。利益越大，风险也

就越大。博人气的代价是收到警告，再严重，便会扣分乃至封房间。近半年来网络监管越发严格，每个直播网站都聘请大量的监督人员，24小时监测所有主播，一旦发现裸露或者其他涉及黄、赌、毒的行为，都会严加惩治。

出走

如果一个赌徒认为自己正在红运当头，那么再大的风险都阻挡不了他的孤注一掷。亮哥就是阿May唯一的赌注。在亮哥的保驾护航下，阿May所向披靡，而一旦亮哥不在直播间，她就输到哭鼻子。被保护得越好，就越发输不起。

有几次亮哥故意不出手，让阿May尝尝输的滋味。直到阿May跟一个玩得狠的男主播PK，被虐到用睫毛膏涂成了包公的大黑脸，亮哥发在公屏上两个字“疼不”，阿May那声“疼”一叫出口，便止不住地号啕大哭。她觉得自己受到了来自对面主播和自家管理员的双重羞辱，一方没有底线，一方见死不救。

那是开播以来阿May哭得最撕心裂肺的一次，她在泪眼蒙胧中看见亮哥在公屏上说“就是要你输到疼”，还教她怎么对待平民，怎么跟玩家聊天，他的每一句话都变成了刺，一根根扎进阿May心里。

阿May在镜头前对亮哥言听计从，却同时跟她的心腹管理员私聊：“我恨死了他。”

然而阿May是个不记仇的人，确切地说是她没办法记仇，尤其没办法跟她的管理员们记仇。她再委屈、再生气，也只能用

大哭一场宣泄，然后冷静下来跟那个管理员道歉。中国有句老话说，“天下无不是之父母”，阿May嘴上管那些金主叫哥，其实把他们当爹供着，只要还留在自己的直播间，让她做什么都行。然而有些人并非想留就能留住，物极必反。

某天，亮哥突然带一个叫“非礼”的主播飞头条。那意味着亮哥在同一时间送出了全平台总价值最高的礼物，所有的玩家和主播都可以看到，并且能够跟着头条的链接进入那位主播的直播间。

那天，阿May已经无暇顾及自己直播间的公屏，她用自己注册的小号进入“非礼”的直播间，看见亮哥已经是“非礼”的管理员，并且留言说再也不会去阿May的直播间，在“非礼”这里改马甲重新玩。阿May瞬间情绪崩溃，几百个不明所以的玩家看着她哭到几乎缺氧窒息，一手捶着胸口，一手捂着脖子，仰倒在椅子上。她一到气急的时候，便会感到从心脏生出一根筋，一直抽到后脑。

造成亮哥出走的直接原因，正是阿May的“严看死守”。

阿May每天睁开眼睛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手机，进入平台App，登录自己的账号，然后在关注里查看每一个心腹管理员的经验值，确保没有增加才会安心起床，因为数值一旦增加，就意味着这位管理员可能为其他主播花了钱。一旦发现数值不对，她便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钱花在哪儿了？礼物刷给哪个主播了？

升到了高等级之后，亮哥在陌生主播那里受到的礼遇，远高于已经视其为家人的阿May。与此同时，阿May也因为PK和上头条的次数增加而增长了人气，家里新添了不少管理员，亮哥的统治地位岌岌可危。所以，他宁愿再去扶植一个级别更低的主播。

直到亮哥带着“非礼”上头条的那天，阿May才意识到自己有多大意。之前的十几天里，这个叫“非礼”的ID就频繁出入阿May的直播间，由于明星等级和财富等级都很小，阿May并没有认出来这是个主播号。“非礼”是在亮哥与阿May有争执的几天里乘虚而入的。她一想到这个“小狐狸精”很可能与亮哥私聊了很多天，就气不打一处来。

覆水难收，既然亮哥的心已经不在自己这里，阿May会主动放弃。就跟她的初恋男友一样，刚分手的那段时间阿May整日以泪洗面，感觉天都塌了，然而时间还是治愈了一切，后来即使对方再提复合，她也决绝地转身。

哭够了冷静下来的阿May跟其余的管理员及时总结着经验教训：玩直播本来就是找主播寻开心的，亮哥是结了婚的玩家，在家就受老婆管，若是在直播间仍然处处受束缚，必然哪里舒服往哪里去。“以后‘妻管严’要跟单身汉们区别对待。”

“神豪”打架

现在，亮哥的排位停留在阿May的超级榜第五位。她依然感谢亮哥，虽然在粉丝们问及亮哥时不愿提及他的名字，但总是

以“吃水不忘挖井人”来结束话题。失去了一条臂膀的阿May只不过伤心了几几天，就走出了阴霾。直播间的繁荣带来了蝴蝶效应，阿May相继迎来了两个支持她的潜在“神豪”。

一个叫“LV哥”的新人一周之内就充值几十万元，以四处留情闻名，见到喜欢的主播，出手相当阔绰，1000元一个的豪华礼物送出来，也要讲究“好事成双”。

来到阿May直播间的那天晚上，LV哥两个小时就冲上了30天榜前五名，不但花大价钱点歌，还帮阿May大胜了两场PK。

跟LV哥争着上头条的是“南海少爷”，他跟阿May早已相识。南海少爷本是主播野子家的榜首，也是因为常跑去支持其他主播，惹得野子大哭几场，心灰意冷之下退出了直播。阿May常跟野子连麦，南海少爷就是在对面欺负她的罪魁祸首。

野子停播了一两个月之后，南海少爷找进了阿May的直播间，此后三天两头就往这里跑，别的玩家给主播开一个月守护，南海少爷一开就是三个月，他说“别人有的我们也有，我们还要比别人好”。阿May又湿了眼眶，她把他当成了自己人。

这个南海少爷只有17岁，算是“富二代”。他的表哥管理着直播平台的两个“工会”，给他的零花钱足够每天挥霍给主播。

新主播进入平台通常都会先找个“靠山”，希望遇到麻烦时能有人替自己出头。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加入“工会”。直播平台的“工会”类似于网络游戏里的家族，每个“工会”有会

长和副会长。旗下的主播得将收入的一成作为会费上交，再除去平台的抽成，主播拿到手的收入只能占到礼物价值的三到四成。

作为回报，会长可以利用自身权力，将主播置顶，或者组织工会活动增加用户活跃度。在主播被扣分或者封房间的时候，会长的能力就凸显出来，跟“官方”关系到位的“工会”，主播会立即解封，而那些被封一个月甚至花了几万元仍被永久封房的主播，只能感慨“所托非人”。所以，会长每天睡着觉都有钱进账，也难怪连表弟南海少爷都那么财大气粗。

阿May真的像伺候少爷一样哄着这位心智还未成熟的金主，他来了，想送什么便送什么，他要走，阿May绝不强留，甚至发现他带着其他主播上头条，阿May也只是开着小号去把他哄回来，不敢多发脾气。否则，这南海少爷不仅会头也不回地走掉，专捡阿May与人连麦PK的时候去帮对面主播赢她，也是做得出来的。

可南海少爷遇到了LV哥，LV哥可不会让着他，他总会送最贵的礼物，踢掉少爷的头条。

一山不容二虎，战争是迟早的事。

有一回LV哥帮阿May赢了一次PK，他说“神豪”也有达到充值上限的时候，叫阿May不要总连麦，他不能保证让她每次都赢。南海少爷这时在公屏上与LV哥互怼：连麦人气高，阿May又

喜欢玩，你干吗限制她？有人专门喜欢看连麦，不PK哪里赚礼物？

所有的玩家都看着两位“神豪”在这里你一言我一语，几乎对骂。直到南海少爷叫LV哥离开，“本少爷有的是钱，阿May不差你一个管理员”。阿May知道场面控制不住了。

这时的阿May一脸窘迫，她不知道如何应对面前的情况。两位大神，哪个都得罪不起，她生怕说错了一句话，得罪了谁，便再也不来看她。她真不知道那些家里养着几尊大佛的大主播，是如何周旋在他们之间，把每个都哄开心了的。此时此刻，她只能选择静静看着，她设想的最坏的情况就是失去LV哥，而自己却丝毫想不出劝架的办法，直播间里只能听到一首首连续播放的背景音乐。

阿May终于又失去了一个依靠。

背叛与负心

在LV哥离开后不久，南海少爷也不常来了。

阿May搞不懂，自己不过是用他的号给自己刷了一个1000元的礼物，他为何在微信上发那么大的脾气。哪个主播没有几个心腹管理员的账号和密码？帮他们充值，关键时刻开他们的号来救自己一把，顺便实行财务监督，多么顺理成章！是自己太不考虑管理员们的感受了吗？

可出乎意料的是，两个土豪的离开反而让阿May松了一口气：“老娘不伺候了！”相比之下，跟小等级玩家的相处让她更开心。八哥是几个月前就来支持过阿May的老玩家，由于生意繁忙停玩了一段时间，等他再次回归时，恰好带着新管理员们一起，把阿May的直播间经营得比亮哥在时更加热闹。

管理员们在公屏上你一言我一语地调侃阿May：“你飘了！”“嘚瑟了！”“有异性没人性了！”

若是游客说几句类似的话，轻则被阿May禁言，重则直接踢出直播间，但管理员们不同。阿May从不把他们的贬低当回事，哪怕说她丑、没有胸，她也只是笑着回一句“你妹的”。被管理员们宠着的阿May开启了“复仇”之旅，找以前虐过自己的主播连麦PK。

此后的两三个月里，阿May保持着一个月升一冠的速度晋级。2017年10月，是阿May最风光的一个月，后来她买了一只萨摩耶，取名就叫十月。那个月她收入超过2000万币，按40%提成计算，再加上签约独家艺人的底薪，她几乎跻身“（月薪）十万主播”行列，算得上大主播了。

然而她并不知道钱该怎么花。

阿May没什么兴趣爱好，日常除了直播就是睡觉，醒来就逛淘宝购置“战衣”，而直播的衣服又只求好看不求质量，便宜得很。十几个个月赚的七八十万元，对她来说只是银行卡上的数

字。前不久，她的存款被母亲借给阿姨买房了。她本来不想借，可母亲跟她大哭。

她也借钱给管理员。她曾借给了八哥12000元，八哥还了4000元，还欠8000元没还就跑掉了。借钱的那次是出于紧急，阿May跟另一个女主播连麦玩出了火，谁输了便要“高山流水”，不是一口，而是两盆，从头浇到脚。两家的管理员们在那10分钟里疯狂充值、刷礼物，大家都憋着劲儿，怕最后关头被对方“秒”倒。阿May私聊八哥，问他能否帮自己一把，八哥说手上钱不多，不然，你先帮我充值，回头还你？于是，在PK结束前5秒钟，玩家八哥以一个价值12000元的年守护带主播阿May飞上了头条——阿May直播以来的第一个年守护，居然是在被逼上绝路几乎崩溃的情况下，用自己的钱开的！然而直播间里为其咂舌的看客们却对八哥顶礼膜拜。

她赢了PK，获得了年守护，却并没有想象中的开心。对面主播的两盆水，好像也把自己浇了个透心凉。可她并没有怀疑过八哥的信用，她相信这个为她狂刷10万元的土豪，还上自己的一万元，就是一转手的事儿。然而在年度盛典比赛9进8的当天，他消失了。前一天晚上他还当着其他管理员的面承诺，要给阿May刷两万票帮她晋级。

直到比赛快结束，八哥也没出现。救了阿May的是陈王爷，一大早跑去银行取出了定期存款的1万元钱。在微信里，阿May听着陈王爷的喘息声，就想马上飞到他身边抱住他。然而阿May还是输掉了比赛。以30票之差。30元钱，哪怕一个管理员多出10元钱，阿May都不至于输掉比赛。看到成绩的管理员们集体沉

默了。劲儿不往一处使，都以为有别人帮阿May就够了，结果谁不后悔？那30票是阿May的滑铁卢。

因为这30票，自责的八哥开始剑走偏锋，既然成就不了她，便毁了她。他不止一次地大闹直播间，私聊每一个给她刷礼物的玩家，说她坑钱。更过分的是，他利用年守护的最高权限，将大号玩家们一个个踢出直播间。阿May哭过，求过，闹过，气过，甚至找过“工会”救助，都无果。到头来只能下播，自己哭到头痛欲裂。

祸不单行。阿森是阿May家的常客，但他却把陈王爷拉去了自己主播家刷礼物，从此陈王爷便走上了不归路，一去不复返了。他在那个主播家认识了新主播，一边骗阿May说自己要考试，一边开小号去给新主播刷了两万多元。终于在他忍不住回来送礼物的时候被阿May发现了端倪。两个人摊了牌。

“你喜欢她什么？”

“我喜欢她的笑。”

“你当初也是这么对我说的。”

“可是你现在很少笑了。”

又一次跟亮哥相似的决绝，阿May跟陈王爷说了再见。陈王爷的离开彻底击垮了阿May，那是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她曾以为他是世界上少有的好男人，下播之后经常跟他视频聊天，一聊

就是一两个小时。长得帅，人品又好，阿May甚至幻想过有一天会嫁给他。

现在，阿May几乎天天在直播间哭，不是因为输，而是没人陪自己说话。她望着空荡荡的公屏，心里的那种无力和茫然，只有做主播之初的那一个月才有，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哭过还要继续播，“没人能阻止我做主播，即便我妈也不行”。

阿May是家里的大女儿，做生意的父母总想给她最好的生活，这使得她几乎十指不沾阳春水。大学毕业回到家跟父母住在一起，她睡在唯一有空调的那间房。饮食起居有母亲照顾，但她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直播间，所有的喜怒哀乐也牵系在玩家身上。现实中没有事情能让阿May流泪，夹在显示器边沿上的高清摄像头，仿佛把她的情绪一股脑儿地放大，却没有打上美颜效果。

阿May从大学时就接触主播行业，毕业直接回家做全职主播，这是她唯一称得上爱好且能轻松赚钱的职业。她不知道自己不做主播还能做什么，好像除了会唱几首歌，会在镜头前表演，自己并没有其他技能。

她不止一次地想过，再也不干这种“不见天日”的活了，换个工作，做个正常人。只是侯门一入深似海，想换，哪那么容易？你不屑你不愿意干的工作，自然有人削尖了脑袋往里钻。

“我从没出过重庆。还没开始见识这个世界，就把自己封闭在了网络世界里面，感觉自己出不去了。”阿May就这样拧巴着一日一日过。她告诉自己再难也要连麦，越故步自封人气越差。在连麦群里，阿May听到了频繁的“吐槽”，萎靡的不只是她一家，许多曾经的大主播都失去了依靠：一是家里的大哥总有刷完的一天，二是玩家们都要多留点钱过年，三是一场年终盛典把每家的管理员都快榨干净了。

更何况，还有每天新入驻平台的主播跟自己抢饭碗。直播这个行当，犹如大浪淘沙，更新换代极快。

2016年被称为直播元年，直播平台 and 主播数量呈井喷式增长。据不完全统计，国内进行网络直播服务的企业超过300家，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上升。以阿May所在的直播平台为例，目前拥有主播101万余人，其中新人超过6万人，阿May的级别大致排在前20万名，直播18个月，平均月薪在4万元。到了2018年元旦前后的低谷期，阿May的平均日薪约为200元。

阿May的直播间从此一蹶不振，再没有新鲜血液，只靠着几个老管理员每天几十几百元地帮她撑着榜单。树倒猢猻散。阿May渐渐叫自己放平心态，曾经3万币都挤不进日榜，如今前5个席位都仅仅过万，阿May便“心满意足”地下播了。

让她心寒的不是收入的落差，而是人情的冷漠。她最多时有400多个管理员，最后仍死心塌地守着她的，只有那么四五个。她在直播间对着所有观众立了誓，即便有一天她结婚了停

播了，仍然会跟陪她到最后的管理员保持微信联系，哪怕这辈子都不会见面也没关系。

那之后阿May大病了一场，连打了三天吊瓶，病情刚刚好转，郑爷就从广州飞来重庆看她。这个男人不离不弃地陪了她十几个月，至今仍然在她的超级榜榜首，多少次在她最困难的时候，不论几点钟，只要发个微信或打个电话，郑爷便会出现在直播间，有时甚至开着小号潜伏着，在PK的最后关头如天使一般出现在阿May面前。

阿May无以为报，她想，也许唯有以身相许吧。

（注：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本文所有人物均为化名。）

我问在缅甸的华人，这七年生活有什么变化？

苏有鹏

在仰光40℃的高温环境中打出租车，一个珍惜生命的仰光人明白，望着一辆辆右舵日本车行驶在专为左舵车设计的道路上，需时刻对司机从右窗伸出的手保持警惕，他们的手势能比交通灯更为准确地告知行人，是否该大步向前。

仰光司机们既可以边刷手机边开车，也可以边看报纸边开车，或者干脆把车子横在路中央，旁若无人地接起电话。瞧瞧这样的情景就知道，世界上人类所有随心所欲的瞬间归结起来，也不如一个摸爬滚打了数年之久的仰光出租车司机在某个酷暑天的表现。

一些对异国他乡充满好奇又健谈的旅行者，还可以从一个出租车司机口中得知更多关于这片土地奇思妙想的故事：女生在华文学校初中刚毕业的第二天，就被允许穿着白衬衫、把纱笼式的民族服饰“笼基”围在腰上，在小学课堂上教华裔小孩儿念中文；泼水节假期从10天缩短为5天的法律刚通过，总统府发言人就在4天后重新宣布：“虽然法定假日为5天，但总统府为了方便公务员，将多给公务员放5天的假。”

1

2017年初，我得到一个到仰光某华文媒体实习的机会。作为一个完全不懂缅语的新闻系学生，除了相机、笔记本，我只

带上了家里所有姨妈的嘱托：拿下玉镯，拿下红宝石，拿下血珀。正当我惊叹家族中男性角色在这场难能可贵的跨国贸易中缺位时，出发前一天晚上，舅舅们也终于按捺不住：记好了，拿下小叶紫檀。

贫穷的黄金之国，落魄的宝石故乡，夹在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缅甸，国家贫困率高达37%，但这个世界上95%的商品级翡翠也出产于此，便宜的珍贵玉石、廉价的绝世珍宝，是大部分中国人对缅甸这个国家的印象。

实际上，学校图书馆的借书卡可以证明，我对于这场异域之旅做了不少功课。不过我也必须承认，自己并非一个可以静坐在书堆前一整天，努力想把问题搞清楚的人。

话虽如此，在以中文写作、主题为缅甸的文献中，一个对异域的热情全然在宝石和木头上的人，还是可以梳理出这样的脉络：地理的优势和宗教的盛行让这个国家有着辉煌的古代史；英国人、日本人的纷至沓来又让这个国家有了近代殖民史；而进入现代以来，军政府是越不过的字眼，但如今，又是曾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昂山素季及其政党全国民主联盟（以下简称民盟）在管理这个国家。

在我的老家云南，玉石商人对缅甸的认识不会超过他们手中掂量着的翡翠。

在民盟执政前，遇上外省来的大客户，云南的这些玉石商人会从店铺最黑暗的角落翻出一块用黑塑料袋包裹的原石，

用“在缅甸五千人民币收的，到了瑞丽就一万五，到了昆明就三万”类似的句式来介绍对面那片“外国地”。他们也用正规合法的边贸交易或违法的偷渡、走私等方式不厌其烦地向世人宣告：伊洛瓦底江流过的山脉平原，是富庶之地，是黄金之国。

“血、梦想和黄金之城”，当时还是智利驻仰光领事的聂鲁达，在1927年一个太阳干烈的下午写出了这句话。那时仰光还是东方土地上，与上海、槟城、加尔各答、新加坡相媲美的繁华贸易港，聂鲁达用夹杂着热气和對璀璨文明震撼之情的语言，尽可能地表明他对缅甸的喜爱。

最近和一个来自瑞丽的玉石商人玩得熟络了，他除了会给你展示他带翠色的翡翠，也喜欢滔滔不绝地为你指出一条致富之道：“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缅甸遍地是黄金，而且还拥有不被禁止的自由。”

2

每次外出采访结束，在与采访对象共进下午茶的时光里，我消磨着一个20岁青年在这个年纪少有的耐心。在接连几天汗水浸透后背，身体盐分散发带来的虚无感中，我挤出笑容，用中文、英文或者半生不熟的缅语向不同的人提问：2010年大选之后，你的生活有什么变化？

2010年11月，被军政府囚禁了20年的昂山素季获释，缅甸也举行了20年来第一次多党参加的大选。

经受过日不落帝国文化熏陶的缅甸人，在茶店里，他们竭尽全力地用西方人千百年繁复礼节中留存的优雅，去托起铃兰花样式红茶杯，另一只手则用大拇指和食指捻着一把咖啡勺，在杯中顺时针搅动，让出产于云南或斯里兰卡的红茶充分与甜腻腻的炼乳交融在一起，待乳白的牛奶已经在红茶里呈现出织线般的纹路时，他们会抿一小口，然后让这股涓涓细流浸透到每一个牙缝之间，摆出一副阅尽幸福人生的喜悦笑容。

在笑容的映衬下，他们会直接却不失礼貌地回答我莽撞至极的问题：政治，不是我们应该谈论的话题。

华人，对此类问题更加谨慎。

缅甸有135个民族，主体民族缅族占比近70%，华人并未被列入官方承认的少数民族之一。不过，在“有钱的华人的社会地位比缅族还高”的缅甸，仰光的华人持有粉红色的居民身份证，民族一栏“信仰佛教的华人”字样赫然在列。他们可以自由出入任何公共场所而不用担心被警察盘问，可以自由开棉布厂，开采矿场，开出租车，而不会忽然“被政府将资产收归国有”。这样的自由，在缅甸的20世纪60年代的排华期无法想象，而在如今缅甸北部仍然使用着绿色身份证的部分地区，也是无法想象的。

我的华人舍友小富，我在他身上见识到了一种刚刚冲破禁锢、获取自由的快慰感。

小富沉默寡言，谨小慎微。他的面孔看起来并非源于华夏民族，宽厚的颧骨，高挺的鼻梁，戴上墨镜、背上黑色书包后，你会以为眼前的华裔来自拉美国家。当下班和同事到餐馆吃饭时，小富会踮着脚尖从公司离开。而到了周末，他会整天待在外头，带上自己的画板和颜料，在人民公园、仰光大学、城市北部的恩雅湖素描写生，在阳光毒辣的下午，他会穿上泳裤，在公共泳池里游几圈。

在初次见面的时候，话很少的他，既没有对我表现出对外国人的好奇，也没有用“一定要带你吃遍仰光”的客套话展露地主之谊，他在做自己的事情：聆听音乐、用金色的画笔勾勒莉顿·梅斯特的头发。之所以是莉顿·梅斯特，源于他的华为手机谷歌图片对于“西方美女”词条的搜索结果。

任何一个自诩来自文明社会的人，当看到小富对艺术的热爱与执着的场景时，恐怕都会心碎，会想尽一切办法帮助他。这个来自缅北腊戍的18岁青年，一年前刚刚从华文学校高中毕业，只身来到仰光，这个房价已经攀升到约合每平方米3万元的前首都。他每月领着不到2000元人民币的薪水，用着二手的笔记本电脑，戴着几乎无法遮挡紫外线的劣质墨镜，穿着已经洗出线头的白衬衫，吃着加了新鲜蔬菜和肉类的方便面。

他的母亲在七年前去世，得了“尿液里有糖”的疾病。小富说，他的母亲很是不忌口，什么都喜欢吃。为了不重蹈母亲的覆辙，小富七年来没有喝过一瓶饮料、没有碰过一颗糖。但我也常常会担心，每天都在吃方便面的他，实际上在做着比他的母亲更危险的事情。

小富把省下来的钱用于买CD、绘画用品和中文小说，所以当看到他带了一本马尔克斯的《迷宫里的将军》时，顿时放下了所有的防备，只希望能有阅读中文书籍的机会。

他太热爱与艺术有关的一切了。五年前，他听到了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那是值得他一生铭记的重要时刻，第一次接触到真正西方艺术的他，从此每天晚上不断地播放《玫瑰色的人生》和《达依女士》。

我希望他能听到更多的曲风，给他介绍了莫扎特、酷玩乐队和孙燕姿，对于我给他播放的歌曲，他每首都无法驾驭，或者说从没听过，但他一定要跟着一块儿唱，似乎能跟着音乐唱歌是转瞬即逝的独立日烟火。音调、音准、歌词，统统不值得一提。他小声地哼，但坚持把每首歌都哼完，当连续的音符把他这个茫然无措的探索者成功带到下一个音符出现的地方时，原唱与他哼唱的契合，会让他用抓住宇宙灵魂的笑容看着我。

“果加，我出生的小镇，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镇子，从我出生到现在没什么两样。5月份开始，白色曼陀罗花就开遍了一条街道。你如果硬是要我回答2010年之前和现在生活的不同，我着实不知道如何给你一个你想要的答案。”

为了让自己缅甸化，除了外出穿笼基、脸上涂抹特纳卡，我还请华人朋友给我起了一个缅甸名字“果加”。朋友声称，周一出生的我在缅甸的属相为老虎，“果加”也就是“老虎哥哥”的意思。

有一天，小富在听了《贝加尔湖畔》后对我解释了迟迟不回答我问题的原因：“我来了仰光之后，感觉生活无比畅快，我接触到了自己以前没有见过的东西。我现在可以充分表达我对艺术的热爱了，我改变了自己以前对未来人生的想象，这是你想知道的关于缅甸的自由吗？”

3

从地图上看与纬线几乎平行延伸的班都拉大街，如同块装巧克力一样的方块网状布局，连附属街道的名字“第1条街、第2条街……第31条街”也呈现一种克制着无限欲望的规则。按照常理说来，一个在外国人看来贫穷、未开化，并且在近代史上饱受摧残的国家，街道的排布应该呈现出“四五双鞋的鞋带缠绕在一起”的模样。

“因为只有把路和楼房修建到每一片裸露的地表上，才是一个急速发展、两年前第一次获取民主的国家应该有的野蛮生长。”到仰光的第一个星期，我没想到飞机上邻座的老板王先生还会主动联系我，而且是在仰光11点半的夜晚。这时，对我来说是在仰光最难熬的时刻，蹲坐在蚊帐里的我全身赤裸，空调吐出的风让人偏头痛但又欲罢不能，汗并非一滴滴地流淌，而是如蒸汽一样从人的体内发疯般地逃走。

这位在缅甸有着几个仓储仓库的台州老板王先生，六年前就到缅甸做木材生意了。“我刚去缅甸的时候，一架航班基本会空出三分之一的位置。”六年后在昆明长水机场，当他滔滔不绝地向周围人介绍自己目前从事的家庭培训课程时，只有我

对他礼貌性地回以微笑。“每次坐飞机，都得认识四五个人。”结果我成了他唯一的听众和这趟旅程中加上的唯一的微信好友。

“果加，有空我带你去KTV见见世面，你会感觉很自由。”王先生盛情邀请，并且还特意强调，“都是华人开的”。

王先生口中“唱中文歌的KTV”就在班都拉大街附近。从一百年前到迁都内比都为止，从勃固、丹老或者远到密支那的佛国子民，都以能在班都拉大街上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为豪，可以说，仰光近两百年的所有荣光都集中在这里了。这位梵文勋衔为摩诃·班都拉的将军，两百多年前在阿干达地区参与第一次英缅战争时所展现的民族气魄，最终以一颗在他身旁爆炸的炮弹作为谢幕。两百多年后把他的名字镌刻在英国人设计的街区上，再一次证明了民族血液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永恒之一。

这条街也是游客的必经之所。他们从象征民族独立的独立纪念碑出发，会先对着纪念碑东边的以马内利浸信会教堂拍照，然后沿着班都拉大街朝西走，路过苏雷塔、木斯米亚约书亚犹太会堂之后，最终以观音古庙作为这趟短暂旅途的终点。其中，只有中国游客会把拍照器材收回背包，双手合十，从钱包里翻出买矿泉水的零钱，毕恭毕敬地塞进功德箱。

有庆福宫和观音古庙的唐人街既不属于仰光，也不属于缅甸。承载了太多民族荣光的班都拉大街已经横穿了唐人街。更为准确地说，班都拉大街本身就是唐人街的一部分。在一次唐

人街的盛大活动上，我曾看到身着西装的华人领袖们只需用手一指，舞龙队、舞狮队就会按照手指的方向跑上一圈，长长的游行队伍有近1公里长，正是从独立纪念碑到观音古庙的距离。路过的缅族都投来艳羡的目光，对华人在这里建立的井井有条的秩序啧啧称奇。

后来应了王先生的邀请。毕竟在国内，每逢寒暑假，我也是下午场里少有的忠实顾客，不喝酒、不撒泼，专注于旋律、咬字以及评分系统为我鼓掌时的快乐。而在唐人街的KTV，熟悉的一切都分崩离析：台州王先生为我点了平生以来的第一个小姐。

那天晚上，王先生的教导和在国内我这个年纪的男生遇上的所有青年长者的教导相辅相成：这就是社会的本来样貌，学会享受而非拒绝。“在缅甸，做什么都是自由的。”在大包房中，他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线，目光穿过泛起的烟雾，用洞悉一切的眼神鼓励着我。

然而，小姐端坐在我身边的三个小时里，我做了所有没见过世面的处男应该做的：不让她碰到我的手，不让她敬我交杯酒，不让她靠在我的肩膀上，以及不接她“12点以后继续服务”的话茬儿。

不论是王先生还是同行的长者们，我能看出他们对于我展现的拘谨以及心急如焚的样子。“你不和她讲话，也会让她很尴尬。”王先生对我说，“来缅甸之前，你身边的师兄都和你一样，但你看看现在。”

在近30平方米的KTV大房里，金色条纹和迷幻的反光耀眼夺目，黑色塑料的大桌子上堆满了缅甸啤酒、雪碧和中国产的绿色包装的泡椒凤爪。在缅甸做生意的“师兄们”围坐在桌子周围，其中两人正在唱《老鼠爱大米》。

他们每个人都搂着一个小姐，然后把头埋在小姐被头发遮挡的耳朵上，抖动着喉结说话。话筒连接音箱的黑线又长又旧，偶尔有蟑螂从线的一端爬到握着话筒的手上，熟练的歌唱者不会被晕乎乎的蟑螂打乱歌唱的节奏，因为“只要不是老鼠就行”。

遇上气氛尴尬或忽然冷场的间隙，小姐会自觉接过活跃现场的重任，匍匐到点歌面板前，用笑容面对失灵的触屏面板，然后把掩盖在笑容下的恼怒劲儿用戳、敲和踹的方式向点歌面板表明心迹。

如果在这样的地方存在着有迹可循的规律，那么“头一首歌一定是《老鼠爱大米》”将会是唯一的真理。当然，除此之外，小姐们还会唱《日不落》和《传奇》，选择唱中文歌并非出于从事职业的便利，而是中文歌是她们“听过最好听”的歌曲，杨洋和吴亦凡也是她们见到照片会激动得尖叫的“见过最帅的”中国明星。

“我们来喝酒吧！”

坐我身旁的小姐也许担心20000缅元（约合89元人民币）一晚的钱太好赚了，一个劲儿地用夹杂中英文的英语让我喝酒，

她用喝红酒的方式握住酒杯，举起的酒杯与眉毛平齐，献媚却不失尊严地敬酒，以让人看起来不像是“服务”，更多是一种出于职业性质的关照。坐我身旁这位来自掸邦高原的小姐如此西方化，以至连干杯都要说“cheers”。她所显出的从容有度，都是2000多年前毕恭毕敬迎接回释迦牟尼八根头发并建造了大金塔的缅甸先人无法想象的，历代的缅甸君王都怀揣着在掸邦高原和伊洛瓦底江之间建立一个纯缅族国家的梦想，一个所有人都在说缅语、用缅文、所有人都臣服在佛法领导下的国家。

“下次带你去另一家更好的，他们的小姐中文说得很好。”王先生也听不下去小姐的蹩脚中文，扭过头来和我说完，又把头埋进了小姐的肩膀上。

在喝酒的间隙，歌曲MV透出的白光让我一下子看清了小姐的样貌：瞳孔黑亮胜过清晨洒着露水的葡萄，颧骨修长，齐肩的直发有一股柠檬味儿，一侧的头发别在耳后，显出小巧的金色心形耳坠，露背圆领的蓝色晚礼服紧贴她的每一寸皮肤，即便我的手背离她的腰还有1厘米的距离，都能感受到血液流动的热量。

时间未到凌晨，喝完了四瓶威士忌和四箱啤酒的我们不同程度地陷入了如行进了几百公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犯人一样的困乏状态中。拥着小姐的人也趁着时间未到凌晨，急匆匆地渴望在小姐的手掌和腰间寻找比仰光三月更清凉的东西。

“你今年几岁了？”

突如其来的问题让我更加尴尬，在如实回答了自己的年龄后，她说了一句：“居然比我还小呢，我的弟弟。”直到12点钟她们的“下班”时间，我俩没再说任何一句话。

“果加，不要对这样的事情有抵触心理，你必须要知道的是，只有经济在发展，红灯区才得以存活。”王先生对我说，“打听打听中国人在这里的投资，你就会知道谁才是决定未来的人。”也只有这种时刻，当某个中国人成功约到一个从腊戍来的漂亮小姐，困乏的众人会激动万分地举起手机，叫嚣着“禽兽”的同时也在欢呼雀跃，某些细节和瞬间会让人看到300年前的葡萄牙人、130年前的英国人或70年前的日本人的影子：他们也会把自己当作这片土地的主人。

4

本地人、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外国人，在仰光的菜市场买菜，是不一样的价格。大多数时候，那里的水果和蔬菜都以“个”来售卖。同样的10颗莲雾，本地人和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需要花1500缅元，而我，花了2500缅元。在一次乘坐由“出游过14个国家”的“大副”驾驶的出租车时，这位鳄鱼皮脸的“大副”向我解释了小贩售卖的秘密：

“那是因为你的英语说得不够好，不是因为你是中国人。”

“大副”坐在右驾，他的车门上没有写着“仰光号”，而是“石野内装”，后面接着一排看不懂的日文。他转过头来朝

我狡黠地一笑，挡位停留在P挡的位置。在西方国家对缅甸实行经济封锁时期，只有日本二手车迎着太平洋的朵朵浪花一辆辆运送到仰光港。缅甸自2011年开放汽车进口以来，登记在册的合法机动车在2014年达到440万辆，其中92%都是二手车。

同样的对话在我本科生记者生涯中曾出现过两次。在云南大学宾馆的门口，有一位售卖民族手工艺品的老人。我们询问过这位老人一些白族蜡染手工单肩包的价格，她并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先引以为傲地对我们说，学生买最便宜，外国人买最贵。“那是因为他们的中文说得不够好，不是因为他是外国人。”

“问题在于中国的学生只会考试，不会说；而我，果加，我是会说四国语言但不会考试的大副。”“the problem”被他说成了“the brablen”，我想指出这个即便是英式英语中也不会有发音错误。但恰好此时，长达8分钟的红灯终于结束，绿灯只有30秒。

鳄鱼“大副”左手刚放下手刹，脚已经使足了劲：5码，然后60码，我已经陷进后座的座椅里，装着相机的书包重重地贴上了脸。

“大副，在中国，你这样开车是会被关起来的。”我一开始准备说会被扣分，虽然1MB的流量只需要1缅元，但我不愿再消耗流量去手机词典上查有关“扣分”的单词。

“果加，在缅甸，做什么都是自由的。你看，我可以在行使过程中打开车门朝外面吐一口混合了槟榔石灰水的红色唾液，周五晚上回到家还有*Myanmar Idol*（《缅甸偶像》，一档综艺节目）可以看，你们中国商人过来，不就是要乘此机会大捞一笔吗？”

我不愿对此多加争辩，因为那一次外出采访的对象，就是一位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到缅甸从事律师行业近三年的上海男生。而他的律所之所以能被授权翻译《缅甸投资法》的中文版、本人受到昂山素季接见，只有一个原因：来自中国的投资与日俱增。

“在缅甸，律师行业是真正的垄断行业。”若干年前，缅甸的某些法律是不对外公布的，如果有两个人想打官司，很大一部分的钱会花在“查询法律条文”上，如果这两人中还有一个外国人，那还得额外支付一笔法律条文翻译费用。

作为一个商业律师，上海男生平时处理得最多的案件就是关于土地所有权的纠纷。“缅甸是一个土地私有制国家，中国客户到缅甸投资建厂之前，需要有专业的律师调查土地的所有权。很多中国公司没有做好这一步，工厂开工前才发现困难重重。”

在事务所对上海男生的介绍中，“语言”一栏的简介让人会心一笑：英语、基础缅语、普通话和上海话。

“你说你对缅甸的小叶紫檀感兴趣，有什么心得吗？”

当上海男生听到我可以找到很便宜的小叶紫檀货源时，多次让采访的航向偏离预定轨道，“我之前做过红宝石，卖到上海价格已经翻了五倍，当我卖出最后一个玉石原石之后，我决定收手不干”。上海男生在这方面比我强很多，他熟读了很多关于缅甸历史的介绍，终于在一次仔细端详亚洲地图时，得出他将用一生去证明的结论：作为连接中国和印度两个巨大经济体的走廊，缅甸的发展只是制度和时间的问题。

他抿了一口咖啡，头上的发胶反射出的光芒，会让人误以为他拥有仰光最耀眼的银发。我们的采访地点在Meliá酒店二楼自助餐厅，三天前仰光省的省长吴漂敏登和中国驻缅甸大使洪亮，刚刚在这里参加了缅甸中国企业商会纺织制衣分会（协会）的成立大会，参会的商人心知肚明，会议是为一个多月前中资服装厂遭不法分子冲击事件召开的。

“为什么要收手不干？”

“可惜制度是个大问题，正如来缅甸投资的商人大多以失败告终一样。法律、文化、习俗，缅甸遍地是黄金，但只有一心扎根在这里，才能把黄金带走。”

一个多月前的服装厂事件，不法分子最后只提出三个要求：涨工资；缅甸员工由缅甸人管理；缅甸员工的厕所，不准其他非缅甸人使用。

离开缅甸之后，在整理笔记时我发现，上海男生是我在缅甸遇到的唯一创业成功的中国人，更多的中国人无法在缅甸体

味到成功的喜悦。

在缅甸泼水节的前几天，气温已经飙升到42℃，一个温州男人走投无路，找上了我们，希望我能帮他曝光“一个诈骗集团”和“两个在逃的通缉犯”。

温州人用焦灼、悲伤和愤怒控诉着合伙人的背信弃义，他毕业于北京工商大学市场营销专业，在浙江某个三本院校担任老师，某个偶然的机会，被人邀约到毛淡棉开采石场，对方允诺由温州人出资建厂，他跑销售，年收入过千万元不是大问题。

“看着别的温州人在缅甸、俄罗斯发了财，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温州人，本来想抓住缅甸的开放机会大赚一笔。”在等待总编批准是否曝光温州男人“被骗”事件的间隙，温州人向我感叹道：“以前在仰光住100万人民币的别墅，现在租22万缅币一个月的经济适用房。项目启动时，老乡争先恐后地打款，一个微信视频就能借到钱，现在当面签借条，也不会有人理咯。”

讲到最后，电话那头已经有啜泣的声音，我不想打击他，但还是必须要弄清楚事情原委。

“其实没有什么诈骗事件吧？就是一次投资失败？”

他没有回话。我把话题岔开，让他说说家庭，说说他朋友圈里晒出的11岁儿子。“早就离婚了，在缅甸赔了300万美元，儿子都难得见一面。”

“你的钱拿回来的可能性太小了，还不如回家从头再来。”

电话那头忽然听不到啜泣，听不到气促的呼吸声。挖掘机碾过、石块开裂、工人人们的低语随着毛淡棉的海风吹来。

“我是一个温州人，我要赚够一个亿才回国。”

我佩服他的勇气，但我最后还是决定不把上海律师的电话告诉他，因为那一刻我清晰地知道，这个男人不仅找不回他的合伙人，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已经请不起上海律师了。

5

“果加，我必须得问你一个问题了。”报社的老编辑，操着台湾腔、祖籍云南的杨姐，在我回国前最后一次加班时，依旧没有给我那个问题的答案：大选之后生活的变化。

“果加，你凭什么认定我们在大选之后的生活有变化？”她说。

我把在瑞丽从玉石商人口中听到的话、小富对于艺术的快感、红灯区的经历以及上海律师的论断告诉了她，这个在仰光生活了近40年，从台湾“中国医药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吃素的杨姐，用极其惊恐的声音告诉我：

“他们怎么这样子咧？完全一副搞不清楚状况的样子咯！”

“其他人的说法我就不引述了，但小富怎么会搞不清楚状况呢？他也是一个缅甸华人呀！”我问。

“注意，他是缅北华人嚯，缅北的华人不愿意去接触外面的世界，太穷了，没有见过世面。”

一锤定音，我落魄地忘了自己一开始为什么要来缅甸。在此之前，我把他们无法体味到身边的改变，归结为“身处变化之中的人看不到变化本身”。

“那还有 *Myanmar Idol*，我赞叹所有的选手都是唱爵士、蓝调等如此西方化的歌曲，你们在这之前应该完全没有接触过吧？”我还是希望从艺术的角度一窥缅甸的变化。

杨姐摆摆手，她手头编辑的稿件还没有处理完，在当晚8点之前，她需要把缅甸华人们的投稿整理出来，拼凑整整一个版面。她用着iPhone 7 Plus，那是她在新加坡的弟弟送的，她身材瘦小，头发染成金黄色，皮肤黝黑，看起来像混血。过了一会儿，当小样打印出并通过审核后，她长舒一口气，用轻松、深谙人生道理的口吻回答：

“缅甸本土的歌，都是抄中国的，你这都不知道？”

第三章 如何写好人物？

如何写好一个人物故事

张卓（《人物》前副主编）

如何讲好一个人物故事？我先给大家看两段话，你们看看哪个是人物故事，哪个不是。

1. 王后死了，国王很难过。

2. 在一场战争中，王后被敌军挟持，不幸遇难，国王发动反攻，力挽狂澜，最终收复失地，但王后的死仍旧让他悲痛欲绝。

很显然，第二段话应该是一个人物故事。

实际上，人物故事是有情节、有因果、有逻辑、有情绪的，而不仅仅是简单叙述一个结果或者事实。

很可惜的是，大部分人在报纸、期刊上看到的关于人物的写作，严格意义上来说都不是这种故事，可能仅仅是大段的叙述或者事实的堆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现在没有非常好的人物报道。

大家在明确故事之后，可以引入我们的第一个话题：我们为什么要来写一个人物故事？为什么写人物故事对我们那么重要？

我们为什么要写人物故事

说一下我的感受吧。对于为什么写故事，我这些年一直有一个很深的思考。2016年十一假期的时候我去了趟西班牙，回来之后看了一个节目，就是BBC（英国广播公司）的《西班牙的艺术》，其中有一个细节挺有意思的。

这个细节讲的是，16世纪西班牙的一个修女，她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她当时声称在一间房间里看到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受尽折磨。那一刻她声称圣徒穿透她的心脏，由此她被注入了一种非常神奇的能力，她可以跟上帝产生强烈的交流并且感到一种神秘的力量在自己体内。当时西班牙很多人管这个现象叫“圣特雷莎的神秘幻觉。”

这位修女去世四年之后，她被西班牙的基督教宣布为圣徒。大家都很惊讶，为什么一个普通的修女会被宣传为圣徒，甚至一直到现在都有她的故事。其实，这个修女的故事是真假难辨的。

背后的理由是，当时的宗教主义者认为，这个修女的故事可以净化人心。注意，他们一直强调说，这个修女产生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可以净化人心，可以让基督教的精神更好地传递。一个普通人因为虔诚地信仰上帝而拥有了超能力，这就是一个非凡的故事。

西班牙一代又一代的基督徒都在讲述这个故事，跟他们的儿子、孙子讲述这个故事，人们甚至忘了去考证这个故事到底

是不是真的，甚至不去怀疑历史上有没有这个修女的存在。这个故事一直不断地被放大再放大、宣传再宣传，这个面目模糊的修女成了民间英雄，由此也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这个细节让我感触蛮深的。无论是宗教宣传还是政治宣传，都在寻找一个非常好的故事，或者说，都在找一个非常好的人物故事。因为故事这个体例非常适合口口相传，也非常容易记。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圣经》《伊索寓言》《西游记》，都可以叫故事，故事是可以穿透时间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去写一个故事，而不是去写一篇简单的说明文或者叙述文。

无论怎么强调故事的重要性都不为过。写作者就是要写一个故事，因为故事才能广为流传，我们要相信故事，要相信一个好故事的魔力。

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一部分是废话，但我一直觉得大家对故事有一个基本的共识，或者相信写一个故事的重要性，相信一个好故事是具有魔力的。这样我们才能去讨论如何写人物故事。很多人说我只想写个散文，或者我只想写一篇叙述文、议论文，那我觉得我们就没办法进行下面的讨论了。

写人物故事的感觉

那么，如何写一个人物故事。

以下是一个记者写的关于易到用车创始人周航的一篇文章的开头，以及我修改后的版本。

原稿：

创业是个筐，每一个围在旁边的人都自视甚高，相信自己能够从中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人从中捞出了财富，有的人获得了名誉和地位，也有的人拿到了激情。但是在这个打捞的冒险历程里，周航得到的是：失去。

近期市场上有传言称周航已经逐渐淡出了易到的管理层，并牵头成立了一家基金。对此，36氪记者向易到用车总裁彭钢求证此事，他的回复是，“没有淡出”。

不过种种迹象表明，他正在失去这家公司。从今年开始，他在朋友圈里不再像过去那样每天拿易到的内容刷屏，而是更多地关注旅行、实业、美食与酒。

我修改后的版本：

最近，除了每周一的例会，易到CEO周航先生的办公室在大多数时间都是闲置的。

有人说，周航在外面牵头做了一家新基金，也有人说，他在休息，还有人说，他去了另外一家汽车公司。他的行踪引发了易到员工的议论。以至每隔几周，易到公关部都要出来辟谣：周航仍然在易到。

一系列微妙变化也在这个43岁的男人身上悄然发生——他的朋友圈更多地关注旅行、美食与酒。36氪记者第一次采访周航时，他讲起在美国参加“火人节”期间和美国科学家一起探

讨Hololens（微软的全息计算机设备）技术和量子计算。“量子计算一旦突破了，可能会对整个世界产生翻地覆地的变化。”他很兴奋，“人们的认知会被彻底改变，想到这些我特别开心。”

这两个版本有什么区别？

第一版记者写的人物非常远，大段的说明文以及大段的事实阐述，让我们并不能对周航产生印象，或者说对这个人物并没有什么兴趣。

修改之后，我把它的视角变为了周航的一个动态，一个最新的消息。大家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有细节，有人物的直接引语，有一些生活的日常。比如，第一段说周航先生办公室大部分时间是闲置的，其实就设置了一个非常大的悬念：为什么他的办公室是闲置的？

修改之后，我们还能看到这个男人身上的一些性格特征，比如说他对科学技术的兴趣，还有他现在的关注点，包括他的年龄。

修改后的版本是一个人物故事的架子，并不是写得再好，而是它展现了人物故事的写作方法。

我们首先要明确一点，人是推动故事的基本前提，没有人就没有故事。我很难想象，一部电影是没有主人公的，一部小说甚至一部短篇小说是没有主人公的。

关于人物故事的基本要素，我大概拆解了六个部分。

第一个要素：主人公

其实主人公也分为两种：主动型的主人公和被动型的主人公。

主动型的主人公一般有非常强烈的野心、抱负，他们会被欲望驱使。大部分的商业人物报道都是主动型的主人公，会主动推动事情发展，比如说我强烈推荐的《史蒂夫·乔布斯传》。你可以看到乔布斯作为一个对世界充满野心、渴望改变世界的人，是如何从一个车库里面的辍学男青年，一步步变成最伟大的商人或者说企业家的。

被动型主人公一般是不经意地卷入一场事件，或者被动地接受某件事，这件事本身和他自身的性格有冲突。简而言之，就是一个人莫名其妙地卷入一个事件。

何瑶写的《范跑跑这七年》里的范跑跑，就是被动型主人公的典型案列。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的时候，这个老师抛下学生逃跑了。他的逃跑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到底在生死攸关的时刻，你的身份是一名教师，还是一个人？到底应该救学生，还是应该自己求生？范跑跑是一个被动型的主人公，作为一名普通中学老师卷入一个巨大时代事件。

大家可以思索，你想写的是一个主动型还是被动型主人公？

这个问题很重要。你首先要确定故事主人公的形态。如果是一个主动型的主人公，你一定要写出他的野心和欲望。如果是一个被动型的主人公，你一定要把他和环境，包括他和时代或世界的关系，理解得非常透彻。

第二个要素：欲望

确定主人公之后，第二个维度就是欲望。但凡是一个人，他总有欲望。欲望是什么呢？就是他要做什么、他要达成什么目的，以及他被卷入这个历史事件或者社会事件之后，他内心到底在想什么。这个欲望，一定要讲得非常清晰，他到底要做什么。

欲望也是内心驱动力，展现一个人做事的价值观、动机。

无论我们遭遇了什么样的事情，哪怕今天早上我不想上班，其实我也可以知道我自己的内心到底在想什么。到底是我对工作不满呢，还是我因为失恋了不想上班？作为写作者，一定要在确立了主人公之后，把人物的心理动因掌握好。

第三个要素：挑战、困境、危机

在我们确定好主人公以及主人公的内心欲望之后，我们要非常清晰地去思考这个主人公所面临的挑战、困境和危机到底是什么。只有有了挑战、困境和危机，故事才成立。因为没有这些的话，他只是一个扁平化的线索或者扁平化的叙事。

比如讲范跑跑的稿子，如果范跑跑没有面临这些质疑，没有面临公众对他的声讨，甚至如果他没有卷入地震或者汶川没有发生过地震，他根本就不会成为公众视野中的人物故事，他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你写这个稿子的时候，只能写一个侧写或者是一篇小的人物散文。所以写人物故事的第三条——挑战、困境、危机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些，你没办法看到人物的真相，在这种巨大的压力或者挫折下，人物到底呈现了一个怎样的状态，这是人本身内心的真相。

我们可以再把这个挑战、困境、危机分为两种，就是外在的和内在的。外在的冲突或者挑战是非常明确的，比如说一个人遇到了一个历史事件或者想去达成什么样的使命，又或者想去改变世界，这都是外在的冲突，就是他与世界或者与社会之间的冲突。

还有一个维度，就是内在的冲突。这种稿子现在非常少见，因为内在的冲突特别不好写。如果大家想看关于内在冲突的稿子，我推荐一篇《人物》刊载的《黄磊：一次别离》，电影可以看《迷失东京》，这些作品讲述的都是非常典型的内在冲突的故事。

内在冲突的意思就是说，某个人因为某一个内心的困惑发生了一连串的故事，然后这个故事的结局就是他对生活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比如说写黄磊的这篇稿子，他讲的是黄磊的一个邻居得癌症去世了，黄磊内心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开始思考生与死，思考他和家庭包括他和事业之间的关系，然后在一系列

内心困惑的描述之后，他最终还是找到了一些生活之于他的意义。

我为什么一再强调挑战、困境、危机，是因为我看过很多写得不太好的文章。有些写作者写了很多人物的日常，比如他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喜欢什么，写得很漂亮，文采斐然。但是，如果没办法看到冲突，就没办法写出人物在冲突中的表现，以及人物在表现之后内在的真实感受。其实这种写作就是一地鸡毛，你写得再漂亮也是毫无意义的细节堆砌。

压力之下才能看出一个人到底是怎样的人。中国有句老话，患难见真情，就是这个道理。一定要把你的主人公放在一个巨大的挑战、困境和危机之下。

第四个要素：动作模式

在讲完以上三个要素之后，我们来讲一个动作模式：经历一个巨大的困境和冲突之后，主人公会怎样？这也是写作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具体来看下动作模式。一个人物面临一个冲突，比如范跑跑面临汶川地震之后被国人质疑的这么一个舆论环境，他做了什么，他怎么想的，他继续做什么，他继续怎么想的，他怎么面临争议，他有什么防范措施，他的举动是什么，他怎么去面对家人……这些都是在经历挑战之后，主人公做出的一系列动作。在写作中把它写得越细越好。

困难往往是连续性的，它很可能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一连串的困难组成了一个故事。

我做编辑的时候发现，很多写作者在这个环节存在误区，就是他们去写困难，很有可能把人物变成一个行动机器或者变成一个沉思者。

行动机器是指他一直在写这个人，比如说碰到什么困难，然后解决了，又碰到一个困难，又解决了。其实在写一个困难的时候，应该写他当时是怎么想的、他的价值观是什么、他的内在驱动力是什么，然后写他怎么解决这个困难。如果你只是写一连串的动作的话，我们就叫他行动机器，因为这个人是没有感情的。

所以困难和他的价值观、内在驱动力要交织着写。一般的模式是：接受困难、怎么想、内在驱动力是什么、价值观是什么、怎么解决困难。

也有很多写作者容易把人物写成一个沉思者，就是光写他想怎么去接受困难的思考，有很多感受，但没有行动，没有跟现实生活直接发生联系，没有跟周围的世界产生接触。所以你就发现很多人物故事，特别像一个人物的抒情，没有现实的故事。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前两年我特别喜欢看一部电视剧，《甄嬛传》。这部电视剧简直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人物故事的写作范本。为什么说它好呢？是因为甄嬛所遭遇的每一次挑战

和困境，包括冲突，都被她化解了，而且化解之后她都有自己的感受。这就是一个女孩儿一路打怪兽，最后获得胜利的故事。

为什么大家都觉得《甄嬛传》能连续看下去？因为甄嬛每次所面临的挑战都是生死攸关的，如果没办法挑战成功，她就死了。只有挑战成功，她才能活下来。所以困难越大，这个故事的张力就越大。

简言之，你要写出人物是怎么一路带着感情打怪兽的。

第五、第六个要素：故事高潮、结尾

第五个要素是故事高潮，由一系列情节，渐次发展成一个最高潮，从而引发绝对不可逆转的变化。第六个要素是结局，你是选择开放式结局还是闭合式结局？

其实这两个部分比较简单。当我们写一个故事的时候，总有一个人物会碰到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危机，我们可以将其等同于好莱坞电影里那个终极大怪兽。这个就叫故事的高潮，对这个高潮要阐述得非常清楚。高潮之后，这个故事也就走向结局了。

在故事写作中，结局也分两种，开放式的结局和闭合式的结局。这个也需要在写作时注意，结局到底是什么样的形态。

个人史、时代、价值观

上面那些是六个维度的关于人物故事的拆解，如果再用一个更大的维度去拆解人物故事，就是一个好的人物故事需要个人史、时代、价值观。这是写作的一个基本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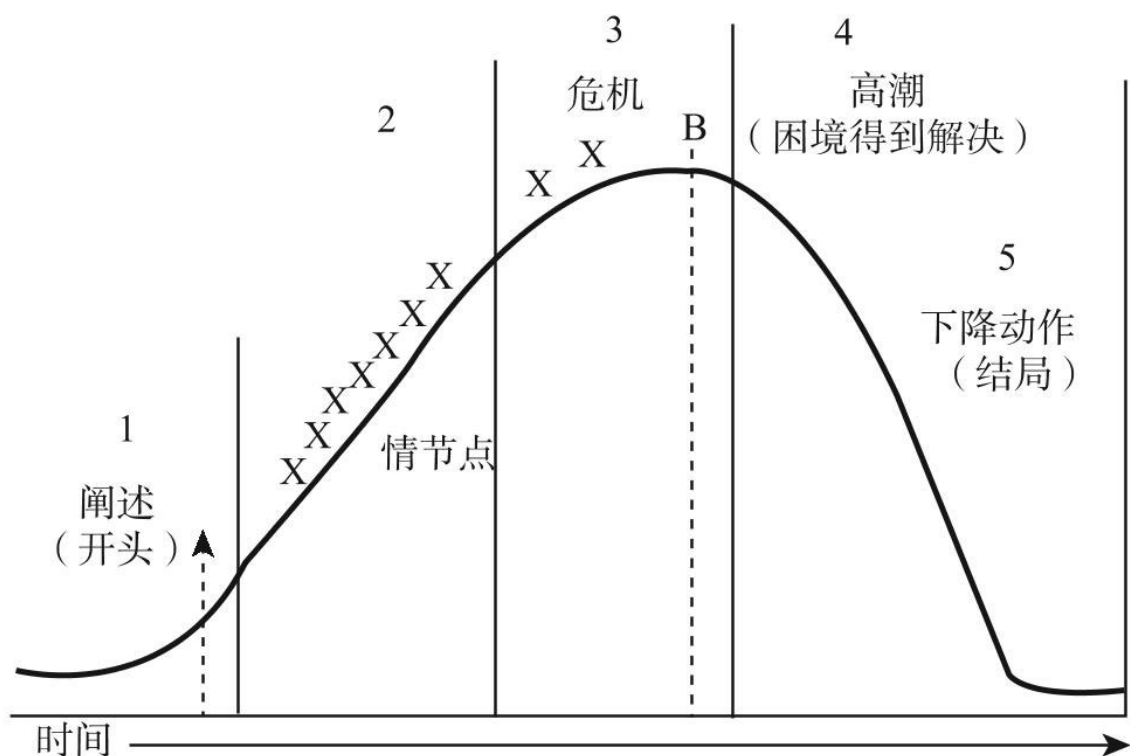
个人史非常好理解，就是一个人自我奋斗的故事；时代就是说如果人物奋斗故事能跟时代有契合点，或者反映了时代的某个特征，又或者它影响了时代，它就是一个非常有厚度的人物故事。与此同时，如果这个故事的价值观与时代价值观是相符的，那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故事。

三个要素都有，就是好的人物故事。大家写作人物故事时，也可以有意识地从时代、价值观的角度来思考。

在此推荐《国民科学家袁隆平》（《人物》杂志）这篇文章。这个故事写得大开大合，写了科学家跟时代的关系、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穿梭到当下。他是诞生于“科学的春天”的科学家，他的价值观、个人威望和个人影响力在文章中得到完美结合，我觉得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完全能够反映个人史、时代、价值观的融合，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莱坞故事叙事弧

当我们把人物元素搞清楚后，该怎样组织人物故事写作的结构呢？



好莱坞经典叙事弧线

借用好莱坞的经典故事叙事弧，我简单讲一下。基本上所有好的人物故事文本，都是遵循着这个叙事弧去的。这个不是我发明的，是几乎所有的编剧和小说家都遵循的，包括我曾给36氪的记者讲特稿写作，都是用的这条叙事弧。

我建议大家去反复研究，去想、去拆解你的故事，或者说当你要写一个故事的时候，你按这个叙事弧去写。

先讲阐述，就是讲清楚人物的背景，比如他出生、家庭情况或者他现在的状况。

上升动作，你可以理解为人物对所面临的挑战的应战模式。就是他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有什么样的困境、冲突，他如何去应战，他的心情、驱动力是什么，他的价值观在这一连串动作中是怎样体现的。

这个上升动作基本上就是挑战应战模式，它会推动故事急速发展。一般来说，一个时长120分钟的好莱坞电影，这种打小怪兽或者是打怪兽的上升动作，可能需要花费100分钟，也就是超过2/3的篇幅，讲述人物如何接受挑战 and 如何应战。

注意要明确人物的价值观和困惑到底是什么。人物在接受挑战和面对困境时，总有反复、犹豫、纠结，不只是乐观地向前冲，他还会怀疑自己、怀疑关系、怀疑时代，这其中总会展现人物的个性。

接下来讲危机，危机就是我刚才讲的，在故事里的一个巨大危机、一个终极boss（老板）或者说这个人发生了终极、致命的内心冲突或外在冲突，然后他所能接受的最大的挑战和困境，在危机里要浓缩地写出来。

高潮就是一个点状体。在打赢怪兽的那一刻，当写作者跟人物有共情效应的时候，就叫高潮。就是说打赢了这个怪兽，或者说战胜了这个挑战，人物到底获得了什么。那一刻到底是获得自由、忠诚、友谊还是爱情，就是那么一个非常短暂的时刻。

接下来的下降动作就是结局了。就是刚才讲到的，你要一个开放式结局还是闭合式结局？

好的中篇小说，或者长篇小说，或者电影故事，都是由无数个这样遵循好莱坞经典故事叙事弧的情节组成的。我们写一篇小说时，每一个情节都是依照这样的叙事弧写就的。

下面我按照这个叙事弧的概念，分析一下我写过的一篇文章《明利场》。这是一篇写郭敬明的作品，是我在《人物》工作时写过的一个封面故事。当时我就是遵循这个好莱坞的故事叙事弧去写的。

第一部分就是阐述郭敬明的现状，他住在一个豪宅里面。然后第二部分就直接写他在18岁的时候面临的一个人生困境，他当时没有钱，没有地位，所有人都鄙视他，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他决定去重获尊严。怎么获得？就是不断地挣钱，不断地获取，即所谓“草根逆袭”。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明显能看出人物有很强的内心驱动力：获得尊严。人物的行动就是要写东西、不断写东西，价值观就是要挣钱。人物面临的最大冲突是什么？就是别人看不起他。

郭敬明面临的第二个困难，在文章的第二部分里面写到。他有了足够的钱，有了足够的名气，解决了第一个困难，终于获得了认可之后，他又迎来第二个困难，就是公知界和文学界对他的不认可，那时候人们把他和韩寒去做对比，就是不被所谓主流文学圈认可。

他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他开始做自己的公司，开始跟韩寒吵，开始因为抄袭的事情与各种舆论对抗，开始彻底走上了商业道路。你可以看到人物面临的困难是不被文学界认可，人物的驱动力是继续要活得有自尊。人物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彻底地走向商业道路，去做一个彻底的文化商人，而人物的价值观是他依旧相信金钱。

现在郭敬明解决了所有的困难，但他又面临着第三个困难：他很孤独。他觉得他走这么远，他获得了名，也获得了得利，但他发现周围已经没有朋友了，这个时候其实是人物的内在冲突。这个冲突起码到我采访的时候，并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所以我并没有写太多他的行动，也就是说，没有写太多他是怎么去挑战或应战这个冲突的。

我这篇文章的结尾，其实是一个相对开放式的结尾，就是当他感到孤独，当他感到自己走得太远，已经没有朋友的时候，他心里的感受是什么。

大家可以去挑选一个你想要写的人物试一下。你最想写谁？是你的父母、你的朋友，还是一个陌生人、一个公众人物？

无论你想写谁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最重要的是，你要相信你写的故事，相信你要写的这个人物。你要对这个人物有“爱”，不是爱情，不是亲情，也不是友谊，而是相信这个人的这个故事，你一定能讲好，你要相信这个主人公，你对他是充满了写作的爱的。

好的写作者一面残忍，一面温暖。为什么残忍？因为要写出生活的真相。能不能写出人物的自私、虚荣？我觉得大家很容易把自己的写作对象想得过于脆弱。比如当时我写郭敬明的时候，他看完那篇稿子的反馈是，“这篇稿子既不像我，又像我，但你说这篇稿子是表扬我呢，还是批评我呢？我也很难下定义，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我”。

当我听到他这个评价的时候，我觉得这篇稿子就算成功了一半吧。你们如果写完一个人物，那个人非常满意，还非常认可这稿子，你这稿子可能是不成功的。因为你只写出了他喜欢的样子，而没有写出一个真实的他，这是对写作非常不负责任的。我们要写出的东西，反正起码我想写的东西，一定是一个真实的人物故事，而不是为谁写的故事。

至于温暖的一面，我觉得一个好的写作者往往是一个好人，因为当你写了很多人世丑恶的时候，你还依旧对生活充满美好的向往，还能依旧理解并接受你故事的主人公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或者说，你能感同身受他的不完美、能体谅他的不完美，但这个只是“温暖”的部分，当你写作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真实和客观。

即便我们写出了人生的灰暗，写出了人性的虚伪自私，但依旧要对人充满善意，善待他人，甚至理解你的主人公为什么这样，用心体会。好的写作者需要具备共情能力。

挖掘人物的欲望、细节和冲突

黄慧（三明治“短故事学院”负责人）

“人物特写是关于一个人的简短描述，英文字‘profile’亦有脸部侧面轮廓之意。在摄影上，所谓特写（close-up）又称细节镜头，是指“以非常近的距离拍摄，能够展现细节，达到强烈清晰的视觉效果，却不能获得宽阔的视角。”

“人物就是价值观、信念、行为、所有物的总和。”

非虚构写作必须立足于事实，再讲求深刻或者文笔。人物是非虚构写作中常见的写作对象，因为人是一切故事的总和，也是推动故事的基本前提，没有人物就没有故事。

那么如何写好一个人物呢？首先要明确的一点就是，写一个人物的“到达点”是什么，对一篇好的非虚构作品来说，不是要写这个人有多好或者多么坏，而是要在刨除了二维对立后呈现人的复杂性，这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

写好人物需要运用到诸多技巧，但这个技巧并不全然是写作上的，也是在于作者对人物的了解与理解之上。在写作上，我们可以运用大量的细节描写以及对话、对情节的记叙去展现人物。记住，不要用观点去总结人物，要用细节去展现人物。

比如本书中的《在中国，为iPhone镀金的美国人》一文就使用了人物对话去塑造人物：

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他并没有多大变化，还是个想做慈善的理想主义者，赚钱的同时内心充满矛盾。

“虽然每个产品的销售额都有数万元，但不能带来内心真正的满足感。可也不能告诉客户——你花上万元买瓶酒，买双鞋，你就是个傻瓜，你可以拿钱去帮助更多的人。

“不过中国人变得很快，接受能力比西方人好得多。之前大家并不觉得‘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是一件很酷的事。但近两年，彭丽媛一直在穿中国设计师的衣服，也让‘Made in China’在人们心中变得微妙起来，变得让人充满自豪感。

“所以我现在继续以迂回战术做着慈善，一边和中国本土新兴的科技公司接触，了解网络平台的捐款设计方式，一边也在研究如何‘让慈善变得酷起来’。”

我们坐在餐厅门口的平台上，餐厅老板中土混血的三四岁小女儿怯生生地伸出小手，想摸摸吉娃娃。塞乐斯给了她一块饼干，鼓励她去喂小狗，小姑娘二话不说，直接把饼干吃掉了。

这样一个五大三粗满脸胡茬儿的老外，笑得龇牙咧嘴，怀里搂着个超迷你的吉娃娃，还是一件挺萌的事。

人的欲望

判断一个人本身的关键要看“欲望”，因为欲望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个人的行为逻辑。写一个人的欲望要通过写对方的“动作”。也就是不要看对方说了什么，要看对方做了什么。谈论抽象的观点很容易，但是做了什么才决定一个人本身，也就是要看“动作”不要看“言论”，包括自己写自己的故事之时，谈论理念并不需要过多出现，它穿插在文中用具体事件去表述就好了，以及怎么去理解一个事物一个人也是很重要的，张晓舟说过：“世上没有浅薄的事物，只有对浅薄事物的理解。”在本书中，《网络女主播的爱恨江湖》一文对主人公下了一个判断：

果一个赌徒认为自己正在红运当头，那么再大的风险都阻挡不了他的孤注一掷。亮哥就是阿May唯一的赌注。在亮哥的保驾护航下，阿May所向披靡，而一旦亮哥不在直播间，她就输到哭鼻子。被保护得越好，就越发输不起。

有几次亮哥故意不出手，让阿May尝尝输的滋味。直到阿May跟一个玩得狠的男主播PK，被虐到用睫毛膏涂成了包公的大黑脸，亮哥发在公屏上两个字“疼不”，阿May那声“疼”一叫出口，便止不住地号啕大哭。她觉得自己受到了来自对面主播和自家管理的双重羞辱，一方没有底线，一方见死不救。

重要的是细节

一个人的性格与行为逻辑多隐藏在细节之中。

比如作家毕飞宇例举过《红楼梦》中刘姥姥初进荣国府见到王熙凤的场景：“凤姐也不接茶，也不抬头，只管拨手炉内的灰。”简单几个字，将王熙凤的形象以及其代表着的权贵、荣华展现无遗。

对于非虚构作品而言，写人物不是一个仅仅停留在遣词造句之上是事物，而是有一定的方法论可以遵循的，但前提是，对该人物一定要足够了解。因此，对人物是否足够了解有时候单从细节上就能看出。作家严歌苓在一次分享中说：

“我写《陆犯焉识》，我花了很多的钱，要去青海体验生活，要花钱去开座谈会，把劳教干部什么的请来，然后我要找人陪同我，我要找很多关系来了解这些故事，很多时候我是不计成本的。”

在《我的外婆是龚自珍家族后人》一文中，作者通过描写与外婆的一次相处过渡到外婆去世的故事。

往前的夏末八月，最后一次见老太太，她落了泪。我说：“过两天就回学校。”她问：“为什么那么急？”我答：“要准备考研。”她的泪已止不住。我笑说：“又不是不回来了。”

在了解写人物的技巧后，另一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也就是你要写的人物是否“值得”去写，他身上具备复杂性吗？他代表的故事是否足够精彩？他遭遇过困境吗？他的故事背后是否折射了人性的深刻或者某种寓意？

如果满足以上某个条件，那么这个人物就“值得”我们去书写。

人物的冲突

以上两点是写人物的两个层面，对于一篇真正具备生命力的人物文章来说，需要从更深的层面去把握一个人物，也就是要去理解“冲突”。冲突是理解一个人的核心，因为这决定了人物会有怎样的动作。只有理解这个层面才能真正认识到一个人，“就像演员在演一个角色时，会全身心地投入这个角色一样，我们在写一个人物的时候，也要渗透到他的内心、血液和骨髓中去”。

冲突分为外在冲突与内在冲突，当然很多时候这两者是交织在一起的，并不是孤立存在。因此在理解一个人时不仅要关注他所面对的外部环境，也要去找到他内心深处的欲望、矛盾等，这样才能展现一个更为复杂的人。

“外在冲突指的是故事主人公遇到某个具体的挑战，或要给巨大的危机，需要克服。生死的挑战、体制的胁迫都是外在冲突。”

三明治曾经发布的《母亲逼我去整容》（作者胖倪倪）一文，作者写道，自己的母亲由于对她外貌不满而不断逼迫她去整容，从而给作者带来了“容貌焦虑”。对作者来说，母亲的做法作为一种外在冲突是其无法忽视的矛盾。

我从来不认为整容变美是件虚荣的事，和化妆、修照片一样，它也是一种提升颜值的手段。但我希望自己真正走上手术台的那一刻心是自由的，我希望自己从内心接受了自身并不完美的外表，接受面容的改变，并且不在乎别人的指指点点。

我妈以为我接受不了的是通过整容这种方式让自己变美，其实，我更介意的是她的初衷和一意孤行，对我的感受不闻不问。她所谓的需求未必是我的真实需求。或许有一天我会躺在手术台上，接受我面部和人生的一场大刀阔斧的改变，但我希望那一刻我的心是自由的。女无须为悦己者容，悦人不如悦己，哪怕这个人是我妈。我希望那一刀下去，无论变美变丑都无法改变我内心原本真实的模样。

“而内在冲突，是更隐性的冲突，更多是人物内心所产生的巨大困惑以及他要怎么突破自己的内心困惑。”

我们在写人物时要尽可能去把握人物身上的复杂性，如果所写的对象并不是公共人物，而是我们亲人或者是自己，可能面临的外在冲突看似不是很剧烈，但如果仔细思考就会发现人与人之间的相似度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低，我们同样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冲突。

比如，三明治曾经发布过一篇描绘一位理想主义者在体制内的生存状态的《千寻：体制内的理想主义》（作者李梓新），作者通过对主人公的内在想法（内部冲突）与其所在的环境（外部冲突）进行结合，将人物的状态与复杂通过大量的细节表现了出来：

不像人们印象中妇女干部留着惯常的失去性别特点的短发，她留着长发，还扎着一个当天被乡里的书记批评过的粉红小熊发夹。这是她到北京这个城乡接合部当乡官的第两个月零四天。她仍然在调整和适应极大的文化冲突。尽管这样的文化冲突，在她离开媒体到航天时就已经经历过一次。

那个时候带来的压抑，曾经使她在办公室的抽屉里养过一缸金鱼，因为当时办公桌上什么位置放什么东西全被规定死了。现在，她找到的一种新的对抗压抑的方式，是每周去学两次舞蹈。

在描写这些冲突时，要通过细节去呈现矛盾立住人物。非虚构写作中的特稿写作比较偏向“判断性叙事”，在语言叙述上记者们认为“列出事实固然有必要，但还要告诉读者，这些事实加在一起说明了什么。”对于个人化的非虚构写作来讲，让写作更为严谨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也可以学习专业的特稿写作，学会在文章中加入作者对主人的公判断，而非信源说什么就写什么。但这个判断一定要审慎而准确。

在中国，为*iPhone*镀金的美国人

佟依

缘起

2011年，湖南一名高中生为买苹果手机，选择去黑市卖肾，iPhone（苹果手机）因而在中国有了新的代名词：“肾6”“肾7”……在苹果公司推出冲击视网膜的土豪金外壳之后，国人并不满足于此，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要的是镀上真金乃至镶钻的土豪手机。

三年前，远在美国洛杉矶的Cyrus Blacksmith（赛勒斯·布莱克史密斯）——如同他的古老姓氏“铁匠”（blacksmith是铁匠的意思）所指明的家族传统——正在“敲敲打打”航天级的纯钛材料。

他一心鼓捣一部曾为NASA（美国航空航天局）生产宇宙飞船部件的机器，想用它制造独一无二的纯钛手机壳。然而销售情况并没有想象中的好。4000美元高价卖一个手机壳获得了不少业界关注，但完全依靠纯钛还是过于烧钱，15万美元的投入如坐了火箭一去不复返。

就在赛勒斯几乎要宣布他的公司Brikk破产之时，他收到了一封救命邮件：

“您好，我们是中国澳门×××赌场，我们非常欣赏贵公司的奢侈手机品牌，可谓目前全世界最为高端、华丽的定制手机。现在我们的VIP客户希望定制外壳镀金的苹果手机，您可否为我们额外加工？”

赛勒斯在接到这封来自大洋彼岸的邮件后十分欣喜，不过他自诩“企业家和创造者”，对“加工”这个词还是有点反感。但是接下来的内容，让他兴奋不已：

“至于订单数目的话，我们大概需要2000台。”

镀金，2000台，假设每台赚1000美元，那就是200万美元。

鏖战香港

2014年秋天，iPhone 6即将发布，香港照例比中国内地的发售时间更早。这让所有的内地潮人、极客以及黄牛党都眼巴巴地望着这个小小的国际化岛屿。

当时我刚从香港大学毕业，正在找工作。当听说有一个加工苹果手机的美人要找个懂英语的摄像师时，我立刻同意了。那时，赛勒斯的澳门赌场“肾5”订单已经让他将业务重心放到了中国和亚洲。

第一次见面，我们约在香港上水，膀大腰圆的他穿着全黑的T恤和大裤衩，土耳其裔背景给了他浅褐色的卷发以及满脸的络腮胡。然而，打招呼时他面无表情，十分谨慎，搞得我也有些紧张。

他向我介绍，我的工作基本上就是跟随他，拍摄他的工作现场。

“就像是一个生意现场的真人秀。”

“像那个美国富豪的《学徒》系列？”

“不不，主要是表现在全球化的今天，多元文化在商业情景中的冲突，特别是在中国发生的有趣的事情。你也知道，中国人扫货是多疯狂。”聊着聊着，赛勒斯兴奋起来，圆圆的眼睛开始友好地闪光。

一个月之后，翘首以盼的“肾6”发售日终于到来。我在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商场拿着摄像机等赛勒斯，那里有一个漂亮精致的苹果店。

我看着拥挤的人流在苹果店外兴奋地嚷着，挥舞着手上的白色包装盒。从透亮的落地窗望出去是湛蓝的天空、海水、维多利亚港的天际线、缓缓旋转的中环摩天轮。阳光明媚，巨大的白色苹果标志悬挂在玻璃幕墙上，在闪烁的波浪反光中，映衬着香港的骄傲：现代化、速度、智能、简洁、优美，以及与之相关的有利可图。

这时，一个漂亮的中亚小男孩走过来，七八岁的样子。后来我知道他是赛勒斯一位老乡的孩子，叫阿米特。小男孩有极深邃的棕色眼睛，他亮闪闪的眸子盯着我说：“你是Joy吗？请跟我来。”

他带着我穿过人流，推开明晃晃的玻璃门，走到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门口的天桥上。看着面前的景象，我呆住了：这个老外真是不太正常。

半空中一把粉红色的“扇子”吸引着众人的注意，赛勒斯正拿着一沓人民币在手上扇动着，他依然穿着黑色T恤衫，用不地道的中文喊着“iPhone 6”，招揽已经订到货的手机主人和黄牛把手机再转卖给他。

可不是嘛，如果不是从黄牛手上买，他要从哪里购买数以百计的手机，然后送到厂商那里加工？不过他的表演型人格有点过于强烈，让我小心谨慎的中国心立刻悬了起来。

“你快把行李包的拉链拉上！里面全是现金，你想干什么？”我冲过去拦住他。我谨记着家长的教诲——过于炫富都没有好下场。

“没关系，香港很安全的！”他又兴奋又得意，“嚯”的一下拽开手提包，展示里面成捆的百元一张的人民币，共计20万元。“这样拍，现场画面会比较有意思嘛！”说着他戴上墨镜，继续更用力装酷地吆喝起来。他的合伙人斯瓦特则坐在不远处的行李箱上，瞅着我们哈哈大笑。

不一会儿，零星的学生党、手拿计算器的中年黄牛都朝我们包围过来，轮番用广东话、普通话轰炸我们。一个大叔跟我说他有大量的货，他老婆则举着计算器，摁一下，给赛勒斯看

一下，赛勒斯摇摇头。她又按下另外一个数字，大概是在原价上增加1500元。

突然三五个20多岁的大男孩儿出现了，T恤衫和牛仔裤、球鞋打扮，每人拖着一个28寸的大行李箱。他们看上去都是华裔，白白静静，小圆脸，一副谨慎腼腆的模样。他们在人群里打量了我们一阵子，我试图用普通话和他们打招呼，但领头的男孩直接和赛勒斯讲起英文。

“我们有几十部手机在箱子里面，你想不想看？”

赛勒斯感兴趣了：“你们从哪里买到这么多？”

“澳大利亚。”

赛勒斯和我都愣了：“我们进去说。”他们推着箱子走到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电梯旁边。

“你们是怎么买到这么多手机的？”

“我们在悉尼雇了好几个流浪汉给我们在苹果店门外通宵排队，一天20澳元。”

“什么？然后你们打飞的回来卖？”

“对啊，所以其实剩不下多少钱。”

交谈一路持续到了重庆大厦，那里的货币兑换店汇率不错。赛勒斯兑换港币时，我们坐在一家中东烤肉店等他。

我放下摄像机，试着用普通话问另外一个满脸是青春痘的男生：“你们都是同学吗？”男生用港式普通话急忙和我介绍：“不是，这是我弟弟，他在澳大利亚上学，他和他的朋友一起买的。”哥哥自称在北京中关村上班。“然后你特意飞回来给他帮忙？”男孩子笑起来，点头称是。

交易很快圆满完成了。

但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这么多手机，要怎么拿到内地厂家去加工？算进口吗？

赛勒斯挤挤眼睛说，我自有办法。

深圳江湖

除了澳门赌场的生意，还有来自全国各地数以百计的零售订单涌向赛勒斯。由于一些媒体对Brikk的报道阴差阳错，竟然称它得到了苹果官方的授权，可以先于苹果官方在内地销售，一时间，全英文的Brikk网站被来自中国客户的订单刷爆。

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上，竞相涌现Brikk金灿灿的新手机。从事电子产品贸易的港商、服装设计专业的大学生、娱乐产业公关和DJ（唱片骑师）纷纷晒图，甚至还有赶时髦的艺术院校女生一次拿出了三台金手机转卖。网友纷纷在这些黄澄澄的图片下留言“土豪姐姐”。女生志得意满地回复说：“其实这些一点儿都不稀奇。”

为了应付客户拜访，也方便发货，客户经理翻译龚小姐为赛勒斯起了一个接地气又有禅意的中文名字“赛乐思”，打从那开始，我们就叫他赛乐思。

之后，我们在深圳国贸区租了一间办公室，作为临时指挥部。地面上堆满了半人高的包装礼盒、宣传手册。空气里都是正在挥发中的新鲜油墨味道，刺激着我们的鼻腔和兴奋点。我们逐个把价格3万~5万元的客户订单打印出来，挨个排列在每一个礼盒上。再根据订单，往礼盒上摆放对应的土豪金、粉金，或额外要求苹果标志被镶嵌钻石的定制手机，在办公室里足足摆了一大圈。

宣传册上的模特是一个中亚女子，眼眶凹陷，银白眼妆，头顶斜扣着铆钉小皇冠，暗色高领蕾丝衫上挂着铆钉项链。黑色嘴唇微张，双手像是托举着圣物一样捧起手机。浓重的蒸汽朋克科幻色彩让我看了半天，这可和国内广告上服务员式的笑容截然不同。而这样的姑娘照片，放在一张张将被送往全国各地的订单上——北京、上海，甚至拉萨、乌鲁木齐。

一张写有河南某贫困县地址的订单吸引了我们的注意——仿佛《星球大战》里的阿米达拉女王，走错到了《秋菊打官司》的片场。

“哇，订了三台，估计还有正室和小三的感情戏。”

因为人手不够，我偶尔也干起送货的杂务。早起搭乘地铁，穿过地铁出口还没有开门的地下服装店，经过一家“十块

钱一斤”的旧书店，到达华强北的手机城。绕过商场迷宫一样的迷你维修站台、彩色LED招牌，找到“百合通”手机店。

老板黄先生是赛乐思的合作伙伴，性格非常豪爽、真诚，声音洪亮，人缘不错的他已经在外面更宽阔敞亮的铺位开了第二家分店。

黄先生见我来了，很热情地招呼我，让我再等一会儿，还有几台已经加工好的手机由他们组装。我坐在柜台边，看着一个工头在本子上不断记录，原来是每个小工的计件数量和每天的工资，基本是十几元到一百元出头。

征得黄老板同意后，我拿起摄像机拍起来。一个留着小胡子的“90后”小男孩，把镀上金的手机外壳，小心翼翼地拼装回去。我从他的肩头拍了一会儿，又转过去，从正面拍他的面部。他头也不抬地说：“你这样我就不好意思啦。”

不足一平方米的工作台前，他熟练地使用各种工具，把头发丝那么细小的零件小心翼翼地摆弄到一起。抽屉里凌乱地塞满了微部件，桌子上摆满了大一点的电子器械、工具，甚至还有显微镜。从他的肩头，我看到他的上衣口袋里放了一盒香烟，盒盖上写着三个字：好日子。他左手上带着一块金光闪闪的腕表，表壳上一圈假钻石倒是和他手中的真钻石相得益彰。

赛乐思告诉我，他第一次去澳门送货的时候，也带了两名这样的技工去澳门组装。因为澳门方面直接下了死命令：“我

不管你们是死是活，明天必须把货交到我们手上。”不得已，赛乐思把等待组装的半成品手机带去澳门通宵组装。

两个叫“乒”和“乓”的小伙子，都是第一次来到澳门，也是第一次见到如此活生生的浮华世界。从赌场到组装手机的高层总统套房，“一直都是下巴掉在地上，嘴巴O形的表情”。

慈善人士

龚小姐和宋小姐对赛乐思评价很高：“他人非常好！”在2014年初镀金iPhone 5热销之后，他给她们每人买了一个蔻驰（Coach）的手包。在整理办公室的时候，赛乐思更是亲力亲为地给我们每个人装电脑显示屏、插线板。

所以当听到他说，成立公司的初衷是建立一个慈善组织的时候，我并没有感到很惊讶。

赛乐思带我们去了办公室后面小巷里的清真餐馆，他开心地 and 老板比画着打招呼，再对着墙壁上的菜单图画戳了戳，要了一份羊肉、一份炒饭。

他说，在他上大二的1999年，土耳其经历了一场大地震。他因为联系不上亲人，立刻着急地停下学业，参加了救护车救护人员训练，再用一晚上的时间从亲朋那里筹得了去土耳其的2000美元路费。

“当我到达伊斯坦布尔的时候，发现那里真的如同战后废墟。而最令人气愤的是，当地政府并没有主动分发食物。我等

不下去了，就想办法找了辆车，组织了一些医护人员，挨家挨户去分发药物。

“后来我们正坐在地上吃西瓜，突然余震发生了，我们被大地颠得颠三倒四。我们赶紧爬起来去村里救人，其中一个村子的村长被我们从废墟里刨了出来。他告诉我们他的妻子以及未出世的孩子都在三天前去世了。太惨痛了不是吗？他慢慢恢复了神志之后，给了我一个熊抱，说，谢谢你这个美国年轻人，中断了自己的学业来帮助我们。

“那是十几年前，估计你都认不出那时候的我。我染着亮绿色的头发，疯狂地迷恋电子音乐。但那个拥抱就是我人生中最接近圆满的时刻，我希望继续那种感觉，所以我回美国之后成立了自己的慈善组织。我也希望利用我的聪明才智来赚钱，之后卖掉公司做慈善。嗯，做个慈善组织的聚合门户网站，直接连接到所有公益平台，让每一个人可以很方便地帮助他人。”

在这次聊天后不久的一个晚上，赛乐思问我：你等会儿帮我翻译好不好，有个老人家很凶，龚小姐都不愿意去了。

原来他结识了一位中外知名的慈善家Y先生，他是我们租住的办公室，连同隔壁相通的酒店的所有者。这位神情肃穆的老人虽然年过九旬，但依然执掌着酒店业务，时不时由孙子或管理人员推着轮椅，从楼顶的套房下到酒店大堂，巡视一番。

等到将近午夜，我们才得到上楼的许可。覆盖几乎整个最高层的巨大套房，显得阴暗幽黑。经过会客室、走廊，我看见沙发旁有一幅苍劲有力的书法，“有我无鬼”，一看落款，果然是Y先生。我们沿着黑暗中前方的灯光进入了他的卧室。

他坐在书桌或是餐桌旁，看不清体格。身后的床头内饰是非常简单的木刻雕花，桌面上也是通常老人家里摆的瓷盘、小钟摆以及各类药品。虽然Y先生的手部已经全部变得紫黑，但是头发乌黑，面色红润，略有暗沉，看得出来是一个已经年过九旬的老人。

赛乐思和Y先生寒暄一阵之后，问起Y先生：“您可不可以告诉我什么慈善组织比较好，我们想先捐出5万元钱。”Y先生说：“你可以和我一起做好事啊！我有一个慈善基金会，目前已经为家境困苦的因白内障失明的病人免费做了30多万例手术，项目叫‘光明行动’。”

赛乐思表示感兴趣，甚至想邀请Y先生做公司的慈善大使，Y先生显然对赛乐思的反应非常满意。

又一次见面时，主人邀请我们到楼顶旋转餐厅一同进餐。餐厅的包房内，电视屏幕上 is Y先生的老照片。邮轮上一身白衣的他迎着海风，一副港式大佬风范。老先生拿出了他珍藏已久的红酒，包装红酒的木盒刻着Y先生的画像以及签名。

借着酒劲，Y先生开始谈起自己做慈善的经历。

“做慈善不容易啊。我是湖南人，去年，去家乡做‘光明行动’，本来以为，湖南是靠得住的。别的地方我两万例、三万例都做，但在湖南，一万例都做不好，做一个（治疗）例子，要付六百元成本费用给当地相关管理部门。

“我们的人去实地调查，虽然（证明上）盖了章，当地的政府也有证明，残联也有证明，但是没有病人的照片，电话也是假的。他们回复说，来不及啦，电话来不及弄，照片也来不及弄。本来我们做好事，结果钱进了别人口袋了。

“后来没有办法，我告诉他们，这是欺诈，要坐牢。我去深圳公安局报案，他们马上就还了100万人民币。我说不行，100万不够，你要全还给我。他们又一点点还钱给我。不过他们说，还钱可以，但是不可以登报。

“总的来说，做管理就是一把刀，你必须要抓住刀把，不容易。做好事也难。我也不想讲太多，吓到你。”

然而没过多久，我们很难过地读到了Y先生的讣告，以及一则不太愉快的新闻。Y先生生前曾有一份遗嘱，表示希望裸捐所有财产给慈善机构。然而去世之后，老人的次子以及孙辈，突然宣称父亲的遗嘱无效，因为父亲的遗产还包括母亲的一部分财产。为了坚持Y先生的遗愿，老人的长孙不得不站出来，和家人对簿公堂。

令人唏嘘的是，新闻画面又扫过了一幅老人生前的字画：“子若强于我，留钱做什么？子若弱于我，留钱做什

么？”

中国文化

认识赛乐思之后，一方面我为他的大胆、狂想式的企业家风格所惊叹：他从高端终端创业，踩准了“智能化”的时代节奏，又撞上了中国人的“拜金”“拜苹果教”风口，但另一方面，我也在质疑，他想对客户进行真人秀拍摄，想在当时人人怀疑慈善组织的中国做捐助网站，简直是不知“水有多深”。我不确定，他的热情是否会在凌厉的现实中消磨殆尽。

果然，慈善合作没有延续，赛乐思也毫无防备地迎来了一场困境。

取悦中国富人和“苹果教徒”的反响不错，赛乐思自信地将同样的产品往洛杉矶推广，受到演艺界、运动圈美国土豪的热捧。“嘿！Brikk要火了！我被贾斯汀·比伯邀请去他家做客了！他说我们的手机很酷！”他在邮件里写道。

没过不久，赛乐思又开始为自己的手机设计新的标志，一个正七边形符号——他说这是能带来好运的神秘图腾，但我认为那是他带有某种神秘主义的繁复审美，上升到了品牌层面。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他被苹果公司一纸诉状告到了法院：因为Brikk手机的镀金外壳上，依然用钻石镶嵌了苹果标识。Brikk涉嫌侵权，被要求支付巨额赔偿金。

当赛乐思咨询美国版权方面的律师时，才意识到自己惹了多大的麻烦。律师一听到赛乐思要和苹果对簿公堂，立刻面如土色，直接连说了好几个“不行”，伸手往头部上空比画：“不行不行，你要找大牌、大牌中大大牌的律师。”再一了解，请这样的律师要花上百万元的律师费，赛乐思更是灰心丧气。

他不断地在太平洋两岸飞来飞去，一轮又一轮砸重金谈判，和苹果公司拉锯。“几个月之间，所有赚的钱都用光了。”他一脸苦笑。

所幸，双方达成了庭前和解。Brikk可以继续加工苹果手机，但必须放弃用钻石加工苹果标志，而是使用自己Brikk的商标。

但此时的赛乐思已经对中国的变化应接不暇了，一个又一个的麻烦开始接连出现。

据赛乐思最信任的中国雇员、有了两个孩子的精明母亲龚小姐透露，赛乐思发现合作商要价不实后，顿时硬脾气地和他们撕破了脸。龚小姐猜测“估计他们捣鬼”，澳门的合同没有继续。而随后因为反腐、苹果热潮开始减退等原因，奢侈手机销量并不是很好。Y先生去世，其孙子接手酒店之后，我们的房租又涨了两倍，赛乐思不得不放弃罗湖的办公室。

办公室位于Y先生酒店的中层，但要经过长长的幽暗的走廊才能找到。龚小姐说得很尖锐：“本来就不该要那个办公室，

浪费了装修的费用。位置不好，结构又很不方正，赛乐思又用玻璃门隔了几道，总之感觉‘风水不好’。”

赛乐思还怪Y先生没有提早告诉他——在租给他之前，那一层是一家倒闭了的妇科医院。

2015年，我没有留在内地继续拍摄赛乐思，而是回到香港另寻工作。再见到他时，已经是一年半之后。学文化人类学的他性情浪漫，娶了个学文学的太太。他把爱妻以及他的吉娃娃小狗举家带到了中国，在深圳定居。

在深圳一家土耳其餐厅，塞乐思携妻带狗地和我相聚。他表示，落户中国，终于让他熟悉了中国人重视人情世故的细微习惯。

比如，因为他的客户重视隐私，“真人秀”拍摄计划被无限期搁置下去；他不再拒绝陪客户去KTV唱歌，就算他眼中的KTV文化奇怪无比，他也明白了客户是把他当哥们儿，才会喊他一起去唱歌；对于新客户，他也不再主动告诉别人，他曾经的深圳办公室因为业绩不佳而倒闭了——中国人往往不信任主动透露自己弱点的合作伙伴，即使对方是出自坦诚。

相比起2014年的“盛况”，如今的苹果手机销量受到了vivo、华为等国产品牌的冲击，但赛乐思没有特别担心。

“我现在真正想为之服务的，只是少数的亿万富翁。这群人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我可以给他们全世界独一无二、精益求精

精的产品。如果一群穿西服的人中间，站着一个穿便装配球鞋的人，那么他很有可能就是那个亿万富豪。

“我会和客人一对一交流，赢得他们的信任，有一些榜上有名的富豪也是我的客户。我现在尝试做更私人化的高端定制，汽车零配件、内饰，甚至如果需要我也可以做高端家居。我在和厂商合作，为兰博基尼、宾利等设计纯钛的七边形轮胎，纯钛的成本就要上百万人民币。至于手机，苹果公司的创造性已经干涸了，我已经推出了新的独立于苹果的手机外观设计。”他一边吃着土耳其糕点，一边掏出自己设计的新产品给我看。

“认识那么多土豪，你觉不觉得他们的消费方式太肤浅？”我问。

赛乐思采取了谨慎的批评态度。“刚开始我确实会觉得中国人比起西方人更加爱钱。如果一个开兰博基尼的车主进了工厂谈生意，几乎所有人都会排着队去巴结他，即使赔本也想让他成为座上宾，因为拥有豪车几乎就等于拥有财富和权力。但在美国，很可能会有不少人给出负面评价：这是个喜欢炫耀的笨蛋。

“但后来，我也开始有德国的医生客户、欧洲的律师客户，传统来说几乎完全和炫富不沾边的高端人群。我慢慢开始意识到，购买奢侈品最根本的原因，是一种骨子里想展示自己的独一无二以及对品质的追求。中国人或亚洲人选择炫富，可能也是当前文化中最简单直接的展示自己不同的手段。”

看着一本正经和我分析中国文化的赛乐思，我觉得他不再是那个拉着我拍摄他针灸、按脚、走在摇曳生姿的赌场姑娘们身后满脸坏笑，到处“体验东方文化”的老外。中国在以更内化的方式，悄悄改变他。

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他并没有多大变化，还是个想做慈善的理想主义者，赚钱的同时内心充满矛盾。

“虽然每个产品的销售额都有数万元，但不能带来内心真正的满足感。可也不能告诉客户——你花上万元买瓶酒，买双鞋，你就是个傻瓜，你可以拿钱去帮助更多的人。

“不过中国人变得很快，接受能力比西方人好得多。之前大家并不觉得‘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是一件很酷的事。但近两年，彭丽媛一直在穿中国设计师的衣服，也让‘Made in China’在人们心中变得微妙起来，变得让人充满自豪感。

“所以我现在继续以迂回战术做着慈善，一边和中国本土新兴的科技公司接触，了解网络平台的捐款设计方式，一边也在研究如何‘让慈善变得酷起来’。”

我们坐在餐厅门口的平台上，餐厅老板中土混血的三四岁小女儿怯生生地伸出小手，想摸摸吉娃娃。塞乐斯给了她一块饼干，鼓励她去喂小狗，小姑娘二话不说，直接把饼干吃掉了。

这样一个五大三粗满脸胡茬儿的老外，笑得龇牙咧嘴，怀里搂着个超迷你的吉娃娃，还是一件挺萌的事。

我的外婆是龚自珍家族的后人

吴昕骐

落红

我赶到的时候，她已经躺在那儿了。

一米多高的灵台，四周铺满菊花，一层黄，一层白。

外婆在前夜里走得突然，未着一词。送医后的诊断是心脏病突发，按医生的说法，老人走时没有太多痛苦。此刻她在透明棺中，宛若前一刻刚刚睡去，鼻息间隐有轻轻的鼾声。（免费书享分更多搜索@雅书.）

她是顶爱美的人，此刻却穿一件褐色寿衣，上头画了团寿，合身得不自然。她要在这违和中停留两日三夜。

我不知她是否早料到了那一刻。往前的夏末8月，最后一次见老太太，她落了泪。我说：“过两天就回学校。”她问：“为什么那么急？”我答：“要准备考研。”她的泪已止不住。我笑说：“又不是不回来了。”中秋前十日，我确实回来了，她却再也尝不到我带回的月饼。

请来道士做法事，午夜时开始点烛、燃香、唱咒，一边奏起铃铛、鐸、唢呐，给周遭的人和周遭的鬼看。房顶的喇叭播着哀乐，重音从头顶捶下，压得人呼吸局促。长明灯照得灵堂通亮，一日二十四小时，不眠不休。

而后，依着道士指引，披麻戴孝，长女、长女婿、次女、次女婿、三女、三女婿、孙辈们排成列，我站在最末，绕着灵台缓缓转。看向外婆侧脸，总觉绕着绕着她会醒过来。地上放一道木质矮桥，一行生者跨过去，算是陪着外婆过了忘川水。

那是我第一次学会烧纸钱，烧经文。那些纸质粗糙的四方形红底经文，得经由信佛的老妈子们的手，念了《心经》《弥陀经》《往生经》，反复念几遍后，交还生者。在一旁写上“某某敬”的字样，再到火盆边点燃。纸钱和经文要烧得完整，落入纸盆，少有飞灰，才算是到了往生者的手中。

9月22日，秋分，往后昼短夜长。外婆肉身停搁世上的最后一日。

临火化前，一个三十来岁的女执事拿张白纸，站到众人前，草草说：“龚为瑾，1926年生，卒于2012年八月初四戌时。”念完，再无别话。好似一个人出生，死去，人间兜转一遭，一头接一尾，其余都不再重要。

爸爸在一旁附耳说：“刚刚应该让你去说的。”然而我能说出什么呢？我对她过往的86年所知寥寥。只知这位龚家长女一生流离，从北平到扬州到屯溪到香港，复归内地又北上沈阳，继而再度南迁。直至半世纪前才稍稍安稳在南方的陌生小城。她膝下三女，一在安徽，一在北京，一在浙江。她们各自攥着母亲的一部分记忆，但并不全然。细节如散了绳的书简，跌入流水，急急想要打捞，却早不知漂去何方。这些粗线条的

联结和同样模糊的地名可能永远成谜，随她飘去了天上，随她沉睡入了长梦。

两个执事者过来，拉开长台，开始把外婆推离。我站在人群后边，姑姑在前面回转头，招手说：“快点过来看你外婆末的一面。”我挤过去，喊着“外婆，外婆”，但声音很快被灵堂内的哭声淹没。

这就是最后一面了。她的脸被推入一扇门后面，接着是身子，最后是脚。门框上写：火化室。身体，穿了三日的衣裳，儿孙孝敬的层层被褥，连同近一个世纪的受难，一并火化。

外边天空开始落雨。灵位前，逝者的女儿们跪着，外孙们跪着。被请来哭灵的女人，画上唱戏的妆容，耳边别了麦克风。一支哭母的选段，唱得如泣如诉。人都说她唱得好，只是外婆从来不听戏文的。

出殡，于是骨灰入了盒，盒入了墓。雨停，留下一层湿冷冷的空气，和着山风涌过来。我的外婆桥就此断却，“外婆家”变作“外公那儿”。

如梦如烟，枝上花开又十年

外婆是龚自珍后人的信息，是外公无意间透露的。彼时，我正把“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两句背给外公听。外婆在旁淡淡地说：“我的爸爸很晚才告诉我。他很谦虚，怕我骄傲。”除却这句，外婆很少再说起她的家事。而这其中种种却变成我的执念，在她离开后越发强烈。

马坡巷内的小米园在杭州城东，1792年龚自珍生在此处。不多年后，父亲龚丽正进士及第，便举家搬往京城。此后虽有归来，但龚自珍待在杭州的时间断断续续。这位长房长孙一生颠沛，最后暴卒于江苏云阳书院，只有小米园内的童年最为无虑。

外婆走后第三年的春夏之交，我初访小米园。这座清代的两层古楼落在小区中间，前后都建了住宅楼。这里应是鲜有来客，推开赭红漆木门时，一个蓝裙小姑娘正绕着柱子跑，三个老太太坐在院落西首的廊下长椅上，碎碎谈着天，见有生人入门，也没有停顿。在院中抬眼，天空被切割成四方。视线越过宅第高墙，是居民楼上的防盗窗、空调室外挂机，以及遮阳的绿棚。庭院石板铺地，南侧有池塘、假山、修竹，北面即是正厅。正厅之内布陈仿古的桌椅，梁上挂了红灯笼，房间暗处则接了日光灯。馆中安置着龚自珍的半身铜像，一副虬髯，目光如剑，头顶高悬“剑气箫心”的匾额。这四字是龚氏一生所奉，不过到头来一例消除，只留了诗名与时运不济的遗恨。

旧木的味道沉入肺中，隔窗传来外头小女孩的笑声。厅堂空落，不见阳光，从前家族的欢愉全化作一地清冷。我朝定庵公（龚自珍）的半身像鞠了三躬，凝神看他，心下茫茫然一片，一如我当初得知自己是龚自珍第八代后人的心情。一纸课文与一座铜像背后的某人，成为两百年前的近亲，只是这某人与外婆与我间到底残存多少联系？百年的乱世之间，这个家族开始流离，族脉四散。

唯一可知的是，在时代的转折点，他们都被裹挟其中。定庵公是激烈的济世者，而外婆，以及更多的族亲都在缄默与隐忍之中度过一生。诸般受难的遭际由时间磨去，能够活着已是幸事，其中滋味也只自知了。

但总有人为着这份联系奔走。在整理外婆旧物时，有只箱子静静立在旧报纸和废弃纸板的中间，没有多少灰尘。里面装了厚厚几摞纸，A3、A4尺寸的都有，用4只塑料袋裹住分装。另有3只暗黄色大信封，外壳已皱得发软，封口处被剪得齐齐整整，信纸叠成四方形，就像刚塞入时一般。寄件方都指向同一人：龚为瑶。

他是外婆的堂弟，今年也到了80岁。为瑶舅公这一脉原在杭州，抗战时，为避日寇南侵，举家迁往西南腹地。为瑶舅公在重庆行医半生，80年代才得归故里。往后的廿余年，他一面照顾老母，一面开始收集材料，编纂家谱。数年奔走间，许多离散的亲族被找到。他把经年整理的族人生平手稿复印若干份，装订成册，附上信件，寄送给尚健在的同辈族人。信中，除联络问候外，他常提醒信那头的亲族，勿忘龚氏后人的身份。

2005年，《仁和龚氏宗谱》付梓。之后几年，为瑶舅公带着家谱，去《钱江晚报》编辑部讲，他盼着龚家五世同堂，后来又接受杭报《西湖副刊》采访，其间还接待了几个登门寻访的大学生，成了“讲故事”的老人。1992年，龚自珍诞辰200周年，曾有一股研究龚氏的风潮。

为瑶舅公说：“那时候开了不少会。”

“那这些年呢？”

“这几年就不大有了。”

待离开小米园时，已近傍晚，一个妇人牵着条博美犬从木门前走过。紧挨老宅的一幢楼中，某个厨房的油烟机开始发出轰鸣。

某山某水迷姓氏，一钗一佩断知闻

我第一次去杭州南山陵园，已是外婆走后第五年的清明。恰逢连日春雨稍歇，玉皇山中的公墓弥散着青草味和鸟啼声。园中禁了烟火，山中水汽落到皮肤，四下里更显得清凉。这里长眠了龚氏两代人。外婆的父亲緘三公在北京过世，骨灰迁葬于此。

多年来，为瑶舅公和其他族亲照看着先灵。上山祭扫的当日，他的幺弟为琦五点起来，把昨日买的猪大肠反复搓洗，一直到7点，再去早市的熟食摊买来熏鱼和卤牛肉。这些贡品被小心装进餐盒，不多时后，就要带去山上，呈给先去的长辈。

公墓之中，墓碑紧挨，前后排间仅够站上一人。緘三公与妻合葬的墓碑立在1983年夏，他在前一年谢世。其时外婆已偏居南方多年。在此两年后，母亲故去，她北上奔丧，孰知仅仅两年后，父亲也急急远行。整30年后，这位长女也随了他们往生。

碑上满生了青苔，碑面镂刻的字已斑驳。过去20年的4月头里，为瑶舅公总提前几日来到了陵中，提几小盒红黑两色的马牌漆，用细笔刷把掉了漆的字重描一遍。黑漆为已故者，红漆的则尚健在。而这回，由我来完成。墓碑左侧镂了子女的名，描至外婆名字，“瑾”字已被雨水冲刷得难以辨认。描完，再拔去石缝中钻出的杂草，碑石好像新立一般。

下山那会儿，太阳从云后露头，我和为瑶舅公并肩走着，散散聊起龚家的旧闻。“龚自珍的墓在翁家山一带，但位置一直没确定。”他抿抿嘴，沉默一阵后续上，“没确认才好哩”。

定庵公的好友魏源晚年隐居钱塘，死后葬于九曜山深林之间。“文革”中碑石遭毁，墓冢匿迹，后来多方探查才确认坟址所在。孰料当地园文局立碑不久，墓穴随即被盗。

緘三公身后两女两子，只次子与二女儿留在北京，长女在南方，长子则去了西安。长女七十大寿那年，四人最后一次团聚。那一回，他们最后一次来到陵园，齐齐祭拜父母，距今也已二十载。龚家几代曾同葬翁家山，而后世却在不同的殡仪礼俗中各设灵堂。

午餐在为琦舅公家摆开。一坛黄酒启封，旧事便浮起来。为瑶舅公饮完一口酒，提起緘三公，说：“我到现在还记得三伯牵我手的样子，这个印象很深。”“我们都很敬重他。”为琦在对面点头说。

一桌人絮絮说着，我坐在一旁，看老人相似的身材、体态，偶尔闪过的某一神情，以及同样温润的面颊，隐隐觉着外婆也在桌边。

外婆在灶头前回过头

外婆走后，我开始疯狂检索那些关于“外婆”的文字，流散的孤篇，成集的册子，陈文茜、张哲、陈绮贞，甚或朋友的。我从来不知，一个称谓会变成最敏感的禁忌。但那是别人的故事，不属于她，也不属于我。

许多次，我梦到她，又在厨房煎荷包蛋，勾芡我不复得尝的酱汁儿，梦到她来参加我的婚礼，喃喃念我乳名。其实我从来未曾向她提及我的爱情，她也没有说起过自己的。

这些故事再难复得了。所幸两老都爱照相，我在旧相片里断断续续窥到了从前的片段。外婆与外公识于患难。1938年文夕大火后，长沙张家东迁到了安徽。不久，臧三公从北平举家南迁也到此地。他们成了对门的邻居。我看到外婆25岁年纪出嫁时和外公的订婚照。她确是世家大族的长女，西洋白纱衬着她的笑。外婆旁侧的湖南小子此时西装笔挺，正是意气风发时候。这个长她3岁的张家小子出落得英气逼人，他是舞池里的王子，泛舟西湖题诗黄昏的新青年，是那个年代任哪个怀春少女都会倾慕的主儿。

20世纪60年代，流离半生后，他俩终于落脚到南方一座未涉足的小城，与各自的故土离分。生活并不富足，每月外公还

得把部分薪水寄去定居安徽的父母、姊妹。但两人熬过了战乱逃难的年岁，又挨过“文革”，有些苦便在忍耐中过去。我妈妈尚小时，某年终外公害了胃病，外婆在单位门口支起炉子，托乡邮员从农村捎回玉米，日日熬玉米糊，直到外公痊愈。

外婆是顶爱美的龚家长女，那会儿没有护肤品，她使用蜂蜜敷脸。有很长一段时间，她的膝盖生疼，就把生姜切片，轻放在膝盖上，从药房采来捣碎的艾，捻一撮在姜片上，再划根火柴点燃，艾香起时，姜汁渗入膝盖，坚持几日便消了痛。外婆的这些法子，许多是从她母亲那儿学来的，我妈妈看得多了也就会了，闲聊时顺口说起，就又到了我处。

1990年冬，我出生，对世界最初的记忆在外婆家烙下，再难割舍。这4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客厅餐桌上放了两副扑克，往日里老太太在午睡后，总要慢慢摆弄一阵，一边的闹钟发出“噼噼”的声响。如若我在，就陪着她玩儿，都是我俩自创的游戏，旁人是不晓得的。

北房原是我妈的闺房，床边桌子最右手边的抽屉里放着跳棋和万花筒，以及供我识字的卡片。房间的门框上，用圆珠笔画着一道道线，那是我自小长高的标记，线旁注了年月。南房总有阳光透进来，80年代，外公买来一台手动调焦的相机，常把相机调好焦，设定时间，两步跨回外婆身边，两人看着镜头，默数秒数，等快门自动弹起，“咔嚓”，自拍印上胶片。

南房连着不大的阳台，一半的面积被他俩经营成了花园。琼花、海棠、仙人球，两盆君子兰一年一开，大朵大朵的橙红

直往下坠。还有水仙，那是每年冬春交接间的固定品种。临到年节，老两口便买来水仙，在椭圆瓷盆里搁放鹅卵石，缀上几颗玻璃子弹球，倒上水。之后每日，数数可有新生的花苞，静待春节前后某日早晨醒来，前夜已花开数朵。这习惯延续到我爸妈身上，只是外婆走后，家中已有好几年未闻见水仙花香了。

约莫在我高中，外公的记忆慢慢不再刷新。及至今日，他见我时，仍常问，想去哪儿读大学。记忆不再时，习惯变成偏执的本能。他左手腕上的表滑落到接近手肘的位置，早停了针，也不肯脱去。他的手电常年搁在枕下。这个三十多年的老小区里只三两盏路灯，从前傍晚，天色暗沉时候，我要归家，他总要打着手电送我到小区门口，再劝也不肯回。而外婆，则站在楼梯中间的平台遥遥看我们。到了晚间，总有一通电话，末了，外公不忘附上一句“你保重，身体健康”。

外公在一次跌倒后，开始卧床。他口中的话渐渐连不成句子。他大概已不大认得我，叫不出我的名。但每次看到我，他总向我竖起大拇指，说：“好，好。”他自然不记得外婆去了哪儿，但有时似乎又清醒。

他问我母亲：“你妈妈呢？”

“为瑾，为瑾呢？”

“那个人呢？”

“还有个人到哪里去了？”

妈妈在一旁答：“妈妈到天上去了啊。”

他别过头去：“不要说了，我难过……”

那些相片被放在床边的小橱里，其中许多张全家福，地点则多在北京。

2006年夏，我陪外婆去北京。外婆第一次坐飞机，回到她生兹念兹的那座城，所有熟悉的地方都变了样。我则第一次到皇城根儿，从首都机场出，到朝阳到西单到丰台，一切都是新的。第一晚的时候，飞机从房顶上划过，发出轰鸣，我从睡梦中醒来，朦胧听到隔壁房中外婆同她的幺妹还在细细私语。最末的相见，不过匆匆一月。

另有一张，外婆在厨房，正侧过身来笑。拉一根铁丝，挂上两只酱鸭，窗台上摆了一篮蔬菜。大约外公端着相机走到外婆身后，唤了一声，外婆在灶台前回过头，看到镜头，于是停下正剁排骨的菜刀，开始笑。老伴儿按下快门，定格。相片冲印出来，外公在背后写“摄于1987年1月27日，除夕前，厨房，无阳光，距离1.5米，光圈5.6，速度1/8秒”。

而外婆故去后，头三年的除夕年夜饭，酒店服务生每上一碗菜，妈妈都须先夹一块，用保鲜袋装好，林林总总凑齐九道。第二日大年初一起一大早，备上黄菊、香烛，上山祭拜。三年中，有时雨，有时晴，有时墓碑前的几株茶花已开，其中一株是难得的粉色。到初二，仍照归宁的习俗，按从前外婆的要求，有几道菜必须有，红烧鱼、鸡肉、元宝蛋。

2002年，我甫上小学六年级。为瑶舅公在给外婆的信中说：“为瑾姐的外孙争取在北京、杭州读大学、就业。这是龚自珍后代的两大理想基地。教育后代，从这方面努力！”七年后，我这个第八代的异姓者，确到了杭州，不过不成器地混迹四年，又离遁回了故土。

及今，龚氏“为”字一辈多入耄耋，外婆故去也近五年。后知后觉如我，才试图从亲眷的叙述中拼凑她的一生。这一趟无力行旅，仿若没有正确答案的考试。只是纵然血脉微茫，有些故事终归藏在里头。

的哥父子，“卖手腕子”的两代人

张露萌

午夜的交通广播放着抒情慢歌，听得杨得意连打两个哈欠。他看了看手机，快到凌晨一点了。一打方向盘，穿进了小区，抄了个近道，把车停在“兄弟盒饭”门前。附近类似的通宵小饭馆有几家，专门为的哥的姐提供快餐。杨得意觉得最好吃的就是这家，店面不大，但已经开了好多年，他也吃熟了不愿意再去其他馆子。

盒饭是半自助式，12元一荤两素，18元两荤两素，米饭和汤任取。饭菜的种类不少，像杨得意这样跑了半宿活的壮小伙也能吃饱。他坐在车里捋了捋兜里有零有整的票子，271元。去掉出车时带上的100元零钱，再去掉110元的份儿钱，还剩61元，刚刚够油钱。

他把数好的200元钱放进裤子左兜，剩下的放在右兜，下车锁好车门，四个车门都拉了一遍，才放心地走进饭馆。

杨得意跟里屋的大姐打了声招呼，把12元钱丢在她的抽屉里，就拿起餐盘盛起菜来。大姐瞟了一眼抽屉：“哟，得意，最近怎么总吃12元的啊？”“嗯，前阵子吃得太好了，肉吃多了容易胃下垂！”杨得意没有抬头，拿着饭勺，眼睛扫着面前的十几样菜，仿佛挑出三样可口的并不那么容易。

杨得意找个位子坐下，吃了两碗饭，喝了一碗汤，把盘子里的三样菜吃个精光，汤足饭饱之后打定主意要开通宵了。他心里盘算着待会儿去哪个酒吧门口趴活儿，今晚不赚够一百块就不回家。

子承父业“卖手腕子”

杨得意其实最初特别排斥“卖手腕子”，就是给别人开车赚钱。他可不想“子承父业”。

20世纪90年代，父亲杨建国从国营工厂下岗了。原本以为抱着“铁饭碗”可以干一辈子，而立之年却突然丢了工作，杨建国急得犯了胃溃疡，在床上躺了20多天。屋漏偏逢连夜雨，杨得意的母亲这时也被“请”出了厂，当“买断工龄”的21000元钱拿到手之后，她给丈夫和儿子各添了一套新衣服，然后就坐在床上看着存折上的数字发呆。

一家人就要坐吃山空了，杨建国强迫自己好起来，当务之急是找一份养家的工作。他考虑再三，还是开出租“卖手腕子”能见到现钱，毕竟开门七件事，儿子又在上小学，家里处处都要开销。

这时找对班司机就很重要了。除了少数开“大班”的司机自己开全天，一般是自己的车挂靠到出租车公司，当然也有车主自己开白班或夜班，找人开对班的。大多数“卖手腕子”的都是两个人开一台车，你开白班我开夜班，交车时间自己商量，通常是上下班高峰前。一来最好两个人家住得近，交车取

车都方便，二来则是合脾气，谁遇到点事情可以相互换换班之类。

当时恰好对面楼的车主在招夜班司机，杨建国就这样成了的哥。

开出租的第一个晚上，杨建国一直干到凌晨3点，回家之前去加油站的小超市里把一口袋零钱换成了一张100元，他刚一转动钥匙就听见里屋有人走过来，果然妻子一夜没睡。“就挣了这么多，留了点明天找零的，给！”他把钱塞在妻子手里的时候，她愣了一下，看蓝色的一张，还以为就赚了10元钱，心想第一天能交上份儿钱就知足了，兜里多留点零钱多好。一展开是大票，杨建国看到对面的一双眼睛里泛的光都变蓝了。

自此杨家的日子不但走上了正轨，还像铁路一样提速了。

杨家是楼里率先装电话的，在别人都在用数字BP机时，杨建国直接买了最新的摩托罗拉汉显BP机，别在腰带外面，大屏幕泛着光。于杨建国而言，丈夫和父亲的形象越发高大，于杨得意的妈而言，却是喜忧参半。再也不用工作，每天在家数钱，让她有种“被包养”的喜悦，但是她也许久没睡上一个踏实觉了。别人的丈夫在陪妻子逛街、吃饭、看电视的时候，她的丈夫不是在开车就是在睡觉。

她开始讨厌过节。“我们家从来都没完完整整吃过一顿饺子。”杨建国有时也想在家好好陪陪老婆孩子，可是谁都知道越到节假日打车的人越多，谁能放着钱不去挣呢？就连年夜

饭，他都只是抱着计价器上楼吃了一盘饺子，放下筷子就穿外套出门，整个过程一气呵成，精确地控制在半个小时之内。

的哥劫

打从杨得意10岁起，上学期间几乎没跟父亲说过一句话——起床时父亲还在睡觉，放学到家后父亲早已出车。他甚至不知道父亲每天几点收车，几点到家。

记忆中唯一的一次，父亲在他睡觉之前就回了家，那是父亲开出租的头两年，寒假的最后一天，杨得意正在老妈的监视下熬夜补作业。

父亲匆忙冲进家门的时候，母子俩都感觉到情况不太妙，果不其然，父亲开车遇见了劫匪，被抢走了身上的200多元钱和刚买的BP机。父亲一边懊恼不该为了多挣点钱去那么人烟稀少的地方，一边宽慰老婆孩子，心里还是惦记再出去把份儿钱挣回来。他回家除了报平安，也是想再取点零钱。母亲必然是拧不过父亲的。

杨得意估摸顶多过了两三个小时，父亲就又回家了，这么快就挣够100多元钱了？可是他分明发现了父亲脖子上的血道子。“一晚上被劫两次，出门踩狗屎了？”父亲拉着领子走到镜子前面，骂了两句。

这次轮到母亲安慰父亲：“人没事，车没被抢走，安全开回来就好。”杨得意不记得父亲那晚是如何度过的，只听母亲说他又犯了胃病。

第二天杨得意的母亲就去庙里求了个平安符，命令丈夫除了洗澡什么时候都得戴着。杨得意一直都想拆开那个红色三角布包，看看里面是何方神圣，可是直到护身符的三个角都磨得破了洞，他也没敢动。

接下来的几个月，父亲的副驾驶位坐上了“压车的”，爷爷、姥爷、叔叔轮番上岗，保驾护航。杨得意也跟着玩过几次，虽然没兜几圈就被父亲送回家，却也让他过足了坐小轿车的瘾，从侧面看开车飞驰的父亲，帅爆了。

杨得意觉得老爸比所有驾校教练都牛，他开车的本事就是老爸坐镇副驾驶一手一脚教出来的，半夜在没人的广场上一圈圈地开，移库、倒库、S弯。“我儿子，一点就透，是他爹的种！”

杨建国上了50岁就开始眼花，他始终坚信，除了眼睛，身上的其他零件都好用得很。不过他也不能拿生命开玩笑，所以即便极不情愿，他还是从夜班换到了白班。

这回白天没人管着他按时吃饭了，经常随便吃一屉包子就当午饭。于是本就凑合着维持运转的胃站出来警告杨建国的频率从几个月一次提高到几周一次，再这么不规律，它就要罢工了。杨建国跟他的胃斗了半辈子，可没打算这么快败下阵来。

作为的哥，要“斗”的还少吗？

跟罚单的“相爱相杀”近年来愈演愈烈。夜班司机总是脚痒痒，在四面无车的路口，见到没有摄像头的红灯就想闯。一

旦哪个摄像头修好了，记6分，罚款200元，逮着两次就得重新学习去了。开了白班之后杨建国越来越小心翼翼，别说闯红灯，连车速都慢下来了，生怕因为眼神不好而违章。扣分就等于扎他的心，扣一分扎一下，驾照是他吃饭的家伙，一天也不能离身。

然而“中招”的事往往猝不及防。一天下午两点多，杨建国饿到不行，把车停在了一家小餐馆门口，进去点了最便宜的酱油炒饭。十几分钟之后他拎着炒饭出来，就发现协警在他车上别罚单，说这是违停。“我解释说就买个饭的工夫，这就把车开到能停车的地方去吃，可是没用，人家扔下罚单就走了。”因为买了盒7元钱的饭，倒赔50元，还不如买包子呢，6元钱，拎着就走，不就没这事了？

让杨建国糟心的还有各种奇葩乘客。

他可以把醉酒的壮汉平稳送回家而保证他不吐在车上，可以陪话唠聊到不想下车，可以忍受熊孩子几乎拆了他的后座，他曾经以为按自己的性格肯定把他们赶下车，但是忍了又忍，用几个笑话能解决的问题，决不把它搞大。于是他成了乘客眼中幽默和蔼的老师傅。

殊不知在车上只有他自己的时候，他一点都笑不出来。杨建国最想不通的是，为什么乘客越来越易怒，动不动就投诉。车上有烟味要投诉，不让把行李放在后座上要投诉，走错路了要投诉，遇到不讲理的乘客跟他争辩两句，那更得投诉……

杨建国特怀念90年代，挣得多花得少，司机的地位比乘客高，哪里能见到投诉？

上阵父子兵

杨得意眼看着父亲挣钱越发吃力，心情也大不如前，他跟母亲都有让父亲退下来的打算。但是父亲总会用一句“儿子还没成家，怎么放心退休”顶回来。一直到杨得意把女朋友领到家里来，又哄又劝，才让父亲彻底断了开出租的念头。

那时杨得意的叔叔杨建军刚从单位内退不久，正好接手了哥哥的车。杨建军车技一般，没什么经验，杨建国建议他开夜班，份儿钱少，违章罚款的概率也比较低。活拉得好的话，前半夜就能收车，不耽误回家睡觉，不过初期可能辛苦些，要干到凌晨。

杨建国终于可以安心“退休”了。他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了还未定性的儿子身上。

在高中毕业之后，杨得意做过各种销售，卖过房子也卖过衣服，挣的还没有花的多。也曾去建筑工地做过一个月小工，晒到脱皮，拿到工资就不干了。有一段时间他换工作比换衣服还勤，后来发现速记员的工作不错，于是报班上课，毕业之后活接得不少，才算是稳稳当当地赚了几年钱。在叔叔要接手父亲的出租车时，他也顺便一起去考了道路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有时候叔叔晚上有饭局要喝酒，就找他帮忙代班开车，算是挣点零花钱。

其实父亲不止一次劝说过杨得意转行开出租，甚至提出用家里的房子抵押贷款，买断一台出租车，他们爷俩开。

一般“小买断”之后，每天交到公司的份儿钱是130~200元不等，8年后不可更新车辆。由于国家规定营运车辆8年报废，之后就无法继续经营了。若是狠狠心“大买断”，份儿钱只要每天40元左右，8年后可以更新车辆，继续经营，手续归个人所有。现在由于国家调控，个人手续的车买少见少，价格也水涨船高。根据车的新旧程度，“大买断”需要20万~40万元不等，“小买断”也要12万~18万元。

“童年阴影”使杨得意一听到“开出租”三个字就发怵，但车技好、记路快、会看眼色确实给了他吃这碗饭的资本。况且转念一想，这年头，谁还会去抢劫出租车司机？随便抢条项链都比的哥兜里的几个子儿值钱。杨得意心里跟明镜似的，自己这种不服管的性格，在哪儿打工都干不长，开出租车，坐在方向盘前自己就是“老大”，无疑最适合自己。

杨得意没有接受父亲的建议，一来不想再让他操劳，二来让家里贷款十几万元是他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负担。还是给人“卖手腕子”吧！杨得意一问，夜班份儿钱是每天110元。“我爸当年开夜班是一晚上120元，就多10元钱，可挣的是现在的两倍！”

兜兜转转还是没逃过子承父业。杨得意认了命，去办了出租汽车驾驶员车辆营运证，自此也步入了“制服男”的行列。

他还是喜欢开夜班，这样白天有时间休息，干点自己的事情，偶尔接接速记的单。

杨得意终于理解了父亲为什么每天都睡不醒。小时候一到放假就跟父亲一起比着睡懒觉，每次都输，起床之后想尽各种办法叫父亲起床成了他的一大爱好，揪耳朵、捏鼻子、敲盆敲碗都尝试过，父亲不为所动，杨得意越挫越勇，乐此不疲。

当他亲身经历熬过一宿之后睡多久也不解乏的倦怠后，才意识到小时候的自己有多烦人。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开车需要点技巧，开出租车更是如此。杨得意总在开车的时候对前后左右的司机有诸多不满，当着乘客的面他也毫不避讳。对他来说，拉活少、跑空车都是耻辱，看见慢悠悠的司机就一定要变道超过他。“夜班就要开得快”是杨得意一贯奉行的宗旨，在车少人稀的路上轧马路，简直天理不容，有那悠闲的时间又能多拉一单。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杨得意把他从武侠小说里学来的那点理论都用在了开车上。不过跑得越多挣得越多在谁看来都是真理。从油费上算也是如此。杨得意刚开车时脚下没准儿，油门踩得重，平均一公里要一元钱。现在他常吹嘘自己“下脚如有神”，一公里最多五六角钱油费，这样跑得公里数越多反而越省钱。杨得意的纪录是一晚上跑了400多公里。

于是乎杨得意养成了开快车的习惯，连QQ都能开出奔驰的速度。有一次杨得意借了一台SUV带家里人去野炊，在路上四轮飞起，闪转腾挪，吓得有心脏病的母亲坐在后面一直往嘴里塞速效救心丸，之后再也不敢坐儿子开的车了，每天杨得意出车之前她都要嘱咐一句“慢点开”。

杨得意嘴上应着，一旦脚沾上油门踏板，可就不是他了。若是副驾驶坐着熟人，更不得了，还有点炫技的意思。

一天晚上杨得意开车去接刚下班的女朋友，打算把份儿钱拉出来之后就跟她找地方约会去。他动了点小心思。那时已经允许出租车合乘了，把女朋友留在副驾驶，既能多陪陪她，又能以不顺路之名明目张胆地拒载。杨得意从CBD（中央商务区）接上了一对情侣，两对年轻人在车上聊得越发投机，杨得意脚下跟着给力，开飙。

不一会儿后面跟上了一辆警车，闪着警灯追他过了两个路口，杨得意还是第一次见这场面，以为警车是在追逃犯，没想到警车一加速，把他的车别在了路中央，四个穿着警服的壮汉把杨得意请下了车。

女朋友看他们一脸“杀气”，怕是遇见骗子劫道的了。“你们干吗的啊？”看杨得意还在给他们赔笑脸，女友忍不住发了声。“小姑娘你快再打辆车走吧，这是个黑车，把你骗了你都不知道！”带头的警察又转头对杨得意补了一句：“你刚才闯了四个红灯知不知道？”

这时后面的一对早已下车离去，车钱算是打了水漂。杨得意的女友不敢再多说，更不敢跟杨得意多交流，她怕万一遇到犯罪团伙，自己逃出来总能想想营救的办法。于是只好也下了车，眼看着两个警察一前一后押着杨得意把出租车开向了公安分局。

杨得意的女友站在旁边的人行道上吹了好一会儿冷风。她给杨得意发了一条短信，说就在原地等他。没收到回信，她又打了一通电话，被挂断了。

这是演电视剧吗？还是警匪片里的剧情？女友越想越害怕，又用英文给杨得意发了两条短信，一条问他情况怎么样，是否解释清楚了，一条说如果遇到了危险，就发个简单的英文单词过来，她会帮他报警。但愿劫匪没文化。

当杨得意开着出租车停在同一个路口时，女朋友已经围着电线杆绕了578个圈。

杨得意说已经用最快的速度赶回来了，1小时40分钟，还不到10点。女友说绝不止。杨得意没有遇见劫匪，是刑警队跟交警队联合办案抓黑车，路上警察怕他跟“同伙”联系，就没收了手机。到了分局跟交警那边核实了车主跟驾驶员信息之后，就可以领手机和证件走了，但闯红灯的200元罚款是免不了的。好在由于情况特殊，杨得意解释说是被追急了，念在他认错态度良好，所以没扣分。

“该！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开快车了！”

“哎，你不懂。”

不是职业司机不会懂。其实杨建国也好，杨得意也罢，一天超过8个小时坐在并不柔软舒适的车座上，冬天冻脚，夏天闷热，绝大多数时间都是独处。即便坐着乘客，说些有的没的，也不是跟他们交流，而是解闷。某种程度上跟自言自语是一个道理。

他必须要找到一个出口，寻求些刺激才行，飙车是在找自己。尤其是开夜班，寂静无声是挺可怕的事，所以他听广播，所以他唱歌给自己听：

“跟着我左脚右脚一个急刹车，右脚左脚别忘踩离合……”

唱着唱着就嗨了，用引擎声给自己鼓个掌。

半路杀出私家车

在入行之前，杨得意就清楚出租车行业早已过了父亲的“遍地捡钱”时代， he 现在是穿着“的哥”的制服，戴着“孙子”的帽子。“您别管我叫哥，上我车的都是爷。”

杨得意没有父亲的好脾气，他有时看不惯乘客颐指气使的嘴脸就跟人家对骂，投诉就投诉，怕投诉就得忍着？真拿我当孙子了？所以三年前杨得意肩膀上是一颗星，现在还是一颗星。三年前他每个月能赚三四千块，现在还是三四千块，可再也没零点之前收过车。

杨得意现在看着遍地的私家车就气不打一处来。不会开车学人家买什么车？买了车开到路上堵着也就算了，你们都跟出租车抢什么生意？

三年前，叫车软件疯狂抢占市场份额，一大批年轻人再也不愿站在路边招手叫车，而是坐在家里等车来接。而且在大额优惠券补贴之下，通常短途只要一分钱。“别说出租车，连公交车都没活路了。”

杨得意已经习惯了把车开到路边等待的人群面前，人家冲他摆摆手：“叫好车啦！”那段日子他把趴活的地点从商场、酒吧、KTV改到了医院和火车站。他宁可去排队等乘客，多跑几趟机场。“市场总会回归平稳。”杨得意相信只要坚持到最后，高额补贴很快会结束，出租车的寒冬期就要过去了。

不想寒冬过去，又是一段春寒料峭。

叫车软件越做越大，高、中、低档的私家车都出来拉活，连接送机都有专车了！快车、顺风车都打着低价跟出租车抢饭碗，杨得意真想去扎了他们的轮胎。

后来听乘客说出租车也能加入叫车软件平台了。杨得意嗤之以鼻：“我反正是不用他们的东西。我又不是捡不着活，还用他们帮我接单？他们让我去哪儿接谁就接谁，我为什么听他们的？”他就想不明白，那些小姑娘晚上叫私家车，不怕出危险吗？有小票吗？有驾驶员信息吗？哪像我们出租车这么安全？

说归说，趋势是趋势，杨得意明白无法改变。

杨得意一直以“老司机”自居，凭借着本地人的优势和近十年的驾龄，他对路况和地形了如指掌，总能凭经验以最快的速度将乘客送往目的地，绕道或者走错路在他眼里都是耻辱。然而随着叫车软件平台配备的各种导航服务，不论是新手还是门外汉都敢开个账号注册车主，摸索着载客上路。高科技在挑战老司机的底线。

据资料显示，以拥有超过80%市场份额的滴滴出行为例，截至2016年，它覆盖了中国400个城市的网约车市场，满足了8亿人次的出行，每天完成的订单数达到2000万。

2016年7月28日，《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千呼万唤始出来，并已于11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意味着网约车司机彻底挥别“黑车主”的阴霾，守得云开见月明，终于可以堂堂正正跟出租车司机来一场正面厮杀。自此，的哥似乎彻底“失宠”，他们心中最后一点“正规军”的骄傲也被击碎。

2016年12月21日起，北京、上海和广州公布了正式的网约车管理细则，备受争议的“京人京籍”“沪人沪籍”规定延续了下来，要求略微宽松的广州则要求专车司机至少要持有本市居住证，网约车的门槛有所提高，但这对出租车行业也并非利好消息，这意味着“地头蛇”的优势尽失，“老司机们”仍旧无法扭转出行方式向新科技的倾斜。

杨得意所在的二线城市还未出台网约车细则，不过显然这一天迟早会到来。其他的哥罢工、举报，他该出车还出车，多挣一天是一天。才不犯傻呢，罢工就不用交份儿钱了？

这两年，杨得意还是奉行着他自己的那套“载客之道”，没挣着什么大钱，可也没饿死。最近他听说份儿钱又要降，可是他已经在考虑不干了。“越来越多私家车出来抢活儿，干得没意思。”

出入人才市场的日子好像是很久以前了。杨得意没准备简历，只要马路上还有车，就需要司机。“还是卖手腕子吧，也没别的本事。”

（注：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本文所有人物均为化名。）

第四章 文章结构的魔力

我是怎么判断和编辑稿件的

郭玉洁（《正午故事》主笔）

写作很难教，也很难学

写作很难用我们常规理解的方式去教学，即不是讲一堂课大家就能立刻学会写作，或者说，我讲一个学期课大家就能写得很好，不一定。

写作，尤其是非虚构写作，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可以教、可以学，即你有一位好老师，或者好编辑，在稿件的修改和反复沟通中学习，因为写作是一个实务的工作。

何伟（Peter Hessler）曾在很多文章和访谈里讲过他在大学读书的经历。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写作，那个系里有好几位著名的小说家，包括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托妮·莫里森。

但给何伟影响最大的不是这些小说家，而是一位非虚构写作的作家约翰·迈克菲。因为约翰·迈克菲给了他非常详细的指导，仔细批改他的作业，告诉他很多细节的处理方法。

所以何伟在毕业的时候，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写作者了。

所以，假如你碰到这样的老师——这样的概率是很小的——或是碰到这样的编辑，能够跟你们进行实务上的沟通，一定要珍惜。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自己要多写，尽量多写。写，才是最好的成长途径。

非虚构写作是宽泛写作

关于非虚构写作，我有三点要跟大家分享。

第一点，所谓非虚构写作，相对的是虚构，也就是在事实层面的写作，不能编造。比如说我今天上午8点钟开始给大家讲课，这是一个事实层面的真实，不能虚构，不可以想象，也不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对我进行心理上的揣测，这都是不可以的。这一点是对非虚构写作的基本要求。

第二点，除了事实层面的真实，还有叙事层面的真实，需要仔细甄别。我们自身所处的位置、对于事情的理解，以及我们的价值观，经常会影响我们的叙事。这就是说，在叙事层面，不存在所谓真正的客观。

比如说我今天上午八点钟来三明治讲课，如果我在后面加上一句：我最近欠了梓新^[1]一万块钱。那么大家把这两句话联系起来，就会觉得我是因为欠债才来讲这个课。这就是逻辑链，是我们在叙事上建立的因果关系。我们往往不能够察觉这一点，或者说没有考虑更多的可能，把问题简单化，做了自己的理解。比如我欠钱和讲课真的有关吗？我可能只是觉得讲课

好玩而已，所以讲课和欠钱这两件事不可以被简单地放在一起。

我再举一个例子。这两年所谓的非虚构写作非常喜欢写凶杀案。比如说白银的连环杀人案，凶手被抓住之后，很多媒体都在写这个案子。有的媒体会写，这个杀人犯以前很聪明，他想做一名飞行员，去考飞行学校没考上。作者似乎没有进行任何主观上的判断，但只要把这一点放在文章里，读者就会理解为，这个杀人犯在成长过程中有阴影，这种阴影导致他成为杀人犯。这就是一个叙事层面的判断。毫无疑问，这种叙事受到了很多质疑，因为问题不会这么简单。

所以，在写作或讲述一个故事的时候，就是在建立你对这件事情的判断。你这个判断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最后的呈现，它不一定是非常客观的。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首先不管是作为读者，还是作为写作者，对于这一点要非常清醒。你要意识到这一点，再三问自己有没有其他可能，你的判断靠得住吗？尽量使它靠近真实和客观，并且，为你的判断承担责任。

第三点，这几年非虚构写作变得有一点窄，好像有了一种特定的样子，很漂亮的人物写作，或是社会案件，或者是一些故事性很强的亲身经历。

我还是认为，非虚构写作是非常广泛的，只要不是事实层面的虚构。可以是自述，也可以是报道——有很多深入的产业

分析，也可以是随笔。它可以容纳所有的写作技巧：报道、评论，甚至是抒情、个人观点和分析，都可以包括在内。我认为非虚构写作是一种很宽泛的文体。

作为一个编辑，怎样判断稿件

我在媒体行业做了十多年，从传统的报纸和杂志做起，财经类的、文化类的都做过。现在在新媒体平台正午。其间我大部分时间都是作为编辑。我的工作就是和记者、作者沟通合作，判断和编辑稿件。

我觉得编辑有一个重要的责任，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责任，即培养作者或记者。帮助年轻的写作者成长，帮他们找到感兴趣的领域，发展自己的风格，弥补缺陷，成长为比较成熟的写作者。

另外一部分工作就是和稿件打交道。现在，我就聊一聊我是怎样判断稿件的。

稿件，往往不是从写作的时候开始的。我想你们也许有一点经验，其实在写作之前，文章就已经开始了。

第一步是找选题，你怎么判断它是不是一个好故事。对于媒体工作者来说，有一点是很残酷，也很势利的，就是我们永远最喜欢名人和热点，因为这是最能带来阅读量的题材。

但就算都是名人和热点，仍然需要找到好的角度。

比如说正午最早被大家知道的一篇文章，是冯远征的口述《我穿墙过去》。在采访冯远征之前，我的同事们先讨论：要采访冯远征什么？从哪个角度切入？因为一个人的一生是很长的，他有很多故事，尤其是明星，他们的经历通常都很丰富，我们不可能把他的故事从头讲到尾，我们要找一个角度。这个角度要很精彩，又是很少被人讲过的。

最后在研究资料的时候，两个编辑谢丁和叶三，再加上当时的作者、后来加入正午的采访者张莹莹，他们发现，冯远征经常讲到他去德国留学的经历：他去德国留学，正好经历了柏林墙倒塌，这是很重要的时代性事件。这个情节出现在很多关于冯远征的稿子里，但都是很小的一部分，很少被完整地讲述，更少有人把明星和这样的国际政治事件放在一起。所以当时讨论的结果就是，主要讲他去德国的这段经历，把它放大作为主要的故事。

因为正午的定位，我们其实采访的名人并不多，有很多写人物的稿子都是在讲小人物。

小人物的故事很难写，因为他们不像名人，名人是这个时代变化的中心，小人物通常是被时代改变的，所以可能没有那么多戏剧性的故事。而且小人物讲故事的能力也没那么强。这是小人物难写的原因。

小人物有很多，哪些可以写，对我们来说，有几个很重要的点：一是这个故事本身有哪些打动人的地方，另一个是怎么找到他和时代、读者的连接。

比如说，我们会收到很多投稿，大概有一半，都是非常个人的，失恋故事或是成长经历。这样的故事除非有一流作家的文笔，否则我们是不太感兴趣的。也有另外一些，写作手法可能还不够成熟，但是其中有一些点，我们觉得是可以和读者建立联系的。

我们前段时间发过一篇随笔，讲一个与“南水北调”工程相关的家庭，在被迁移之后，又回到家乡的故事。初稿也不是很成熟，但是，“南水北调”工程本身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很多人的命运因此被改变了，这不是一家一户的事情。另外，这篇文章其实讲的是由于某个重大事件而失去了家乡的故事，这一点可以和很多人有共鸣，因为很多人都是在国家命运的改变过程中，失去了或是离开了自己的故乡。

所以我把这个作为主要的线索，编辑发表了这篇文章。

还有，我们曾经发过另一个稿子，讲的是作者曾经去过的一条老街，叫虹镇老街。虹镇老街有很长时间的历史，但后来在城市的更新和房地产开发过程中被拆掉了。最开始稿子也不是很成熟，但这也是一个可以和读者建立共鸣的故事，因为我们就是生活在一个变化的时代里，很多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都已经被改变了。这篇文章也编辑发表了。

所以，收到这些稿件的时候，我们首先会考虑它的题材，即使是个人经历，有没有社会性？会不会引起共鸣？有没有回答人们关于这件事的疑问？否则除非你写作能力超群，才有可能被采用。

另外一个小人物的故事，是我写的一篇，叫作《时间的工匠》。写这个故事的起因，是我同事谢丁听说了一件事，卡地亚在上海办了一个钟表展，除了展览钟表，还有一些钟表制作技巧的演示，一位上海的老工人，每天都去，而且很认真地学习。我们听了，都觉得这件事很有意思。

那它有意思的点是什么呢？就是在卡地亚这样一个奢侈品的展览上，会出现一位退休工人，这个冲突本身就很有意思。

然后我就去见了这位退休工人，知道他曾经在修表厂工作，20世纪90年代下岗了，做过很多工作，但他很喜欢技术，痴迷于机械表的工艺，想做出一个机芯来。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打动我，一位老人，不考虑利益，不考虑这块表做出来对他有什么好处——机械表的技术非常精密，我们国家在精密制造上落后于发达国家，如果没有创新，他做出来也没有太大的价值，但他就是喜欢，想试验。这就是一个小人物的亮点，除此之外，他身上也有那一代上海产业工人的特点和遭遇，这是他的时代性。

确定选题之后，怎么做？

在确定了一个选题之后，要做很多研究工作。不是每个人都会做，但是我认为这很重要。

比如说我刚才讲到的那位上海的退休工人，在确定这个选题之后，我先去了解了钟表业的发展。

我一方面去了解钟表业、机械的原理，以及卡地亚钟表的发展历史，另外一方面去了解上海的工业发展历史。上海原来是工业中心，有很多像这位退休工人一样年纪比较大但很喜欢技术、喜欢动手的上海工人。对这些背景的了解，在我后来写作的时候帮助非常大。

除了做研究，当然就是采访了，其实判断一个稿子好不好，采访可能是最重要的，采访决定了你掌握多少材料，有多少细节，细节够不够充分。如果采访得充分，就算文章写得不好，也绝对有可能改得很好看；但如果拿来的材料不够，是怎么样都改不出来的。

所以，如果想要以后长期写作的话，培养采访能力非常重要。

采访最重要的当然是核心人物，比如《时间的工匠》中，就是那位上海退休工人。我就要跟他聊，知道他的人生经历、制表的过程，我见完一次之后回来整理，发现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下次再见他就补充，再问。我和他见了有三四次，经历了大概一两个月的时间。

理想的情况下，我还应该去做一些周边采访。采访老工人家里人、他的同事，还有以前跟他一起修表的师傅。但是种种原因吧，只做了一个周边采访。如果做更多的采访，也许文章会更丰富。

有很多稿子是很需要周边采访的。有时候你的稿子跟某个领域有关，那有可能还要采访专家、学者，让他来对这个领域、行业做一些分析。比如我原来工作的杂志，曾经写过一组话剧导演，在做采访之前，我们就找了一些年轻学者，帮我们做最初的梳理、介绍，来熟悉这个行业。这些采访最后没有用在文章里，但是对我们之后的主体采访很有帮助。

比如说我们的记者黄昕宇，她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讲一个叫作“机核”的游戏网站。

机核是一个网络电台，主要介绍游戏、讨论游戏。这样的文章会很沉闷，因为它没有什么故事发生，就是几个人在那儿聊，没有什么行动，很难好看。后来我们讨论，希望把它变成关于中国游戏业发展的众生相，除了采访机核网站的几个主办者，还需要采访更多人，比如说设计游戏的人、游戏玩家，让它变得非常丰富。

另外就是要学会找资料。有些资料是可以补充文章细节的。我当时写那个上海退休工人，有一些细节是从资料里来的，比如说他当时在的修表厂有一些老师傅修手表的技艺很高，曾经西哈努克亲王的表坏了，都拿到那儿去修，最后还非常满意。我从资料里看到这件事，然后找这个老人核实。在研究资料的时候，你往往会发现很多相关的东西。

另外，采访是一个经验累积的过程，到后来你就会知道，怎样才能拿到更多的细节。我在《财经》杂志的时候，主编胡

舒立跟我们讲，你就按照时间顺序问，从头到尾，哪一年，发生了哪些事情。

说到这，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经验。首先，你要能够把人跟时代连接在一起。比如说采访上了年纪的人，你永远都可以问他，“文革”的时候他在做什么，往往能够迅速打开话题。其次，如果你按照时间顺序去问，采访对象回答时可能一下子就拉到今天，这时候你要把握住节奏，回去再问，或是请他讲一些细节。但你要能够判断，哪些信息背后可能有故事，哪些可能没故事。

采访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我经常觉得采访非常非常累，因为你采访的时候不停地在想，接下来要问什么问题，他刚刚讲到的内容里哪些一定要追问。

采访中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还原场景。当时如果发生了争执，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具体说的什么话？每个人说的什么？最好当时就要把这些事情问清楚。如果你真诚的话，他是能够理解你的用意的。

不是所有的场景都需要还原，要看它是不是在文章里很重要。其次是你要去想象这个场景，是个什么样的房间？在什么地方摆了什么东西？然后这个空间里面有几个人，他们分别都是什么样的角色？在这个事件的进行过程中，他先做什么，然后做什么？他说的什么，然后另外一个人说的什么？

比如说刚才讲到的上海工人，他要去钟表展览馆学习制表工艺。对我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在现场，但是我没有去，我只能事后再问。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空间，人大概有多少？教的那个人是什么样的？他多大年纪？他具体教了什么？那个工艺到底叫什么？他怎么演示的？

搞清楚这些信息，一个基本的场景就有了。我最好还能搞清楚他当时穿了什么，他跟别人说话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这是我通过问其他人知道的。这位老师傅很客气，如果别人正忙，他就说你们先忙，我先去别的地方，一会儿我再回来。

所以我觉得，还原场景还是要回到采访，一方面要很有想象力，拿到尽可能多的信息，另一方面，你要理解这些细节，哪些是真正重要的，能说明问题的。

那么到底要做多少采访，到什么程度？我们通常会做一些选择，但我的建议是，越是年轻的记者，越需要多采访。

正式写作

结构

写作有几个要素，第一个就是要定好你的结构。

对于结构，我觉得很多人都不是很理解。尤其是写比较长的文章，或者是比较复杂的故事时，很多人不太明白应该要怎么组织结构。

其实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定好你的故事主线和主要人物。

刚才我讲的机核电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你的线索很多的时候，怎样理清楚你的故事主线？假设我们把机核电台的组建和发展作为主要线索，那么它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刚建立；第二个阶段，也许中间碰到了一些困难，又解决这个困难；第三个是现在的发展——总要有一个来龙去脉、转折和到今天的状态。

定好这些主线之后，从头到尾，按照时间顺序来写，线索就会很清楚。很多文章都是这样的。但我们还希望能够给读者丰富的感受，那就要用比较复杂的结构，加入其他因素。

比如说在机核电台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加入了一些东西，包括几个主创的个人经历、他们为什么会喜欢玩游戏。这个过程其实就反映了中国游戏产业的动荡和变化以及国家政策的变化。

也可以穿插另外的东西，比如一位重要的游戏设计师陈星汉的经历和设计游戏的过程。另外，我建议记者自己也去玩一下陈星汉设计的游戏。她之前从来不玩游戏，我就建议她去玩，然后把自己的经历写进去。

这样的结构设置——有清晰的线索（机核电台的发展），又能讲述中国游戏产业的背景，也有很好看的人物故事，又有作者自身的感受——就会变成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结构。

另外一个我们一定会做的，我想你们大概也会这样做，就是分小节。以前我在新闻媒体工作的时候，会特别注重小节。因为人们阅读时是会疲倦的，据说到1500字的时候就会想休息一下，所以我以前工作的杂志，会建议写作者在写足大概1500字时另起一个小节。

分小节之后，我们会建议写作者给小节取一个小标题，比如说“机核电台的诞生”，那这一个小节1500~2000字，就在写这个电台诞生的故事。后来也可以再把小标题删掉，但这样整个结构会非常清晰。

开头

开头非常重要，我们在修改稿子的时候，很多功夫都下在开头上面。

开头最重要的，就是要吸引读者的注意，让读者看得下去。什么能够吸引读者的注意呢？一个动人的场景，或者是戏剧性的场景，或者是悬念。

如果我们的写作技巧还不是那么成熟，我们可以用更直接、简洁的方式去开头。

比如说，我刚才讲到有一个写上海虹镇老街的稿子。那篇文章的初稿里，开头讲到两件事，一个是2014年4月30日，“我”从上海的《晨间新闻》看到一则消息，“最后一户于昨日签订拆迁协议，虹镇老街主要部分拆迁安置工作完成”。接下来第二段是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城市里林

立着一片巨石阵，高大威武的华丽巨石屹立在最前端，后面是用被蛀虫啃食多年的原木和塑料板搭成的棚户区。然后接下来，是关于这个梦境的描写，大概有两三百字。

我觉得，第一段就像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的信息，不会触动读者。第二段又太个人，就是做了一个梦。这样非常个人的描写，除非你是技巧很高超的作家，否则很难写得很好。最后我把这些都删了，然后用这个作者在第二部分的一句话作为开头：“上海是生我养我的地方，但我不是一个地道的上海人。”

这个开头很直接，会给读者一种力量，让读者一下子知道，这个人要开始讲他自己的故事了。也有可能造成一个悬念就是：上海是生我养我的地方，但我不是一个地道的上海人，这是为什么呢？

细节和逻辑

细节会让文章变得非常好看，很吸引人，而且细节本身也是准确性的体现。但不是说随便什么细节都可以，一定要是准确的、有效的和独特的细节才可以。

比如，还是机核电台，记者写道，一个暑假，主人公之一西蒙去表哥家玩。我的批注是：哪一年的暑假？当时西蒙多少岁？

时间会给人一种确定的感觉，不是在随便说说。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他当时多少岁，因为他去表哥家玩是他第一次

接触游戏，那他到底是在什么年纪，10岁还是15岁开始接触游戏的？这很重要。

写作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要素，就是我们通常都觉得写作最重要的是文笔好，有动人的情感，有漂亮的比喻。但其实不是的，尤其是在我们通常的写作里面，最重要的是逻辑清晰。

在编辑工作中，我最容易看到的问题就是逻辑不清楚、跳跃，第一句话和第二句话没有什么关系，第一段和第二段也没有什么关系。一件事情都没有讲清楚，就出来了另外一个陌生的信息，而且彼此没有关系。

好结构成就好故事

苟维佳（三明治特稿主笔）

当你已经找到想写的主题、人物和素材，就相当于准备好了食材，接下来的目标是烹饪出一道美味的菜肴，你需要对制作步骤了然于心，放在写作中也就是确定好文章的结构。

罗伯特·麦基在《故事》中写道，“结构”是对人物生活故事中一系列事件的选择，这种选择将事件组合成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序列，以激发特定而具体的情感，并表达一种特定而具体的人生观。

无论是聚焦于一个普通的人物，写生活中的小事，还是描述更复杂的群像，记录重大的事件，都需要找到适合的呈现形式。好的结构是讲好一个故事的关键，写作者把素材妥帖地串联起来，才能将读者一步步牵引至想表达的主题，产生思想与情感上的共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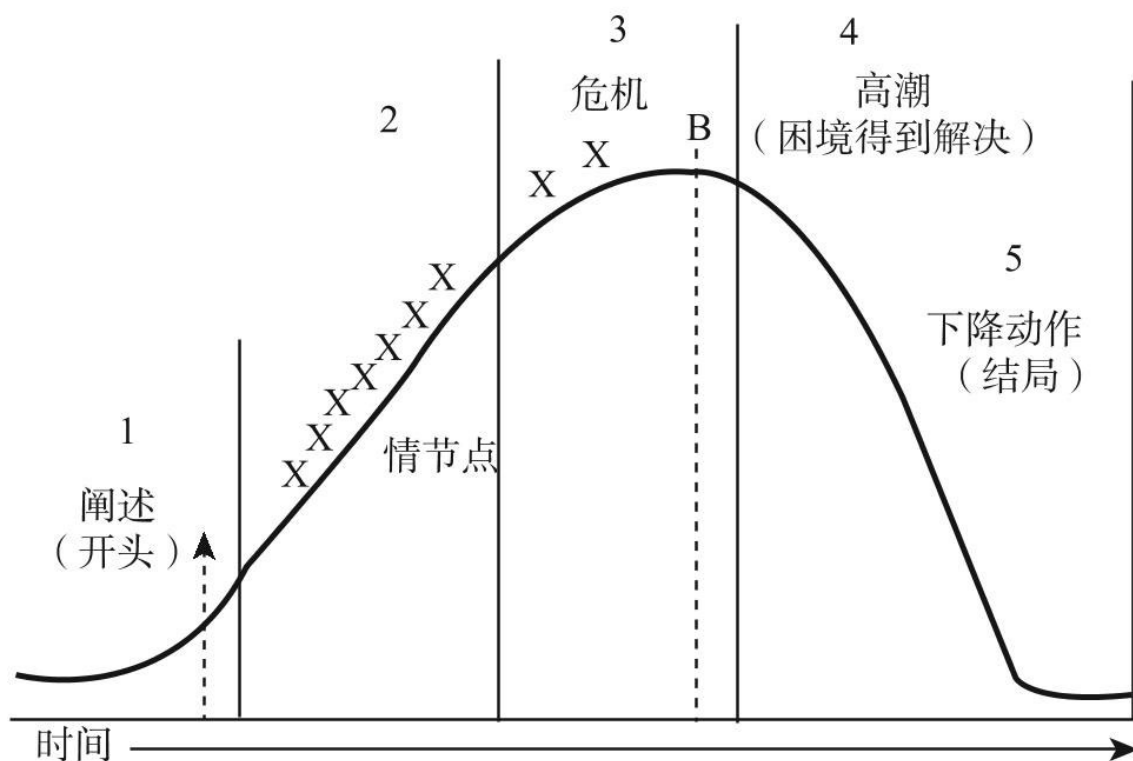
如何组织你的故事

讲故事的人都希望能把故事讲得更精彩，引人入胜。在这方面非虚构写作与小说、剧本写作是相通的，我们可以从好莱坞编剧理论中汲取养分。

故事的结构可以有很多种表现形式，但拆解开来会发现所有结构都具备三个组成部分：开端、中段和结尾，也就是所谓

的“三幕式结构”。故事通常是由冲突推动的，它可以是主人公遇到的外在的挑战或者内心的困惑。写好冲突，是故事的点睛之笔。矛盾冲突会让一个故事爬升至故事弧线的高峰，成为文章中最精彩的部分。

在好莱坞经典叙事弧线中，一个故事的结构分为：阐述（开头）——上升动作——危机——高潮——下降动作（结局），呈现出一道先上升然后落下的弧线。冲突（危机）将故事推向高潮的顶峰，在高潮的部分困境得到解决，释放张力通向尾声。



好莱坞经典叙事弧线

杰里·克利弗在《小说写作教程》一书中说，“冲突+行动+结局=故事”，“渴望+障碍=冲突”。前《南方周末》特稿记者李海鹏曾说，“好的非虚构写作，等于故事加意义。也就是写一个人，他有一个愿望，然后遇到了一些阻碍，最后有一个结果，写出来会对他人产生一定的触动或影响”。

具体的故事写作中，这样的弧线可能不止一条，一次次的冲突出现和解决推动故事向前发展。比如派妮的《一个家庭的下岗人生，1998—2017》中，车间职工杨爱兰和丈夫遭遇“被下岗”，这与她想讨个好生活，供一对儿女上学的愿望产生冲突，而在生活困难解决之后，又被丈夫患肺癌的噩耗击中。通过主人公不断与困境的抗争，呈现出一代人中的典型人物在特定时代背景下起伏的命运。

至关重要的部分：开头与结尾

文章的每个段落都很重要，但有一些段落比其他的更加重要，比如开头。如果不能在一开始吸引读者，引发阅读下去的兴趣，那么可能会与读者失之交臂。

一个好的开头建立在你对全篇运筹帷幄的基础上。加西亚·马尔克斯说，他写小说最困难的就是开头的段落，会花几个月时间来写开头。不过一旦找到了好的开头，余下的就变得非常容易。

当故事的核心冲突已经明确，那么可以在开头呈现一个关键的场景。可以开门见山地引出主要人物和故事背景，还可以

适当使用倒叙手法，把矛盾冲突提到开头来呈现，营造出带有悬念的氛围，让读者迅速地进入故事的情景中。

为了勾起读者的好奇心，制造出剧情的张力，你甚至可以先揭示结局，再讲述故事是如何演变至此的。比如《公民凯恩》就是以主角的死亡作为开场，之后通过一名记者调查凯恩，他一生的经历才在倒叙中娓娓道来。在具体的形式上，分为场景描写式、直接引语式、外貌描写式等类型的开头。

结尾也需要特别重视，好的结尾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反之则可能削弱文章的表现力。小说家杨晓敏曾生动地形容小说的结尾为“临门一脚”或“临床一刀”，他认为结尾除了留下适当的警示和启迪，还要给读者留下意味深长的思考余地。

但对于一篇文章的结构而言，结尾的地位应该是这样的：如果把它单独拿掉，并不影响读者对故事的理解，故事仍然是相对完整的。最关键、最有意思的素材，应当作为开头或在高潮中出现。

非虚构故事的几种常见结构

文章的结构与故事本身的时间跨度、复杂程度，出场人物的数量等有关。好莱坞剧本通常较为复杂，所以有多重线性结构、链式结构、非线性结构等花样繁多的叙事结构，但对于普通人的非虚构写作来说，结构相对简单一些。参考资深媒体人叶伟民的分析，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

首先较为常见的是时间线式，也就是按照时间顺序，从故事的开端讲到结局。这样的结构适用于围绕着一个核心人物或者核心事件的故事。比如《一个家庭的下岗人生，1998—2017》就使用了时间线式结构，将每一个时间阶段的故事娓娓道来。

要描述多个人物和场景，叙事在不同的人物、时间地点之间切换，多个故事平行展开又有所关联，即多人物和地理空间式。如张眯眯的《当美国老年人在写作，中国老年人在做什么？》，文中有两个不同的故事线索，一边是作者在美国的写作坊里遇见的老年人，一边是自己母亲和她周围的中国老年人。两条故事线互相独立，通过同时呈现形成了一种有趣的对照。

另外非虚构写作中还可能用到模块式和剥洋葱式等结构。前者适用于相对静止，需要观察整体面貌的文章，如展现北京夜晚人世百态的《北京零点后》。而后者多用于解释性报道，这是BBC（英国广播公司）纪录片的惯用方法，用困难和问题来带动情节，一个问题解决了又出现新的问题，最后到达故事的核心。

把握文章的节奏感

从编辑的角度来看，文章结构还有一个重要的层面是合理的断句、分段以及小标题的分割。这些文字编排的处理，会影响文章的节奏感和读者的阅读体验，关系到读者能否清晰、快

速地理解文章，而这常常是一些经验不够充分的写作者忽视的部分。

太密集冗长的语句和段落会让读者产生疲劳，我们需要在停顿的地方及时分段。另外，提炼出小标题，将文章分为几个部分，有助于读者迅速了解故事主线，或是文章想表达的几个层面。在构思故事主题和提纲时，就可以带有小标题分割的意识。

文章结构就像是骨骼，架子搭好了，也就有了基本的形状，高低轮廓已见分晓，剩下的就是要完善语言和细节的血肉。

一个家庭的下岗人生：1998—2017

派妮

北方的冬天有一种枯寂的冷。人们从有暖气的房间里走出来，只消一会儿便能浑身上下冻透。从人民路左拐进入一条小路，煎饼果子、火烧豆汁、肉夹馍、肉馄饨、豆腐脑……卖早餐的小摊儿一个连着一个，热气从每个锅子里升腾着，最终连成一团白雾，把这一片儿都笼了起来。有人把自行车停在一旁，连锁也没上，就吆喝着：“老板，来两个肉火烧，一碗豆汁儿！”有人则一边从这一团雾气中走出来，一边不忘抹一抹吃豆腐脑时留在嘴角上的葱叶。

杨爱兰和姐姐杨爱梅从清晨5点就出来摆摊卖水饺。馅料是前一天调好的，一荤一素就两种：白菜猪肉馅、韭菜鸡蛋馅。包水饺用的面也是前天就发酵好的。早上摆好摊后，姐妹俩就先擀面皮，面团在她们手里飞快变成一张张圆面皮。六七点钟，来吃早餐的客人多了起来。这个时候，杨爱兰就负责包水饺，杨爱梅负责往锅里下，顺便收拾客人吃完的碗筷，一直忙活到9点多钟才收摊。

回到家后，杨爱兰又开始准备第二天要用的原料。白菜、韭菜都要剁碎，五花肉加上酱油、大蒜、姜丝剁成肉糜，鸡蛋先摊成饼然后再切碎。杨爱兰初中毕业后，她的父亲就把她安排进了当地一家煤矿的食堂上班。和面、揉面、剁馅、包包

子，这些技能就是那个时候学会的。尽管姐姐比她大了5岁，但是干起这些活儿，杨爱兰的手脚更麻利一些。

“被失业”的开端：1998—2000

杨爱兰是三个月前开始摆摊卖水饺的。此前她还是一家国有工艺品厂的车间职工，从前几年开始，工厂的效益就一直下滑，最近一年整个工厂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端了十几年铁饭碗的杨爱兰一开始还坚信“工厂不会不管我们的”，可是眼看来工厂上班的人越来越少，她才慢慢意识到，自己必须得想想办法了。

这一年是1998年，“下岗”一词还没有流行，工厂给出的说法叫“停薪留职”。停薪的这一年，杨爱兰41岁。

丈夫张友进跟杨爱兰同是一个厂里的职工，凭着一手好文章博得厂长赏识，没几年工夫就当上了厂办主任。张友进还有三个兄弟姐妹，他们要么在家务农，要么靠做点小生意补贴家用，张友进算是最风光的一个。然而，停薪留职却让这一对中年夫妻昔日的风光一点点破灭。尽管家里还有一些存款，但是女儿刚考上高中，儿子在读初中，光是这一对儿女的教育费用就是一笔不菲的支出。两个人在家里琢磨来琢磨去，张友进决定跟同事一起把工厂原先的工艺品生意接上手来做，而杨爱兰则把在家务农的大姐叫上，一起上街摆摊卖水饺。

杨爱兰干起活来是一把好手，实诚的她跟在家里包水饺一样，把饺子做得皮薄馅大，咬一口能喷一嘴的油水。这样的饺

子很快为她招了一大批顾客，每天早晨她的摊位前人总是很多。尽管起早贪黑，但是杨爱兰满怀着对新生活的希望，干得十分带劲。然而毫无生意头脑的她，在卖了三个多月水饺后，才第一次后知后觉地想起算账这回事儿。算一下买菜买肉买面的钱，再算一下支起这个摊子的各种杂七杂八的费用，杨爱兰算完才发觉，三个月下来根本没赚多少钱。

于是杨爱兰开始在节约成本上下功夫，她不再像以前那样把肉糜的分量放得那么足，素馅水饺里面的鸡蛋也变得比以前少一些。“精明”的顾客也慢慢发现了这一点，光顾的客人一点一点变少。杨爱兰有些不知所措，她不知道该如何做才能在“保住成本”和“留住客人”之间做一个平衡。

半年过去了，杨爱兰水饺摊的生意变得不温不火，丈夫张友进跟别人做的工艺品生意也没有起色。生活又一次向这个家庭展露了难色。

两年后，杨爱兰16岁的女儿张雪莉开始上寄宿高中，只有周末才有机会回家。她回家后总喜欢第一时间打开电视机，盯着屏幕看个够，以缓解书山题海带来的压力。电视里庆祝澳门回归的活动轮番上演，迈入新千年的跨年庆典也在24小时不间断直播……中央最权威的媒体总是喜欢以这样一种宏大叙事的方式制造出歌舞升平、和谐欢乐的气氛。

在之前一年，中国共产党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一政策悄悄改变了杨爱兰一家的命运。

张雪莉不是没有感受到家里的一丝丝变化。爸爸隔三岔五跟同事们聚在一起喝个小酒打个牌的日子不见了，妈妈时不时就从厂里带回来过年过节的油盐酱醋也不见了，一家人在节假日逛个公园下个馆子的日子更是一去不复返了。

张雪莉一家住在父母工厂附近的家属小区里，邻里之间都是父母以前的同事。从前，因为父亲在工厂里的职位和威望，那些邻居每次见到张雪莉，也有意无意“示好”。同一幢楼的王阿姨每次见到她，大老远就喊：“哟，咱们张主任家的千金大小姐回来啦！”当工厂宣布“停薪留职”那一刻，“以厂为家”的时代也宣告结束。每家每户都重新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开始各奔前程。大家为了讨个好生活，使出浑身解数。

曾经是父亲下属的荣叔叔与妻子一直不和，打打闹闹好几年，随着荣叔叔的光荣下岗，妻子坚定了离婚的念头。离婚后的荣叔叔于是在街头摆摊卖馒头。

跟张雪莉在一个学校上学的李强的妈妈，自从离开工厂后，买了辆三轮摩托车，每天一大早天不亮就跑到青州那边一个大的农贸市场批发蔬菜，然后在附近的菜市场上卖菜。傍晚时分，张雪莉经常看到李强妈妈风风火火地把摩托车开回自家楼下。

住在张雪莉家对门的是曾经在厂里卫生室工作的张医生，她回到乡下老家镇上开了一间诊所。不出半年，邻里乡亲有个头疼脑热都往她这儿跑，一时间挣得比在工厂里还多。

住在张雪莉家楼下的于阿姨则没有这么多的烦恼。她的丈夫做着煤炭运输生意，家底殷实，于阿姨不上班了以后，干脆就在家当起了全职太太，一心扑在相夫教子上。

这些因为“被失业”而做出的各种选择，成了他们走向不同人生的分水岭。

门路和生计：2001—2004

2001年7月13日，正在过暑假的张雪莉聚精会神地盯着电视机屏幕，当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宣布北京将主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时，她也禁不住激动地喊了出来。这一喊把已经睡着的妈妈给吵醒了。杨爱兰翻个身，想继续睡觉，但是此时窗外开始噼里啪啦放起鞭炮来了，本来就有一肚子的心事，这下她再也睡不着了。

第二天杨爱兰一早起来上街时，发现“庆祝北京申奥成功”的横幅已经满大街挂起来了。然而时刻为生计问题焦虑的她，对这种普天同庆表情木然。她盘算着不去上街摆摊卖水饺了，一方面是因为赚不了多少钱，另一方面则是丈夫张友进正在准备开一家洗车行，正好缺人手，杨爱兰过去正好可以帮一把。

过去一段时间，张友进的工艺品生意一直没有做起来，他一直在琢磨新的出路。那个时候，私家车在这个小城镇里悄然多了起来，相应的洗车服务也应运而生。张友进盘算了一下，

除去租房、买设备，洗车服务最大成本就是人力，而他们夫妻两个人只要肯干，应该能从“洗车”这块蛋糕里分一杯羹。

杨爱兰的弟弟杨宏军在当地的城管大队工作，他人脉广，关系多，于是杨爱兰和张友进便拜托杨宏军找了一个门面，且和管辖这一片区的“相关人士”打点好关系，简单装修了一下门头就开张了。

由于没有雇人，多数时候需要张友进和杨爱兰齐上阵。先是张友进穿着防水胶鞋，拿着洗车水枪把车子清洗一遍，然后杨爱兰提着一桶装有洗车液的水，用抹布里里外外仔细清理一遍。上完蜡后，张友进进行最后一道工序——擦蜡抛光。

对于杨爱兰来说，撸起袖子干活并不难，但是对于坐惯了办公室，拿惯了笔杆子的张友进来说，他的心情却五味杂陈。从前在厂里上班时，工厂里有公车，但凡有事，不论公私，张友进都可以指派司机车接车送。但是现在，他却要为别人洗车，这不能不让他感叹今不如昔。就连张雪莉每次看到父亲洗车的样子，都忍不住一阵鼻酸。

张雪莉正处在“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纪，她心目中的父亲是一个靠脑力吃饭的人，不仅可以写一手好书法，更是可以写一手好文章。无论如何，她不能接受自己的父亲为了现实生活而去出卖自己的体力。可是，作为一个未经历过社会的高中生，张雪莉又能做些什么呢？她什么都做不了，除了在日记里抒发一下自己的心情，她只能更加努力地学习，以这种方式为父母争口气。

洗车的生意越来越忙，杨爱兰和张友进开始“以店为家”。杨爱兰在门面后面搭了一个简易厨房，夫妻俩的一日三餐都在这里解决。张雪莉和弟弟放了学也不再直接回家，而是跑到店里，一家四口在店里解决晚饭后才回家。

家越来越变得像一个宾馆。这一年的冬天，杨爱兰为了省钱，干脆没有缴纳那将近2000元钱的暖气费。没有一丝热乎气的家，让张雪莉不再盼望每个可以放学回家的周末，她宁肯住在学校宿舍里，也不愿意回家挨冻。

在张雪莉眼中，跟父母谈心聊天几乎变成了一种奢侈。唯一一次是杨爱兰主动提起的，她感慨自己过去在工厂里上班时，从来没有想过会有为生计发愁的时候。现在唯一后悔的就是当初没有好好学几门技能。她嘱咐张雪莉以后不管怎么样，都要有一技之长。

2002年7月的一个早晨，杨爱兰从街角的早餐店里买了油条和豆汁，打算带到店当早餐。当她打开洗车店的门时，发现昨晚放在门后的一个洗车设备不见了。她心里一沉，赶忙打开抽屉，昨天收来的800元钱也不知去向。她跑到附近的公共电话亭，给家里的丈夫打电话。张友进听说后匆匆赶来，两个人查看一圈后确认洗车店被盗了。

心急的杨爱兰赶紧给自己的弟弟杨宏军打电话——她对自己这个“公务员”弟弟十分依赖，大事小事都喜欢找他出主意。杨宏军来了之后给他们报了警。警察很快来了，围着现场

四处侦察，他们发现门上面的锁有被撬开的痕迹，地上还留有小偷作案时不小心留下的一根细钢丝。

然而，这次报警并没有起到实质性作用，警察只是如实登记后，告诉杨爱兰和张友进，案子有了进展会及时通知他们的。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三个月过去了，这次失窃案以不了了之告终。

失窃的洗车设备是店里唯一一件值钱的东西，没有了设备，店也没法继续开下去。这次失窃案给杨爱兰重重一击。

从1998年下岗到现在，四年过去了，杨爱兰两次做生意都以失败告终。当初的意气风发不再，她越来越怀疑自己的能力。她觉得自己好像不是一块做生意的料，与其这样折腾，还不如服从命运的安排。

这个时候，原先厂里的一位车间主任下岗后，自己干起了纺织刺绣工艺品的进出口生意，他那里急需大量车间女工。她很快通过应征——每个月工资600元，在完成保有工作量后每多完成一件刺绣品多赚8元钱。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杨爱兰开始了数年如一日的纺织女工生活。杨爱兰每天的工作就是按照给出的花样图纸，一针一线、一圈一扣缝制在纺织品上。为了多赚几个钱，杨爱兰把“绣花边”的活儿带回家来，每天吃完晚饭收拾妥当后，她打开电视机，一边听着电视里发出来的声音，一边做手上的活儿。长时间的劳作让杨爱兰很快得了“职业病”——她的眼睛

开始老花，必须佩带老花镜才能看清楚手上的针线；与此同时，她的颈椎劳累过度，每天必须靠贴缓解疼痛的膏药，并用手大力揉捏和敲打才能缓解。即便每天如此饱和的工作量，杨爱兰每个月挣来的工资也不过1000元左右。

这一年，杨爱兰一家最大的事情是女儿张雪莉考上了大学，这是张家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杨爱兰一方面为女儿的争气感到骄傲，走在路上邻里都在夸她的女儿有出息；可是回到家后看看家里的存折，她只能默默咬紧牙关。

张雪莉读出了母亲眼中的忧虑，她开始变得懂事。高考的事宜忙完之后，她就缠着妈妈，让妈妈教她如何绣花边。杨爱兰于是把最简单的“打圈”工作交给女儿。所谓“打圈”就是把一个圆环套在一根笔尖上，然后用线一圈一圈缠上去，缠满了之后再锁边，一个圈就这样完成了。张雪莉打一个圈，交给杨爱兰，杨爱兰就把这些圈镶在刺绣品上，一个连着一个。

相比杨爱兰顺从地接受了生活的安排，张友进则始终不愿意服输。对于一个中年男人来说，没有什么比事业上的一败涂地更让人觉得羞愧，他准备“三进宫”，再次寻找新的门路。

这一次，“门路”是杨爱兰的弟弟杨宏军介绍过来的。张友进生活的城市是一个典型的工业城市，煤矿、炭厂、水泥厂、砂石厂、化肥厂林立，这些工厂生产出来的原料多数销往其他城市，中间过程中的货物运输环节则鱼龙混杂，一盘散沙。只要能跟这些工厂打点好关系，它们就会优先把货物运输的活儿交给你。

杨宏军正是认识了当地其中几家大型炭厂和水泥厂的老板，于是介绍给张友进。张友进第一个活儿是把两吨水泥从当地水泥厂运输到江苏省无锡市的一个工地上。除去雇货车和司机的费用，这一趟下来让张友进小赚了一笔。

这次尝到的甜头让张友进看到了希望。他为了巩固这得来不易的战果，又拉上杨宏军给这几位相熟的厂长老板送礼请客，请他们以后多给些“好活儿”。把“财神爷”供奉好以后，张友进的心开始野了起来：既然手中有了货源，干脆自己买个货车，这样成本降低，利润岂不是更多？

于是，张友进开始跟杨爱兰商量买车的事情。家里存款还有五六万元，买辆承载量两吨的货车大概需要八万元，差的两万元张友进准备向银行贷款。一向谨小慎微的杨爱兰并不同意买车。她觉得这样风险太大，不仅掏空家底，还欠银行一屁股债。如果以后运货生意不好，这个家庭将举步维艰。

然而，此时一根筋想要扩大生意的张友进根本听不进去。他觉得不把步子迈大，怎么赚钱？最终，杨爱兰顺从了张友进，把家里的几张存折都交给了他。经过数月繁复的手续，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停在了张友进眼前。张友进感觉他的生意马上就要红火起来了。

“天真”的张友进没有意识到，任何依靠人情关系得来的生意都不是长久的。张友进供奉的金主们，被不少人惦记。为了维系好得来不易的门路，张友进必须花更多的血本去请客、送礼，否则这些货源被抢走是分分钟的事情。

除此之外，还让张友进头疼的一件事情是路上那些“血口大张”的交警们。在货物运输这一行当，超载超量几乎是行内默认的潜规则，否则根本没法赚钱。交警们也心知肚明，他们经常以各种理由在高速路口检查货物，但凡超载一点点，他们就开出罚单，这些罚款也就进了他们的“小金库”中。在张友进自己城市的地界里，还有杨宏军可以照应一下，但是多数时候张友进要送货去别的城市，这些“马路警察”常常杀他个措手不及。

时间一长，张友进也摸清了一些规律。夜间拉货跑运输被逮到的概率要远远小于白天。于是，张友进形成了夜里拉货跑运输、白天在家休息睡觉的模式。心疼丈夫的杨爱兰自然也养成了跟丈夫一样的作息规律。每天凌晨时分，杨爱兰就起床，给丈夫做点吃的。吃好饭后，张友进就一头钻进茫茫夜色中。

自从1998年停薪留职以来，杨爱兰原来所在的工厂一片静悄悄。2004年，杨爱兰和其他100多名职工被通知：工艺品厂正式宣告破产。尽管这五六年以来，大家各自谋出路，但是个人档案、社保等各种档案、关系依旧属于原来的工厂。现在工厂破产了，工人们这五六年被欠的工资上哪里去要？断缴的社保怎么处理？个人档案要转到哪里去？这些关系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被一一提了出来。然而，没有人能够解答这个问题——原来的厂长早已因为贪污问题被关进了监狱。很快，大家开始组队去“讨个说法”。张友进没有心思理会这一摊事儿，杨爱兰则被原先厂里的几个姐妹拉上，开始隔三岔五跑到区政府门口“上访”。

一开始，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还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定会为大家争取一个公正、公平的解决办法。然而，杨爱兰很快就发现，这些不过是这些工作人员应付上访群众的“官方说辞”。

因国企改革造成职工的下岗问题，一直是新千年以来引发社会动乱的不安定因素。尤其是在北方，国企工厂的职工一直被灌输主人翁教育，以厂为家，以身为工人阶级为荣，只要有“正式职工”这样一张王牌，就可以终生无忧。甚至在很多老牌企业里面，更是全家上下都在一个厂里工作，其“工人身份”是可以传承世袭的。

这些职工从来没有下岗的思想准备和再就业的能力，当国家决定解除与这些工人的“终身劳动契约”的时候，却没有为这些“弃儿”健全好足够的社会保障制度，因此也酿出不少社会动乱事件。多数工人都像杨爱兰和张友进一样，默默忍受着改革带来的阵痛，然而也有部分失业工人彻底绝望，跳楼自杀、行凶报复等事情时有发生。

有关部门的敷衍了事激怒了杨爱兰以及其他上访者。他们不肯善罢甘休，又发动了更多的职工加入上访的队伍。他们开始展开新一轮更加声势浩大的上访，他们的行为也开始偏激，他们经常堵在有关部门门口，静坐抗议。

经过旷日持久的上访，有关部门不得不商讨解决方案。最终法院介入了工厂的破产相关事宜，清点工厂资产，拍卖工厂

厂房，然后把拍卖款分发给职工，随后又给每位职工补缴了从1998年到2004年的社保工资。

厂房就在杨爱兰家前面，过去几年工厂的大门一直紧锁着。当厂房被拍卖那一刻，杨爱兰又站在门口往里看了看，曾经通往车间的主干道早已杂草丛生，车间外面的防护铁网也锈迹斑斑。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竟然过去六年了。

国事家事：2006—2009

经过两三年的摸爬滚打，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张友进的货运生意在摇摇晃晃中顽强生存了下来；杨爱兰依旧日复一日地当着她的“纺织女工”；张雪莉的弟弟张路康因为学习成绩差，早早踏上社会给别人打工；张雪莉则在这一年考上了硕士研究生，继续深造。

在即将读研的那个暑假里，张雪莉并没有闲着。她深知父母经济上的重担，她想要通过自己的本事为这个家庭做一点贡献。“本科，家教经验丰富，擅长语文、英语，可辅导小学至高中各个年龄段。”张雪莉把广告语简明扼要地打印在一张A4纸上，然后每天清晨骑着自行车，开始到各个生活小区里张贴。有时候，她刚一贴上去，打扫卫生的阿姨就给她呼啦一下子撕下来，丢进垃圾桶里。张雪莉并不气馁，第二天趁着没人，照样再贴一张。

一个星期下来，张雪莉已经收到四五个邀请她过去做家教的电话。她一一上门，跟家长沟通、试教、询问学生意见，最终决定聘请她上门做家教的有三家：上午去隔壁小区辅导一位初二学生作文；下午骑半个多小时自行车跑到另外一家，教一位三年级的小男孩数学；匆匆忙忙吃过晚饭后，则又要去帮一个刚上初中的男孩子补习英语。

初中生每小时20元辅导费，小学生每小时15元辅导费，两个月的暑假下来，张雪莉赚取了6000元钱——这是杨爱兰将近半年的工资。杨爱兰第一次对女儿产生了一种自豪感，同时她也为过去一年里的“目光短浅”感到对不住女儿。

去年张雪莉说要考研，杨爱兰极力反对，她天天盼着女儿大学毕业后能赶紧找一份工作，缓解家庭的压力。继续读研的话，不仅张雪莉要晚两年参加工作，这两年间又是一笔花销支出。杨爱兰无论如何不想再等两年了。

张雪莉自然知道母亲这样一种期盼不无道理，但是她心中仍有不甘，她还想继续深造，还想去大城市里闯荡一番，这个瘦弱的女孩体内蕴藏着一股说不出的倔强。张雪莉内心一直被这两种选择折磨着：一方面，她不忍心继续看父母为生计操劳奔波，她也想尽一份自己的孝心；另一方面，内心想要考研深造的愿望，却促使着她每日早出晚归泡在图书馆里疯狂复习。

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报名的那个晚上，张雪莉在网上提交了报名申请后，没有去图书馆复习，而是一个人在漆黑的操场上，一圈一圈跑步，一边跑一边放声大哭，直到精疲力竭。

最终，张雪莉金榜题名。张雪莉有些不知所措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妈妈。杨爱兰听到这个消息时，木然地答应了一声，再无任何其他反应。这种回应让张雪莉心里难受极了，她也埋怨自己的自私，为什么只顾自己不顾父母的感受？

正是由于这种愧疚的心理，让张雪莉在暑假里拼命打工赚钱。她想以这种方式告诉妈妈，接下来的读研生活不用家里操心了。开始读研之后，张雪莉也是在打工、上课、实习中度过。刚开学，她就已经很积极地通过学校的勤工俭学中心找到了一份家教工作，又很积极地通过学院导师的帮忙与推荐，到沪上的报社实习，甚至在校内的助理助教应聘时，她也报了名。一个学期下来，她收入颇丰：一周做三次家教150元；写稿稿费一个月能拿千把块钱；校内助教一个月补贴600元，加上研究生的生活补贴400元，张雪莉月收入两三千元。

这个时候，杨爱兰才觉察到当初对女儿的这笔教育投资是值得的，她嘴角第一次露出了难得的微笑。

2008年，正当人们欢天喜地期盼着即将在北京召开的奥运会时，一场大地震却给全国人民一个措手不及。那些灾难的画面，那些温情的时刻，那些被点燃的爱国热情，都不禁让人眼眶湿润。

张雪莉学的是传媒，地震发生时她正在报社实习，她跟着带她的记者老师忙前忙后，做专题跑采访，经常也会因为一些内容被触动到内心深处，伤心落泪。为了纪念这段经历，她决

定将“汶川地震时期中外媒体报道比较研究”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题目。

而在千里之外，杨爱兰一家已经走出下岗的阴影。尤其是张友进的生意，经过过去几年的颠簸曲折，如今几乎是顺风顺水。张友进知道风水已经轮转到他的脚下了。他更加开足马力，撒欢地折腾。他时常跟杨爱兰说：“赚不赚钱就靠这几年了，所以得抓抓紧，给咱儿子攒点钱弄套房子好娶媳妇。”

相比于过去几年的艰难求生，杨爱兰越发感到身上的负担在一点点减轻。过去，由于常年的焦虑以及丈夫日夜颠倒的作息，她的睡眠质量每况愈下。最严重的时候，她整夜整夜睡不着觉。想到手头的紧迫，想到未卜的明天，她只能不停地在黑夜里唉声叹气。这种透支身体的方式让她的“更年期症状”更加明显，她的脾气越来越差，动不动就训斥儿子，埋怨丈夫，整个家里的气氛时常被她搞得十分紧张。儿子张路康有时都不愿意回家吃饭，宁肯在外边跟朋友一起喝酒解闷。即便跟在外地上学的张雪莉通电话，也只是例行公事般，没有太多深入的交流。而如今，随着丈夫的生意红火，女儿和儿子也已经能自食其力，杨爱兰终于可以喘口气。

可是，上帝并不因为人们的勤劳或者善良就会放过她。杨爱兰怎么也没想到，她气还没有喘顺的时候，命运就再一次捉弄了她。

8月，奥运会在北京如火如荼地召开。张友进早上起床后，时常感觉到脖子后方总是一阵阵地疼痛发麻，而且总伴随着发

热。忙于生意的他并没有在意，以为自己感冒发烧了，于是翻出家里的药箱，抓了一把退热解毒的药吃下去。可是连续吃了一个多星期，症状不仅没有改善，反而越来越厉害。而后一个月，他每天早上起床后咳嗽不止，到最后已经咳出血来了。

张友进有了一种隐约的预感，有可能……

他常年抽烟，特别是前几年生意不顺的时候，经常是一根接一根，玩命地抽，似乎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可以把眼前的不顺心都抛掉。此外，他做的生意多是拉煤拉炭，经常要与粉尘相接触，难免呼吸一些污浊甚至严重污染的空气。加之，张友进所在的城市本身就是一个重工业城市，城市污染本来就比其他城市要严重得多。这个城市的癌症发病率已经大大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张友进的亲朋好友当中已经有人“中招”。

自己身体出现的这一系列症状让张友进预感到自己也可能“中招”了。可是，他不敢去医院检查，他内心还存有一丝侥幸与希望，他没有勇气面对可能预见的检查结果。对于一个人来说，只要活着就有希望，然而绝症会把希望统统拿走，他还不知道绝望是什么滋味。他也不敢告诉杨爱兰，他怕她比自己先倒下去。

张友进拖着身体一直在熬，从夏天熬到冬天。11月的北方已经进入寒冷的冬季，张友进再也无法隐瞒——身体的疼痛在加剧，以前是间歇性的疼痛，现在几乎每天夜里都会疼得醒过来。一个早晨，张友进望着卫生间里咳在马桶上的血迹，知道

自己瞒不住了。他走出卫生间，虚弱地跟杨爱兰说，今天去趟医院吧！

当医生把“肺部恶性肿瘤”的确诊报告单递给张友进时，站在旁边的杨爱兰感到天旋地转，脑子轰得一下子炸开了。超出自己人生经验的事情，她从来都不懂得如何应付。当年的下岗，让她失去了饭碗，让她为生计奔波，她以为这已经是老天爷对她做的最残忍的事情了。她无论如何都无力招架再一次的打击。人生啊，它怎么会是这样？

“非不能也，是不为也”：2010—2012

一回到北方，张雪莉再次感受了那种久违的寒冷。正值春运，瘦弱的她拖着行李箱，从火车站里出来，随着人流往出口处挪动。

过去半年多的时间里，即将毕业的她跟多数同学一样东奔西走在求职路上。百年难遇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让这个求职季成了媒体口中的“史上最难”，张雪莉只能一边整理着自己的求职资料，一边和同学们抱怨着倒霉。没有任何关系背景可以依靠，在这座野心勃勃、充满无限机会的城市里，张雪莉却时常感觉自己像是溺了水一样，随时会被淹没在茫茫大海中。面试官轻轻地皱眉或者不经意地叹气摇头，都能引发她内心的地动山摇。

从繁华大都市回到家乡小城，熟悉的乡音让她有了一种久违的放松。然而，打开家门那一刻，她一下子怔住了。

张友进蜷缩在沙发一角，面无血色，体重骤减，仿若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确诊癌症不久，张友进就在医院做了化疗治疗——这是一种破坏性极大的治疗方式，原理是用化学药物治疗的方法把体内的癌细胞杀掉，其副作用也相当明显，那就是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把体内的健康细胞一并杀死。过去几个月的化疗让他头发全部掉光，也破坏了他的喉部气管，他说不出话来。看到女儿后，他站起身来，想要说话，发出的声音却是沙哑一片，只好朝女儿勉强挤出了一点笑容。

张雪莉扔下手中的行李，眼泪一下子奔泻而出：这是怎么了？这是怎么了？

杨爱兰听到女儿的声音，也从厨房里出来。为了让女儿可以安心地找工作，杨爱兰一直都没有将张友进患癌症的消息告诉她。她没有能力在女儿的就业问题上帮一把，只能以这种方式不拖女儿后腿。可是当她看到女儿站在门口无助哭泣的那一刻，她也不可抑制地跟着哭了起来。为她，为丈夫，为这个家。

晚饭时分，张路康也赶回家来吃饭，这是这个家庭近年来难得的一次人员齐整的晚餐。张友进患病之后，不甘心丢弃自己那如日中天的生意，于是让儿子张路康接了班。这一年，张路康刚满20岁。此前他只是一个玩心十足、乳臭未干的男孩，父亲的重担就这样毫无准备地压向了他。他要替父征战生意场，周旋在年龄比他大一句、经验老到的中年男人之间，他被欺负，被讥笑，像块橡皮泥一样被随意捏来捏去；回到家后，望着父亲苍白的脸庞，他却什么抱怨的话也不能说，而且还要

逼迫自己一点点地做好“父亲随时会离开这个世界”的心理建设。

吃过晚饭后，张友进早早躺下睡过去。张雪莉躲在卧室里，打开电脑开始拼命在网上搜寻关于父亲病症的一切相关信息，那些“坚持N年抗癌”的励志帖子给了她一丝希望，而那些花费昂贵却“人财两空”的消息则让她坠入深渊。夜已深，电脑屏幕散发出来的蓝光反射到张雪莉的脸上，眼镜片后面的泪水早已泛滥决堤。

张路康蹑手蹑脚地进来，张雪莉根本无暇擦拭脸上的泪痕。张路康扫了一眼电脑，身子和头重重地陷入床边一角，摇摇头，对姐姐说：“没用的。”张路康在刚开始得知父亲得病那段日子，也做出了跟张雪莉同样的反应，拼命上网查信息，寻找着可以战胜病魔的奇迹。然而这种虚无缥缈的自我安慰很快被父亲体内扩散的癌细胞给吞噬了。

夜里，张友进每隔一阵就会来一次剧烈的咳嗽，好像要把五脏六腑都要咳出来一样。咳嗽声划破这个家里的宁静，每咳一声，杨爱兰的心就被狠狠地揪一下。整夜整夜的失眠卷土重来，杨爱兰经常枕着被泪水浸湿的枕头等待天亮。人生已过半百，坎坷磨难却越来越多，这样的日子啥时候是个头？没有了丈夫的生活可怎么办？

自从张友进生病之后，杨爱兰不得不把工作辞了，在家照顾丈夫。化疗之后，张友进的身体极其虚弱，需要补给营养；

与此同时，医生建议中西医结合，杨爱兰又遵医嘱，从济南的省立医院背回来几麻袋中药，每日熬药给张友进服用。

其实杨爱兰心里很清楚，花费不菲的治疗费用和药物费用到最后可能都是“打了水漂”，可是花钱不一定治得好，不花钱肯定没得治。钱没了最多从头再来，但是人没了就一切希望都没了。杨爱兰隔三岔五就看看家里的存折，本打算留着给儿子买房娶媳妇的十多万元钱，慢慢变成了医院里开出来的一张张住院医药费用发票。

张友进躺在病床上，他的身体像风中之烛般轻盈飘忽。亲戚们都赶过来了，散落在病床四周。大家没有任何表情，整个病房里除了罩着氧气罩的张友进一张一合艰难而又沉重的呼吸声，一片静穆。

张友进是前夜被救护车送进医院来的。几个月以前，张友进的癌细胞再次扩散，已经不能正常呼吸。医生给配了家庭式吸氧器，感到胸闷时在家插上氧气管可以暂时缓解。一开始张友进还只是偶尔吸一下氧气，后来越来越频繁，杨爱兰几乎每天都要跑到医院换新的氧气瓶。最后张友进祈求般地不肯摘吸氧器——对他来说，这是生存的最后一道防线。

那天晚上，张友进仍旧带着吸氧器艰难地躺下，氧气瓶里咕噜咕噜冒着泡。自从患病以来，夜晚对于张友进和杨爱兰来说，更像是一种煎熬，入睡是一种奢侈。后半夜，张友进戳了戳杨爱兰，气喘吁吁地说：“要不咱上医院吧！我感觉快不行了。”杨爱兰明明知道这一天早晚会到来，可是当真正到来的

这一刻，她还是接受不了。眼泪再次奔泻而出，这辈子的痛苦她受够了，这一生的眼泪她流尽了。

救护车风驰电掣般地把张友进拉到医院，安排好住院手续，医生做了相关检查，然后把杨爱兰叫到一旁，压低声音说：“随时做好准备吧！”此刻，杨爱兰好像全然接受了这一现实，没有了以往的哭哭啼啼，开始打电话挨个通知亲戚们。

张雪莉接到母亲电话时，正在北京出差。自从得知父亲患病后，她就放弃了回上海找工作的打算，她原本想着就留在家里陪父亲走完这最后一段路，然而现实并不容许。父母已经都没有了工作，看病的钱只能吃老本。弟弟在张罗着父亲的生意，她必须要解决生计问题，为她自己，也为这个家。于是，她在离家不远的省城济南找了一份行政类工作，平时上班，周末回家看父亲。

过去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但凡是家里来电话，张雪莉总会条件反射般地心一沉。坏消息来得太多太快，她已经没有权利“乐观”。张雪莉挂了母亲电话，便赶忙收拾东西往家里赶。从北京回家有四个小时的车程，在高铁上张雪莉几乎是坐立难安，守着手机一分一秒度过。她害怕不能见父亲最后一面。

进了病房，看到父亲的身体像缩了水的鱼干一样，只剩下皮包骨头。张雪莉一下子跪在病床前，摸着父亲枯树枝一般冰冷而又粗糙的手。她开始不顾一切地哭喊：“爸爸，爸爸，爸爸……”张友进早已神志不清，连眼皮都抬不起来。

张雪莉情绪稳定下来之后，病房里再次恢复了以往的平静。病房在19楼，张雪莉站在窗户前往下望，医院大门口人来人往，再看看床上插满各种管子的父亲，她生出一种“人如蝼蚁命如草芥”的幻灭感。

过了几个小时，突然间，张友进睁大了眼睛，挣扎着想要起来，维持了不到一分钟后，身体发直，硬生生地跌落在床上。一旁的心脏监护仪显示屏上，原本上下闪烁的绿线逐渐变成了一条直线。散落四周的亲戚们一下子全部围了上来，医生跑来，拿手电筒照了照瞳孔，然后带着一种遗憾的表情，朝杨爱兰说了句：“走了。”

在医院料理后事的时候，杨爱兰始终没有再流一滴眼泪，她反而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无所畏惧。回到家后，她走进卧室，床上还放着张友进临去医院前换下来的秋衣秋裤，床头上还留着一瓶没有吃完的药片和架在一旁的吸氧器，她一下子瘫倒在地上，“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在医院里积攒的情绪一下子全部释放。张路康和张雪莉赶忙扶住母亲，可是悲伤已经成河，母子三人就坐在地上抱在一起，犹如狂风暴雨中三棵瘦弱的树苗。

在张友进走后的第三年，55岁的杨爱兰正式退休。退休手续的办理似乎也成了她告别过去生活的一种仪式，她从此不再过那种忧心、惊惧的生活，她终于可以像一个正常人一样，拿着养老金，心无旁骛地享受自己的退休生活。她开始大声地笑，大口地吃，努力把没有享过的福都享受一遍。她除了每日照顾好儿子的一日三餐、饮食起居外，开始到处张罗给儿子找

对象。张路康继续忙活父亲留下来的生意，当他的同学刚刚从象牙塔里走出，一脸懵懂地踏上社会时，24岁的他已然像父亲一样成熟老练、精于世故。

张友进离世不久，张雪莉忍受不了那份工作的平庸与琐碎，提交了离职申请，重新回到上海。当张雪莉再次站在上海街头时，看着这座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她感觉一切都是从前的模样，可是她已经不是当年的自己。失去了应届毕业生的优势，加之第一份工作的乏善可陈，让她在上海全无竞争力，一切只能从零开始。

她白天上班，晚上学习——经历过父母的下岗岁月，她的骨子里也时刻发出“危机感”的信号。有一天晚上，她读到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里面讲述国企改革带来的大量工人下岗，引发她无限唏嘘。国家的一个政策让父母经历了十多年的荒芜岁月，他们被生活嘲弄，被苦难打磨，在社会底层滚打历练，然后在无可奈何中老去。

父亲走后，她总是担心母亲。她养成了每天给家里打电话的习惯，她听到母亲说身体有一点不舒服的时候总会很紧张，劝她去医院做个检查。杨爱兰反过来安慰女儿说：“放心好了，我会很长寿的，你爸爸没活过的岁数都算在了我头上，老天爷都数着呢！”

张雪莉时常像回放电影一般回放母亲过往的人生。在她的回忆里，母亲经历过单纯的童年，跟兄弟姐妹相亲相爱，也经历过如花似玉的青春韶光，享受过甜蜜的爱情，最终嫁给了父

亲，在漫长的婚姻岁月中，母亲享受过新婚的甜蜜，也品尝过一心相夫教子的生活，谁也预料不到，在进入中年之后有这样长达十年的提心吊胆、以泪洗面、贫困无助的生活。在刚刚走出阴霾，母亲以为会迎来平静安稳的生活时，生活再次给了她一次重击，相守走过低谷的丈夫早早离她而去。张雪莉有时会问母亲，这十多年的时间里，你有过怨恨吗？杨爱兰说：“当然怨过恨过，但是都起不了啥作用。这一切终归是命，只能说自己的命不好。”

父母的这段经历让张雪莉心里一直怀揣着一个问题：为什么父母会遭受这样一段困苦的生活？当年国家的政策到底对不对？如果当年没有国企改制，没有下岗分流，父母的人生又会是怎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张雪莉不停翻阅写那些年关于改革的文章、书籍，她企图给自己找到一个答案，也企图给父母那段岁月找到一种解释——毕竟那是父母用自己最宝贵、最黄金的生命时光来演绎的一段时代故事。

从1992年开始，因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政府开始进行国企产权改制运动，随之带来数千万的工人失业。到1998年前后，全国失业人数已经达到1500万。在张雪莉看来，让多余的工人下岗更多时候是政府被逼无奈的选择，无数像父母这样的人成了改革的“牺牲品”。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失业者的社会保障配套措施却没有相应建立，国营体系的瓦解让很多下岗工人沦为城市的贫民阶层。

张雪莉有一次看到《吴敬琏传》里，提到吴敬琏曾经提议从国有资产中拿出两万亿元来补偿那些失业人群的社会保险账

户，然而却因有人以“国有资产的流失”加以反对，最终方案宣告流产。吴敬琏后来评论说：“中国的改革史上，有一些失误是无知造成的，而有一些是因为以权谋私的贪欲造成的，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当张雪莉看到这句话时怅然若失，个人的命运就这样在时代的大潮中不堪一击。

生命就是一场迎来送往：2015年至今

一年多以前，张雪莉在上海谈了个南方的男朋友，很快结婚；紧接着，张路康也结婚了，张路康的儿子也很快出世。这些新的人新的角色陆续进入杨爱兰的生活中，她努力适应着丈母娘、婆婆、奶奶的角色。她也曾在某些时候想起张友进，一阵恍惚之后，她就明白她跟他这一世的缘分已经结束了。

生命就是一场迎来送往，她送走了自己的丈夫，迎来了自己的女婿、儿媳、孙子，以后还会迎来外孙。

元旦刚刚过，杨爱兰就开始盼望着春节。因为女儿张雪莉答应她，今年带着南方老公回山东过年，这将是一双儿女分别成家后第一次在一起过年。

除夕那天早上，张路康一大早就开车去火车站接姐姐和姐夫。杨爱兰也早早把厨房占领，蒜薹炒肉丝、酸辣土豆丝、凉拌菠菜、猪皮冻、熏鱼、排骨炖山药、土豆鸡块……这是她今天的任务——给一家人准备一桌可口的年夜饭。

北方的年夜饭里面少不了水饺，更何况自己的这个南方女婿一早就在电话里说，喜欢吃山东的大馅水饺。杨爱兰准备好

年夜饭后，又开始乒乒乓乓准备包水饺的馅料。儿子和女婿喜欢吃韭菜猪肉馅的，女儿喜欢吃胡萝卜鸡蛋木耳馅的，一晌午的工夫杨爱兰就把这些馅料全部准备妥当。

张路康和姐姐姐夫到家开门的声音，惊醒了正在熟睡的宝宝，一时之间这个家热闹起来。

杨爱兰干脆把包水饺的“排场”摆在客厅茶几上，张雪莉看到后洗了个手就加入包水饺的行列；张雪莉的老公更是一脸好奇，也跟着洗了洗手，开始给丈母娘打下手。

和面、擀面皮、包水饺……手脚利索的杨爱兰本来一个人就可以搞定，结果这两个“帮倒忙的”插进来，搞得她效率大大降低。

水饺下锅后，她更是哭笑不得，水饺有的被馅撑破了皮，有的则皮多馅少……年夜饭桌上，她把一盘盘饺子端了上来，不忘发牢骚：“还不如不让你们包呢！”

张雪莉一边吃着滚烫的饺子，一边打趣：“有其母必有其女啊！妈，我这都是当年跟你学的啊！”

酒过三巡的张路康也接过话茬，跟在一旁的姐夫解释说：“当年妈上街摆摊卖水饺，一开始这么大，再后来变这么大，到最后只有这么大了……”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比画着一个越变越小的圆圈。说完，几个人都已经笑作一团。

杨爱兰一怔，这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啊，孩子们还记得。

对于她而言，以前那些日子仿佛隔了一个世纪那么遥远，她已经很少再去想了。

她一边往嘴里填个饺子，一边跟着他们一起笑了起来。

（注：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本文所有人物均为化名。）

当美国老年人在写作，中国老年人在做什么？

张眯眯

“我们这个年纪不害病就可以了！”

我出国前，妈妈生了一场病。我每天陪着她去医院打点滴，天擦黑时再扶着她回家。

有时，快走到家门口，就看见一个中年女人，手里端一锅乳白色的鱼汤，等在路边。不端鱼汤的时候，就拎一箱特仑苏牛奶，或是大包的中老年补品。

“我不要这些，你回去吧。”我妈看着我在，冷冷地回应。

“老师，我听说您生病了，特地来看您！”那女人哈着腰，捏着声音说。（免费书享分更多搜索@雅书.）

女人是我家附近卖保健品的，专卖各种成分不明的神丹妙药。有的药传说跟着“神五”上了太空，在天上转了三圈，回到地上就可以治三高，还可以让血脂血糖血压分分钟回到正常线；有的是从外省来的四世神医，开一个健康座谈会，再把祖传秘方药丸以“感恩价”批发给在座的老人。

我妈退休后，经朋友介绍，去过几次“座谈会”。从此，鱼汤和补品就总在她生病的时候出现在我家门口。

“你不要跟那些骗子来往了！”每次看到端鱼汤的女人，我就知道，妈妈最近一定又去“开会”了。

“哎呀，我又不买啥子。我退休了没事干，去开个会，见几个朋友总可以撒。”

“你看看书，或者学点啥新东西嘛！”

“我这个年纪，还学啥子哦？你李阿姨都说了，我们现在不害病就可以了！保住身体健康最重要！”

妈妈已年过六十。我出国后，一直很担心妈妈的健康，也担心那些以“健康”之名欺骗老人的店家再次登门。

2017年底，我随先生搬到美国。

刚来的第一个月，我就报名参加了这个国度发源的创意写作课班。大牌名校的课程太昂贵，幸好所租公寓附近的社区大学有几个继续教育写作班。毕业后，想继续充电的上班族，都可以趁着周末或晚上选修。想想自己刚过三十的年纪，业余上上继续教育课，说不定能认识一些志同道合的同龄人。

我报了两个写作班：创意虚构写作和非虚构纪实写作。

非虚构纪实写作课的教室里，桌子都围成一圈，仿佛亚瑟王的圆桌会议。老师也坐在圆桌边上，一个微胖的金发女人，

大概六十上下的年纪。一双碧蓝色的眼睛周围布满了皱纹，一见到我走进教室，立马站起来向我伸出手。

“嗨，眯眯！我是爱丽丝。”她很用力地握着我的手，蓝色的眼珠炯炯有神。

要不是爱丽丝这个迎客式的握手，我完全看不出她是老师。教室里，和她坐成一圈的，几乎都是与她年龄相仿的老人。一个身材娇小、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打开贴满彩色标签的文件夹，有条不紊地归置一大叠印刷稿；一个大肚子老伯面前立了一个iPad，俨然一副圣诞老人穿T恤牛仔裤的模样；一个褐色头发的大婶看起来年轻一点，披着羊毛披肩，戴一串珍珠项链，一直和她身边的一个胖大婶聊天。

“你看起来不像五十有余嘛！”胖大婶见到我，笑着说。

“亚洲人看起来比较年轻而已。”我早已学会了这种自嘲的美式幽默。

“我注册的时候看到这好像是个老年班啊？”胖大婶又笑着问爱丽丝。

“是，这是我们社区的老年写作项目。不过既然眯眯可以加入进来，我们就不再是老年班了。”爱丽丝笑道。两个大婶都笑了，圣诞老人也嚯嚯嚯地笑着。

环顾四周，在座的所有人几乎都是我年龄的两倍以上。想哭只觉不合适，只能陪着他们一起笑。

坐我旁边的老太太眼睛生得奇大，动作却很慢，有点像《冰河世纪》里的树懒奶奶。她慢慢地从包里拿出一块裹着保鲜膜的面包，放在手心一点一点地拨开，拨出一小块花生黄油三明治，一口啃下去。

“不好意思，我刚从陶艺课上过来，没有时间吃饭。”她向我解释。

“哇，你还学陶艺？”我不敢相信一个看起来比我妈妈年纪还大的老太太，除了写作还做陶艺。

“我还上水彩课呢！”她对我笑着，拿出一个保温杯，边吃边喝。那保温杯有个小盖子，她慢慢地把水倒进盖子，当作杯子。这倒很像我妈妈。

爱丽丝的非虚构纪实写作课其实是一个写作工坊（workshop）。每人每次带一篇非虚构作文，轮流念给同学听，然后从老师到同学逐一给出评论和建议。

“树懒奶奶”慢悠悠从包里取出两张纸，正准备念，突然想起什么，道歉说：“等等，我要戴上老花镜。”

白发老太太嘿嘿笑着：“别着急，眼镜很重要。上次我忘了戴眼镜，完全是瞎念。”

“树懒奶奶”念的是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上，她和男朋友白天狂欢，晚上挤在一张老旧的吱呀作响的旅馆床上，仍其乐无比的青春往事。

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是美国一次里程碑式的摇滚狂欢。1969年8月的卡兹奇山上，汇聚了40万摇滚青年，一边跟着音乐尖叫，一边手里挥舞着象征反抗的毛泽东画像。1969年，我妈妈正面临即将离家下乡的人生转折。

白发老太太念的是小时候和家人一起从东德逃往欧洲的故事。一对薄薄的嘴唇吐出铿锵的德国口音，念完后薄唇一闭，咬得死死的。在座的美国老人听后都唏嘘不已，戴珍珠项链的大婶两只眼睛噙着泪水。东德老太太对同学的每一声赞叹都微微一笑，铿锵地道一声谢。她与那些快乐的美国人不同，她像我妈妈，在饥饿与苦难中成长起来的女人。她们的表情，她们的嘴唇是一样的。

轮到我了。我打开手机，把前两天敲到印象笔记上的美国见闻翻出来。

“哦，孩子！你的东西全在手机上呢！”胖大婶笑道。全班都笑开了。

“树懒奶奶”道：“亲爱的，你大声点念，我耳朵不太好。”

和“老恶霸”一起提高英语写作

“树懒奶奶”叫琳达，每次上课前她都要打开手机相册，给我看她画的水彩、做的陶艺。

“眯眯，你是不是还修了周二晚上的小说课？”她下课后问我。

“你怎么知道？”

“我丈夫也在上周二的小说课。他叫汤姆，你记不记得？”

在我的创意虚构写作课上，确实有一个汤姆。他个子高高的，头已经秃光了，说话总是一副无所不知的样子。

从此，汤姆每周三做陶罐，每周五写小说。家里做的瓶瓶罐罐都堆不下，他女儿又大叫：“爸爸！不要再做了，没地儿放了！”于是，他就去租了一个艺术厅，把家里的罐子都搬上架做起了陶艺展。

创意虚构写作课上年纪最大的是安竹，但是他喜欢我们叫他上校。他是从越战回来的退伍军人，做上校做了一辈子。他总是半瘫着坐在最宽大的一张课桌边，肚子上的肉软塌塌地坠在腰上，头发皮肤都白得褪色了似的，说话极慢，舌头仿佛拉不直，咕噜咕噜地从喉咙里慢慢吐出几个字。越战老兵如今顶多七十来岁的样子，而他的样子看起来差不多有一百岁。每晚下课，老师同学们都各自开车离开，他也胳膊下夹着稿纸，驼着背慢慢地走进停车场，打开一辆福特卡车（得州非常流行的家用卡车）门，呼的一声关上，呜嘟嘟嘟一转眼就飞驰不见了。

创意虚构写作课的老师也是一个典型的得州老头，年轻时在纽约闯荡也是穿牛仔靴，拴大皮带，唯恐别人不知道他是从南方来的硬汉子。说起纽约，我想起那儿的地铁以老旧脏乱闻名。他却说：“没有啊！纽约地铁很新啊！”然后戏谑地挤一挤老牛仔的眉头道：“我在的时候纽约地铁还很新，等到它跟我差不多老的时候，我就回老家了，哈哈！”老师也不喜欢我们叫他本名，每次都在批改作业后署名“Cap’n”（船长）。

这门课上，许多学员都早已跟着船长航行了几个学期了。每个学期结束，他们又都重新回到船长的大帆下，仿佛上瘾似的，每天写，每天在创作的大海里起伏跌宕。

船长鼓励我们新进的学员：“上校刚来时，写他的战时回忆也很困难。对很多事情都扭扭捏捏，不好下笔。我说，你不如把那些事情都半真半假地写下来，或许要轻松一点。上校说，那不行！那是对我战友的不敬！”船长拿起上校桌上的一本300多页的书，手里晃着，“你们看，他后来放松去写，已经出版了这本半自传小说了。”

我不敢相信，那个软塌塌的老人，正望着自己的书，嘿嘿地笑着，全是一副小男孩恶作剧成功的顽皮表情。

上校给自己的书做宣传很有一套。每周学员互相发送作业的时候，他都会在邮件里加入他的书在亚马逊的页面链接。他还咕噜咕噜地建议汤姆：“你也应该把你的邮件签名设成你的陶艺展链接。”老上校抿嘴笑着：“你不要告诉我你是数码盲！”

汤姆不服道：“我不是数码盲！谢谢你的建议，我回去就把链接弄上。”

汤姆年轻的时候，拖家带口，还是坚持读完了双博士，把两个女儿供养大，上名校。退休后在继续教育学院连修了四门课。我们都笑他是“职业学生”。

“眯眯，我觉得你应该先去修一门语法课。”汤姆看了我的作业后建议，“你的时态、介词错误太多了！”

“我懂语法！”在中国，我可是专门给学生纠正语法错误的英语老师。

“哦，你既然懂语法，还出那么多错，也太不仔细了！”汤姆博士说话从不留情面，每次老师同学都鼓励我这个外国学生的时候，唯有他千方百计地挑刺。他说他以前教女儿开车也是教了两次就放弃了，没有耐心。

我没他这样的爸，也是万幸！

老上校和韦恩（退休极客）是船长的老船员，他们俩常常嘴里絮絮叨叨地说着我听不懂的“黑话”，说完后，韦恩转头问我：“眯眯，你一定不知道我们说的是什么。”看我一脸茫然，几个老头便哈哈大笑，像是小学里欺负女生得逞的男孩子。

我面上微笑，却默默咬着牙。你们等着！我要写得比你们更好！你们这些老恶霸，给我等着！

“爸，妈，你们没有自己的朋友吗？”

微信上，中老年朋友圈里总爱分享号称“感动中国”或“不看肠子悔青”的文章。打开来看，多半有色彩鲜艳，闪闪发光的莲花，或菩萨像，或祝酒的民歌手。内容常常是短小简单、难以考证的故事。大概是某老太、某老头辛苦一生抚养两三个子女，长大成人后都统统弃老人于不顾。弥留之际，老人在病榻上终于恍然大悟：子女不孝，人生悲苦，早知就应该对自己好一点。不到百字，匆匆对人生、家庭做了大包大揽的至理总结。

这样的故事，在假药店的“座谈会”上也是最常见的。不知从何方来的挂牌专家，讲一两个“儿孙都是白眼狼”的故事，个个说到在座老人的心坎上，立即全场鼓掌，泪流满面，掏钱买药。

“老人其实需要心理寄托。”我妈也帮我总结“假药”现象，“李婆婆你晓得撒，她女儿平时很少去看她，每次去都要吵架。她就去药店，一去人家就给她端茶倒水，嘘寒问暖。李婆婆说，他们就是我的家人！没有他们我早都死了！”

李婆婆在药店买了一个老年机，店员说是华为的，但是印商标的地方压根儿没有“HUAWEI”标识，只有一串看不清的火星文。电话打了两次就用不了了。

汤姆的陶艺展，也有琳达的份儿。她手机相册里那些陶瓷，还有颇具印象主义画风的水彩画都上了架。她请我去他们的陶艺展捧捧场。

每次非虚构纪实写作课，琳达都坐我旁边，用一双慈母的眼睛看着我，无论我写什么她都喜欢。她一邀请，我立马就答应了。

陶艺展在闹市区商场的三楼。在一楼大厅一抬头，就能看见一只实物大小的黛色陶马，马身上镶满了各色的锆石和玻璃珠子。马身下立着一块牌子：天马艺术。

展厅里摆着琳达手机上的后现代陶艺品：身上长满花纹的猪，吐出长舌头的嘴被晾衣架牢牢地夹住了嘴角……五十年前在摇滚音乐节胡闹狂欢的少女灵魂，全被捏进了架上的陶像。

汤姆在工作台边和两个朋友聊天，都是和他年龄相仿的老头。琳达远远地见到我就迎上来把我抱住，一边脸亲了一下。汤姆也两三句与老朋友道别握手，过来陪我。

老两口带着我把80多平方米的展厅上下看了一遍——那其实是商场里独立租赁出去的一个小商铺。汤姆全城看了许多地方，终于挑定这个店铺，装饰成了他们的陶艺展馆。

“我们开始把陶艺展开在南边，但是那儿的商店都搬走了，开展宣传都没什么资源。”汤姆跟我谈他的开展经验，态度变得温和了许多，看得出其中也经历了许多艰辛。

“这些我以前也不懂。搞这个展览，学了很多东西，哈哈！”汤姆摸着自已的光头笑道。

“你们的退休生活真丰富啊！”我突然特别羡慕他和琳达。

“是啊！我们两个女儿，一个在外地，一个就住在这里。那个住得远的还好，住得近的女儿老说，爸、妈，你们怎么老来烦我啊？你们就没有自己的朋友吗？”琳达一边说一边笑，“所以，我们就开始上课，学陶艺，学画画。”

“其实，学这些新东西很有意思。”汤姆补充道，“琳达以前是绝对想不到写作的。她上学的时候，启蒙老师说她写得太烂，她就再不敢提笔。幸亏爱丽丝一直鼓励她把我们的经历讲给女儿听，琳达才发现，原来她也可以写得很好！”

我拿出手机，四处拍照：“可以吗？我想给我的父母看看，不一样的退休生活。”

“当然可以了！”汤姆大笑道，“我父亲那一代，退休后就坐在躺椅里打盹。不工作就自我放弃，没过多久我父亲就坐在躺椅里去世了。我们不想这样，我们还年轻，哈哈！”

我离开展厅前，汤姆叫住我：“这个学期学完，你还要继续修船长的课吗？”

我有些踌躇：“到时候再看吧。”

汤姆到底是聪明人，一眼看穿我的心思：“你不要生上校和韦恩的气。他们拿你开玩笑，也是把你当女儿逗着玩。他们人不坏。”

“嗯。”我只好答应着。

“我建议你去买一本语法书仔细看看，或许有帮助。”

我心里恨得慌，也只是道谢离开。

回程的路上，我买了一本小威廉·斯特伦克（William Strunk Jr.）和E. B. 怀特（Elwyn Brooks White）的《英文写作指南》（*The Elements of Style*）。

回家后，对着近几周写的作业看，果真动词时态和介词是错得最多的。

“孤老太婆”的生活

一年前，刘阿姨的老伴去世了，急性病发作，走得很突然。刘阿姨是我妈妈从小的朋友，妈妈知道这个消息后，连夜赶去安慰。回来后，对我哀叹：“到了这个年纪，这种事越来越多。好朋友、朋友的老伴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走了。”

前两天，妈妈告诉我，她和刘阿姨几个老朋友又聚会了。

刘阿姨说，她去银行取钱的时候，看见前面一个老太太，自己一个人颤颤巍巍地从皮包里取出一张银行卡，放进取款机里，然后哆哆嗦嗦地按下密码。密码不对，她又哆哆嗦嗦地按

了一遍。还是不对。老太太不敢再按了，她一个人站在那里想了好久，想不起来。只能颤颤巍巍地把银行卡取出来，慢慢地走了。

“孤老太婆一个，取钱都取不出来。”刘阿姨对我妈说，“以后我们就是这样。”

妮娜是我非虚构纪实写作班上的同学。西方人不方便问年龄，但从她的样子来看，至少六十有余了。她仍然每次都会擦桃红色的口红，两颊抹上桃粉的胭脂，戴一顶雪白的绒毛帽来上课。

第一次上课自我介绍，妮娜两片桃色薄唇紧张地上下哆嗦：“大家好，我是妮娜。我的先生……我的先生查尔斯……他留了一本回忆录。”她的十片手指甲都均匀地涂成了粉红色，哆哆嗦嗦地把面前的文件夹打开：“他去年，去世了……他写了一本，关于我们的回忆录……但是没有写完……我要帮他完成。”

我坐在她的对面，脑子里浮现出好莱坞电影里携手白头的爱情镜头。而眼前这个粉红色老妇人羞涩的自我介绍倒比《本杰明·巴顿奇事》中，满脸皱纹的本杰明缩成一团，在黛西怀中死去的场景更能触动人。

听她念完第一篇作业，我才知道，她的先生查尔斯去年离世的时候92岁，妮娜比查尔斯小18岁。她今年已经75岁了。

美国电影里，女主角总是日日夜夜地等待男主角求婚。诚心为难的编剧又往往要把好戏留到最后，历尽千险万难之后，男主角终于买好戒指，点好蜡烛，问恋人要不要做自己的妻子。这时，虔心的观众难免会和女主角一起喜极而泣，擦湿一堆卫生纸。

非虚构纪实写作课上，听妮娜念她和查尔斯的故事，每次洋洋洒洒四五页的热恋，已经听了两个多月，查尔斯仍然没有求婚的意思。

今天下午，妮娜只拿了两页纸，她说，今天就这么多：

我走在查尔斯身边，突然转身问他：“你打算什么时候向我求婚？”

我看着他的眼睛：“我会做饭，会洗衣服，会把一个家打理得很好……”

妮娜停了下来，两只手又开始颤抖，新打印出来的稿纸抖得哗哗作响。我连忙从包里取出一袋卫生纸递过去。她的手哆嗦着打不开纸袋，我又帮她撕开封口，拿出一张给她。纸送到妮娜手上已经被捏成了一团，她就把那团白纸送到一对厚重的老花镜下面，擦了左边，擦右边。

“我说，‘我曾经……我曾经……亲吻过几只青蛙……现在……才遇到我真正的王子……’”

整个教室陷入沉默。我们都望着她，望着那个主动向恋人求婚的少女，如今已白发苍苍，坐在教室的一角泣不成声。

“妮娜，你休息一下，深呼吸，喝点水。”老师终于开口。

“好，我今天就读这么多。”妮娜低头把手上的稿纸放回文件夹。

“妮娜，”邻桌大婶温柔地说，“你很幸运，你们相伴走到了最后。我是做临终护理的，我见过好多好多临终老人，多半都是孤身一人。我也听过好多好多失败的婚姻，还有背叛和吵架。你陪着查尔斯走到最后，是有福之人。”

妮娜连忙抬起头：“真的吗？我真的是有福之人？”

爱丽丝噗的一声笑出来：“当然了，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遇到过像查尔斯那么好的男人。”

妮娜又望向我们。

“是的，你们的爱情是受上帝祝福的。”希德说。

“是的。”

“是的。”

妮娜的桃红色薄唇又咧开了，托出一个活生生的意大利微笑。一颗泪珠挂在她嘴边的褶皱上，还没有干。

非虚构纪实写作课下课后，妮娜追出教室在我身后急急地喊：“咪咪！咪咪！你等等！”

我转过身，见她挥着桃红色指甲，健步如飞地追了上来：

“你这次写中国，让我发现你有这么深的灵魂！你的故事一下就抓住了我的心！”她说起话来手舞足蹈，一个典型的意大利后裔。“在课堂上我不想占用大家的时间，可是我一定要让你知道。你是一个直接用心说话的人，你有这种天赋！上帝给了你这个特殊的礼物，给了你一颗会说话的心。”

我受宠若惊：“我其实很担心我的英语写不好，有中国腔。”

她又扬起眉毛感叹：“中国腔？怎么会！你的语言是从心里说出来的。那么自然，那么舒服，就像大理石一样平滑。”她连忙指向一辆白色的宝马车：“你看，就像那辆车，光洁平滑，在阳光下反射出光芒。”

她又伸出她的左手，上面明晃晃地戴着两个大戒指：“你看，这是查尔斯的戒指。他去世的时候，我在医院里亲手把他的戒指摘下来。我说，亲爱的，我从此以后，要戴着你的戒指，我们永远在一起。可是他的手好大，戒指戴在我的手指上晃来晃去，就跟个呼啦圈似的。护士说，太太，你这样不行，我给你拿个绳子系上，别丢了。我正要给她，突然发现戒指一下缩水了！不大不小刚刚套在了我的无名指上！就这样，你看！是不是很神奇？”

“天哪，你的故事太感人了！”

“是的，咪咪。我跟你说这个，就是为了告诉你，你的故事也很感人。我写查尔斯是从心里写出来的，你写中国也是从心里写出来的。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

“谢谢你，妮娜！”和我说话的这个女人分明比我妈妈的年纪更长，我总觉得不在她的名字后面加一个“阿姨”就有点怪怪的。而美国人从没有这么叫的，哪怕是父母的亲兄妹，也很少叫姑姑舅舅，都是直呼其名，仿佛少年伙伴似的。仿佛美国人的眼睛看不到年龄，就跟色盲看不见颜色似的。

“谢谢你，妮娜！”看着她仍然温柔地望着我，我又直呼了一次她的名字，假装也是个年龄的“色盲”。

她说：“我就是专门来告诉你这个的，你一定要记住！我的车在那边，拜拜。”然后急匆匆地跑开了。从背影看，完全看不出是一个七十有余的人。

后来妮娜告诉我，她在敬老院教跳舞。伦巴、恰恰、莎莎舞，她全会跳。两周要教二十几节课，后来连年轻人也来学。那些年轻的小姑娘都说：“妮娜，我真希望我以后也跟你一样！”

周末我给妮娜打了一个电话，她不在家。只有自动应答机的声音：

“你好！我们是妮娜和查尔斯，我们现在不在家。请在‘哔’的一声后留言，拜拜！”

是妮娜的声音，末尾嘻嘻一笑，活泼欣喜如少女。

“哔”声后，我半天说不出话。妮娜说得对，她和查尔斯永远在一起。

写作与健康

非虚构纪实写作课上，戴珍珠项链的莎拉大婶和那个爱笑的胖大婶，来了几次就没再出现了。老师向我们解释：

“莎拉说，她要做乳腺癌治疗，时间和我们的课冲突，她就不来了。坐她旁边那个女士是她的好朋友。莎拉因病情不能开车，她就开车送莎拉过来，顺便也选修了我们的课。现在她应该正在照顾莎拉。”

圆桌周围都沉默了。

爱丽丝叹了一口气继续说：“我们这个年纪确实无法避免这种事情。以前坐在靠窗口的那个太太也不能来了。她丈夫最近卧床，她要留在家里照顾他。”爱丽丝转头对我说：“眯眯，你是例外，给你说这些还太早。”

“哎，不说了，上课！”爱丽丝的蓝眼珠又立即焕出光芒。

我想起了船长的班上也有一个老太太。每次我快迟到，就会看见小小的她，左一大包，右一大包，急匆匆地赶进教学大楼。

“不好意思，我刚从医院过来。”她说话还喘着气，“我丈夫身体不好。”

她写的题目是家人在“二战”时期的故事。因为偶然的机遇，她发现了一箱祖母与参军儿子往来的信件。老太太想在船长的课上学习，用专业的叙事手法，把这些信件串联起来，写成一本书。

上战场前，年轻的士兵一封又一封地给家里写信：

亲爱的妈妈：

这封信以后，我可能就会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给您写信了。我最放心不下的还是您在家里的情况。您一定要知道，您从小给我的教育，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它会帮助我以最尊贵的姿态，克服以后的困难……

她所引述的家书无一不令人动容。而更令我触动的是，学期末，她写了一段学习写作的心得，发给老师和同学：

完成这本书的过程，让我重新理解战争，理解“家”。

……

我还觉得，自己一定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有这些宝贵的信件以及时间来整理那一段历史。这一定是命中注定，我相信这是我的使命。

.....

我一直说，是那些老兵的英灵站在我的身边，陪我完成这本书。也正是他们在我丈夫和弟弟患病的时候，在我手足无措的时候，给我力量。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恰恰因为我丈夫患病，让我放下许多事情，我才有这些时间和心思去写作。

时而有人说，你真不容易，完全没有被家人的重病打倒。我只是说，“我现在其实很好！”

今年5月，我得知自己怀孕了。然后是没完没了的恶心，坐着立着都不舒服。为了交作业，我还是每日定时坐到窗前，逐字逐句地写。写到黄昏，夕阳渐渐扫到墙角里，天色暗下来，一天的章节就差不多写完了。

抬起头，伸展一下腿脚。突然发现，不恶心了。一坐几个小时，竟没有作呕一次。整个人全心全意地想着手上写的故事，完全忘记了怀孕这回事。

我把这件事说给船长听，他倒一点也不惊奇：“没错呀！写作是非常有益身体健康的。现代医学已经证明了，写作可以稳定血压，调整心率，还有很多难以解释的治疗效果。”

原来，老船长除了每周在社区大学教三次写作课，还义务在癌症康复中心教写作。“那是一个南方卫理公会大学（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所做的心理治疗项目。他们发现，病人学习写作、画画有利于治疗恶性肿瘤。很多被判死刑的病人都在渐渐好转。”老船长说。

船长有时教他们描述病痛的细微感受。他们就开始写，有的只是在纸上画。而写着画着，他们的痛苦就渐渐减少了。病痛仍然会有，却不再是难以承受之痛。

上一次，船长请他们描述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刻，许多人写了自己的婚礼，第一个孩子出生，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笑容。这一次，写的是人生最痛苦的时刻，大多数人写的是亲人的离世，很多人都哭了，写得特别真。哭过后，人又轻松了不少。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爱丽丝的写作课上也有病人。爱写南方民谣的希德患有癫痫，退休医生丹尼在两次车祸后患有严重的脑震荡。他们都是经专科医生介绍到爱丽丝的写作班的，希望通过写作恢复大脑功能，作为一种辅助治疗的手段。

我只是无数次听爱丽丝鼓励他们：

“希德，你写得越来越好！”

“你看，比你刚上课的时候好太多了！”

据说他们已经学了好几年。我不知他们刚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如今看来，他们与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

“完全看不出来是外国人写的！”

上校的半自传体小说写的是一个叫杰杰的年轻侍应，因为会做大锅饭，误打误撞被征入军，又在一次受伤后恋上军营护士的故事。我一周一周把上校的故事读下去，那个软塌塌的老头竟越来越像海明威，写的仿佛是越战版《永别了，武器》。

最打动我的一章写的是，杰杰看守军火库的时候，遇到一个神秘黑影，来回周旋许久才发现，只是一个误闯进军营的越南小女孩想和他玩捉迷藏。

文末有一张照片，在堆放枪炮弹火的仓库前，站着一个五六岁的亚洲女孩。齐整整的蘑菇短发，一双丹凤眼羞涩地望着镜头。那是几乎在国内每个居家小区都能看到的女孩面孔，一个不懂战争，心里只有游戏的孩子。这个故事不是虚构的，而是真真切切发生过的事情。

上课时讲到上校的故事，整个教室都静了下来。

我们看到的是年少时的上校——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少年眼中的军火与儿童，残酷与天真。

60年代，我的父母也正值年少，经历着他们那个年代的历史风雨。年少时的他们见到了什么？曾被什么事情打动？我知道得很少。

有一次上课，一个女生提议，这次每个人都要写自己完全不了解、从来没想过的话题。上校就为此写了一篇对话体短

篇，故事里的退伍“上校”告诉自己的老战友，他决定要变性，然后做一个变性女同性恋。老战友吓得几乎晕厥过去。“上校”说：

“兄弟，你知道我有多爱女人。我的那些女友、前女友，还有那些私生子。所以我要变成女人，然后和女人谈恋爱。这就是我人生最大的理想！”

我笑得把脸埋到了电脑键盘上。这活生生是一个典型直男对变性人与同性恋的胡乱想象。而一个七十来岁的人可以对自己完全不了解的禁忌话题有如此诙谐的想象，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

一次课上，上校把他的手机翻过来，递给我说：“眯眯，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帮我念一下这封电邮。”

那是我这一周写给他的作业互评。我的脸一下就红了。

“眯眯，可以念吗？”上校看着我的眼睛，“我想让老师和同学们都听听你的评论。”

“可以。”我硬着头皮：

“上校，读你的故事之前，我以为军人都是要么冷酷无情，要么活在战争阴影里。看了你写的作品之后，我才知道，军人也可以这么柔软，这么幽默。”

我抬起头，汤姆对我嘿嘿笑着。上校稳稳地坐着，他的笑比平时多了几分老将的威严：

“谢谢你！眯眯，你的评论对我来说很重要。谢谢你！”

最后一次虚构创意写作课，我的作业上竟然一处红杠都没有。我想，怕是老师忘了改，便一半玩笑地试探：“船长，我这次是写得完美无瑕，一点儿错都没有了？”

船长竟立即点头道：“是啊，这次你写得特别好，完全看不出来是外国人写的。”

没想到玩笑竟成了真，我反倒紧张起来：“我还以为我写得不好呢。”

船长笑道：“哪有的话！你看看他们，都是美国人，说英语说了几十年，这次也没你写得好。”

韦恩被船长点到了，也不生气，说：“眯眯，你是个好作家！你写的奇幻故事，我一看就停不下来，我不管是中国人写的还是美国人写的，我就想一直看下去，因为太好看了！你的想象力不是谁都有的。眯眯，你记住一句话，千万不要说你写不好，也不要允许任何人说你写不好。因为——”他用圆珠笔头指了一下自己胸口，“我说你写得好！我说你是个好作家！”

我狠狠地咬着牙，才忍住没当着那一帮“老恶霸”的面悄然泪下。

爱丽丝的最后一节课上，我终于鼓起勇气，向东德老太太倾诉我对她的亲近感：

“你让我想起我的妈妈。你在东德长大，她的童年在‘文革’时期度过。你们脸上有一种很相似的、坚韧的表情。”

爱丽丝马上问，“你妈妈写东西吗？”

“她不写。”

“她应该写！”妮娜立即建议。

“可是我妈妈总说她写不好。”

爱丽丝双手一摊，笑道：“有谁天生就会写的？在座的不都是越写越好了吗？”

“是啊，咪咪，你应该叫你妈妈写！”琳达也说。

“我相信，她一定有很多很精彩的故事。她的经历不简单。”东德太太收敛地笑着。

“好吧，我试试看。今晚就打电话，鼓励她写。”

“太棒了！”老太太们欢腾起来。

[1] 李梓新，三明治创始人，本书主编。——编者注

第五章 建立你自己的语言风格

寻找自己的语言，先从清理开始

关军（非虚构作家）

回看人类文明史（它几乎等同于文字史），我们会发现，语言既是人类思想进步的推动力，在某种程度上也禁锢了人类的想象力。

有文字之前，人类一降生便处于自然之中，靠感官认知世界。而文明史开启之后，人一降生，等于直接降生在了语言和文字的世界里。它为你提供一切既有的经验和知识，你成为被动的接受者，感受力严重下降。

用作家柴春芽的话来说，你不能再随心所欲地命名了，一张碰得你生疼的桌子将不再被你命名为“哎哟”，而是被你的父母灌输给你一个与疼痛和喊叫无关的词语——“桌子”。

写作是一种与文字密切相关的创造性的劳动，我们要依赖文字，又要尽力摆脱它对我们的限定。

思维与语言之间的关系，类似于鸡生蛋、蛋生鸡，甚至比那个还要复杂。我只能用车轱辘话来表述：

如果你放弃独立思考、独立体验，就很难生成自己的语言方式；如果你放弃寻找属于自己的语言，势必妨碍你去体验自

身，发现自我。

无论时代如何趋同，如何裹挟，既然大家选择以写作来表达，我相信，大家还是愿意过一种对自我有所确认、有所彰显的生活。那么，寻找自己的想法、生活体验并诉诸个性化的书写，就不是可有可无的命题了。

我们要今天谈论的，就是如何找到自己独特的语言。

看起来，它像是对写作者的高标准要求——总归要是大作家才追求这个吧？其实不然，写作是高度个人化的事，不仅要讲述专属于你的故事，还要让人看到专属于你的体验，专属于你的对一个故事的理解与体验。而且，每个人都必然地有自己的表达方式，它像指纹一样。只不过，多数时候它被弄丢了，被遗忘了，或者被湮没了。

不寻找和使用自己的语言，就等于宣告：你放弃了你是你。

被禁锢继而被污染的汉语

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是著名的文体家。在《答李翊书》中，他对于散文写作提出独到的见解：“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意思是，要做到我手写我心，一定要把那些陈旧的言辞全部去掉，当然，这是很费力、很困难的。

我把“惟陈言之务去”按难易程度拆解为两个层面：一是规避陈词滥调，二是摒除人云亦云的庸俗之见。

韩愈还在《答刘正夫书》里说：“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闵循者是也。”

在韩愈生活的年代，汉语已经开始渐渐失去活力。汉字，这种象形文字的衍生品原本就不利于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它又与顽固的文化、政治制度相互成就。骈文、格律诗词、八股文甚至对联，从上层建筑到民间市井，汉语层层固化，层层累积（明清小说看似挣扎着表现出一些活力，但难以撼动历经千年的语言牢笼）。韩愈的所谓“陈言务去”，只是追求在笼子里跳得舒展一点，至于真正的自由表达，实在是太难企及了。

在民国那个充满各种可能性的时期，还是有一批作家形成了自己的语言风格的，比如鲁迅、萧红、沈从文、张爱玲。可惜这个有想象力的阶段太短了。

我们的现代语言本来就先天不足，而且难以完全摆脱象形文字自身的弊端，接下来，它又要面临新的语言灾难——最近几十年，我们生活在一种生硬的、暴力的、粗糙的、宣教式的语言环境下，更糟糕的是，它还是灌输性的，从你开始学话、识字，灌输就一直进行着。这个时代的流行语也对我们的写作语言构成威胁。

寻找自己的语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最要紧的是先得清理，摆脱那些被污染的汉语对你的影响。把自己清理得近乎穷光蛋了，才具备重新创造的可能。

触目惊心而又习焉不察的套话、空话、废话……

从三个词说起吧，它们是批判、批评、审视。

2016年12月，我在参加一场内部讲座时，问了日本的鲁迅研究专家藤井省三先生一个问题：日本是否也有国民性批判的浪潮？藤井先生用中文回答时使用的词语是“国民性批评”。

也许说者无心，我却觉得，“批判”这个词是因为面目可憎才被人家规避掉了。仔细想想，世界上有什么样的人或事，值得我们采取“批判”这样的态度？

从此以后，我连“国民性批评”都不用了，还是使用更温和的“国民性审视”为好。

生活中，这种被污染过的词语、句式，不胜枚举。警惕某些词语及表达方式上附着的暴力、愚昧或不恰当的价值判断，在日常使用中把它们剔除，是我最近一两年才有的习惯。

比这更早几年，我已经对自己在长期媒体生涯中形成的表达风格很不满了。比如说，我以前非常非常喜欢使用转折、递进这类句式，文章中充斥着“然而”“即使”“甚至”之类的词语，限定性副词“大概”“总体上”“相对来说”也极其频繁地出现在我的文章中。当我对此有所警觉，我开始有意识地

减少使用它们。我也开始有节制地使用复杂的从句，并尝试更简明、直白的表达。

最近两三年，我有些畏惧于写东西，原因就在于，我想摆脱30多年形成的写文章的套路和惯性，找到自己的语言。这非常之难，但我觉得我必须这么做。哪怕失败了，至少要把以往的坏习惯多多摒弃，让语言纯净一点，这算是最低目标吧。

有时，我们受到职务写作（比如新闻、文案、公文）的影响，有时，我们受自幼接受的错误教育的影响，因为一些假话、套话、空话、废话太普遍了，我们甚至对此习以为常。下面我举几个例子。

1. 可疑的形容词

你是不是经常看到“衷心祝愿”“温馨提示”这样的字眼？是不是你自己也用过？我却觉得，这样的形容词是多余的，是丑陋的，尤其当表述主体把自己的祝愿与提示描绘为“衷心”和“温馨”的时候，就更可疑了。是否衷心，是否温馨，难道不该是别人的评价吗？

除了这种例子，我们的日常写作中，也要谨慎地使用形容词。当我们学会克制，才会渐渐学会用更准确、更鲜活的方式去描述。

多数形容词，看起来是生动的，其实恰恰是苍白的。它的含义就是词典里的含义，读者无法从你使用的形容词里得到更丰富的信息。所以，我的建议是，不可能不用，但一定要节

制。比如说我有时也怀疑，“实话实说”这样的表达，是不是也有问题。你让我怎么想，莫非你其他的话都不是实话？

2. 套话、媚俗以及伪概念

我们很容易在文章中散播廉价的感动，用米兰·昆德拉的说法，那也是一种媚俗。一个核心的观点是，对于无处不在、被大量使用的套话，我们得培养识别能力，培养怀疑精神。

3. 失去魅力的俗语

“（痛苦）得就像天塌下来”，这是多常用的写法。我们中间有谁经历过天塌下来吗？想必没有。但是，大家是不是都习惯于这么用？作为一种修辞手段，第一个这么说的人，自然很了不起，但生硬照搬的人，就只能暴露自己的平庸了。

我想，大家都经历过生活中的痛苦一刻，不妨陪伴自己返回那一刻，仔细体味痛苦给自己造成的内心感受，把真正属于你的痛苦描述出来，形容出来，不要像随手抄起一支拐棍一样，复制那句烂俗的“天塌下来”。

顺便说一句，同样一种修辞，用在不同语言环境中的效果也完全不同。

美国有一位用英文写作的女作家，叫李翊云，她会在小说中使用一些中文中的俗语和惯用的比喻，比如形容客人多，会说“踏破了门槛”。对于英语读者来说，这种说法非常新鲜，但是对于中文读者而言，你再使用这种修辞就毫无新意了。

一个文字上有追求的作者，应该努力寻找富有个性特征的描述方式。

绕开时代流行语

流行语这个话题，可以展开来说的内容不多，但我还是决定把它单列为一个话题，为的是强调其重要性。

近十几年，网络流行语突然变得非常强势。表面看上去，它鲜活、新奇、有趣，但当一种语言模式被争相使用、成为时髦的时候，你就要对它有所警觉了。于写作的人而言，尤其如此。

我认为现在人们在交流中（不限于网络上）那么频繁、高密度地使用网络流行语，是一种从众心理。似乎不使用这个，就显得自己跟不上潮流了。

那我就奇怪了，大家都争先恐后地用同一套话语，何谈个性？又何谈潮流？更可怕的是，依赖网络语言进行表达，也有着失去独立思考的危险。而且久而久之，它将侵蚀你的表达能力。

在我的微信朋友圈中有许多作家，有的写小说，有的写非虚构作品，我留意到，那些有所成就的作家，无一例外地避免使用时下的流行词汇，无论是“颜值”“屌丝”，还是“蓝瘦”“香菇”。虽然朋友圈的表达通常是轻松随意的，但他们还是保持了洁癖，绕开了网络流行语及这个时代的其他流行语汇。

作家柴春芽在他的一份写作讲稿中也提到要规避虚伪套话。下面摘录一段。

作为一个严肃的写作者，你的写作必须从清除你头脑里的虚伪套话开始。可是，如何清除你头脑里的虚伪套话呢？

认识语言。认识语言，也就意味着，你开始具备智识和勇气，开始了认识你自己。一切严肃的写作，首先不是从认识这个世界开始的，而是从认识你自己开始的。

如果说有谁的写作，如同祛魅般，破除了千年汉语虚伪套话的魔咒，我愿意在此提及长篇小说《人类学》，并向这部伟大汉语文学作品的作者康赫致以敬意。

康赫的文学贡献被批评家和文学奖漠视了，在这样一个虚伪套话惯坏了文学品位的社会里。但是，毫无疑问，以我的文学标准来衡量，康赫无疑是汉语文学史上第一位倾尽全力，对语言的现象与本质予以关注并持续研究的作家。可以看出，他的写作野心，是向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 1871—1922）和乔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看齐的。

啊。元音中的元音，丹田宗气推送万音之母无阻无碍回旋于蟹壳空腔呃，啊，嗯嗯嗯，被咽喉深处干涩发痒的小巴扁附近冒出一小串粗糙的摩擦音意外打断。可耻。下不为例。麦弓皱了一下眉头，肉体不可靠，总是率先腐败拖垮精神。就一年时间，也开始像本地人一样喉咙底下开始叽叽咕咕地叫。挤在公交车里，边上一个花胡子老头旁若无人，唔唔，发出了粗

重的止痒音。那边还有一个，呃，神色凝重的小伙子，呃，却做得格外地小心翼翼。一个双声一个单声，一个重摩擦一个轻元音，此起彼伏，间隔固定，准确得像两个节拍器。喉咙底下装了一只小青蛙，要不就是一头小乳猪。嗯，我嘲笑过他们，现在自己也装了一个，随时突破意志的监控，咕咕叫出声来。自制力。自制力。麦弓眉头紧锁，对自己默默呼喊。

以元音“啊”开启一部小说，就像以“光”（light）开启了《圣经·创世记》一样。

19世纪的伯根副主教用过一个奇特的隐喻：“一座如玫瑰般红艳的城市，已经有时间一半久远。”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用过一个令人震惊的隐喻：“她以优美之姿行走，宛若夜色。”

其实我们对一个事物、一种现象、一种体验，都会有自己独特的感受，不要把它们丢弃。心理学上讲究与自己的痛苦共处并体验它，我们也可以与各种感受共处，而不是因袭现成的写法。

如果没有写作，我们可能就可怕地随波逐流下去了。但为了写作，必须重新认识自己，表达自己。寻找自己的语言注定很难也很快乐，但谁也不要说，我怎么配有“自己的语言”呢？大家不妨都回去翻一篇自己写的东西看看，看能发现多少可疑的字句使用。

好的语言风格应该符合三个原则

苟维佳（三明治特稿主笔）

我们时常遇见这一类的写作者，他们带着不错的选题或故事前来，列出的提纲能勾起人的兴趣，可一到正文部分读者就发现，怎么写得这么无聊？读起来像温墩水一样平淡。或者用词夸张，抒情泛滥，陷入媚俗的套路中。

可能是因为当下的应试教育，以及网络上糟糕的语言环境，让很多人对“什么是好的语言”失去了感知力。有人觉得堆砌华丽辞藻就是文采，也有人摆脱不了网络流行语的干扰。但如果在写作中使用了太多成语或大词、网络用语，这篇文章就会变得非常大众化，就像用别人的语气在说话，看不出丝毫的个人风格。

作家、媒体人袁凌感叹道：“我们已经习惯暴力的词汇，甚至习惯暴力的思考。我们刷微信、网页，使用太多过度的词汇。现在非要用极度的表情，才能表达善意。因为我们的语言被用得太过分了，我们一上来要调动别人的情绪。大量的语言都已经没有教养了，正常使用语言的情境已经不存在了。厚道地观察，厚道地使用语言，这个很难做到了。”

写作本身是一件高度个人化的事。我们不希望所有文章都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而想看到更多鲜活的、独特的内容。每个人对于世界都有自己的感受和看法，那么写成文字，也应该带有属于自己的印记。

拉里·布鲁克斯在《故事力学》一书中讲到了他认为好的语言的三个层次：

好的写作风格：句子清晰、直接，形容词和描述很少，但很有效。干干净净，没有跑题，没有用力过度。行文不以追求风格效果为唯一目的。读者沉迷于故事之中，不会注意到词语、句子和段落。

更好的写作风格：阐明这一时刻以及其中人物的潜台词。在这方面，第一人称通常比第三人称更适合进行人物内心的刻画。

最好的写作风格：文笔轻松、流畅，暗含幽默风趣，必要时表现出细微差别和微妙之处，需要时又给以直接的力量。文字具有大道至简的特性，没有表现出用力过度。这样的结果是，作者的风格很容易被辨识出来，如歌手的声音一样，清晰明确，有个人特色，因此提升了读者的阅读体验。

我们并不要求写作者的语言多么华丽，描写多么细致，但好的作品应当让人感到自然、顺畅，这是你的故事能通过文字传达给读者的前提。更进一步的追求，则是在持续不断的写作中建立自己的语言风格。以下是一些具体的建议。

描述越具体，越不容易陷入陈词滥调

平庸的文字大多相似，鲜活的文字却各有各的特别之处。这其中的区别可能在于作者是否对生活有足够深入的洞察，并且找到最准确的词语和意象来刻画这种感受。

作家钱佳楠曾讲过她在爱荷华大学给本科生上创意写作课时，带学生重读《格林童话》和《安徒生童话》，探索一个最原始的问题：为何《格林童话》相互雷同，而安徒生却有着浓重的个人风格？

其中有一点是关于比喻句的对比，《白雪公主》里王后希望能有一个孩子，“皮肤像雪那么白净，嘴唇像血那么鲜红”。这样的比喻我们已经司空见惯，而《海的女儿》开篇是这样写的：

在海の远处，水是那么蓝，像最美丽的矢车菊的花瓣，同时又是那么清，像最明亮的玻璃。然而它又是那么深，深得任何锚链都达不到底。要想从海底一直达到水面，必须有许多许多教堂尖塔，一个接一个地连起来才成。

安徒生在描述海的蓝色时使用的是非常具体的物像“矢车菊”，搜索一下矢车菊的照片你就会知道这个比喻有多么的具体。在描述深度的时候，也不是泛泛地说深不见底，而是要有“许许多多教堂尖塔，一个接一个地连起来才成”。

描述得越具体，就越不容易陷入陈词滥调。以本书中胡卉的《望明蛇馆》为例，作者是这样描写小镇上野生蛇很多的情景：

如今气候变暖，一到七八月，天气更是炎热。人们常从门背面、床底下、沙发缝里、瓷砖角落，发现跋山涉水，爬墙入窗，来蹭空调的野蛇。女人们打扫卫生时，常常吓得尖叫。被

搅了午睡的男人们，一次次挑起竹竿把野蛇送出门外或送上砧板。高考后的那个暑假，下午四点，我从漫长的午睡中头脑昏沉地醒来，感觉额头上皮肤凉飕飕的。伸手一摸，才发现一条纤小如2B铅笔的大王蛇横陈着，一动不动，兴许像我一样睡着了。

这里作者写额头被野蛇当“凉席”，用了一个很具体的比喻“如2B铅笔”来描述蛇的粗细，一下子就有了画面感。

在写作中尽量少使用一些空泛的形容词，比如提到海面就是辽阔，提到天空就是蔚蓝，可以具体地去写一写那是怎样的海，怎样的天空，去捕捉视野里、记忆里的具体细节，这才是真正属于你的文字。

打开感官，提高感受能力

川端康成在凌晨四点醒来时，发现海棠花还盛放着，他突然醒悟到原来花在无人注视的夜晚，也是这么美的。任何一样事物，你不去认真观察，就无法感受到它真正的美。于是他感叹道：“要提高感受美的能力，光凭头脑想象是困难的。美是邂逅所得，是亲近所得。”

想要写出触动人心的文字，同样需要提高对于生活的感受能力，认真观察生活，充分利用各种感官去体会尽可能多的细节，再用文字将各种层次的感受记录下来。

前FT中文网总编辑张力奋曾分享过，他为了提高语言能力，经常做一种练习——即时的文字速写。“无论是在火车站

候车还是面对海滨日落、路边的乞丐，我都会静静观察五分钟，用感官记下尽可能多的细节，而后用文字还原。有时，它们像一幅精致的工笔，有时则如一幅印象派画作，唯求抓住那瞬间的真实——光线、层次和色彩的游移。有时，我也会记录下咖啡馆里邻座漫无边际的对话。”

本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调动感官呈现出更加丰富的场景。比如小沸的《一场由杜蕾斯引发的教育风波》中，作者描写第一次打开杜蕾斯包装的画面让人印象深刻：

我把大厅的落地窗打开，雪白的阳光像水一样泼进来，清爽又亮堂。我盘腿坐在地板上，沿着杜蕾斯橘红的包装袋齿状边缘，撕开一个口子，捏起淡黄的套套小圈，一点点把它拖了出来。我感到指肚上油腻腻的。我仔细查看包装，上面写着加了润滑液，是草莓味的。草莓是我最爱吃的水果，这气味让我忍不住舔了舔自己的手指。

这一段描述中作者不仅写出看到的样子，还有指尖的触感，闻到的气味，包括第一句写阳光“像水一样泼进来”也用了通感的手法，让文字更有富有质感和层次。

写故事的时候，作者就像一个电影导演，要调度镜头去呈现场景，远景与特写结合，视听触闻等多方位捕捉，才能更好地将读者代入其中。

减少口语化和冗余句式

我们也希望文字能够尽量简洁，这种简洁是指表达上的干净利落，尽量减少与主题无关的描述，避免啰唆絮叨。

一方面是需要减少口语化的表达，比如过多使用“我”“的”“了”，写作者需要回过头审视它们是否可以从句子中删去，很多时候删去并不会影响表达，但无意识的使用会让语言变得累赘。更影响语感的是一些应用文式的冗余句式，例如“对……进行××（动词）”可以改成“××……”，“具有××性”不如直接用形容词。

正如威廉·津瑟在《写作法宝》中所说：“好的写作的秘诀是把每一个句子都剥得很干净。有一千零一种减弱句子力度的累赘物：每一个无用的词，每一个可被简化的词，每一个已由动词表达其义的副词，每一个要让读者猜测施动者的被动结构。”

望明蛇馆

胡卉

1

去年冬天的一个傍晚，陈凤从北京给我打来电话。她是我在湘北老家的发小，也是我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同学。那会儿，课间上厕所她都挽着我。但她结婚后，就极少主动联系我了。

陈凤说，弟弟陈龙退学了。为了把OPPO手机换成新上市的iPhone 6S，他游说两位同学半夜翻墙出校，试图抢劫319国道上的—辆卡车，却被司机用扳手敲断肋骨，绑送到派出所。

陈凤很生气，他居然想劫车？脑筋还没小学三年级的学生拎得清。平素又懒得动，体育考试从不及格。被人逮了，逃都逃不掉。脑力体力都不行，他还专挑那种前后不通的路走。

17岁的陈龙已经不是第一次被退学了。—年前，他因聚众吸烟，被原来的中学警告。没多久，二犯，就被劝退了。转到现在的中学，仰仗的是学校里的一位亲戚。由于不是什么过硬的关系，该交的10万元择校费，说尽了好话也只打八折。

陈凤从头到尾和我梳理这些家事，气得长吁短叹。离家久了，陈龙在我脑子里变得面目模糊。但一路听下来，这少年—无是处的形象基本也就成形了。最后，陈凤话锋—转：不过，有一点你也知道，他是在我们镇上最好的蛇馆长大的。

陈凤是想请我帮忙，介绍陈龙去我姑妈在长沙的蛇馆帮厨。她这人说话耿直高效，要么一句不说，一说就和盘托出，目的明确，这是我多年前就了解的。

我满口应承下来。可是没多久，陈家接连发生变故。17岁的陈龙诀别似的逃离湖南，参军入伍，一走就到了内蒙古包头。陈凤说，父母守一世，挡不住子女抬脚一走。家到了子女这一辈，就完全不成家了。

2

陈凤的父亲陈望明，原本是个砌匠。1999年的夏天，手上的房屋盖完了，却没有新的活计可以续上。越来越多的人去县城宁乡、省城长沙买房，镇上好些楼房荒了，成为“鬼屋”。屋顶狗尾丛生，门板受了潮，红漆剥落，青苔遍布。窗户玻璃被多事的过路人用石子敲碎，风霜雨雪和野蛇、乌鸦、流浪猫、黄鼠狼一起，在此自如穿梭，为巢为穴。

陈望明从没动过去城里谋生计的念头。妻子王瑛也不想离开这儿，她觉得目前的生活虽不富裕，但安稳且有滋味。女儿陈凤10岁了，她还想尽快生个儿子，增强生存的底气。

陈凤童年和少年时期，经常见到太阳底下，母亲摊开细长的手脚，喝黑茶，嗑南瓜子，和男人们聊个没完，笑得花枝乱颤。作为一溪之隔的邻居，这情景我见得也很多。王瑛相貌周正，眉目清爽。额头和下巴尖瘦，卧蚕眉因而显得有些厚重。瞳仁略大，看人时透出不合年岁的天真。嘴短唇薄，如果刚喝

完水，红润地弯弯一笑，恐怕要引发镇上妇人们茶余饭后无端的责难。可她又那么爱笑。印象中我每次叫“瑛姨”，都会迎上她笑盈盈的脸庞。那眼神的亲热与和气，让面对她的人很舒服，没法不对她报以微笑。

镇上的孩子和男人们，都喜欢王瑛，女人们则很难说。我的母亲就曾在饭桌上评论她，说她热情得像不懂分寸。陈凤也和我抱怨过，母亲的好脾气常让她觉得难为情。有一次，麻将散场，镇上性格轻狂的养殖户老罗，当众在王瑛屁股上掐了一把，她居然不生气，斜视着拍了下人家的膀子，就又笑咪咪的了。这样的韵事频繁发生，就像一日三餐使用的酱油鸡精，是丰富日常生活的调料。等陈凤稍长，学到“打情骂俏”这个词，她简直可以用“王瑛和×××打情骂俏”来造一百个不重样的句子。

而王瑛对待陈望明的亲热劲儿，就更不用说了。陈望明本来性格内敛，喝高了才会像当地男人那样，喜欢用一知半解的见识，喋喋不休地谈论曾国藩、蒋介石、苏联解体等严肃话题。在清醒状态下，他从不多说一句废话，脸上也没有什么表情变化。

王瑛却毫不含蓄地在麻将桌、扑克桌、桥牌桌、饭桌、酒桌上赞美她的丈夫。在家里，她从不避讳儿女，抱他的腰，亲他的脸，摸他的头，吊在他身上，脖子卡着脖子，跟他有说不完的趣话。

等陈凤十二三岁，她一度觉得自己在家显得多余，对父母的亲热反感得要命。某些场合，尤其令陈凤别扭。比如，他俩胳膊焊胳膊，来学校开家长会的时候。事后，陈凤在教师办公室受到了集体刻意的打探和无意的耻笑。

那时，少女陈凤还预料不到，再过十年，自己会对母亲羡慕不已：她是发自身心地热爱男人，而他们也的确喜欢她。这种能力像是出自天然，轻而易举地屏蔽了时代与地理对她的限制。

1999年的夏天，麻将牌友老罗和林叔突然想到，这镇上没有谁比王瑛更适合当老板娘了。老罗说，他有进货渠道和养殖经验，只要是活物，他都能养。月底送走77只牛蛙和20只竹鼠，他正打算去定一批豪猪崽子和100枚蛇蛋。

3

那时，三十里外的大成桥镇，建明蛇馆生意非常火爆。老板胡建明是“宁乡口味蛇”的创始人，可以说，湖南人开始学习广东人，把蛇端上饭桌，是受了胡建明的启蒙。胡建明从1993年开始琢磨经营蛇馆，从一个只能摆放四桌的小餐馆，做到拥有一家1300平方米的大饭店，只花了短短四年。

建明蛇馆声名大噪，“宁乡口味蛇”被评为“湖南金牌名菜”，录入《中国湘菜大典》。许多学者还以“宁乡口味蛇”申请了研究课题，纷纷来建明蛇馆考察。

关于胡建明的手艺，镇上吃过的煤老板们赞不绝口，但王瑛他们都没去过：实在太贵，1999年，当地猪肉一斤6元，而建明蛇馆最便宜的大王蛇，一斤110元，一条蛇最小的也不止3斤。

这生意，我们镇上还没人开张。事实上，这里依山傍水，湿气很重，野生蛇类有30余种：大王蛇、乌梢蛇、眼镜蛇、灰鼠蛇、竹叶青、银环蛇、五步蛇、赤链蛇、水蛇，我们从小就能辨认。如今气候变暖，一到七八月，天气更是炎热。人们常从门背面、床底下、沙发缝里、瓷砖角落，发现跋山涉水、爬墙入窗来蹭空调的野蛇。女人们打扫卫生时，常常吓得尖叫。被搅了午睡的男人们，一次次挑起竹竿把野蛇送出门外或送上砧板。高考后的那个暑假，下午4点，我从漫长的午睡中头脑昏沉地醒来，感觉额头上皮肤凉飕飕的。伸手一摸，才发现一条纤小如2B铅笔的大王蛇横陈着，一动不动，兴许像我一样睡着了。

额头被蛇当凉席，我和陈凤都遇到过。镇上没被蛇咬过的人寥寥无几。人们一在此生存，就学会了对付蛇毒，所以也罕有人因此毙命。人们都说，镇上多蛇，应该叫“蛇镇”。据《宁乡县志》记载，镇上出现过两次万蛇惊现的场景：“成千上万条蛇从回龙山脚草丛中爬出，旋入栗溪河。从栗溪新石桥下至龙船岫的半华里之间，满河都是清一色长约半米、大小均匀的蛇，密密麻麻，无法数清。约半小时之后，群蛇消失在栗溪河两岸草丛中。”

王瑛说，她小时候吃过蛇肉，自己就能杀能剥。但那时，敢尝的人不多。做法上也有讲究。人们像尊重财神、门神、观世音一样尊重灶王爷，地上爬的蛇比洗脚盆还脏，不能上大灶，不能上正席。有谁捉了蛇，就在屋外临时垒几块石头，架起铁锅。蛇头锄掉或剪掉，蛇身用钢钉固定在树上，开膛取出内脏。蛇胆留着泡酒，肝肠可熬粥。接着剥皮。颈部断头处的皮往外翻出一截，拽住，使力往下拉，就得到完整的蛇皮。蛇皮沸水去鳞后，适宜与黄瓜、辣酱、蚝油一起凉拌，爽口又有嚼劲。去皮的蛇身雪白带血，还在砧板上扭动，这时手脚要快，剁成一寸一寸，和油盐辣椒、生姜蒜头一齐扔进煮开的沸水中。焖上锅盖，大火猛煮半小时。入味，收汁，又辣又鲜，一碗汤肉一身汗，酣畅淋漓。

陈望明顺着妻子，商定了规模、装修、成本、人手安排和可能获取的客源。听着有些复杂，但他想想也没其他更好的营生，最起码，这比当初刚做砌匠时简单多了，托人情，送钱物，磕头拜师，全都免了。他规划一番，最后总结道，给湖南人做吃的，不管是蛇，是猫狗，是龙凤，十二生肖和十二生肖以外的，第一便是在“辣”字上做文章。

一个“辣”字，说来简单，做起来有门有道：薄皮青椒，多肉红椒，酸汁剁椒，暴晒的干辣子，先晒后腌的白辣椒，小巧如钢钉却火力惊人的朝天椒辣酱，每种口味迥异，但都对湖南人的胃口。辣椒帮助他们抵御湿气，也有益健康。某种程度上说，湘菜的根本不在食材，而在“辣”。这是随便一个湖南人都能想到的。

王瑛翻了黄历，敲定了开张日期：1999年9月9日。三个男人都说，这可真是百年难遇的日子。而说到蛇馆的名字，陈望明提议用老婆的名字命名，老罗、林叔都称好。最后，还是王瑛拍了板——用男人的名字。她觉得一家子的事业，说到底是男人的事业。

4

1999年9月9日，蛇馆如期开张。头两个月，因为缺乏经验，这家人都出了倒霉事。有次陈望明杀完一条眼镜蛇，正蹲在地上剥蛇皮，被砍掉的蛇头突然蹦起来朝他眼睛喷了毒液。尽管及时清洗治疗，但他右眼的视力明显差了很多，已看不清两米开外的东西。陈凤的脚踝也被剪下的蛇头袭击过，后来一直留有一块炭黑色的圆形伤疤。王瑛的手背、手腕和食指上，有三处月牙儿形状的小伤口。

但这点代价，添上这家人起早贪黑日复一日的辛劳，在他们的收获面前，似乎都不值一提。一个季度后，陈望明心里渐渐有了底。开蛇馆这条路，是条好路。老罗的养殖场还没派上用场，他已不必操心蛇源。镇上和乡下的农民为了节省车费，降低风险，连夜把捉到的野蛇送到这里。

至于价格，陈望明卖得比建明蛇馆一斤要低三十元左右，加上他为人谦卑谨慎，乐于听取食客的建议，不断改进掌厨的配方，稳定了本县许多客源。王瑛注重细节，又热情大方。厨房虽传统简陋，但窗台和灶台每天擦洗干净。碗柜是敞开式，调料瓶子一字排开，品牌商标一目了然。新近优惠动态，请人

用红纸毛笔写了，贴在玻璃门上：每周一、三、五，分别免费提供米酒、花生米、拍黄瓜和一小碟凉拌猪耳朵。带朋友上门，按人头打折。她小施恩惠，招揽了很多回头客。一个季度下来，刨去装修、置办装备等大头开支，居然还略有盈余。

等到年底，迎接2000年，龙年新世纪，蛇馆生意特别好做。2001年，蛇年，更加应景。这年正月，陈龙出生，八斤六两，浓眉大眼。客人们向陈望明道喜，羡慕他的运道，纷纷说，看来大小龙年，没有比吃蛇更顺应时运的了。

蛇价涨得飞快，最常见的大王蛇斤价最高时卖到170元。价格贵得越离谱，风气和习俗跟着变动得越快。蛇肉开始进入正席，超越甲鱼，成为判断一户人家是否大方的标准。如果婚宴上出现两种不同做法的蛇肉，人们则会认为新娘嫁入了一户殷实人家。2002年，老罗娶儿媳妇时，陈望明送了八桌口味蛇和啤酒蛇。这档宴席和这件美事，在镇上津津乐道一年有余。等到陈龙过周岁，蛇馆办了一席“全龙宴”，十桌十二道做法不同的蛇肉，包括凉菜都是蛇肉和蔬菜的拼盘。众皆哗然。镇上的人后来说，这一家子的风头都在那时出尽了。

2001年，镇上出现了四家“口味蛇”，而蛇馆已在原先的基础上拓展了青椒焖蛇、啤酒蛇、椒盐蛇、五香卤蛇、酸辣蛇肠、凉拌蛇皮、干锅带皮蛇、蛇肉火锅、龙凤汤（加入当归、党参、枸杞，与老母鸡一起清炖）。显而易见，这些都是从家常菜中获得的灵感：青椒炒肉、啤酒鸭、椒盐排条、五香卤牛肉、酸辣鸡杂、凉拌猪皮、干锅牛蛙……忙碌一天下来，夫妇

俩坐在床头一边泡脚，一边捧着计算器盘算当天的进账，攒钱速度之快，常常令他们大吃一惊。

陈凤最愿意回想的，正是那三四年。母亲王瑛常常笑得合不拢嘴，颧骨上泛着发迹的红晕。她喜欢穿大红、水红、玫红、砖红、绛红的贴身连衣裙，夏天穿棉质的，冬天穿毛呢的，过膝和不过膝的都很多。她164公分的身高在当地算是修长挺拔，发稍微烫了一点儿，散落在胸部，走起路来，摇曳生姿。面对食客和儿女，她脾气十分耐烦，言谈举止轻松自在。

她那时已过了30岁。操心多了，王瑛眼角也长了笑纹，皮肤总体却变好，眼白也比之前水润清亮。人们夸她，她就背书似的推销自家蛇馆，吃蛇大补的啊：高蛋白，低胆固醇，富含八种氨基酸；补气血，强筋骨，通经络；滋阴壮阳，美容养颜，延年益寿呀——您来我家试试？

十七八岁的小姑娘来店里，王瑛会开各种玩笑：你们小年轻命好呀，往这儿一坐，整个湖南最好的蛇肉就送到嘴边了，瑛姨我呀，每天可是忙得连放屁的工夫都没有，正打算改行呢。

大家纷纷问：老板娘改行，想干么子呢？

假如瑛姨再年轻十来岁，也像你们这样漂亮，樱桃小嘴水蛇腰，屁股软似棉花包……说不定还可以和你们组团，去东莞、深圳挣轻松钱哦。王瑛说。

姑娘们大笑。旁边的陈凤常常满面绯红，挑开门帘，逃遁而去。

5

陈凤像母亲王瑛一样，是镇上格外引人注目的人物。但母女俩吸引眼球的方式很不一样。

陈凤长得像王瑛，但自小厌弃女人身上的招摇。她走向王瑛的反面，个性非常沉默、骄傲，对什么都无动于衷的样子。这种气质，在小镇这种熟人社会，显得古怪又不相宜。可是所有人都包容了她。她是小镇第一个考上北大的人，是镇上每个孩子学习的标杆，几乎像个传奇。

2005年，高一暑假，我作为陈凤的好朋友，受王瑛的鼓励，陪陈凤在蛇馆当服务员。每天早10点开门，晚10点关门，来往客人很多，两大圆桌，六小方桌，撤走又摆满，少有空闲。做这份工作，我从未见陈凤对人表现出多余的热情。

有客人招呼她：小凤，火锅加点汤，再拿点胡椒和辣酱来

陈凤伏在窗户下小方桌上，面前摊着一本英国侦探小说《东方列车谋杀案》。细脖颈支着一颗略扁的椭圆大头，从薄瘦的烟灰色T恤里伸出来。她直起脊背，茫然地张望了一眼，坐着没动：开水在炉子上，辣酱在橱柜里。胡椒？用完了。

说完，她又垂下头，继续破案。

王瑛提着铁壶，笑着从厨房里出来。她做什么事，脸上都带笑。她支开陈凤，打发她去超市买胡椒。陈凤不情愿地起身，临走时小声对王瑛说：你看出来了，我没法服务人的。

没关系，以后让人服务你。王瑛说。

陈凤以为受到了嘲弄，鼻孔发出轻微的冷笑。

王瑛声音陡然大了：你说不定就有这个命呀！很多东西都看命！你看你爸，当初和媒婆急，说他不会追姑娘，娶不到老婆，后来呢，老婆自己追来了呀。

客人们都笑了。握着锅铲的陈望明从厨房里探出头来，“嚯嚯”笑岔了气。陈凤尴尬地瞥了我一眼，匆匆走开了。

同学十二年，直到上大学之前，陈凤几乎只接纳了我这一个亲密的朋友。15岁时，她有过一次无疾而终的短暂恋情，对方是一个物理成绩很好的男孩，拿过全省物理奥林匹克竞赛金牌。可是他并没有帮到她什么。陈凤中考时恰是因物理太弱，以一分之差落榜当地最好的附中，只能去离家很远的一所寄宿制普通中学。陈凤后来陪母亲去交弟弟的一大笔择校费时，想起当年，父母没有一点想给她塞钱补“一分之差”的意思。他们暗示她，那所普通中学考上大学的概率很小，蛇馆又忙不过来，她留在家里帮忙更好。她要是不喜欢做服务员，可以待在后厨，打打下手，学学厨艺。陈凤起初答应了，可暑假还没结

束，她就彻底厌倦了。她清楚自己完全不像母亲，不是当蛇馆老板娘的料。

陈凤有点轻视母亲，她太聒噪，也未免太快乐。她从没见过哪个文化人——哪个女老师、女医生，哪一点像王瑛。陈凤觉得，这都是她读书少的结果。王瑛一进初中就不读了，她觉得校园里无趣，情愿在校门口看摊卖菜。有些碎嘴婶娘告诉陈凤，少女王瑛站在菜摊前吆喝，就像特级教师站在讲台上讲课，很能吸引别人的注意力。

2007年，陈望明和王瑛在扩大店面与新建别墅上，发生了分歧。陈望明希望继续向建明蛇馆学习，把小店面做成大饭店。王瑛认为，家里的财力并不能达到那个预期，除非借债。最终，他们放弃了扩大店面，拿出55万，买下镇上通往县城的公路沿线的一块地基，建了一栋气派又时尚的双层别墅。方方面面都很先进，连房梁材质的抗震性都考虑到了——小镇并没有处于地震带上。人们艳羡陈家人，说如果哪天发生地震，大家往陈家别墅跑就对了。

那时，陈凤在文理分科后，在文科班如鱼得水。高次的四次模拟考中，她晋级到超级学霸的行列。高考发榜后，王瑛在谢师宴上感谢了所有人（包括7岁的陈龙，谢谢他每次路过祖宗祠堂时，都记得提醒祖宗们，保佑他姐姐清华北大有得选）。有人问到她的教育方法，她的神情显得无比局促，迟疑了一下，说，幸好陈凤一点不像我咧——

如果倒退一年，陈望明夫妇还会为女儿办一席“全龙宴”。可世事变了，席面上只放一碗通红鲜辣的口味蛇，动筷子的人也不多。蛇馆的火爆持续了五六年后，仿佛一夜之间，遭遇了大雪冰冻。

起先，因蛇肉昂贵，捕蛇者增多，生态遭到破坏，小镇周边村庄都遭了鼠灾：水稻刚抽穗，就被大面积吸了浆；红薯、花生、玉米未成熟，就被断茎刨皮。村民们还从广东买来专业捕蛇笼，笼内放置鹌鹑蛋作诱饵（鹌鹑蛋的气味能吸引周边一百米的蛇），有时一个晚上就能捕获四五条。政府担忧，要不了两年，鼠患猖獗，很多田土只能废弃。

县电视台开始蓝底白字，滚动播放《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法》，并呼吁人们举报“出售野生蛇类的违法行为”。

但镇上无人举报。路过蛇馆的人，经常左耳听着“野生动物保护法”，右耳听着蛇肉“噉吱噉吱”扑进油锅。

然而，有一天，报纸头条上刊登了一条新闻，说“蛇肉携带多种寄生虫，高温不死，或可致命”。人们口口相传，舆论旋成风暴，重创了每家蛇馆。好事者们用米糊刷了恶心的寄生虫剪报，贴在蛇馆“欢迎光临”的红字上面。他们还把剪报贴在电线杆上图文并茂的“老军医治性病”的旁边，制造出更加惊悚的效果。

在这场“寄生虫风暴”中，小蛇馆更是接连关门，改卖螺蛳、酱板鸭和常德米粉。至2015年，局面又恢复如1999年，方圆百里只留下建明蛇馆和王瑛家的蛇馆。

6

我猜想，陈凤在北京的生活可能过得寂寞孤苦，所以临近毕业，就通过教会（她大一下学期开始，每周日都去参加聚会）嫁入当地一户彬彬有礼的基督教家庭。她信仰很虔诚，婚后还养成了手抄《圣经》的习惯。一本手工牛皮本，一年就抄了170多页，八只黄铜护角磨得溜光。那是我送她的结婚礼物，说好是用来写孕期日记的，没想到成了《圣经》手抄本。

陈凤不太提起家人，发的日常朋友圈也多是与上帝的对话。似乎上帝才是她在北京有缘结识的家人。

在公婆面前，陈凤谨慎而简洁地交代父母的行当：“开餐馆的，做点家常炒菜，重油重辣的。”她从不提“蛇”。父母来北京参加婚礼，她再三强调，在婆家人这里提“蛇”，相当于在回族姑娘那里提“猪”。她感到自己的历史不太干净。在小镇时，她没觉得那些东西令人羞耻，到了外面，到了北京，到了公婆教授这里，它们就变得难以启齿，得躲躲藏藏。她差点儿想不起，当初蛇馆给她父母带来过怎样的风光。那几乎是他们存活于世的全部尊严和乐趣，他们共同拥有过的非常有限的金色年华。

陈凤上大学后，蛇馆的营收一度下降，2010年之后，只够撑她一人在北京的开支。陈龙逐渐长大，因父母宠溺，养尊处优，七八岁时就认得很多服装名牌。再加上还得留备四位老人的医药和丧葬费，陈望明开始去城市建筑工地揽活。蛇馆门前清静，经常两三天都接不到一单生意，王瑛一人应付也绰绰有余。她每次联系陈凤，都说镇上可做的事情越来越少了，劝女儿节省花销，又劝她吃好穿好。她总喜欢在傍晚时，跑去网吧和陈凤视频60分钟一元钱。

视频反而弄得两个人烦躁。王瑛纳闷，陈凤去北京后皮肤差了好多，黄得不见一丝血气，额上粉刺密密麻麻，怎么还不如她这当妈的了。每次视频，她都在网吧里大声强调这点，并说要给陈凤炖点蛇肉煲寄来，补一补就好了。

陈凤厌倦起来，她早就不再吃蛇了：有寄生虫，妈，你难道没听说吗？

王瑛的反应是，女儿和别人一样，犯了神经病。

对对，你别来理我这神经病。我拜托你。

那两年，母女间相互看不惯，一开口就呛声，有仇怨似的。后来就干脆不怎么联系了。陈凤隐约记起，当初王瑛像被鸟掐住了喉咙似的，音线又尖又急。她以为是人上了年纪的缘故。陈凤告诉她，你问太多，管得太多，实在是闲得无事可做。也难怪，留在镇上的人越来越少，连麻将都凑不齐了。

有一天，王瑛来了兴趣，让陈凤给她读一段英文书，说她长这么大，还没听过英文呢。

那阵子，陈凤一直在劝家里关掉蛇馆，改“口味蛇”为“口味虾”，他们不听，说小镇湿气重，没人爱吃凉性的东西。陈凤捡起手边的《圣经》，语速飞快，用英文念出下面的段落：

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

王瑛问，这讲的是什么意思？

陈凤说，就是，蛇天生不是好东西，会带来霉运。

王瑛大笑，说女儿去了首都，学会瞎扯了，开蛇馆七年，她手上捋过的蛇千千万，那不是要倒血霉了？

这话听来阴森，字字都长了毛。陈凤不开口了。离家越久，离父母越远，用方言说出的话越来越少——湘北方言还不如英语熟悉了。从2008年到2016年，陈凤一口气不歇，忙着适应城市生活，适应大学，适应就业，适应工作，适应婚姻，适应新的中产家庭。

陈凤想不起自己哪天曾像王瑛二三十岁时那样快活过。她在这人口密集、庞大得恐怖的城市里，始终有种孤军奋战的感

觉。她从不和家里人多说。人跟人总是很难达成理解的啊——她怎么会懂？她记忆中活得那么轻快的母亲，一生中有过孤独无助的时光吗？

7

当陈凤讲起这些往事，我也想到自己的母亲。我认为我的母亲温和乐观，婚姻美满幸福，可在她和我父亲的极少数争吵中——比如，父亲不顾她的反对，把车借给了一位嗜酒如命、手脚轻狂的朋友，她哭闹了两天，不止一次向我们提起四个名字。那都是些死人的名字。她说她夜晚梦到了她们，白天老是想起她们。她们是她少女时期一起学裁缝、婚后一起搓麻将的密友，后来都在冲动或报复的支使下，死在自己手上。

小镇有这个传统。女人们在过日子的磕绊中，顺手提起墙角的百草枯、速灭威、溴鼠灵，自行了断，待到再次人口普查时，以“病逝”归档。而活下来的人，对生活没有清晰的去向时，总是闪闪烁烁地想起曾经的朋友。

我的母亲和王瑛从小熟识，都是1968年生人。她说，王瑛最后总该想过，去找她那独立、高知、出类拔萃的女儿，当面说一说的。

譬如去年冬天，她的儿子遭到退学的时候。接着，她的儿子整日无所事事，夜不归宿，飙摩托撞死人。她赔得倾家荡产，蛇馆关门。她的丈夫心灰意懒，醉得肺出血，随后父子断

绝关系。丈夫叫来吊车，拆掉了别墅中央的一间正厅，和儿子分家而居。

可能她没有孤军奋战的经验吧。可能她也试图从女儿那里讨要一点知识和力量。可惜不知为什么，这最后一点希望也没有了。于是，在小年夜的后半夜，她摔碎家里的每一只碗碟，烧光家里的每一双筷子，吊死在蛇馆天花板正中的冰冷铁钩上。人们在短暂的震惊后，陷入了巨大的困惑。所有人都不理解这种死法。他们说，这真是镇上百年来出现过的最恶毒的诅咒了。

（注：文中王瑛、陈望明、陈凤、陈龙均为化名。）

一场由杜蕾斯引发的教育风波

小沸

1

圣诞节前一周，我的同事、文学课教师袁愿在批改作业时，看到九年级女生Orca一篇这样的周记：

周六，我在世纪大道练完架子鼓，骑单车回碧云，路上想起下周要与同学交换圣诞礼物。昨天室友们吵吵闹闹地说，要给咱们的乐队主唱买杜蕾斯套装，让她拥有“性福人生”。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这是我第一次买避孕套，居然不是给自己消费。读初一时，我在科学课上见过图片，初二时，在生物课上又看了一遍。我问Angela等朋友，她们都说，老师跳过了那一节。Angela还模仿她生物老师平缓拖沓的男低音：“上节课我们讲了心脏，这节课我们讲膝关节……”同学们都很沮丧：从心脏跳到膝盖，那我们身上面积宽阔的肚子和屁股，算什么？如果不痛不丑，是不是截掉也没关系？

我走进家乐福，扫了眼避孕套专区的货架，赤橙黄绿青蓝紫，包装鲜艳，种类繁多。什么挚爱装，情迷装，激情装，活力装，螺纹装，冰感超薄，热感超薄，还有一款“金刚持久环”。我的选择恐惧症立刻上线，傻杵在那儿，眼睛溜溜地来回转动。

有个售货阿姨抄手并肩和我站着。她四五十岁的样子，半边脸的蝴蝶斑，加上眼线画得又青又重，服务性的笑容显得面目狰狞。见我犹豫了七八分钟，她贴上脸，瓮声瓮气地介绍：“现在买冈本有优惠哦，12支装立减10元。”

“冈本？不要，不要的。”

阿姨只好把取下的一大盒冈本放回去。

“就要杜蕾斯，小盒装就行了。”我平常爱看杜蕾斯的公众号，它的文案特别幽默，给我带来了无穷的欢乐。

“喏，你买这个套餐，一盒螺纹装，一盒果味装，才29元，便宜伐？超划算的。要是单买，一盒就得20元！”

我迅速掳过阿姨手上的两盒，去收银台结账。

到家后，老妈正好不在。老妈知道她女儿啥都懂。我去漫展买小黄本她也不拦着，只问钱带没带够。

我把大厅的落地窗打开，雪白的阳光像水一样泼进来，清爽又亮堂。我盘腿坐在地板上，沿着杜蕾斯橘红的包装袋齿状边缘，撕开一个口子，捏起淡黄的套套小圈，一点点把它拖了出来。我感到指肚上油腻腻的。我仔细查看包装，上面写着加了润滑液，是草莓味的。草莓是我最爱吃的水果，这气味让我忍不住舔了舔自己的手指。

看完后，袁老师笑了。“性”是学生喜欢探讨的话题之一。她起先没有多想，只是条件反射似的，认为学生可爱、有趣，句子也挑不出什么毛病。袁老师教十年级荣誉班，学生都像Orca这样，除了成绩优等，做什么都感到自在。Orca是学校乐队的鼓手，吉他也玩得很溜。艺术节、全能秀、英文歌大赛，都能看到她。表演之前，先调试乐器，Orca常会和身边人说说笑笑，兴之所至，全场都能听到她嚯嚯的，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打起架子鼓来，她却绷紧脸，神情十分严肃，气势磅礴，完全不像16岁的少女。据传，她每周看一遍电影《爆裂鼓手》。她一心想去伯克利音乐学院读大学。要知道，英文名Orca是“虎鲸”的意思。

袁老师用红笔批阅道：“哈哈。杜蕾斯味道如何？”

接着看到Angela的周记。Angela是一个栗色卷发的女孩，皮肤白皙，个性沉静。她这周末去一个剧组实习了。说是实习，其实是想看看明星鹿晗。原来，Angela的妈妈厉女士是一家鼎鼎有名的影视公司的行政总监。

袁老师回过神，想起Orca写的“我问Angela等朋友，她们都说，老师跳过了那一节”。于是，袁老师发微信给自己的好友，也是学校的生物老师：“你和十年级学生讲过性方面的知识吗？”得到否定的答案后，袁老师想了想，决心自己来。

袁老师32岁，江西上饶人，复旦大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博士毕业。这是她在上海这所国际学校高中部任文学课教师的第一年。我比她早入职一年。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去年初冬，她面试那天。我被邀去试听她的讲课。

“各位老师好，我试讲的篇目是汪曾祺的《大淖记事》。”

袁老师的声音很像周迅，只是语速更慢一些。她穿着深色及膝羊毛大衣，一排平整、锃亮的牛角扣让她看上去像个高中生。她身高一米六五左右，平板身材，圆脸杏眼，戴一副大得夸张的黑框眼镜，神色中有股莫名的欢欣。美方校长一眼相中了她：“你一看就是属于这里的。”

这所学校是一所留美预科学校，是美国一所中学在上海的分校。教师大多是英美人，学生大多是中国人。学生一进校门，就放弃了国内学籍，进入美国的教育系统，毕业获得美国高中毕业证，申请美国或其他英语国家的大学。

袁老师放弃上海某二本大学的教职，来到这里，她对自己的选择感到满意。

相处久了，袁老师成为我在学校最亲近的同事。我晚上一得空，就去找她看惊悚片，白天则常去旁听她的课。

袁老师讲课有她的风格。比如，讲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她会对比阿摩司·奥兹的《爱与黑暗的故事》。前者发生在南美大地，主人公阿里萨持续五十年，在

内心执拗地坚守对初恋费尔明娜的爱情，同时，他却极其谨慎地拥有难计其数的秘密情人。

课件上写着马尔克斯的一句名言：“人孤独的根源，在于没有爱的能力。”

“爱”这个字对学生很提神。袁老师郑重地解释，这里的“爱”不单指“爱情”，应该说，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建立深刻的生命联系的能力。

学生们似懂非懂。袁老师拿自己下刀：“我就缺乏这种能力，至今只与一个人建立起‘深刻的生命联系’，连父母都没能。他们对我理解，渐渐耗掉了我对他们的耐心。没有办法。理解的前提是相似，而使人们相似的，往往不是基因，而是同处一个时代。”

课堂陷入了微弱的感伤。

有个男生细声打探道：“我对‘那个人’很感兴趣。”声音很小，但人人都听到了。大家笑起来。袁老师抿着嘴手足无措，飞红了脸。学生们感觉逗弄到了老师，占得一点便宜，个个都喜气洋洋的。

《霍乱时期的爱情》很受少男少女们喜欢。故事激情奔放，如火如荼，自由之河滚滚向前，一如加勒比海人极盛的生命力。大家心满意足地看完，又满怀期待地读下一本，来自以色列的《爱与黑暗的故事》。读不了一半，学生纷纷叫苦不迭：

“连情节都没有，像和尚碎碎念，太难进入了。”

“最像和尚的是，太禁欲了，太愚昧了。比如，作者写母亲招待家里的来客，弯身给他们倒茶，脖颈的皮肤露出一小块。男性客人们都觉得很不好意思，慌忙把头扭开，不敢看。”

袁老师笑道：“旧式犹太人是这样的，新型希伯来人就变了，作者奥兹——”

“奥兹就是在这两种人之间徘徊，所以有很多内心冲突。他处在历史的过渡点，和鲁迅《孤独者》所表达的‘历史的中间物’类似。”袁老师话还没说完，就被班里一位活跃的“学霸”Joy打断了。看来她早就不满意同学这么诋毁她心爱的小说了。

她侧身扫视着大家，说：“新型希伯来人，也就是基布兹的拓荒者们，在男女关系上没有任何界限，他们对任何事情都满不在乎。”她拾起书，大声朗读起来：“看这一段——

亚历山大爷爷有一次说：‘他们认为将来这样的事情会很简单，小伙子只是到一个姑娘那里提出要求就行了，或者姑娘甚至连等都不等小伙子提出要求，自己就会向小伙子提出要求，就像讨杯水。’

‘讨杯水’，就像我们的‘摇一摇’，还有那么多的社交软件。”

全班大笑。只有Angela和她同样腼腆的同桌，羞赧地低下了头。

奇怪的是，Joy却面色忧郁，眼圈一下子红了。她欲言又止，最终只是稍作停顿，用一种更加缓沉的音调，继续读道：

“缺乏想象力的贝茨阿勒尔伯伯则带着克制的愤怒说道：‘这些十足的布尔什维主义就这样把所有的神秘感都毁了？就这样把所有的感情都抹杀了？就这样把我们的整个生活变成了温墩水？’

——所以我觉得，不能简单地说他们愚昧、落后，他们是很谨慎，很会为自己考虑，看得很长远，所以才会坚持一种相对禁欲的生活。”

大家陷入了沉思，有些同学在点头。袁老师等着Joy说完，脸上始终保持着某种满意却琢磨不透的笑意。

Joy最后小声嘟囔道：“好吧，问问你们男生，如果sex（性）唾手可得，见多了，还有意思吗？”

“没意思，没意思。”男生们乐不可支地摆摆手。

袁老师这才咳嗽一声，用油性笔敲打讲台，在白板上画出四横四竖16个方格。袁老师说：“让大家对比南美和中东的这两部小说，是想说，其实世界像一个有很多抽屉的大柜子，抽屉的材质和形状看上去可能十分相似，但里面装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你各处看一看，了解多了，人就变得开阔、包容。你会

剔除文化和社会成见，多考虑个体的特殊性。于是，做个人选择时，你也会更加秉持你的本心和本性……”

3

圣诞过后，周五早晨，我一进办公室，袁老师就问道：“小沸，你是不是写过一個同性少年自我探索的故事？我印象很深，主人公叫肖石。我想发给学生看看。”

袁老师看完Orca购买杜蕾斯的周记后，想鼓励学生就“性”这个话题，写写自己之前受过的启蒙教育，以及十六七岁特定的年龄阶段对此的困惑。袁老师清楚自己和学生的关系：足够真诚，但了解不深。

我有点犹豫，要不要把肖石的故事给学生看。起先，让我敏感的，倒不是题材涉及“同性恋”。这并非禁忌。之前的学术主任，一个性格高冷、耶鲁毕业的纽约人，就曾在全校大会上，系统地科普过这个话题。他谈到少年时一个因此受歧视而自杀的朋友，音调陡增，眼泪直流。那是我们唯一一次见到他情绪如此失控。

我起先拒绝了袁老师：“关键是，我不想在一帮小朋友那里显摆。”

“这你就不对了。”袁老师督促我快把电子文档发给她，“我们教文学的，都得向沈从文学习。他好些小说都是在西南联大教创作课，写来给学生做示范的。比如《着墨医生》，通篇都是对话，那是他用来教学生写对话的。”

我无从反驳。我拗不过她。我觉得她说得很对。

等到她打印好17份《少年肖石》，我也跟着进了课堂。我心不安，好像不习惯这么张扬，又好像预感到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

袁老师讲清楚要求后，把《少年肖石》发给了15位学生。坐在最后一排的我，也拿了一份。这还是一年前写的，看着有点陌生，仿佛出自另一个人之手。

这时，坐在第一排的Neil笑着朝我大声喊：“小沸老师，这个主人公真有意思噢！”

“是啊，是啊！”很多学生都笑咪咪的，回头望向我。

袁老师这次布置的写作，无疑十分特别。学生们在短暂的茫然后，兴奋起来。好像每个人都背着一个故事，不堪重负走了很长的路，正迫不及待想卸下来。还有同学询问，写完要不要照常发到公共邮箱，大家交流交流？

看来对“性”这个话题，学生们很有话说。

从西班牙回国不久的上海女孩Cora说：“在马德里，学校里男女生勾肩搭背都很正常。常有个别女生坐在男生怀里，但他们并不是男女朋友关系，也不会有人认为，这是什么轻浮的举动。我刚去马德里时，男生们拥抱我——奔过来从后面熊抱，我脸色十分难看。这导致他们一度以为我是拉拉，讨厌和男生亲近。十六七岁，西班牙人在性方面就十分成熟了。大多

数女生十四五岁就变成了真正的女人。但她们并不会觉得羞耻，反而会很骄傲！这种骄傲似乎让她们更有魅力。怎么说？那种魅力，真让我自卑。对于这一点，我至今想不明白，这要放在国内，早就被父母骂死了。”

一位高高大大、性格温文尔雅的男生Mark接过话头：“是的，受国外经历的影响，我的想法也在转变。我在挪威时，和好友上街，总会遇到很多对gay（男同性恋），打扮另类，紧身裤紧身衣，涂黑色指甲油。人们并没有特别关注他们，反倒是我，老忍不住瞥他们，反感他们。但待了两年后，受环境影响，我没再认为gay有什么恶心我、对不住我的。每个人都有追求爱的权利，若是真爱，同性和异性又有什么本质区别？”Mark说着扬了扬那沓《少年肖石》的A4纸。

他的同桌Dave笑着说：“在哪儿看到过这么一段话，觉得特别有意思：曾经由男人来决定女人该不该受教育，由白人决定黑人能不能活下去，后来我们都认为这是荒诞的，如今我们却又让异性恋来决定同性恋能不能相爱。”

Mark想了想说：“异性恋的问题就挺麻烦了，如果还要谈到同性恋，家长们会被吓到。”

“怎么说？”袁老师问道。

Mark继续道：“现在国内的父母对待性教育，就是希望能有一种神奇的药，给孩子吃了之后，青春期的身体照常发育，但没有性欲，也不会产生性方面的好奇。等到高中毕业，进入

大学，再吃一片解药，一切恢复正常。一切性知识全懂。整个过程，无须教育，也无须戒备。”

袁老师笑了：“你是说别人家的父母吧？”

我也笑了，心想，你们的父母可是这个国家的精英，脑袋和口袋一样满满当当，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呀。

4

周六早上10点醒来，我看到有三个袁老师的未接来电。点开微信，她的头像，粉红的笑弯了眉眼的樱桃小丸子，弹了出来：“小沸，出事了。”

附在这句话后面，是很多张微信聊天记录的截图。

第一张是傅副校长半夜两点多发的：

“小袁，你让学生写什么了？Angela妈妈的微信推荐给你，你自己去处理好。”

傅副校长是学校的大管家，五十来岁，精力比一般大学生还好。学术、招生乃至校园里的流言八卦，她事事操一份心，每晚只睡三四个小时。

第二张截图，是Angela的妈妈厉女士发给傅副校长的：

“傅校长您好！今天Angela跟我说，文学课老师袁愿布置了一篇关于性的文章，还给每位学生发了《少年肖石》。

Angela比较单纯，不会写，来请教我该怎么写。我便要了《少年肖石》来看。一看，我惊呆了！这是写青少年同性恋的，内容用词都污到极点！我让孩子爸爸也看了，我们都难以置信，这样下作的东西竟然给未成年人看？！孩子们目前三观未正，这是要教给他们怎样的人生观啊？！若是在国外，我们家长是可以将袁老师和学校告上法庭的！”

我虽不是什么作家，但对待写作这一行为，还是认真的。看到“下作”两个字被用来形容自己辛苦得来的成果，心里有股憋闷。更难受的是，这个非虚构作品的主人公，是我很亲近的人。我像画素描那样，尽最大努力还原了他的生活。我不知道他们眼里“下作的东西”，是不是也在指他。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完全没必要再浪费生命，去教这样充满恶意、狭隘无知的人的子女了。

第三、四、五、六张截图，是袁老师与厉女士的沟通。袁老师性格沉稳，也比我有耐心得多。我设身处地，心惊胆寒，自忖以我的脾气和口才，是完全无法和厉女士过招的。

袁老师说：“Angela妈妈，您好，这次写作布置了‘性教育’的话题，一是有学生在周记中写到了。他们在思考并接触这方面，我觉得引导之前，有必要了解学生们之前接受了怎样的性教育。事实上很多学生的性教育都是自己通过网络完成的，这反而容易出问题。二是不久前北师大出了一套五年级性教育教材，因是国内第一次很认真地对待这件事，内容图片客观，引起了不少争议。我想，高中生也可以来谈谈他们的看法、接受度等。

“推荐小沸老师的《少年肖石》，一是有警示意义，因为这是真的悲剧。这位少年成为同性恋，很可能是因幼时受熟人性侵所致。人们大多低估了第一次性经历对之后人生的影响。二是这篇对话较多，正好学生在练习写场景和对话。这篇是非虚构，真实的人物和事件，曾入选国内非虚构价值推荐榜（链接如下）。我疏忽的是（这一点非常抱歉），可能它只适合部分人看，而您的女儿不在此内，我收回这份推荐。”

5

厉女士把美方校长、傅副校长、学术主任、袁老师，以及Angela的爷爷、奶奶、爸爸和两位叔叔拉进了一个微信群，继续说道：

“袁老师，你的初衷也许是好的，但你拿出《少年肖石》这样一篇畸形、黑暗、非主流、带有负能量的小说给学生看，且让他们模仿此篇来写作，就极其不合适了。

“我和孩子爸爸都在国外定居过，我们从大学毕业后就一直与外国人打交道，有很多不同国籍的朋友，且我们的父辈也从青年起就在西方国家留学，所以我们家应该是相当西化，相当开明的了。我们欢迎、支持、鼓励正常的性教育，但这是基于健康阳光、积极向上、宣扬主流价值观的基础上。袁老师，你作为文学老师，既非生理课老师，又非性心理学老师，你若发现像Orca这样的个别学生，有错误危险的倾向，应当交予专业老师严肃处理。

“这个故事对一个成年人的冲击已经很大，如何能让16岁的孩子们辨清方向呢？畸形变态的东西有，但不能在课堂上传播和宣扬——肖石说起其“男友”，是一脸幸福状，这不是宣扬是什么？

“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你们的责任是把孩子们往正确、健康、正能量的方向引导，而非迎合少数孩子，将大多数单纯的孩子引向黑暗面、复杂面、龌龊面。如今，不少孩子开始认为异性恋、同性恋都是一样正常的，难道袁老师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吗？袁老师希望我们的下一代舍弃掉正常的家庭观吗？说到底，你是想鼓励孩子们往这方向走吗？你是想让孩子们认为社会就是如此肮脏不堪的吗？我们需要宣扬正能量！消除学生心中的负能量！而非反其道行之。望你三思！”

袁老师说：“您的问题我这里一一回答。首先，需要致歉的是，我不该把这份材料给Angela同学，毕竟我不是看着她长大的，对她了解得远远没您深入。同时，我低估了各个学生的差异性。

“关于这篇材料，我需要再次说明的是，这是一个悲剧，我给学生看，是提出警示，我提醒他们了解和注意，因为我知道朋友中像肖石这样疏忽造成的悲剧，不止一个。时代不像以前那么单纯单一了，我的学生也在面临新的困境。这里不多说了。

“为什么您觉得我是在弘扬同性恋？我想可能是，这个故事没有明显反对同性恋，指出：这件事是错的，畸形的，有病

的。它只是把一个人本来的想法、经历客观地还原，没有评价。

“在课上，我没有和学生说这样的悲剧是畸形的或可行的，也没有说这样的事在社会上普遍。我想我的学生应该有了自己的判断。我只是说世界像一个层层格格的大柜子，每个人处在其中一格，遇到或听到另一格的人，希望他们不要大惊小怪，不要歧视。我能说的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我第一次涉及，您就及时指出，我很受教，真的非常感激。因为这有助于我今后的教学更加审慎，十分注意区分每一位学生的个性和情况。”

6

我正费力地厘清这里面的论点论据，袁老师的电话又打来了。她语气沮丧，但是气愤让她强打精神。她一上来就问：“有没有专业人士给过《少年肖石》好评？”

“几位非虚构作家，之前在《南方周末》《人民日报》当过记者的，算吗？”

“有百科名片吗？”

我搜了一下：“有。”

“赶紧发我。怎么评价的，一并发我。”

我心里有些不爽快。对写完很久的故事，这样肢解检验，如同刨坟验尸。我的性格，除了胆小，还软弱，一旦面临压力就容易自我怀疑。听完厉女士一通批判，我像犯了什么见不得人的罪，痛苦，充满负罪感，连恋人精心准备的早饭都吃不下。在这个早上，我还预料不到自己多无能，预料不到这件事会持续在我心里蒸腾，让我面临和“性”沾边的一切时——比如和恋人亲吻时，会蓦然想到“下作”这个词，心思就上了岔路：我真的写了“下作的东西”，想着“下作的事”，是一个“下作的人”吗？

我找了很久才找到《少年肖石》的评价，发了袁愿几句。比如，“作者体现出对肖石性取向的包容，调性平和，客观冷静，十分难得”，此类。我不觉得这有什么用。一切都没意思透了。

下午3点半，袁愿还在和家长拉锯。我给她送来午饭，她都没吃。她像一个经受了漫长审讯的犯人，被同样的提问和观点反复折磨，已经精疲力竭，沮丧到了极点。我心疼地看着袁愿，从她身上吃到了一个教训：即便在21世纪上海的国际学校，性教育依然是一块禁地。你不知深浅，稍稍踏足，就会身陷泥沼。

我催促她尽快结束这件事。她又扛了半个小时，才承认了错误，打出一段又一段妥协的词句，向厉女士道歉。她答应在下周一的课堂上，一定尽力弥补已经造成的可怕的影响和伤害。

袁愿蹲靠在床脚边，累得长吁短叹：“瞅见了么？啥叫误人子弟？”

见我不搭腔，她又碎念道：“跟你说个搞笑的事儿。念小学三年级时写《我的理想》，我说，我想当老师。念初二，写英语作文，我说，I will be a good teacher. 刚进大学，修了葡语，在课堂上厚颜无耻地答道，Quero ser uma professor. 但是你知道吗？我三位老师的反应居然是一样的！”

我提不起一点精神去聊“理想”。我和她隔着两米的距离，歪靠在另一只床脚上。加上没有午睡，我的脑子一团糨糊。我来回拨弄她的手机，艰难地琢磨群里的对话。

袁愿似乎兀自陷入了悠久的回忆：“他们说，你完全可以找一份更好的职业。”

学校管理层始终不发一言。我怀疑他们关了手机，正在享受美妙的周末。

袁愿私信给傅副校长：“实在不行，我引咎辞职吧。Angela是个好学生，肯定能申到TOP10的名校，学校应该留住她。”

“引咎辞职？哪有的事？”傅副校长很快语音回复，“如果她因为这事儿要走，就让她走好了，这样的家长也不是理想的家长。”

袁愿颇感安慰。但隔了一天，周一一早，她走进校长室，还是提交了辞呈。她那对浮肿青黑的眼袋，以及脱水似的，蔫了吧唧的体态，让学校领导生了气。傅副校长觉得很荒谬：你也老大不小了，怎么屁大点事都放心上？

袁愿虽比我强一点，但也不是那种性格刚毅、没心没肺的人。

我问她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她说：“人生要搞点大变动了。”她将和求婚求了好多回的男友完婚，备孕，生孩子，带孩子，教孩子，过一种富足而单纯的生活。

“我起码生三个。自己的孩子，我想怎么教，就怎么教。”袁愿哈哈一笑，又悠悠地收拢笑容，“我还是再找个学校吧。”

7

两个星期很快过去了，学校依然没找到合适的代课老师。学生们也不知道袁愿即将离职的事。截止日期一到，他们都把写好的三五千字作业，发到了袁愿的工作邮箱。大多数人还抄送了课程的公共邮箱。

在批作业的过程中，袁愿和我说，她估计走不了了。

因为事情根本没完。她挑起了问题，学生们给出了答案。可这答案又引发了更多更复杂的问题。比如，Joy讲述了她两个月前回杭州，陪同约见完“陌陌”好友的闺蜜去查艾滋病的经

历。两个姑娘在排队等候时，恐惧得抱头大哭。袁愿想起当初Joy朗读《爱与黑暗的故事》时，那气急败坏、压制着哭腔的语气。原来底下，暗潮汹涌。

Mark讲述了他的一位好兄弟，为了找最好的医院给女朋友做人流手术，借走了Mark这两年卖素描画和彩铅画攒下的私房钱。

类似的故事让袁老师心生顾忌：她的学生，别人不一定能接手；如果接了手，又惊慌失措地移交校长室，那学生们就会永远地关闭心灵之门。从此，即便黑咕隆咚，擦破膝盖，撞裂脑袋，他们也决心孤独到底了。而师生关系，也将退化到一个虚与委蛇的时代了吧。

这在袁老师看来是个悲剧。因为她一直希望自己，还有她的学生们，具备“爱的能力”，具备与人“建立深刻的生命联系的能力”。

袁老师几乎是最后才读到Angela的作业。Angela写作一向不错。这次，她以细致悲伤的笔调，讲述了她和父母的一场争吵。争吵的缘由是，父母严令阻止她去交通大学找她读大二的哥哥。哥哥在“保持与父母的关系”，还是“保持与男友的关系”上，选择了后者。他有两个多月没回家了，尽管家离交大只有六站地铁。

读完，袁老师猛然对厉女士产生了深深的同情。这同情超乎她的想象，让她忘记厉女士强势的辩才，也原谅了那个痛苦

不堪的周末。

袁老师还说，这同情的出现，吓了她一跳。因为这说明，潜意识里，她也认为同性恋是一件不幸的（至少是不光彩的）事。恐怕只有下一代，恐怕只有她的学生们，以及他们身上承载的未来世界，才可能做到真正平等、包容。

至此，袁老师才第一次理解这份职业的好：因为你可以在后来者身上，看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看到理想实现的种种可能。

袁老师又留了下来。

学生们无人知晓这场风波，但它确实是因为他们，不动声色地过去了。

（注：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本文所有人物均为化名。）

第六章 什么是好的故事细节

散文写作的视野和想象的读者

覃里雯（笔名“苏丝黄”，著名新闻人兼专栏作家）

我做了十几年的媒体人，真正给媒体写作是从1997年前后开始的。在这些年里，我主要的写作方向是非虚构，虚构方面也是基于我的一些非虚构的专栏文章，即朋友们的一些故事。

我说的非虚构，并不仅仅指的是媒体里讲究的以调研为基础的写作，而是散文式的写作。

“散文”这个词，在中文和英文里有非常不同的含义，我讲的可能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东西。在传统散文的题材里有很多规则，但现在的媒体散文写作完全不一样。互联网媒体兴起以后，散文就变得更散了，甚至可以说没有任何规则可言，很多时候就是很松散的一些细节穿插起来。这对我们的写作、阅读都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对我自己而言，我还是努力地向古典式的散文写作回归，因为我相信任何文章中间没有贯穿的线索都是不行的。

接下来我会用我自己的一篇文章《柏林的野猪》的一些段落来作为一个范例。一般来说，我对自己的文章是不太自信的，除非是得到了好的反馈。

我为媒体写作这么多年，几乎都是交命题作文，关于自己的生活 and 日常状态的描述这一类的文章，我写得比较少。今天我讲的故事，就是自己怎么写作的故事。

《柏林的野猪》这个题目，其实是它核心的提炼，是在跟“界面长篇”（现改名为“正午故事”）的总编辑谢丁一块儿聊的时候聊出来的。当时他到柏林来玩，我已经在柏林住了三年多。聊到我在柏林的生活，我跟他讲了几个小故事。其中最让他兴奋的，是一个关于烤野猪的故事——我家附近的啤酒花园有天雇了猎人在城市里打了一头野猪，在户外烤熟，并邀请邻居们来分享。

我觉得这个故事可能击中了他的两个兴奋点：一个是作为中国的城市居民很难想象，真的野生动物在城市里被捕捉和猎杀，然后还被吃掉的这种传奇式的感觉，这一点其实触发了他的好奇心；另一个就是中国人对吃的爱好。所以，他请我把这个故事写下来。

但烤野猪这个故事，其实并没有多么扣人心弦，如果你仔细想想，虽然当中有许多戏剧冲突，但都不是台面上的戏剧冲突，不是大家打成一团、扭成一团、谁要死了的那种对峙。但是对柏林而言，它已经是当下最激烈的对峙的一种了。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想了一下，如果我光把柏林的野猪的故事写进去，可能会比较单调，而且是悬在跟中国读者不相干的空中，过于遥远。我怎样能把这个故事讲得令读者感到跟他们相关呢？

我想来想去，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要再躲在媒体第三方以冷静的口气里去写。我唯一能够让读者从情感上感到近距离的，是共情，不是同情，是感同身受的一种方法，把我自己的经历如实地写出来。

我是一个中国人，小城市住过大城市也住过、工作过的这么一个普通人，我怎样才能把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到柏林的整个经历描述出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可以引起读者更多情感上的共鸣。

对结构和故事选取的过程

所以我就坐下来，从我来到柏林时的情感描述开始，认真地写我看到的周围环境以及我个人的经历，诚实地描写了我经历的准抑郁状态和当时的苦闷，当然也有快乐的时光。把这些东西按时间顺序写下来，思路立即就很清晰了。

第二步就是选取材料，该怎样去选取一些让中国读者感兴趣的材料？

如果从材料上来说，柏林作为一个特别平静的城市，真的没有多少戏剧性的东西在发声。这个城市实在是太和平、太富足了，虽然对德国来说它是一个穷的城市，但它毕竟是一个发达国家的首都，所以在这里生活遵循的逻辑和其他地方是完全不一样的，不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激烈的、需要时时刻刻去证明自己的状态。

正好反过来，你在其中会感到一种失落，就是如何在一个没有太多忧虑的世界里，去重新定位自己的一种失落。在这种失落中，人就会变得更加漫无目的，而这种漫无目的，就会让生活的诸多碎片能够很平静、很清晰地呈现在你眼前。我整个人的状态，就从北京的一种战斗式的状态，进入了一种外来的观察漫游者的状态。这个状态使得很多无用的东西，开始显现出它们有意思的细节。

所以这篇文章刚开始的记录是很诚实的，关于“耻辱的烟头”这一节，我把一些本单元住户的信息很凌乱地写在了里面：

1. 我家正对面有个长得像日本德国混血后代的羞涩友好的男人，刚搬进来时他曾经主动告诉我们：“要是你们不在家，需要我帮忙收快递包裹就告诉我一下。”后来我们替他收过几次包裹。

2. 一楼中间那家门口贴的姓名毫无疑问是个中国人的名字，却没见到人，后来门上换了名字，可能是租户，也许是个典型的中国中产海外买房产投资的故事。

3. 楼上有对乐呵呵的老夫妇，每天妻子带着丈夫一起出去跑步或者骑车，他们的孙子们偶尔结队来玩，在楼下踢儿童足球。他们看起来是整个小区最快乐的人。

做这些记录没有任何目的，只是记录了一种漫游者的无目的的观察。但如果让这些观察继续这样发散下去，这个散文就

会变得超级散，就会变成无数网络媒体当中或社交媒体上大家流水账式的记录的一部分。

在选取材料时，我更多地用的还是一个基本标准，就是在什么时候这些东西跟我一个外来的中国人发生了关系，是情感上的联系或者是身份上的联系，又或者是打动了我。叙述完这些碎片之后，我的大脑还要开始工作，把它整理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如何寻找完整的故事

如何去寻找完整的故事呢？

我想，真正形成冲突的故事，一个是烟头，一个是我的大闸蟹跑到邻居家去，第三个就是别人的冲突，也就是啤酒花园跟新来的住户之间的冲突。它们是以柏林的标准形成的冲突故事，虽然说到后来读者会发现，这些冲突也不怎么激烈。

在这三个故事里，我刚开始感觉它们相互之间是没有任何联系的，我自己写下来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把它们联系起来。但后来我发现，这里面内在的逻辑是情感的进展，是一个外来人对一个地方的情感的发展过程。

在文章第一节“耻辱的烟头”里，我是一个纯粹的外部观察者，一个非常沉默的、拘谨的，而且抑郁的观察者，没有参与任何事情。到第二节的“大闸蟹，或者1817”，我试图借助一种食物跟我居住的城市产生熟悉的联系。再到后来，我积极

地去观察和参与，甚至也参与了社区相互建立纽带的活动。这里面是有一个渐进的过程的。

我发现这三个故事里，我的个人角色从内在的自我禁锢、胆怯，到逐步参与到社区活动的过程中，其实有一条贯穿的线索，它使得这篇文章成了一个完整的移民故事，是很自然的一个组成方式。这就是我在写整体架构时的想法。

什么样的东西能够让你的文章成为一个整体？虽然叫散文，但是必须有一个一以贯之的逻辑在里面，这个逻辑可以是情感逻辑，也可以是个人的行为驱动。但总而言之，必须从头到尾有一条贯穿的线，一根绳索，否则散文就无法站立起来。

这就是我对结构和故事选取的过程。

谈细节，先谈语调和气氛

写一篇文章时，我们其实有很多选择，以不同的方式定义文章的语调和气氛。哪怕是讲述同一个故事，你也可以用多种方法去讲述。

选择什么方法很多时候取决于你个人的性格。比如说你是一个向来很欢快的人，那么你描述的时候语气会很欢快；你向来是个严肃的人，可能写出来的东西很正，很沉重。也有介于二者之间的，而且大多数人是介于二者之间的。

那么介于二者之间的人，应该如何去选取一篇文章的语调呢？

我个人的话，一般是根据写作时的心情，但因为我已经有了很多年的写作训练，所以我能够把这个语调保持到底，即一篇长文用一种统一的语调。但对初学者来说，在写的时候往往会发现自己慢慢变了调。我早期也会遇到这个问题，刚开始时候很诙谐，后来变得很沉重，或者忽而很沉重忽而很诙谐，想从头到尾贯穿一种基调，一开始并不能很好地完成。

但这都没关系，可以在完成文章之后，再对文章的语句和个别词句进行调整修改，以达到语调和氛围的统一性。比如说像《柏林的野猪》这篇文章我就做了不少调整。一开始的时候，我直接陷入了抑郁的状态，那是刚来到柏林的时候。但是写着写着，就越写越开心。怎样去把这些东西重新调整？

我举一个特别具体的例子。在写到我自己的忧伤的时候，我会把自己的这些情绪做反讽处理。比如说我觉得柏林人抽烟很讨厌，这个时候我是很理解楼下那个住户的愤怒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我跟楼下住户一块儿去愤怒，一块儿进入他的那种情绪，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就失败了。因为我应该做到抽离，然后用一种更为诙谐的方法记录下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调整了一些字句，把它变得更卡通化一些。

我来自一个楼上会随时掉落窗框（或者没有窗框的玻璃）、花盆、小刀（我自己小时候就不小心掉过一把，正插在楼下一个乘凉的女人身边）、小孩子、钢制防盗网、装修材料、椅子……的国度，所以对于高空坠烟头，我的第一反应是咧嘴一笑。但是我可以想象，今天这张告示与此前代表秩序并

然的告示是多么鲜明的反差，会给德国邻居们造成多大的震惊。

这种卡通化的夸张的语调，到后来就越来越顺溜，比如说把大闸蟹比喻成一个大将军。写第二部分的时候，我就可以把整件事情看成一场很滑稽的扮演，扮演一种文化，扮演一种仪式，让大闸蟹去扮演它应该扮演的一个角色。

城里长大的皮皮对这个建议感到陌生，她从来没有养过自己的食物，L觉得我的提议奇怪极了：“为什么你要这么养一只蟹？为什么？”皮皮犹豫了片刻，问了好几个问题，那些绒毛还是对她起了作用。她选了一只最威风凛凛的公蟹，看起来像个大将军。一只虎落平阳的将军，“就像滑铁卢里的拿破仑。”L说。

到第三部分的时候，我的这种诙谐就没有了，因为故事里不是只有我自己，邻居们是很认真地在对社区关系做一些调整。所以这种情况下，我去观察的时候，就会用没那么诙谐的语气，整件事情是让我感动的。

但在结尾的时候，我还是会努力地用一种更诙谐的语气，这样才能够统一整个文章的语调。

我们捧着盘子排队去领肉、土豆、酸菜和啤酒。N女士走到每个客人面前，用她粗壮的胳膊指着吧台说：“自己去取，别客气！”每个人好像都在哈哈笑，嗓门儿震天，跟平时平心静气小心翼翼的样子截然不同。在冲天而起的炭灰热气旁，这场

景像极了电影里德国部落对罗马军队战争胜利之后的庆功宴镜头。

在这里，我有一个以前写作时经常使用的小方法，可以帮助你从头到尾不产生太大的语调和氛围的变化：写作时持续听同一种音乐，但要是太有入侵性的那种。我比较喜欢听古典音乐，但即便听古典乐，你也有莫扎特、肖邦、贝多芬、巴赫等这些不同的选择，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

写作时，音乐会把我们带入不同的氛围，让你能在走神时迅速回到那种氛围里去。

如何扩展文章的视野

如果做一个自由撰稿人的话，文章的视野有点像锻炼身体，拓展的时候是需要去锻炼肌肉的。

举个例子，比如像张爱玲和亦舒的写作，为什么有些人分不清楚张爱玲和亦舒作品？两者很大的一个区别就在于，张爱玲对整个时代都有观测，所以她评价每一个人物，描述当时时局细节的时候，背后都有一个大的时代、图景支撑。

亦舒却是一个非常“小格局”的作者。她对时代没有任何兴趣，她感兴趣的只是一个人赚了多少钱、买了多少衣服、嫁了什么人，别人对她又是怎样评价。对更大的不同人物的命运，她是毫无感知或者说毫不关心的。

即便是在个人故事、小人物的写作方面，还是存在一个有无集体视野的巨大区别。

我个人认为，写作者要有更宽广的视野，否则没办法把作品的价值提高到更高的水平。作品的价值为什么会随着写作者视野的拓宽而提升呢？因为它能够让即便是不同命运、不同阶层、不同文化、不同年龄的人，在你的文章里都能找到共情点，以及一种写作者对他们的了解。

拓展视野第一步要做到的，就是培养共情能力，也就是学会与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人，与某个人群，最后到与社会、与全人类的共情。而这种共情能力的拓展，可能需要的是更多的阅读。共情能力往往从阅读书籍到阅读报章、时事新闻，以及和他人交谈中产生。

写作时，不管你写的是什么样的故事，故事背后的知识和情感，会自然而然地体现在你的文章中，这会使你的人物描写不一样。

现在网络上很多海外留学生写文章时都有非常充沛的情感，但他们经常给我一种视野非常狭窄的感觉。虽然他们受过很好的教育，在很好的大学里读书，但我感觉他们的作品里特别缺乏一种东西，就是共情的能力。也就是说，他们面对自己所在的国家或者社区的人，没有去了解他们的情感基础，没有考虑各种规则合理和不合理的地方，去理解它们为什么会存在。

比如说，来到德国的中国学生经常会嘲讽德国人各种各样的政治正确，或者说在美国的中国学生对多种族裔共存往往会感到不适应。不适应是正常的，但是有些人就认为我来自一个很大的国家，我们国家有五千年历史，所以你们所有这些让我不适应的地方都是奇怪的，都是不值得尊重的。

这样一种鄙夷的态度，我认为是最具摧毁性的一种写作方法。

文章的境界是知识和道德的结合吧。但文章的境界还需要加上写作风格和技巧，比如词汇量的大小。我对词汇量还是很看重的。大量阅读是必需的，白话文的词汇量，最丰富的是张爱玲。词汇量不足的话，写作就很难提高。一般来说，语言总是在不断变化丰富的，但我们这个时代的语言反倒更贫瘠了，社交媒体让所有人说一样的话，这一点太可怕。

张爱玲对服装、家具、建筑的专有名词储备，很有用。

《红楼梦》里也有很多，我以前都有抄在本子上做分类，比如“蛋壳青”这种词。我会把它们放在不同类别下面，比如“颜色”“服饰”“建筑”等。比喻也需要积攒意象，有时候走在路上想到一个比喻，我就赶紧把它写下来。我最喜欢的当代诗人，是我的朋友邹波。他对现代汉语的拓展，是基于丰富的历史、哲学、社会学和英语文学等多方面的知识。我记得有一次跟他探讨我写的一首诗。我写圣诞节的法兰克福，那些市场里旋转木马华盖上闪亮的灯，因为是圆的，好像孩子们的牙齿。我就这么写下来，自己觉得很美了。但是他又拓展了一下，“资本主义的乳牙。”他说。打破意象和思想之间的篱

笆，抽象世界里的词汇也可以和现实意象结合。也许有时候这样能更准确地描述我们的世界。

想象的读者

为什么要说想象的读者呢？因为我们每个人写东西的时候，都会有想象的读者在那儿支持我们，给自己一个写下去的理由。

没有这种想象的话，我们的写作是没有方向的，而且是没有动力的。毕竟作家的第一倾诉欲望，在很年轻的时候慢慢就会消失掉，或者说不足以支撑你写完一个故事，或是让写作有持续的动力。所以我们每个人在写作的时候，都会有想象的读者。

那么怎样去想象读者，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写作的内容、风格和质地。

比如说，如果你想象的读者是“10万+”这样的一大群人，那么你的语言、语言组织方式肯定是相对更粗暴、更直白的，你的文章长度肯定有一个限制，不能太长，你的分段也要分得更多一些，段落也要更短，还需要一些激励性的词句，等等。

这是一种非常“恶劣”的写作，当然我是不提倡的。

另外，放任个人情绪是不行的。你可以先写下来，作为抒发，但在此后的修改中，要尽量往回收。节制是美的起源，首先，“我”字要少用，“我感到”要少用，多去设想其他人的

感受，但这个感受又是基于我的想象。其次，关于要展示什么，没有必要清晰地描述出来。你大致能感觉到就好了，能描述就更好，但有时候这种描述会毁掉更宝贵的真实，这种困惑是真实的。抒发情感用情景描写这种间接的方式的确是更好的，对情感的描述常常会陷入几个常见的坑：一是描述情感的词汇不够用；二是就像量子科学一样，被观察的对象随着你的观察被改变了。我们常常会在描述情感之后，对这个情感又感到陌生，感到描述不彻底，或者在描述过程中情感发生了变化了。

有些时候，我们会把我们的朋友想象成我们的读者。我就一直把我的朋友作为我想象中的读者，因为他们对我而言更熟悉，我知道他们的趣味、道德观，以及他们对未来的想象。那么我在写作的时候，就可以去想象我写的东西在他们心目中会激起怎样的情感。

但我的这种方式，并不适用于所有人。因为在不同的人群中，有可能有些人写作，是因为身边没有任何他认为可以对话的朋友，他想象的是一个遥远的读者。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建议不管怎么样，你得想象有这么一个人，他跟你是共通的，他跟你很相近，但他可能生活在不同的地方。当他从不同的地方阅读你的东西时，会为你的所做、所写的东西打动或启发。有些人甚至把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甚至高中同学等想象成自己的读者，想象他们阅读自己的文章时是什么感受。

但无论你想象的读者是谁，有一点是特别重要的，就是不要用一种特别否定的、批判的、刻薄的眼光来看待自己所写的

东西。你的写作应该是在一种被鼓励、被认可的情况下进行。

虽然说有各种各样的写作方法和更好的努力方向，但是基本的态度应该是一种：我们用作为人的共通的对话方式，用最不轻浮的方式来对话。那么这时候，我希望我的倾听者是一个真正的倾听者。

我们看到在社交媒体上有很多人把自己的秘密，吐给一个“树洞”，这个“树洞”再把这些秘密弄出来，很粗糙地讲了一个很悲惨的事情。比如说一个女孩被男朋友骗了，又怀孕了，没钱打胎这样的遭遇，当然这里面只是一种干巴巴的乞求。通过一个干巴巴的故事来乞求获得他人同情的这种文章，是没有多少营养的。

因为在所有这些倾诉里，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他会想象一群陌生人如何评判他当下的命运，有多少是他的责任。而中国社会里，这种苛刻的评判是对人心灵自由的一种最大的压制。

所以这些人在说出秘密的时候，会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自我辩护，就仿佛只要犯一点点错误，就活该去死一样。那样的一种态度，在当下的互联网写作中是非常常见的，因为我们社会的高度对立，目前极度缺乏一种集体同情的态度，这对写作的伤害极大。

所以我特别希望，每一个人，每一个充满弱点的人，每一个充满弱点又充满热望的人，当他把自己的故事好好地、诚实

地讲述出来的时候，他应该得到的是理解和同情，以及一种向更深的人性去挖掘的叫友谊的东西。

好的细节可以让人身临其境

黄慧（三明治“短故事学院”负责人）

细节能直接向读者展示故事的具体形态、人物的各种外在和心理行为以及环境场景的特色，呈现某个相对稳定的时空片段里的一些细枝末节。同时细节为文章提供相对稳定的时空环境：文章主人公的行动是发生在具体环境之中的，因此细节可以为人物带来大量的生动的描绘，同时，细节也可以在其中隐隐推进情节的发展。比如本书中《逃避计生三十年》一文作者叙述自己特殊的身份带来的影响时，通过展现自己无法面对与父母相处的片段，呈现了计划生育政策下成长的“多余与不合法”的一代的尴尬境地：

第一次真正回到爸爸妈妈身边，我紧张又兴奋，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间，对着镜子练习和爸爸妈妈说话的表情、语音、语调。虽然我已经会模仿弟弟故作轻松地叫他们“老爸”“老妈”。可一开口，不出两句，我又窘态毕现。为掩饰内心慌张，我总急着一口气把话说完，语气又急又硬。

细节对于非虚构作品来讲更为重要，它的出现为人物、事件提供了真实的支撑，与小说不同，非虚构文章里的一切细节都要经得起检验，稍有作假也很容易露出破绽。细节通过真实性让人们触景生情，获得共情，这是细节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智族GQ》一篇写李阳的报道《家暴之后李阳依旧“疯狂”》通过细节，让读者看到了“家暴”事件之后李阳的另一面：

他脱了鞋，半躺在沙发上，边看手机边回答我的问题。单听讲话，他和台上那个疯狂老师没什么区别，但每当我抬头，一个鬓角发白的中年人出现在我眼前，他招呼我吃水果，看我不好意思，说：“假装吃，吃五块儿再聊。”我没法把他和课堂上、镜头前那个高喊口号的李阳联系起来，他皮肤松弛，皱纹爬在嘴边、眼角，频频呵欠、甩头，露出疲态。

细节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对人物与情节的发展进行精准刻画。非虚构主要以真实发生的故事为主，这就要求对故事中的人物以及环境包括心理活动都要有精准的刻画。而“刻画”需要细节支撑，这样故事与人物的真实性才能得到实现。在《逃避计生三十年》一文中，作者在成年后与妈妈的关系逐渐和解，通过妈妈织毛衣的片段来叙述她们之间关系的变化，这个细节是非常日常的，也是真实的，因此也足够打动人：

妈妈左手握着对齐的两根棒针、右手拇指食指呈八字形勾着线圈，当线圈刚挂到棒针上，一下子就滑着松掉了。“我记得是这么起的啊。”她尴尬地笑笑，手在微微颤抖。琢磨了好一会儿，起针终于对了。“1——2——3——”妈妈眯着已经老花的双眼，向上抬手挂线、向下拽线抽紧，一针一针地启动了。她的动作宛若一台没有上油的机器，磕磕碰碰。

我的眼睛酸酸的，从妈妈身上挪开。墙角里那只黄褐色蜘蛛来回爬动，一张构图精巧的网在轻轻晃动。屋檐下，我和妈妈相对而坐，膝盖不时碰到一起。我撑着毛圈，妈妈呼呼地将线盘成团……按照现在的时髦说法，妈妈是我的女神。

但是对人物行动的描述需要精准而简洁的语言。比如，鲁迅写孔乙己，“唯一穿长衫而站着喝酒的人”，洪治纲老师认为，这一句话“既点明了孔乙己是个贫穷者，又道出了他不肯舍弃所谓秀才的清高与虚荣，从不脱下士大夫标志的‘长衫’”。

不同于虚构类的小说创作，可以任由作者发挥自身的想象力使其更具艺术性或者美学上的表达，非虚构作品需要严格遵循事实本身，不能对客观的“物理真实”有丝毫的表达偏差。

本书中郭玉洁对细节的重要性已经阐释：细节会让文章变得非常好看，很吸引人，而且细节本身也是准确性的体现。但不是说随便什么细节都可以，一定要是准确的、有效的和独特的细节才可以。

一个好的写作者的眼睛就是一台摄像机。你所写的每一个文字都代表着你将如何拍摄电影细节，你将如何去扫一个街景，你将如何通过长镜头去扫一个房间，最重要的是，你将如何用镜头去扫一个身边的人，关注这个人物身上的每一个细节，去寻找背后的意象、意义，去帮助人物升华。

对人物的描写没有捷径可走，要通过敏锐的观察力去描写感官细节，通过人物的外表、声音、动作、对话等来描绘一幅“画面”。

这时他忽然听到尖厉、清晰、如一把小刀的拖得很长的尖叫声从楼下的什么地方传来。他冲进起居室，那尖叫声再次传来，这会儿变得很短促，强烈得有些愤怒，是从伊迪丝的工作室里传出的。他迅速穿过房间，打开工作室的门。

——约翰·威廉斯《斯通纳》

读者听到像小刀一样拖得很长的尖叫声，可能会猜想发出这样的声音的人是处于怎么样的一种状况？而答案也在这样的描写之中暗藏着，之后尖叫声变得短促，听起来强烈得有些愤怒，说明发出声音的人，也就是伊迪丝，她的情绪从一开始的无助、不知所措，到后来的怒不可遏。

用事件发生的过程和场景，以及其内部的声音和动作将读者带到现场，让“看到”事件的经过，制造身临其境的效果。

同样在细节描写时要尽量用动词。因为动词让事情更有动态感，让故事有节奏。如何恰当而精准地使用动词是新手写作者需要学习和练习的能力。要让文字变得有趣，需要将人物的每一个动作都观察到位，并做出判断，而不是仅仅为了描写而描写，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你要确保你写下的“动作”对人物或者事件有着相应的作用，并不是所有的动作都值得被写下来，否则那就是无意义的细节堆砌。

逃避计生三十年

温晓薇

“秘密糖果”

妈妈年轻时很美，爱唱歌，爱跳舞，还是个“有单位”的人。村里人常说奶奶有福气，儿媳这样好。才三四岁的我已听懂了大人的夸赞，内心很骄傲。

可妈妈到底长什么模样？那时的我脑中像玻璃蒙了层水雾，映不出她清晰的脸庞。我很难见到妈妈，只有过年，她才来我住的地方。因此，我总是从每年元宵一过就开始期盼下一个除夕。（免费书享分更多搜索@雅书.）

妈妈回来了，我躲在奶奶身后，怯怯张望着。妈妈端着碗追着弟弟喂饭，我远远跟在身后。妈妈用普通话一句一句教弟弟背唐诗，那声音像夏天的雨点敲打瓦片，噼啪噼啪欢快跃入耳中。我只会方言，一个字也没听懂。

我最喜欢拿着爸爸读过的教科书，指着插图给爷爷编故事。爷爷总夸我故事讲得好。和爷爷不一样，书里的字妈妈都认识，她一看肯定知道我在胡说。所以，我从来不敢在她面前讲。

妈妈也会夸我。她让我辨认晾衣竿上哪件衣服是谁的，我都答对了。她的眼睛眯眯笑成两弯月牙，夸奖的声音折得高高

低低，就像村口那条青石小径。可我不敢直视她，目光瞥向屋檐。一只黄褐色的小蜘蛛在墙角上下左右来回轻快移动，一张构图精巧的网轻轻晃动着。

我身上的毛衣毛裤构图也很精巧。穿着毛衣毛裤在村里晃悠，我经常会被姑姑婶婶表姑表嫂之类的年轻女子拦下：这花样好看，你站好，我看下针法。我定定站着，仰起脸，说：这是我妈妈织的。虽然我从未当面喊“妈妈”，可这两个字我早已暗暗喊了千百遍。

妈妈是编织高手。我喜欢帮她盘毛线，那是我距离她最近的时刻。我双手撑着线圈，左一下右一下放线，妈妈快速捋着线，呼呼盘进手心。毛线一点一点从我掌间溜出，快速在她手心成团。

时光很慢，悠悠地在身后团成记忆。终于盼来了长大：我可以上学了！这样离妈妈近了很多。

爷爷奶奶带着我从老家离开，下山寄住在三姑家。虽然我从来没有去过妈妈教书的学校，但是到寒暑假，爷爷奶奶总会把我送回到镇上那个有爸爸妈妈的家里，住上一阵。

可以经常看到妈妈了。她有漂亮的脸蛋、白皙的皮肤，留着烫卷的短发，身着利落的套裙，正式出门前的她婷婷然如一株木棉。

然而这美丽的模样并不是常态。很多时候，她总在忙。她忙着搬砖头、忙着砌围墙、忙着布电线、忙着刷油漆……她穿

着旧衣服，带着工人的白色手套，蓬头垢面的样子占据大多数时间。她一直在忙着装修镇上的这栋房子，并没对我的到来投以多一分的关注。

我只能和弟弟玩。弟弟有很多玩具，是我从来没见过。弟弟有一台小霸王学习机，那是他考第一名的奖品。那个学期，跟他同年级不同校的我也考了第一名，分数比他还高，可是我什么都没有。

弟弟教我玩电子游戏。《超级马里奥兄弟》《疯狂坦克》《魂斗罗》……不论哪款游戏，他总能轻易通关。可我总笨手笨脚，控制马里奥跨越障碍这样简单的动作，我也神情严肃、全身随之上下晃动，仿佛自己是个木偶控线人。

我还笨嘴拙舌，喊不出“爸爸”“妈妈”这两个词，似乎总要把“baba”“mama”的发音闷闷吞进喉咙里。我不敢像弟弟那样撒娇，不敢缠着妈妈讲故事，我不能跟着妈妈一起上街，我不能在家里有客人的时候在楼下玩……

对了，为应对不速之客，我练就了一身过硬的“逃窜技术”。

每次全家人围坐餐桌吃饭时，我总要竖着耳朵时刻关注着院子里的动静。一旦有陌生的脚步声或咳嗽声朝门口接近，我就熟练地收起碗筷、抹平餐桌上的残渣、提着自己的鞋子溜到楼上。待客人推门进入时，我已气定神闲地趴在楼板上听着大人们在楼下交谈。等客人离去，我才能下楼完成我那被中断的

用餐。我最恨那种一聊几个小时不肯走的客人，那样，我常常要被饿得头晕眼花。

哪怕有这样那样忧伤的时刻，我还是很高兴能在爸爸妈妈身边，仿佛手心里牢牢拽着一颗甜甜的糖果。就算不能剥开糖衣大快朵颐，闻一闻香甜的气息，也能让人感到满足。

遗憾的是，大人的心里总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他们无法也没有时间理会你手握一颗糖果的秘密喜悦。

8岁那年除夕夜，吃过年夜饭，看了一阵春节联欢晚会，我和弟弟争着跳上爸爸妈妈那张漆成枣红色的大床，央求着妈妈讲“年”的故事。一家人挤在一张床上，热热乎乎，这是我梦想中的过年方式。或许是这欢愉气氛鼓舞了我，我第一次大胆要求妈妈讲完一个故事讲另外一个。妈妈居然答应了……那晚我是什么时候睡着的，我不知道。

第二天早上睁开眼，我发现自己并没有躺在那张枣红色的大床上，我被偷偷抱回了爷爷奶奶的房间。像被人抢走了珍藏很久的一颗糖果，我却无能为力。委屈充满了整个胸腔，我“哇——”地爆出了哭声。

哭声引起了大人的不快。奶奶皱着眉，解释说爸妈的床太挤，小孩子在哪里睡不都一样。妈妈怪我不懂事，说大年初一哭会招霉运。爸爸则上前直接“赏”了我一脚。

除夕夜的欢乐像灰姑娘的子夜舞会，天亮时突然都还原成冰冷的现实。我抹着泪，好希望有谁能够过来抱抱我，哪怕只

是摸摸我的头也好。可是没有。

在大人的呵斥声中，我把哭声一点一点咽了下去。

我是谁？

“不要跟同学闹别扭，咱们在这儿，头顶的天，脚下的地，那都是借的。”在三姑家读书的那段日子，奶奶反复告诫我。

我“哦哦”地应着，并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这谁家孩子啊，长这么大了。

——我大妹儿（我大姑，她嫁到外地，在三姑家很少人能见到她）的闺女。哎，这年轻人啊，孩子太多看不过来，就都丢给老太婆。

我是大姑的女儿。我心里重复着，记下了。没过多久，我又多了一重身份。

“可以给你报户口了。”在我大约10岁时，有天爸爸兴冲冲回来告诉我。其实，我不知道“户口”到底是什么东西。大人们嘲笑我没有户口，他们叫我“黑户”，说公安局一旦发现就会把我抓起来。听到爸爸说要给我报户口，我激动得想立刻冲出门去、挨家挨户宣告：我再也不怕被抓起来了！

填户口信息时，爸爸记不住我生日，填错了。可我依然很高兴，毕竟户口簿上爸爸妈妈都不对，生日错了又有什么关系

呢。户口簿上，我的身份有点绕：我是舅公家的女儿。

爸爸说，舅公夫妇没有生养，我变成了他们名义上的养女（读高中之前，我一直由爷爷奶奶照顾，落户他们家只是一个说法）。

感觉脑回路还没捋顺，学校里就来了一拨大人物，问了许多关于我的身份的问题。大约就是我父母是谁、我跟我自己的爸爸妈妈是什么关系以及家里的各种亲属关系等问题。

我抬头盯着一个梳着大背头的男人，一一按照他们的问题作答，仿佛在做一个“我是谁”的角色切换游戏。

从小生活在一个大家族里，这个游戏对我来说并不难。亲属关系如同一张蛛网时刻罩着我，我很清楚在不同的位置上，自己与网络上其他人的关系。

“市教育局派人到我们班调查时，你女儿应答如流。”事后，班主任似乎对我的表现很满意，还在妈妈面前夸奖我。看来这些大人物在我这儿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线索。

我不在妈妈所在的学校就读，但我们在同一个以镇为单位的学区。我的很多老师都和爸爸妈妈共过事，他们知道我是谁。

在三姑家住了7年，我要到镇上读初中了。爷爷奶奶带着我和二姑家的表弟表妹（二姑和姑父外出打工，把表弟表妹交给

奶奶带）住进爸妈镇上的家里。孩子多，正好可以掩藏我的身份。

第一次真正回到爸爸妈妈身边，我紧张又兴奋，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间，对着镜子练习和爸爸妈妈说话的表情、语音、语调。虽然我已经会模仿弟弟故作轻松地叫他们“老爸”“老妈”。可一开口，不出两句，我又窘态毕现。为掩饰内心慌张，我总急着一口气把话说完，语气又急又硬。

这个阶段，我已经过了听故事的年龄，再也没机会躺在妈妈身旁。不知什么时候起，妈妈已习惯从服装店给我们买机织的毛衣，而不是手工编织，我也因此再没有机会和妈妈合作盘毛线。妈妈总是忙忙碌碌，而我跟她之间连接的管道似乎慢慢都被切断了。

我得表现得比弟弟好，证明我不比弟弟差。我暗暗在较劲。我认为，一定是因为自己在很多方面不如弟弟，所以爸爸妈妈不喜欢我。如果自己变成一个好孩子，爸爸妈妈应该就会注意到我，会给我更多耐心和时间。

在课余时间，我和同岁的表妹春天主动帮奶奶洗碗，周末整理每个人的房间，洗全家人的衣物。在成绩上，我甩开了一直跟我齐头并进的弟弟。我在全年级500多人中稳居前三名，而弟弟一直在三五十名间徘徊。

然而，我的努力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相反，或许我太过让人放心，妈妈把所有的关心或操心都给了弟弟。

妈妈偷偷给弟弟买好吃的，偷偷给他买课外辅导书，然后让他用塑料袋包着，藏在我不易找到的角落里。妈妈背着我给弟弟打气：你要超过姐姐，你是这个家、是妈妈所有的希望。

不巧的是，这些都被我发现了。我像一只被逐出雁阵的大雁，哀号着找不到归属和方向：在山上的老家，大人经常说我是被爸爸妈妈遗弃的“黑孩子”，寄住在三姑家7年，奶奶告诫我，我们在寄人篱下。回到自己家，我发现这里还是没有我的位置……

弟弟是这个家所有的希望，那我是什么？偷藏吃的、偷买辅导书，是把我当贼防吗？我当面质问妈妈。

我哭了，把自己小心翼翼藏起来的委屈一股脑儿地倒了出来。我指责她重男轻女。

很小的时候，我就发现每个家庭里都有“重男轻女”的情况：爸爸那一辈的男孩子，大多都上过学识得字，而女孩极少有机会读书；男女都下田地干重活，可家里难得的白米饭和肉一定是先就着男人吃……我感到不公平，甚至怨愤。我语气激烈，几近嘶吼。

妈妈几乎接不上我的质问。她哭了，也把自己小心翼翼藏起来的委屈倾泻而出。她怪我没良心。她说她为了我，吃了很多苦。她说这些年，她每天都在承受着计生政策带来的高压，每天都吃不香睡不安。

母女俩吵作一团，哭成一片。爸爸下班到家看到这情形，脸色瞬间暗了下来。他从腰间解下皮带，往我身上抽。皮带所及处火辣辣地疼。进入青春期的我却犟得像头牛，梗着脖子喊：打死我算了！

表妹见爸爸又要举起皮带，赶忙上前拦住爸爸，搂着我进了卧室。我和表妹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她抱着我，也哭了。

我要去跳河。我说，这样活着太没意思了，不管我在老师和同学眼里多优秀，在爸爸妈妈眼里，我永远不如我弟。他们真的是太过分了。表妹搂紧了我，大哭。你要跳河，我陪你一起跳。我俩哭累了，不知什么时候就歪在地板上睡着了。

天黑时，奶奶使劲敲门，唤着我俩的名字。

楼下食物的香气悠悠地从木门缝里钻了进来，缓缓飘入我们的身体，像解药一般唤醒我们已经迷离的意识。我头疼，手臂疼，肚子饿。一个对食物还饱含欲念的吃货，在“死”这件事情上注定是要认的。

站在桥头上，我想纵身一跃，好让爸爸妈妈永远痛心。这样，或许我就可以永远停留在他们心里。可最后，我还是转身回家。出生前就跟死神“擦肩而过”，出生仅三个月就被宣布“夭折”，或许“死”在爸爸妈妈眼里也并不是多大的风浪。想到这，我觉得我或许不应该死。

僵局中的弃子

我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候计划生育政策抓得特别严。从我记事起，村子里就有很多人在“逃计生”。

为了要个儿子，这里的人们似乎可以不计代价。

有的人逃了很久也没生着儿子，只能接着一次又一次历险，生下一个又一个女儿，然后一个又一个地送人。

有的人很快就生下儿子，回到家里喜气洋洋，在堂屋里摆满猪羊鸡鸭瓜果酒茶，焚香感谢祖宗庇佑。只要他们再交点罚款，生活又可以恢复风平浪静。

在福建东部的偏僻山村里，生儿子是每个家庭的头等大事，很多人一生都在为儿子而活。很多老人闲聊时都会感叹：“等儿子讨了媳妇、起了新房，我这一生的任务就完成啦。”如果没有儿子，那这个家庭基本就成了村里的“隐形人”，谁都可以忽视他们，嘲笑他们。

我的爸爸妈妈也为要个儿子，“逃计生”。

我出生三个月后，爸爸妈妈对外宣布：头胎女儿夭折了！次年腊月，弟弟降生，家里很快多了一张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我的出生在大人的预料之外，我的性别更与他们的期待相悖。他们告诉我，妈妈怀我的后期患上严重肝炎，打了很多针吃了很多药，可是我还是顽强地、健康地出生了。

母女平安，还没来得及给这个家庭带来多少欣喜，立刻把一个尖锐的难题甩到全家面前。

生个女儿就等于“断后”了。读再多书、有再体面的工作有什么用？伯公这句话刺痛了爷爷奶奶，也刺痛了爸爸妈妈。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如果再生个儿子，我将愧对列祖列宗。爸爸说。

再搏一个男孩，意味着必然要超生。可这是一条红线，会让爸爸妈妈丢掉工作。妈妈说，家里太穷了，他们需要这份工作。

爸爸妈妈分别是自己家里的长子、长女，都担负着家里的经济重担。他们俩参加工作后还都把自己的弟弟带在身边读书，照顾他们的生活。

那时家里还背着巨额债务。在我出生前爸爸为朋友作保贷款，后借款人不幸遇害，所有贷款和利息加起来上万元债务，全部背在了爸爸肩上（当时爸爸月工资53元）。一旦没有工作，这个家肯定要被击垮。奶奶说，爸爸差点儿因还不上债而轻生。

工作不能丢，毫无疑问。作为村里第一个走出来的读书人，所有人都对爸爸寄予光宗耀祖的厚望。生长于山沟沟，经历过贫穷和大饥荒，爸爸比谁都渴望抖落裤腿上的泥巴。丢了工作回去当农民，那比夺去他生命更加可怕。

妈妈和爸爸一样渴望出人头地。妈妈小时候，算命先生说她是“乞丐命”，所以外婆一直看不上她，甚至不让她上学。在校长多次家访做工作之后，外婆才勉强让妈妈完成中学学业。“文革”结束后，老师不断到外婆家游说，妈妈这才获得机会去补习并参加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试。

她太渴望逃离外婆了。第一次高考，她就直接报考南京大学。最终，分数差了7分。

“我要是再考一次，我相信我能考上。”妈妈后来时常做这样的假设。可外婆终于再也不给她机会，要求她进入当时的国营蜜饯厂工作养家。

妈妈做了最后的反抗：她去一个小学当起了民办老师。

之后妈妈结识了同样当老师的爸爸。跟爸爸定亲后，妈妈在婆家的资助下到一所师范学校读书。毕业后，她被分配到一所中学，这才算是捧上体制内的饭碗。

工作不能丢，又不能没有儿子。爸爸妈妈几乎陷入绝境。

“把女儿藏起来。”妈妈的同事、闺蜜芬阿姨提议道。

芬阿姨此前因为超生被开除公职，可她坚信多要一个孩子是值得的。作为一个挑战“红线”的失败者，那些年她没少总结自己失败的技术原因。

很显然，这是一个不错的建议。爸爸妈妈面前的僵死棋局被激活了。弃车保帅，总要选择一条活路。我就是那个被弃的棋子。

20世纪80年代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很差，婴儿夭折并不鲜见，加上妈妈孕后期得了严重肝炎，因此，他们认为这个说法简直天衣无缝。

于是，我出生三个月后被抱回那个偏远的小山村，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

其实，村里人如果第一胎是女儿，是允许再生一个的。可他们说爸爸妈妈跟别人不一样，他们是“有单位的人”，只能生一个。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没想明白为什么这个规则要这么设。

爸爸可以有六七个兄弟姐妹，为何爸爸只生了我跟弟弟，就算超生？

为什么这个规定还对我的爸爸妈妈，和对村子里其他小孩的爸爸妈妈限制的标准不一样？

难道“有单位的人”犯了什么错？这似乎有点说不通。大人提起爸爸妈妈“有单位”，语气明显是羡慕的，没有感觉他们犯什么错。甚至还有长辈说爸爸妈妈是村里“最有出息的

人”。可为什么“最有出息的人”不能生两个孩子，普通的人反而可以？

没有人能告诉我为什么。人们只告诉我一个可怕的事实：爸爸妈妈现在超生了，如果我被人发现了，他们就会被直接开除，甚至会被抓起来坐牢。他们还说，如果被抓去坐牢了，爸爸妈妈连过年都回不来了。（长大后跟爸爸求证，没有“坐牢”一说，系乡里人误传。）

很长一段时间里，一旦有“查计生”的风声，我就领命挨家挨户“封口”，央求每一个乡邻不要泄露“我是我爸妈的女儿”这个秘密。

我常想，如果我没有出生，爸爸妈妈直接生弟弟，那该多好。

为此，我常常讨厌我自己。

可是我不希望别人讨厌我，我希望得到很多很多的爱，尤其是爸爸妈妈的爱。但现实总是让我很失望。

初中三年，我跟妈妈争吵的次数很多。

最初的争吵是因妈妈的“偏心”，我感到委屈和愤怒。后来，我竟有些上瘾。我想通过做“好孩子”引起她注意，可是这个想法行不通。当我说混账话时，她的反应很激烈，她会泪眼婆娑地絮叨过往的种种。这让我内心生出一点近似变态的安慰：她还是在意我的。

后来，争吵成了我面对妈妈最舒适的状态，因为这个时候，她把精力投在我身上了，而我也不会因为跟她说话感到慌张。

“有污点的人”

“当时真的太害怕了，怀飞飞的时候一天假也没敢请，也不敢去做产检。后来我偷偷找一个接生婆，摸了摸……”直到现在，妈妈一提起心惊胆战的日子，总喜欢叙说她怀弟弟时的情形。她认为，弟弟现在性格软弱，主要是因为她怀他的时候整天担惊受怕。

这样紧张的日子到我们读高中时达到了顶峰。“县计生委要求我们做亲子鉴定。”妈妈说着，仿佛脚下马上要踏向深不见底的万丈深渊，面部表情僵硬，双眼圆睁。

夜里醒来，我经常发现妈妈房间没人。后来，她告诉我，她整宿绕着县城的马路不断奔跑，以此消解内心的愁苦和不安。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有人劝诫妈妈：你有一对漂亮的儿女，别人花几百万也买不到，你该知足了；你是个女人，在事业上就不要那么卖力了。

妈妈听到这总是很不服气，女人怎么了？我的能力和责任心摆在那儿，要的也只是一份基本的认可。这难道很过分吗？

爸爸评价妈妈，一辈子愣是活成了“教科书”。为人正直、坚守原则、任劳任怨，这些词随便拎出哪个，她都担得起。

在他人眼里，妈妈的卖力有点冒傻气。有几个亲戚看了中央电视台关于“最美乡村女教师”的报道后，都跟她开玩笑：如果没有多生一个，你的事迹早可以上《新闻联播》了。

虽然他们的口气带着戏谑，但我并不怀疑这个可能性。看了几期报道，我觉得妈妈和那些主人公确实有很多共同的经历和相同的品质，尤其那种被人视作“傻”的韧劲儿和付出。

妈妈也很为自己的教学成绩感到骄傲。按自己的成绩，早在二十年前，就够格评高级职称了。这是她的一个心结，也是引发被人举报的一个重要原因。只要她一开始申请评定高级职称，举报信必定随之而来。

就因为多生一个孩子，得一辈子背着一口“黑锅”。这让遵规守纪（除了计生这一条）的妈妈感到万分不解：

“这计生政策到底是为了什么？说是控制人口，可在农村任教一辈子的她根本没见到几个独生子女。农村人口那么多，不控制这大部分，光控制少许有工作的人，这有什么效果？

“计生政策除了说少生，不是还强调优生吗？可有学历、有工作的人要求只生一个，农村越穷越生得多，这跟优生的初衷真的吻合吗？

“真的把我开除了，可我依然还是有两个孩子。改变的只是学校里少一个真正热爱学生的老师，多了一个干农活的妇女而已。其他想生的人照样生。这于国家大计又有什么影响呢？”

与妈妈不一样，爸爸比较随遇而安。得了儿子后，他知道自己已经是一个有了“污点”的人，在事业上，他只求稳，绝不敢有其他非分之想。

生命力旺盛的妈妈在释放她的能量时，不得不成天担惊受怕；爸爸变得“不思上进”，这样反而能换来些许安宁。这实在是一个讽刺。

我读高中那三年，妈妈一下子老了好多。她鬓角有丝丝白发往外直冒，她的大眼睛下方垂着大眼袋，黑眼圈越发明显，她原本白皙的皮肤变得松弛发暗，整个人都充满了更年期的焦躁与不安。除了不断有人盯着她超生的事情，弟弟进入叛逆期，也让她操碎了心。

那段时间，我在妈妈眼前活成了“隐形人”。妈妈往我和弟弟的住所打电话，从来不问我的情况，甚至连寒暄式的“你吃了没？”都没有。她的电话永远又直又愣：“让飞飞接电话。”“飞飞回来了吗？”

我开始有点讨厌我弟弟，拒绝给他洗衣服、做饭。有次生气，我还朝他泼酱油。弟弟对妈妈各种乖张、叛逆，对我却默默予以包容。

“老姐，不论你遇到什么事情，你还有我。”在我难过时，他会这样温柔地安慰我。我感到很温暖，但这依然没有阻挡我要逃离家的渴望。

高考结束填志愿，我只给自己一条原则：离开福建！我不想让弟弟身边变成“隐形人”，我不想再成为妈妈哭诉的“原罪人”，我不想让计生人员轻易找到我……

“和解的努力”

18岁生日过完，我离开家，在1373公里外的西南边陲成了一名大学生。爸爸送我去上学。我们俩坐硬座火车，熬了40多个小时。一路上很累，但我很开心。

我获得了人生中渴求已久的许多“第一次”：我和爸爸第一次说了那么多的话，我第一次吃爸爸给我削的苹果、剥的鸡蛋，第一次靠着爸爸的臂膀睡觉……那个遥远、陌生、有点凶的爸爸似乎倏地一下变成真实亲切的爸爸。

这让我倍感温暖，也备受鼓舞。在离家千里之外的大学图书馆、大学宿舍楼里，我时常在一种安全的、舒适的距离里想念着爸爸妈妈。曾经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光，慢慢褪掉了争吵撕裂的痛楚，披上了些许玫瑰色的温情。

那时候妈妈虽然总是很忙，但忙碌的一天结束时，她还是会偶尔给弟弟和我讲故事，讲她自己的故事，讲她在书里看到的故事。每次她讲自己的故事，我感觉自己跟她站在一起，心离得很近很近。

妈妈有四个妹妹和一个年龄尚小的弟弟。她出嫁前，全家八口人挤在狭窄潮湿的老屋里生活。邻居断言，这家人要等儿子长大盖房子，那是遥遥无期咯。

我要证明给所有人看，即便我是女儿，我也可以给爸爸妈妈起房子。妈妈说。

跟爸爸结婚前，妈妈没忘自己要给外婆家起房子的诺言：她要求爸爸家给外公家起一栋房子。

因之，也就有了我们在镇上的那个房子。房子的一头是外婆的家，一头是我们的家。两家人共用一个院子。

爷爷奶奶以卖炭种田维持生计，家里很穷。这栋房子盖好后，他们无力承担内部的装修。此后十年，妈妈靠自己的力量一点一点地填充这个房子。

虽然那时候我们都还小，但我跟弟弟似乎都知道这栋房子对妈妈意味着什么。在她忙碌的时候，我跟弟弟会主动帮忙，一起搬砖、一起打扫……

想着想着眼角就渗出了泪，我决定把心底的这份柔情通过文字告诉他们。于是，我往爸爸和妈妈的单位分别寄去一封又一封的信。

爸爸很快给我回了信，但妈妈始终没有动静，我只能在爸爸信中或电话中听闻：“你妈妈很感动。”

直至大学毕业，妈妈没有一个电话或者一个字的回复。这让我心灰意冷了很长时间。

渐渐地，我给爸爸妈妈打电话也少了。几年后，当我再次提起妈妈没有给我打电话或回信时，爸爸也红着眼反问：你给家里打了多少个电话？

或许我的存在就是一种负担、一种罪恶。有一次闲聊，我对朋友说，因为多了一个我，爸爸妈妈一辈子都郁郁不得志。可我妈是一个生命力多旺盛的女人啊。这夹着尾巴过活的人生对她太残忍了。

妈妈不喜欢我，我觉得可以理解。换作是我，也一样啊：一看到我，就仿佛看到自己压抑的人生。我絮絮叨叨地吐着自己的郁结。

“等等！我有没有听错？为什么是多了一个你？你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啊。”朋友惊讶地说。

“对哦，我为何一直觉得这一切是我的错？”

那一刻，我仿佛是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猴子，朋友的话如同唐僧的咒语，揭下了符印。我听到压在心底二十多年、已经扭曲到变态的内疚、负罪感轰然崩塌！

不是我导致了他们的失败人生，我应该是他们人生最灿烂的一部分。我对自己说。为践行自己这个全新的理念，我想到

了一个自认为绝佳的主意。当时正值我研究生毕业，我决定邀请爸爸妈妈参加我的研究生毕业典礼。

可是，我跟爸爸妈妈依然不在一个频道上。我的邀请被他们委婉拒绝了。他们的理由是：妈妈在很多人撂荒的田地里种了很多红薯、玉米等作物，那个时候正值收获季节，她走不开。爸爸在业余时间和朋友合伙做一笔生意，正忙着到处考察。

我尴尬极了。好不容易鼓起的勇气，再次深深地瘪了下去。电话里，我没忍住哭腔。

我常想，什么时候我和妈妈之间的障碍能够消解，那该多好啊。就像我和爸爸在旅途中经历的那40多个小时一样。

2014年，我看到了这样一个机会。那时候，我正孕育着一个小生命。我也要做母亲了，我跟妈妈之间应该会有更多共同的语言吧。我想。

那年暑期，先生外出调研，需要离家40多天，家里只剩一个挺着大肚子的我。于是，我请求妈妈来京照顾我。

尽管嘴巴里叨念着家里的各种牵挂，但妈妈还是来了。我一边在朋友圈晒着被妈妈照顾的点点滴滴，满心温暖，一边不得不与妈妈进行着生活方面的艰难磨合，摩擦不断。

——老妈，宝贝踢我了。

——啊。是啊。六个多月了，宝宝是很有力气了。当时飞飞在我肚子里的时候，力气特别大。有次，我发现他一踢，我胸口就疼，喘不上气，原来是他胎位不正……

——老妈，我晚上翻身有点困难。

——哎呀，怀孕是很辛苦的。不过飞飞在我肚子里的时候，还比较乖。我裹上大衣，别人都看不出我怀孕……

——老妈，我在给宝宝听音乐。

——对，这样对宝宝好。我怀飞飞的时候啊，整天担惊受怕的，什么都没给他准备。哎，他现在变成这样一个懦弱的性格，都怪我啊……

……

——老妈，为什么？！我跟您分享任何事情，你开口闭口总“是我怀着飞飞”，“飞飞在我肚子里的时候”，为什么总是飞飞？我到底是不是你生的？为什么我在你肚子里的时候，你一点都没有印象了？

老妈愕然，继而抹泪。

一次好好的机会，又毁了。

“赦免”

我临产前，妈妈再次从老家来京，虽然她之前反复申明家里很忙不一定能来。

“生孩子毕竟是大事，”她说，“我只有一个女儿。”

我住院待产期间，妈妈守在病房。或许习惯了忙碌，短暂的空闲让她变得烦躁不安。最后，她决定要给即将见面的小外孙（女）织毛衣。

妈妈左手握着对齐的两根棒针、右手拇指食指呈八字形钩着线圈，当线圈刚挂到棒针上，一下子就滑着松掉了。“我记得是这么起的啊。”她尴尬地笑笑，手在微微颤抖。琢磨了好一会儿，起针终于对了。“1——2——3——”妈妈眯着已经老花的双眼，向上抬手挂线、向下拽线抽紧，一针一针地启动了。她的动作宛若一台没有上油的机器，磕磕碰碰。

我的眼睛酸酸的，从妈妈身上挪开。墙角里那只黄褐色蜘蛛来回爬动，一张构图精巧的网在轻轻晃动。屋檐下，我和妈妈相对而坐，膝盖不时碰到一起。我撑着毛圈，妈妈呼呼地将线盘成团……按照现在的时髦说法，妈妈是我的女神。

“要起多少针？”妈妈打断了我飘忽的思绪，一脸茫然地看着我。

“随便啦，织着玩就好。”我应着，声音习惯性的硬冷。话音未落，我就开始自责：为何说话不能温柔点？

我和妈妈就这样，变成了两块磁铁的同一极。彼此都在对方身上看到自己，却永远无法靠近：哪怕有一方小心翼翼地试图靠近，另一方则本能地往后退缩。

家人要我多理解妈妈，毕竟，这些年她太不容易了。何况，“抬轿子都需要一对人”，现在多了个弟弟，可以说是“因祸得福”，好处多多：

比如，你现在可以安安心心嫁人，安安心心在离家那么远的地方定居，要是独生女可没有那么容易。独生女的嫁娶在我们当地是一个难题，夫妇两家人常常会因孩子姓氏问题闹得不可开交。

比如，爸爸妈妈年纪大了，有人跟你一起分担照顾他们，要不你们夫妻俩两边那么多老人，以后照顾得过来吗？

.....

我也觉得有个弟弟挺好的，小时候有人跟你吵架，长大后有人分你肩膀依靠。从小成长在大家族中，我从来也没觉得弟弟是多余的，虽然有段时间我非常非常嫉妒他。

可一直以来似乎都是外来压力告诉我们：我们姐弟中有个人是罪恶的源头。这个罪恶是爸爸隐忍一辈子、妈妈努力一辈子都无法赎回的。

只是我们一直不知道这个“外力”到底是什么？我们谁也无法找这个“外力”去理论。爸爸把它归结为“命”。他说，

要怨就怨你投错胎，不投大城市、大富豪、大官人家。

可突然有一天，我们的“罪恶”似乎被赦免了：2015年10月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施行二孩政策。

生育两个孩子合法了。已经安全退休一年的妈妈百感交集，眼泪簌簌往下掉：

“县计生委有人偷偷告诉我，举报我超生的状子摞起来有三尺高。”

（注：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本文所有人物均为化名。）

试管婴儿的造人工程

派妮

毕灵灵躺在病床上，一阵阵发冷。四周发白的墙壁和天花板上的白炽灯刺得她眼睛疼，她索性闭上眼。医生的对话传进她的耳朵里：

“她怀孕周数少，一会儿动作很快的。”

她把眼睛闭得更紧了，眼泪顺着脸颊流到脖子上，凉凉的。

此时，她的下身已经流血超过24个小时。尽管中间打了好几次止血针。医生已经给出明确的诊断意见：必须尽早做胎儿流产手术，一旦出血量过大，子宫不得被摘除，那意味着毕灵灵此生再也没有做母亲的机会了。

一切准备就绪，字一签，手术就会马上进行。

毕灵灵却一直拦着老公，没让他在手术通知单上签字。她还在等，等血流止住，等奇迹出现，她实在舍不得千辛万苦才来到肚子里的双胞胎宝宝，一对试管婴儿。

两个医生还在断断续续讨论着，毕灵灵翻身背对医生，戴上耳机开始听歌。手不由自主地摸着还没凸起的肚子，喃喃道：“孩子，如果我们有缘分的话，你就乖一点吧！别让妈妈流血了好吗？”

这一年，毕灵灵34岁，结婚8年。

1

毕灵灵出生在山东省中部城市一个回族自治县上，他们一家是这个镇上少数的几个汉族家庭之一，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下面还有一个小自己两岁的妹妹。

幼年贫穷的记忆总是伴随着她：两间黑漆漆、空荡荡的破瓦房，铺不起水泥地，走上去经常深一脚浅一脚，一家人为了省电，从来不舍得在白天开灯。窗户是用纸糊上去的，一到冬天窗户纸就被风刮得声声作响，毕灵灵的爸爸隔段时间就趴在窗户前糊纸，等纸用糨糊一层层粘上去变成硬邦邦一层壳时，寒冷的冬天就过去了。

尽管家徒四壁，但每年家里墙上都会多一两张姐妹俩的奖状。一年年过去，有一整面墙竟然都被红红的奖状贴满了，成了这个破败的家里唯一一抹亮色。15岁那年，毕灵灵考上了中专，毕业后在省城济南找到了一份在五星级酒店的工作。26岁那年，毕灵灵跟大多数同龄人一样完成了结婚这件人生大事，在济南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对于婚后的毕灵灵而言，头等大事是工作，生孩子一直被提上日程。童年贫穷带来的自卑以及敏感贯穿了她的整个青春期，她希望一步步往上爬，事业有成，完成“龙门一跃”。

2012年，33岁的毕灵灵终于如愿坐到中层管理者的位置。此时的她稍微松了口气，开始考虑生育问题。

不过，她很快发现事情变得有些麻烦。

那年9月的一个早上，毕灵灵起床后发现下身流血了。“月经怎么提前来了？”她一直在吃中药调理身体备孕，对自己的月经周期格外敏感。毕灵灵心烦意乱地换下带血的内裤。

“吃了这么长时间药，还是没效果。”她望着卫生间墙上的大镜子，眉头拧在一起，那种准备了很久却两手空空的沮丧一览无遗。洗漱完毕，她就匆忙上班了。

和一位同事谈完公事后，毕灵灵起身，突然一阵剧烈疼痛从腹中袭来，直觉告诉她这绝对不是痛经。她冲进卫生间，在马桶上蹲了半天，扶着墙面才踉踉跄跄站起来。从未有过的疼，让她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于是毕灵灵赶紧让老公送她到附近医院挂急诊。医生拿着B超仪在毕灵灵的肚子上来来回回“走动”了好多遍，又把另外一位医生喊过来，两人盯着监测仪器看了又看。沉默又紧张的气氛压抑在毕灵灵周围，她没敢出声。

“你再去抽个血吧！”检查了近半个小时，医生才让毕灵灵起来，并且嘱咐她不要乱动，就近吃个饭马上回来。

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正式宣判：宫外孕。

正常情况下，精子和卵子结合后会通过输卵管到达子宫，在子宫里发育成胚胎直至分娩。宫外孕则是受精卵在路上走着

走着就不走了，在输卵管通道里安营扎寨。受精卵越长越大，输卵管会因压迫而爆裂，引起体内大出血，甚至危及生命。

住院，必须马上手术。毕灵灵还没缓过神来，一条生命在她身体内稍事停留后，就彻底消失了。

出院时医生告诉毕灵灵，一年之后再怀孕。

医学上将35岁及以上的产妇叫作高龄产妇。年龄的“大限”越近，毕灵灵想要个孩子的愿望就越迫切。而更令她头疼的是，宫外孕在医学上的复发概率是30%，即便一年后再怀孕，很有可能还是宫外孕。若如此，难道又要打掉，重新再来？

她等不及了。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比赛中，不如趁早想别的办法。

毕灵灵想到了试管婴儿。

2

若干年前，不孕不育这个词还只是出现在一些报纸的中缝小广告里。伴随着生存环境恶劣、生活压力加大、晚婚晚育带来的生育期延后，不孕不育患者的数量呈急剧上升趋势。

在各种版本的数据统计中，最保守的一个数据是，每15对已婚未育的夫妇中就有一对夫妇不能正常生育。如果在一个医院的生殖科门口稍作观察，就会发现，有生育困扰的人，远比人们想象中的多。

“我已经35岁了，不能再等了。”沈菲斩钉截铁地说。与毕灵灵一样，年龄的压力迫使她在今年年初下定了要做试管婴儿的决心。

沈菲和老公是高中同学，大学毕业后第二年登记结婚，但一直处于异地状态。沈菲留在杭州工作，老公因为读研、读博、出国交流等原因，兜兜转转停留过好几个城市。长期分居让生孩子这件事情一拖再拖：“读博士很辛苦”“经济还不稳定”“房子还没买”……这些都成了他们不想要孩子的理由。

2014年，沈菲33岁，老公终于博士毕业，在杭州的一所高校找了份工作，结束了两地分居的生活模式，父母“催生”的电话也接踵而至。

有一天沈菲接到婆婆的电话：“菲菲呀，昨天妈妈做了一个梦，梦见你怀孕了呢。”沈菲挂掉电话后，转身就朝老公一顿发泄：“我不是不想生，现在我也在拼命努力。我天天往医院里跑是为了什么呀？我自己的压力已经很大了好不好！”

心绪平静下来后，沈菲内心又泛起对婆婆的一丝同情。

沈菲老公的弟弟结婚多年，尝试过多次试管婴儿，一直没有孩子。婆婆生了两个儿子，在耳顺之年尚未能抱上孙子，过年过节聚会时别的人含饴弄孙，总让她觉得颜面无光。沈菲的公公从前是个爱凑亲朋好友酒局热闹的人，但近两年不爱去了，他怕看到别人家儿孙满堂，更怕被问起什么时候能当爷爷。

有一次醉酒后回到家，沈菲的公公忍不住大声长叹：“我也没做什么缺德事啊，咋就没有后代呢？”他甚至疑神疑鬼地跟婆婆讨论，是不是祖坟埋错了地方，才导致自己两个儿媳都没法怀上孩子？

对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沈菲夫妇而言，如果这辈子真的无法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他们可以接受丁克家庭。沈菲曾看过一篇文章，说根据国外多年的调查研究表明，孩子并没有给一个家庭增加更多的幸福感。然而，沈菲拿国外案例说事的论调无法让公婆接受。

沈菲也渐渐明白，让公婆接受这样前卫的想法太不现实。“我也能理解他们。中国传统观念太强大，毕竟是上下五千年传下来的，怎么能在我们这一代说变就变呢？”

到后来，沈菲已经无法分辨，究竟是自己真的想要孩子，还是因为想让公公婆婆高兴而想要孩子。

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沈菲的肚子仍然没有动静，虽然所有的检查都证明，沈菲夫妇没有生理上不能受孕的问题。沈菲和老公不得不坐下来认真讨论下一步的计划。

“我们可以领养一个。”

“不行，我弟媳妇就是领养的，这个身份一直让她性格敏感而又自卑。”

“实在不行找人代孕。”

“国内代孕不合法呀，跑到国外去代孕？有多少道手续要办？要花多少钱？”

比较了各种选择后，沈菲和老公决定尝试试管婴儿。

3

跟沈菲一样，毕灵灵之所以选择试管婴儿，一方面是年龄的压力，更多的是她想要给双方父母一个交代。“我跟我老公这么多年了，感情一直挺好，不要个孩子，感觉挺对不起他家里人。”

很长一段时间内，毕灵灵的父母也对自己女儿生不出孩子一筹莫展。在农村老家，毕灵灵的父母经常要面对邻里“关切的询问”，时间一长，村里便有了一些口舌，老两口变得有些沉默。

在生孩子这件事情上，毕灵灵内心深处“想要做个母亲”的天性，其实远没有“给父母一个交代”的责任感来得更强烈。

当一个人对某件事情格外关注的时候，相关信息就会从四面八方涌来。当毕灵灵开始关注试管婴儿时，她发现自己周围做试管婴儿的人群早已星星点点，呈燎原之势：

单位一位领导一直丁克，35岁后又突然想要孩子，最终选择试管婴儿，并成功生下一对双胞胎。

一位同学先后三次自然怀孕，都是宫外孕，不得不一次次打掉，最终做了试管婴儿。

舅舅家的一位亲戚，也是比较难怀孕，最终做了试管婴儿。

大舅母所在的生活小区有位邻居，通过做试管婴儿，生了一对双胞胎。

.....

这些“同类”悄悄浮出水面，让毕灵灵有了一丝安慰。在30岁时她就知道周围有人做试管婴儿，但一直不能接受“通过人工干预的方式进行生育”的做法。孕育生命本来就是遵循着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这种“外援”岂不是对规律的一种破坏？

现在的她，开始嘲笑自己过去的想法“太落伍”。

她偷偷跑到山东省立医院辅助生殖科去咨询，发现来做试管婴儿的女性多数衣着体面，看起来都是新一代知识女性或职场精英。医生告诉毕灵灵，如果要做试管婴儿需要预约排队，最快也要三个月后，北京某权威医院试管婴儿排队已经排到第二年。

从省立医院回来后，毕灵灵更加坚定了要做试管婴儿的决心。“既然这么多有钱人，包括电视上的明星都在做，为什么我不能试一试？”

毕灵灵和沈菲在决定做试管婴儿时，都天真地对“做试管婴儿生双胞胎的概率比较大”抱有期待，对做试管婴儿过程中所经受的痛苦和折磨，却严重估计不足。

试管婴儿的第一步，是从女方身体中取出卵子。而要想得到足够多足够好的卵子，医生往往会通过药物的方式刺激卵泡的生长发育，也即所谓的“促排”。

6月的杭州，梅雨季像条慢船，拖着人们驶向盛夏。躺在取卵手术台上的沈菲却紧张地手心直冒冷汗，她亲眼看着医生拿一根又粗又长的取卵针管，通过阴道插入卵巢，像磁铁一样把体内的卵子吸附出来，保存到试管里。

她这次只取出4个卵子——而据她从一个试管婴儿微信群了解到的情况，多数人都能取出八九个甚至更多的卵子，数量越多代表可选择的余地越大。在排队缴费时，她只缴了2000元。这是她第一次羡慕那些缴费多的人——缴费的数额跟卵子的数量有关。

当沈菲的卵子被取出后，守在手术室外面的老公便立即被叫进取精室取精。三天后，沈菲收到医院的电话，得知医院成功培养了两个优质胚胎。

最关键的一步是移植，也就是把体外的胚胎送入女性体内。只有受精卵在子宫内成功着床，才算移植成功，而多数人

都败在了这一步上。跟沈菲一起取卵的共有21个人，走完最后一步的只有3个人。

移植相当于把一颗成活的种子，放到合适生长的土壤中去，土壤的环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移植能否成功。为了保证“土壤的肥沃”，医生给沈菲开了35天的身体调理针，需要她自己每天在中午12点到1点之间，扎进自己的肚皮里。

沈菲是一个拔牙都会被吓晕过去的人，一开始她还哆哆嗦嗦不敢对自己下手，常是拿着针头犹豫好久，才眼睛一闭牙一咬，朝自己的肚子扎去。这场景颇悲壮。

移植后第10天左右，沈菲测出怀孕了。

当她把怀孕的消息告诉婆婆时，婆婆在电话那一头兴奋地说：

“菲菲，你真是我们家的大功臣！”

5

与沈菲的“幸孕”相比，毕灵灵的试管之路吃尽了苦头。

在休养了近一年后，毕灵灵和老公去医院提交了试管婴儿申请。第一次取出5个卵子，培养成3个优质胚胎。按照规定，35岁及以下只能一次性植入两个胚胎，但为了提高成功率，毕灵灵通过熟人关系，让医生多放了1个。

10天后，毕灵灵测出怀孕。但几天后的血液检查显示，虽然胚胎在她的子宫内着床，但是没有生长。第一次宣告失败。医生给出的失败原因是，毕灵灵的体内没有形成一层胚胎保护膜，建议她进行免疫治疗。

免疫治疗是将男方的血液抽出来，分离出血清打到女方体内，形成抗体。打针时，需要针头将胳膊上的皮肤挑起来打，像做皮试那样，不仅疼，而且一针下去一片淤青。

毕灵灵的疗程需要做7个星期，每个星期连续打6天，一共42针。刚刚一周，毕灵灵的胳膊就已经被针管扎得全部青紫，还未缓过来，新一轮打针又开始，医生在她的胳膊上四处找还可以扎针的地方。

毕灵灵还做了“刮宫”，将给胚胎着床的子宫“清扫”干净。为了保证手术质量，医生不建议她选择麻醉，告诉她，心里默数20秒就结束了。当手术灯关掉，医生把手术器械收走，整个手术室空荡荡时，毕灵灵躺在手术台上疼得狠狠哭了一通。

当怀孕成为毕灵灵的一种执念后，她就一心扑在了“要孩子”这项事业上。

除了配合医生治疗，毕灵灵每天都要浏览各个母婴论坛的“试管婴儿”版块。在那里，她不仅可以从别人的成功案例中获取信心，也积累了一堆“助孕”的经验：“着床失败说明子宫冷，每天热水泡脚20分钟有助于改善宫寒。”“西瓜、梨

等凉性水果一概不能吃。”“月经来之前开始喝大枣红糖姜水，可以补血。”“每天早上把豆浆当水一样喝，可以提高体内雌性激素。”“每天坚持30~50分钟的运动。”……毕灵灵将这些金科玉律熟稔于心，并身体力行。

半年后，在毕灵灵认为身体已经调理到可以接受第二次挑战时，她再次躺在了手术台上。这一次取了8个卵子，最终培育成6个优质胚胎，毕灵灵还是把3个胚胎移植到体内。

移植完当天，医生让她多卧床，以便给胚胎着床一个稳定的环境。毕灵灵从手术室里出来，干脆在嘈杂的医院走廊里找了一排长椅，自己躺了5个小时后才回家。一进家门，鞋子一脱，直接躺床上一动不动，吃喝拉撒全都在床上解决。

15天后她测出怀孕；45天后她被告知，是一对双胞胎。试管成功，还是二胎，一个看似完美的结果。

但风险在怀孕90天时降临了。

2014年春节的一天晚上，毕灵灵早早洗完澡躺倒在床上，突然觉察自己下身又流血了，好在肚子不痛，量也不大，她打算静观其变。半夜里，血直接一阵接一阵地涌了出来，毕灵灵和老公望着被血浸湿的床单，突然害怕起来。连夜爬起来去医院挂急诊。

打止血针，做B超，结果显示胎盘低置。

毕灵灵急切地问医生：“孩子能保住吗？”医生一开始还鼓励她说：“没事的！”后来止血针连续打了一夜，血还是汨汨往外流。医生只能说出最坏的结果：“既然止血针都止不住，就得把胎儿做掉，保住大人的子宫，以后还有生育的可能。否则子宫出血量过大，只能切掉子宫，没有办法再生育。”

毕灵灵的老公实在不忍心，开始小声跟她商量：“我觉得你太受罪了，要么孩子不要了吧！你别有压力……”还没等说完， she 就把老公赶出了病房。

在手术台上，毕灵灵背对着等待手术的医生，摸着肚子，不停和命运未卜的宝宝喃喃说话。

几针加大剂量的止血针后，大规模的血流终于被止住了。

6

医生告诉毕灵灵，止血只是保胎的第一步。接下来除了每天打保胎针外，更多靠她把控自己的身体。

所谓“把控”，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绝对卧床，绝对静止。

毕灵灵把自己变成一个“植物人”，在病床上保持着一个姿势一动不动，七八个小时下来，背部和腰部早已失去了知觉。老公、妈妈、婆婆、妹妹每天轮流来照顾她，这对还未出世的双胞胎成了整个家庭的生活重心。

在医院住了56天后，毕灵灵出院了。因为自己家住六楼，没有电梯，毕灵灵生怕稍有不慎孩子又出问题，干脆让老公在家附近租了一个二楼的房子，专门请了一位家政阿姨来照顾自己。

在租来的房子里，毕灵灵一躺就是几个月，当临近预产期下床时，毕灵灵已经全身麻木得不会走路了。两个人架着她，才把她一步一步从卧室挪到客厅里。身体长期处于静止状态时，体内的新陈代谢功能也受到严重影响，小便需要插上导尿管才能解出，而大便则需要不停打开塞露才能通下来。

身体不能动，毕灵灵多数时候就躺在床上想事。

从童年的贫困到工作的打拼，在30多年的人生中，她经历了不少的难。但她无论如何都不会预料到，生孩子这件事，会成为她迄今为止人生中最大的一场“劫”。

“如果刚结婚就要孩子，可能就不用遭这么多罪了。”毕灵灵甚至有些后悔，当初不该醉心于追求事业。“现在我也不想那么多了，只要我的孩子能健康地出生，以后叫我干啥我都愿意。”

毕灵灵怀孕7个月时，由于羊水提前破裂，不得不剖腹将双胞胎产出，毕灵灵的孕育之路以早产结束。

身体上的痛苦由毕灵灵一个人来承受，经济上的付出则考验着整个家庭。

从第二次试管婴儿手术一直到产后三个月，毕灵灵将近有一年时间没有上班。做试管婴儿一次的费用是两三万元，两次试管婴儿的手术花费约4万元。住院保胎花了3万多元，回家租房子、请阿姨每个月花费1万元，生孩子当天手术费将近2万元，给孩子存脐带血花了3万元，两个孩子因为早产进温箱一天就是2500元，20天差不多就是5万……如此算下来，毕灵灵生孩子的成本在20万元以上。

“有很多做试管婴儿的都做了四五次，花再多的钱还不一定能成功。我已经很幸运了。”

7

事实上，在不孕不育问题的解决方案中，试管婴儿是最后一条路径。也就是说，不到万不得已，不会采取人工辅助生殖的办法来解决生育问题。尽管试管婴儿技术目前国内已经实行了30多年，第一例的试管婴儿也已经长大成人。但是相较于自然孕育，试管婴儿还是存在一定的弊端，诸如对女性身体的破坏性极大、成功率比较低。

正是看到了这些弊端，李婧尽管也跟毕灵灵和沈菲一样遭遇了生孩子难题，但她并没有将“试管婴儿”作为唯一的出路。

李婧从事的是金融行业猎头工作，每天早上8点半以前，李婧都会准时来到位于上海陆家嘴的办公室。打开电脑，密密麻麻的候选人资料扑面而来。接下来的8个小时里，她需要做的是

不停地筛选简历、发送推荐报告、给候选人打电话、安排面试……

当然加班也是必不可少的——她的时间得跟着金融行业的作息规律走，常要在晚上10点钟给候选人打电话谈工作。

李婧在30岁那年结婚，老公比她大3岁。虽然晚婚晚育在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很常见，但他们在新婚后不久也加入了风风火火的备孕运动。

在一次做孕前检查时，李婧被医生告知有“输卵管不畅且伴有伞端粘连”，须做腹腔镜手术。如果术后半年内仍没有怀孕的话，建议做试管婴儿。然而当李婧交了一万多元的手术费躺在手术台上时，主刀医生却告诉她，其实输卵管是通的，伞端也只不过有一点粘连，对怀孕的影响并不大。

她有点不敢相信西医了，转而投向一位据说很有名望的中西医结合的医生。

每周一早上5点半，李婧就得从家里赶过去排队挂168元的号，稍微晚些号源就没了，只能找黄牛。8点多挂好号，李婧又赶紧奔到公司上班，下午请假再回医院就诊、做检查、拿药。

在医院就诊时一般需要三四个小时，其中多数时间在排队，真正就诊和做检查的时间往往就十来分钟。从医院出来时，李婧手里必定提了大包小包的药，一周配药1000元左右，一个月4000多元的固定开支，只能自掏腰包，不能使用医保。

接下来一周，李婧就在吃药、敷药和中药灌肠中度过。

每天晚上的中药灌肠，是李婧最为小心的治疗程序，灌肠前必须先把大便排掉，否则容易胀气。灌肠时还要注意不能把空气带进去，否则一晚上都在放屁，一夜都睡不好。一根长长的管子，一边伸到装有中药的塑料容器里，一边插入自己的肛门。药液进入体内，和外敷的中药“里应外合”，据说可以起到消炎和调养身体的作用。

此外，李婧还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同房。一旦白天在医院里做B超时发现卵泡发育成熟，医生便安排她回家后每隔一天行一次房事。李婧和老公就像完成任务一样，毫无性趣可言。

时间、金钱、精力、身体上的不断付出，并没有让李婧如愿以偿，反而让她更加焦虑。当请假成为李婧每周去公司必须要做的事后，李婧的领导也从一开始的同情、体谅，变成了不耐烦和没办法。

在压力之下，李婧依然抗拒试管婴儿，一方面觉得自己还有信心能够自然怀孕，另一方面则是对于试管婴儿技术的不信任。

“成功率根本就没有宣传中的那么高，平均做三次才有80%的成功率。”“做试管时女方的卵子很大程度上都是打各种促排卵针催熟的，虽然官方没有正式说法，但是滥用激素得来的胚胎总归是不如顺应自然规律得来的健康。”……她用各种理由否定着试管婴儿。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要做试管婴儿，频繁就医会让她失去工作，她不想让怀孕这件事影响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李婧越来越讨厌自己被当作小白鼠一样去试验，于是她再次换了医生，这一次是纯中医。

中医不再频繁让她做卵泡监测，她和老公也不必按照规定同房。除了坚持服药和灌肠，中医更多时候劝导她一定要放松心情。她开始把工作之余的生活安排得丰富多彩，一周做两三次瑜伽，周末则去攀岩、骑车，或者在家里烘焙、看书、写作，她尽量让自己从怀孕生子的压力中解脱出来。

“我不想再过那样的生活了，我也不想为了生孩子放弃我自己的生活。”

重新夺回对自己生活的掌控权后，李婧慢慢发现，自己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都比之前好了很多。这让她更加觉得，怀孕是一件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事，她在等孩子自然降临的那一天。

8

还没休完产假，毕灵灵就急匆匆上班了，为了感谢公司在她过去一年生孩子过程中对她的体谅与照顾。她的领导曾在她住院期间多次看望，甚至还派了两个下属轮流照顾了毕灵灵两周。

由于早产，毕灵灵的一双儿女在体格发育等方面比一般儿童要迟一些。不过毕灵灵并不特别在意，她觉得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生长规律，慢慢来就好。

毕灵灵的老公时常对她念叨，等孩子长大了，一定要把当年怀孕的过程讲给他们听，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妈妈有多么不容易。毕灵灵觉得，经过这一番艰辛的历程，老公比以前更爱自己，更爱这个家了。

“孕育生命就是一场修行。备孕顺利就好好享受，不顺利就当作一种磨炼心智的机会，唯有抱有这样的想法，才能让自己从女孩变为女人，成为一个真正的母亲。”

然而发出这样感慨的毕灵灵，并不敢设想，如果怀孕依然未能成功，自己和家人此时会是什么状态？

（注：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本文所有人物均为化名。）

第七章 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

关于文章的修改和写作者的价值观

张春（知乎“盐Club”、TEDx演讲嘉宾）

我想讲两个部分的内容。第一个是关于文章的修改。因为据我所知，其他老师大部分是媒体从业者出身的写作者，而我是一个主要写散文的写作者，所以在文章的修改上他们的经验跟我会有不同的地方。第二个部分我想讲的是关于写作者的价值观。对这个部分我特别有感触，也是我独自思考、总结出来的对我很重要的部分，在此分享给大家。

我从修改讲起。我在“犀牛故事”这个平台做主编，我发现大部分写作者往往忽视一些很基础的问题，哪怕他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就是他基础已经非常好了，甚至已经写出来了挺完整的作品，但由于没有注意这种基础的小问题，还是会产生一些很刺眼的东西。在此我把这种基础的内容拿出来单独讲一下，大家可以有意识地去注意一下，也许就会进步得很快，包括我自己。

文章的修改：“的”“了”“我”

在一篇文章中，“的”“了”“我”都特别容易出现，但又特别容易被忽略，其实它们特别容易影响一篇文章的观感。我个人是比较细腻的，我会觉得它们非常刺眼。网上的很多文

章，还有杂志里的文章、各种大V在微信里的推送等都存在这个问题。

我分享一种简单易行但效果卓著的改法。

首先说一下“的”“地”“得”三个字的用法。

下面有几个例子：

1. “但其实明天还没有来，没办法浪费明天的，能被浪费的只有今天。”

A. 两个“的”都对

B. 有一个错

答案：A，“的”一般用在名词前，或用作代词。

2. “实际上这个谅解，在她往后的人生中依然能够随时地获得，但没有做到。”

A. 两个都对

B. 一个对一个错

答案：A，“地”在动词前。

3. “难道父亲得承担吗？可这些惩罚都成为松子一生的罪。”

A. 两个都对

B. 一个对一个错

答案：A。

有人说多少年前就取消“的”“得”“地”三个字的区别了，但如果我们阅读的时候都是“的”，还是挺刺眼的，如果分不清，可以反复读一下，基本上就能分清楚了。

下面讲“了”。

问题：“久美没有想到，松子意识到了一点，但不够清楚，她做出了反抗的行为，局部胜利后受到严厉的惩罚，形成了全面的失败：终生愧疚。”这里的“了”能不能去掉？

全去掉后是这样：“久美没有想到，松子意识到一点，但不够清楚，她做出反抗的行为，局部胜利后受到严厉的惩罚，形成全面的失败：终生愧疚。”

个别去掉后是这样的：“久美没有想到，松子意识到了一点，但不够清楚，她做出了反抗的行为，局部胜利后受到严厉的惩罚，形成全面的失败：终生愧疚。”

我觉得个别去掉可以，都去了会不舒服。

“了”是一个过去时态，如果太过密集的话，就可以用另外意思相近的词来替代，摘出来的话比较容易发现。

大家这样仔细琢磨非常好，希望大家也可以这样去挑剔自己的文章。

“了”就说到这里。

接下来说说“我”。

使用很多个“我”字，是每一个写作者都很容易出现的问题。特别是人们现在往往主要在写自己。这个我就不单独举例了，因为“我”可以用什么来代替，大家都是清楚的。我自己的文章也一样有这样的问題，都要在修改的时候才能发现它。这个部分我就不单独举例了。可以用一些代词来代替“我”，最关键的就是要有这个意识。

修改文章很麻烦、很枯燥，远远没有写一篇新文章那么有快感，所以没有关系，慢慢来，先让这件事情在我们心里形成一个印象，可以从这些方面去着手，不一定要马上做到，先做到心里有数就好了。

寻找文章的价值，调整素材

第一点，我们要记得最初写这篇作品的原因，说通俗一点就是不忘初心。

不忘初心就是不要跑题。跑题是非常容易出现的问题，跑题一般是怎么产生的呢？就是我们素材的重点不突出。我在这里扯一段，那里扯一段，洋洋洒洒就忘了这篇文章真正的出发点。

在我的写作课里，曾有一位学员写自己的爷爷。她写得特别好的一点在于，她在说自己对爷爷的爱。从头到尾都在写“我对爷爷的爱”，每一件事情都是在靠近这个主题。所以，她选取的素材里，没有一点冗余的东西，而是一直在说自己 and 爷爷的感情。她没有写爷爷这个人多么伟大，他的品质、他的美德，或者他跟奶奶的关系、他跟其他人的关系，从头到尾就是围绕着自己对爷爷的爱这个主题来展开。这就是这篇文章的初心。

我们如果在第一稿里没有写出来，没有突出它，那么我们在修改的时候，就要注意，哪些线索是跟这个主题没有关系的？我们先把它拖到一边，看它是不是真的有用，删掉它对这个主题有没有伤害？如果没有，就大刀阔斧地把它删了。一般来说，主题不突出，都是因为线索太多了，这种情况比较常见。

另外就是要去设想，自己的读者对文章中的典故是不是清楚。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你在对什么样的读者讲话。假如你是在对自己人讲，就像以前我在写博客的时候，我会直接提到一些人，因为我的博客都是我的亲友在看，那些人他们都已经很熟悉了。他们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人，我们大概是什么关系等，那就不用每次都去交代。

但如果你要在网上发布，那你就必须要交代你这里面出现的人、典故是什么背景，什么意思，它意味着什么。我做调整的时候，往往会发现我把我的读者当弱智了，这也是一个可能

性，把一些不必要的东西反复说，这会让这篇文章很啰唆，而且显得写作者智商很低。

这种情况要小心，就是你去想象你的读者是什么样的人，设想他是不是清楚你所用的典故和提交的人物。你想对什么样的人说话，这个东西是双向的；你要解释得多清楚，这也是双向的；所以你最需要明白的就是，你在对什么人说话。

最后一点，顺序和重点要向最初的目标靠近。

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调整素材。一般来说就是，你选择把你的论点放在哪里，在哪里去展开。你是徐徐前进、逐步深入，还是从一个非常拗口难懂的事情开始？是从一个悬念开始，再渐渐地展开深入，还是把那个最震撼的事例放在最后呢？这些就是我们在修改的过程中要去想的。

写作这样一种艺术形式，给了我们限制，同时也给了我们空间。这种空间就是它都在一条线上，那么我们就可以去安排它的节奏和重点。其实写作很像唱歌，你想象一下歌唱的感觉，你想怎样去整理它的节奏？你希望这首歌呈现什么样的面貌？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可以怀着一种感性的认知，你去想象它是一首歌，该怎么展示给听众？我们作为写作者，要怎么展示给读者看？

阅读是一种线性的过程，我们在读一篇文章的时候，必须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向后读，那它就是一种线性的过程。但是看

电影的时候，我们接收的信息不是一个字一个字来的，不是一秒一秒来的，而是一帧一帧来的。

像唱歌一样，你在线性地展开的时候，你要怎么排列重音？怎么排列节奏？有各种情况需要去感受、去琢磨。

朗读和打印修改

上面我说得很复杂，我是把它拆开了、掰碎了来讲的。其实，我觉得修改文章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朗读。

我最近感受很深的是，其他题材作品不像散文和小说那么注重韵律感。你要真正地去朗诵你的文章，把它朗诵出来，那是非常见效的。一旦读出来，不顺畅的地方就是不对的。

这里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四声歌》，这是播音员经常要练习的一个材料，涵盖了中国的四声。我们普通话的抑扬顿挫就是由四声组成的，但是《四声歌》里面的声要更复杂一些，区别了爆破音，也就是开口音、闭口音。

四声歌

学好声韵辨四声，阴阳上去要分明。

部位方法须找准，开齐合撮属口形。

双唇班报必百波，抵舌当地斗点丁。

舌根高狗工耕故，舌面机结教尖精。

翘舌主争真志照，平舌资责早再增。

擦音发翻飞分副，送气茶柴产彻称。

合口呼舞枯湖古，开口河坡歌安争。

嘴撮虚学寻徐剧，齐齿衣优摇夜英。

前鼻恩因烟弯稳，后鼻昂迎中拥生。

循序渐进坚持练，不难达到纯和清。

大家没事的时候可以读一读。不要以为这个跟写作是没有关系的，我认为两者关系非常密切，这对写作也是非常有用的。如果我的哥哥不是一个播音员，我可能很难注意到这个问题。他十多年前开始当播音员的时候，经常去找一些散文来读。然后我就会发现，他是有选择的。他挑选的是什么样的文章？他在读一些东西的时候，他在抱怨什么？他在修改什么？这些让我留意到了这个问题。

我发现一篇文章的响亮，或者是娓娓道来，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它的读音决定的。基本上我们会说一篇文章优美、感人，但是我们很少会注意到它是否朗朗上口。为什么说我们是在读文章，而很少说看文章呢？因为我们是在心里默读。

这个“四声歌”里面的句子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单凭发音，它就像一首诗一样，你就觉得它有情感在里面。这就是它

的音乐感和韵律感，这个东西天生就会传达一些信息。

一篇文章流畅与否、优美与否，跟它的音律有很大的关系。所谓朗朗上口就是要训练语感。我们前面提到的所有这些修改的大小事项，最后都可以在这个环境里体现出来。当一篇文章里有了错误的“的得地”，还有大量的“我”“了”，或者大量的名字，又或者顺序不对、重点不突出、情感铺垫不足等问题，在读的时候，你全部都可以感觉到。那怎么训练自己有更好的语感呢？如果我们之前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突然说找语感，可能会不得其法。下面这个方法也是我的播音员哥哥向我介绍的，他告诉我，训练语感最好的方法就是诵读古文。

千古名篇里面，就有最完美的平仄、韵律、节奏，你可以多看唐诗宋词。我基本上把语感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清脆响亮，一个是像情人的耳语一般喃喃细语。你看《四声歌》里全是闭口音的那一句，怎么都响亮不起来，再体会一下《将进酒》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上、来”两个字连着，一下子就显得大气了。

我读了一些千古名篇之后，再去读《全唐诗》，我发现没有出名的就是不怎么样。我感觉唐人写诗就跟我们现在写微博差不多，也确实有相当多非常平庸的作品。所以我们要去找那些最著名的作品来读，你就会自然地找到审美的感觉。

我觉得写作的终极境界，一是真，二是美。“美”这一点一定是可以通过训练得来的。

对自己得意的部分，在那些重要的句子、标题、开头或者结尾的部分，都要用上面所说的这些方法，去要求它像诗歌一样美，一样动听，给人留下印象。有可能这一整篇不怎么样，但是其中几句很好，也是一个很讨巧的办法。

关于斟字酌句的修改，我最后总结一下：第一，朗读它；第二，你把它打印出来再改，你会发现它在纸上和屏幕上的不同，这样你会改得越来越细致，直至让你感受改无可改。

下面我再讲写作者和读者的关系以及写作者和自己的关系，实际上讲的是作者的价值观。

写作者和读者的关系

我们在写作时和读者的关系、和自己的关系，不只是在写作中体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体现。这些关系是我们为自己定位的重要工具，也是我们做所有事情的出发点。

首先讲讲写作和读者的关系。我从一本书讲起，这本书叫《河童家庭大不同》，它是由妹尾河童的妻子风间茂子女士写的。

妹尾河童在日本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在中国也是一位畅销书作家。他是一个舞美设计师，也是一个非常有趣味的老头，他写了一系列有关偷窥的书。这本书，是他的妻子写的。这本书每一篇大概就是一千多字，是一整本的小散文，篇幅也不长。它从妻子的视角介绍了自己的家庭。风间茂子和妹尾河童两人有一个独特的婚姻契约，就是他们每年都要重新约定，

第二年要不要再继续一起生活。出版这本书的时候他们已经在
一起生活了40多年，他们这每年一次的约定，是来真的，也就
是每一年他们都要重新考虑这个问题。

风间茂子女士是一位很独特的女性，对于他们俩这种婚姻
契约，很多人是不理解的。我向朋友说起这本书的时候，有很
多人，特别是女性朋友，会觉得风间茂子做出了很大的牺牲。

这本书里有一两篇对他们的契约做出了解释，或者说是一个
说明。

妻子风间茂子在表达自己的看法。她说在跟河童结婚之
前，河童就是一个很花心的人。这是他本来的样子，没理由因
为结婚，他就改头换面变成一个新的人。既然他就是这个样
子，我爱的就是这个人，那么这件事情对我们的婚姻是没有影
响的。另一方面，她认为，如果两个人明明不想在一起了，就
因为婚姻的约定硬要在一起，是很可悲的事情。

所以他们俩有两个情况：一个是河童这个人很花心，他会
把情人带回家；另一个就是，风间茂子认为，花心不是他们婚
姻的障碍，但他们可能有其他的问题，因此她在每年一次的约
定中依然占据了主动。

大家可以略微思考一下，这本书的作者是谁？在对谁说
话？

下面我要讲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这套书我相信
很多人看过。我认为这里面作者和读者的关系，是作者对抱有

善意和好奇的读者进行民主启蒙。为什么是面向抱有善意和好奇的读者呢？第一，我是从这个书里的字里行间的语气感觉到的。第二，是因为一些意识。当天涯还是一个精英论坛的时候，林达夫妇这样的知识分子也常在天涯上玩。在很久以前，天涯跟中国的很多论坛一样，玩的人是很少的，最初能够使用互联网并且在互联网中和一些陌生人谈论事物、舞文弄墨的，都是一些知识精英。

那个时候天涯上还没有任何争吵、八卦、狗血剧情，那上面的文章，是真正的文章，就是这套书里这样的文章。后来天涯乃至整个互联网都发展了起来，加入互联网的人群也越来越复杂和庞大。据我所知，林达夫妇后期也和读者有过争吵，他们对网友的挑刺和抬杠是非常不适应的。他们没有办法在这种情况下，一边跟人论战一边再去写一些娓娓道来的东西。所以我想，在写就这本书的时候，他们俩完全没有想到，会有怀有恶意来抬杠的读者的。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大量的启蒙说理的文章，也就是所谓的公知文章，有很多是针对心智未开民智未启，也不善于讨论的读者讲的。这是现在很常见的情况，很多知识分子写的东西，满怀嘲讽，恶语相向。

举一个我们身边的例子，就是热了一轮又一轮的咪蒙老师。她勾住了一种读者。比如她讽刺实习生，为什么？咪蒙老师的广告收入从哪里来？从老板们来。所以她不能讽刺老板。咪蒙本身和读者构成了一个环境，反咪蒙也构成了一种生态。她的观点成了一种流行，反对她也成了一种流行。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写作者在想象自己的读者的时候，已经把读者分好类了，他们知道哪一类读者不会看哪一类文章。所以，写作者在写东西的时候，都要去想象一下自己的读者是什么样的人。

在我个人看来，这种想象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浪费自己。

因为你对同意你的人说一些大家都认同的看法，这有什么必要呢？你说得很开心很过瘾，这又有什么意义？你去反驳他，但你真正要反驳的人是不会来看这篇文章的。所以，其实这种反驳，这种痛快，是一种诱惑。我去反对这些意见，但是我反对的人根本不会接受我的意见。这就是一个个性上的选择了，你要考虑清楚，要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要不要去做一个这样的写作者？你要去对什么样的人说话？说什么样的话？

林达的书，用的就是一种娓娓道来的态度，我们是平等的，是可以坐下来谈论一些事情的，即我比你知道得多一点，我想把这些知识见闻分享给你的一种语气。所以写这套书时林达用的是书信体，就是在给自己的朋友写信。林达用这种体裁和口气，建立了自己和读者的关系。

写作者和自己的关系

刚才讲到的是写作者和读者的关系，下面我讲一下写作者和自己的关系。

我们暂时还是会处于写自己的阶段。我们不是记者，大部分人还是会从自身去寻找素材、观念，寻找自己的体验。因为

这部分是我们具有最多体验的，是最直接的素材来源。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最好还是从自己有感触、有兴趣、有情绪的事物中取材，因为这是我们能写好的实实在在的东西。我们能写好的，就是我们自己。

说到这里，你可能会想，我写一个人物，或者是叙事，说的明明是别人，怎么叫写自己呢？是的，我认为，在写别人的时候，我们还是在写自己。

我讲几个小故事来加以说明。

我有一个朋友在妇联工作，有一项工作是接妇联信访处的电话。有一天他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男人打来的，他状告他的情人。原来男人和他的情人都有家室，并相约一起离婚。现在男人已经离婚三年，女人还没有离。不仅如此，女人在他之外还有好几个男朋友。男人有时候会给女人一些钱，女人一有钱就拿去赌博。但是男人打电话来重点不是说钱的事，他就是气女人为什么不离婚，而且还有别的情人。

他实在是太生气了！他去报警，要求派出所管一管。派出所的同志说，你是自愿给她钱，不能算诈骗。男人说我不是要抓她。派出所的同志又问，你是不是说这是经济纠纷？他说不是。派出所的同志又问，那你这是什么事？他说是感情纠纷。他还说派出所的同志应该评评理，应该对女人讲，让她对他好一点儿。然后派出所的同志说，人家就是两口子我们也管不

了，何况你这还不是两口子！你这个事儿找妇联可能靠谱一点儿。于是，他就把电话打到妇联来了。

让他特别生气乃至去报警然后又来找妇联的原因，是女人说：“我们不就是睡了一下吗？你怎么那么多事？我老公都管不了我你管得着吗？”男人特别生气：什么叫不就是睡一下？她没有感情的吗？我在妇联工作的朋友跟他说，这件事儿我们真的也管不了。

我这位朋友在妇联信访处接过上千个电话，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女人打过来的。被家暴得走投无路的女博士，被小三骗钱的女老板，贫穷到绝望的母亲，众叛亲离的未婚先孕少女。接到这样的男人的电话比例大概是几千分之一，他接过的所有电话里就只有这一个男人为自己声张权益的。

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感觉是，我挺想认识一下这个女人，我想问问她，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是怎样意识到你有这样的自由的？但这是我以前的看法，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好几年了。

这个故事里，主要有三个人，一个是打电话的男人，一个是风流的女人，还有一个我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人，就是女人的老公。这个老公会怎么想呢？最开始我想她老公可能挺没办法的，娶了这样一个老婆。后来我就想，这个老公可能也是一个花心的人。再后来我又有了一种想法，说不定这个老公觉得女人这样很有魅力，他就是喜欢自己老婆这样。也有这种可能，对吧？

下面我讲三种开小店的人的故事。

一种是日剧《深夜食堂》里的大叔那样的人。大叔每天晚上开门营业到早上七点，他的客人都是一些夜班工作归来的人。看过这个日剧的人就知道，大叔他从来不作声，他不参与任何事情。作为一个观众，他不对任何人的事情、言行做出判断，他就是在那里一直默默地听着。

另外一种开小店的人，是《武林外传》同福客栈里的一群人。他们在掺和所有的事情，他们彼此之间发生故事，又加入别人的故事，他们把这个店开得热闹非凡。所有的故事来来去去，一直在这里上演着。这也是一种开小店的人。

第三种开小店的人，就是“晴天见”里的我。我也是一个开小店的人啊，也写过一些“晴天见”的故事。我的那本书《一生里的某一刻》第一个大章节主要就是“晴天见”的故事，也就是我的故事。我没怎么写到客人，即使有客人也是我的朋友，是我很了解的那些人，除此之外还有店里面发生的细枝末节的各种小事。

这第三种开小店的人，跟前面两种又截然不同。在“晴天见”的故事里，“我”就是主角。在深夜食堂里，那些客人是主角。在同福客栈，是他们掺和进去跟每一集不同的客人一起成为主角。这是三种不一样的开小店的人。

我想说的是，你的感受、你的经历、你的变化，跟你写下的故事是密切相关的。人是一直在流动、一直在改变的，我们

作为写作者，一定要警惕一件事情：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准则，不管是正向的也好，反向的也好，它形成了一种准则以后你就要警惕了，你是不是把自己固化了？

如果我们认真思考，就会察觉人性的丰富性和独特性。当然你也可以偷懒，选一个现成的观点，去站队进入阵营，但是偷懒的话，便只能建设起一种空洞以及越来越固执的价值观。我们写出来的作品，要有独特的经历和价值观，并且只有能够表达这种独特性，才能成为真正成熟的写作者。

所以当我们有一个主题，开始收集、筛选素材并动手修改时，就可以用这些问题来梳理思路，让自己的价值和观点贯穿这个作品。它将会使你看到更多的东西，不光是看到世界，看到读者，更是看到我们自己。

从这个角度来说，写作是一件非常寂寞，需要非常冷静并且诚实的工作。这也是我个人喜欢写作的原因。我相信只有很少人可以做到，因为诚实有着非常丰富的层次，需要巨大的勇气。但我相信在读这本书的你正是想要这样做的人。

写作这种东西，表面上的术，是可以学习的。但使你成为一个独特的、成熟的写作者的，最重要的部分还是价值观，是你独特的对世界的认知、对自己的认知、对事物的见解。这个部分有非常丰富的维度，它可以让你区别于其他人，而且变得无法模仿。这才是一个写作者最关键的能力。

你知道为什么真实会让你的作品跃进吗？因为对于文学来说，形式、文笔、内容全都是可以模仿的，如果作家最内核的价值观、态度、风度没有形成的话，他的作品就永远只能是大路货，而且它们会很有限，很快就会被消耗完，被掏空。相反，作家的价值观、态度、风度一旦形成，就会变成独特的、不可取代的，其作品也会迈向成熟的文学。

以上，我觉得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没有提到，写了很久也没有想过的事情。我希望朋友们可以注意到这些，用更勤勉的思考、更丰富的际遇，去丰富自己的作品。

好文章是改出来的

万千（三明治主编）

修改是完成文章的重要环节，可以说是文章的“整容术”。所有好的文章都是一遍遍打磨、找感觉写出来的。

不过完成文章初稿是一件很值得庆祝的事情，因为至少你已经克服了不动笔的心理障碍。

在和很多写作者交流时，我们常发现许多人即使有写作冲动，但是依然会有很大的心理畏惧，导致自己迟迟不动笔。也许是拖延症，在准备开始写之前，总会被分心；也许是追求完美的强迫症，觉得自己素材积累得还不够，还达不到开始写的程度。

但其实没有一个作家一开始就能写出好的东西。所有作家都在很艰难地写作，都花了很多时间在打磨自己的文章上。当你已经确认清楚自己想写的故事主题，梳理出已有的写作素材、故事人物关系之后，一定要开始写。如果一开始就想要写一篇主题宏大、意义深远的巨作的话，那这篇巨作有可能永远都留存在想象中，无法完成。

在写初稿的时候，可以尝试做加法，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在修改的环节再多考虑其他因素。可能写了一千字，删掉九百字，最后留下的那一百字才是好东西。但前提是，写作者要先

写出那一千字出来。没有哪位作家是一下笔就生花的，每个普通人也都一样。

关于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我们总结了一些经验。这些经验来自于我们在很多普通人写作中经常发现的一些“问题”，大家可以对比检查一下，自己的文章里是否也存在这些可以修正的地方。

首先要过“字句”这一关

语言流畅，听起来是一个很简单写作要求，但实际上在真正修改、编辑时，写作者如果不够细心、专业的话，会在文章里留下很多差错。比如，“的、地、得”的用法是否出错？句子是否加了不恰当的衔接词？是否过度使用了副词？在写完初稿后，一定要自己重新读上几遍，以便发现不必要的重复和累赘。

我们之前读到一篇作者的文章，记录的是自己留学英国时一位给她印象非常深刻的房东。作者的语言很优美，但是在她的故事里有一个很重大的错误，就是经常缺少主语，造成表意不明。这其实是非常容易避免的错误，但是作者因为自己是“当事人”，总会想当然以为信息已经传递到位了。但是作为读者并不知道她想表达的是什么，自然也会削弱文章的力量。

要检查自己的字句，避免低级的错误，甚至包括检查标点，是否每一处都正确使用了？就连省略号这件小事，有时候

我们也会看到一篇文章里，有三个点的省略号，有五个点的省略号等等。写作，毕竟和发送微信消息是不同的。

想要成为一个专业的写作者，首先作者自己要用更专业的心态对待你的文章。

在修改中，确立自己的风格

有时候我们在看一些文章时候，会觉得很可惜，因为文章的题材可能是还不错的，但是作者写得“没有意思”。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感觉呢？很有可能是文章里用了太多的陈词滥调，或者说，比较陈旧的用语等。

比如在形容一个人的时候，只会给一些模糊的标签，比如美丽、聪明、勇敢等，但是没有用任何具体的事情来呈现出为什么在他人看来这个人身上具有这些特点。我们希望每个写作者都能写出自己真正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事情，而不是只是千篇一律的表达。

另一方面，过度使用网络流行词语也是要反思的。比如“666”“我真是醉了”等。因为网络表达其实是讨巧的、速朽的，经不起太多推敲。使用太多，这篇文章就会变得非常的大众化，人人都能写出来，看不出丝毫的个人风格的印记。写作者应该要减少使用那种不过脑子的词语。

我们希望大家写出来的文章统统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也不希望看到一个写作者变成一个陈词滥调的制造者。我

们更希望看到每个人都使用自己独特的语言。这也是一个作者形成自己语言风格的必经过程。

关于素材的取舍

当我们费劲心力，终于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完一篇完整文章了，这时要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了：怎么取舍素材。

修改是一件很麻烦很枯燥，远远没有写一篇新的文章那么有快感的事情。因为文章可能笔走龙蛇一气呵成，但修改，就必须反复咀嚼，在众多素材中做取舍。

如何取舍素材？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回到刚开始写作时的初衷：你想写这篇文章的出发点到底是什么，你最想表达的是什么？

所以素材的取舍，就是围绕这个主题来做的。要保证主题突出，所以文章里所使用的素材，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个细节，都一定要为这个主题服务。一旦有分叉，主题就会散，重点不突出，故事就不好看。很多故事不够吸引人读下去，就是因为线索素材太多了，什么都想说，反而什么都不突出。

“想写”和“实际写下来”其实是两码事，大多数时候人们想写的事情太多，但是真正能写下来的少。有时候，写作就和吃饭一样，满汉全席一顿吃不完，专心做好一盘精致的菜就已经很不易，切忌贪多。

我们发现有些写作者很舍不得删掉自己已经写下的内容。但其实，这不是一个好的写作者应有的反应。最好的写作者一定是自己稿子最好的修改者或删除者。

为什么要学会自己删除呢？因为这个删除的过程本身就是写作者换角度思考的过程：如果我是第一遍读这篇文章的读者，哪些部分是没用的？哪些部分只是作者自己的爱好，但对读者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呢？

要学会自己删除稿件中冗余的部分。在完成一篇作品后，我们要从作者的身份中跳脱出来，以更为冷静客观的姿态，像一个编辑一般去看待作品，给自己提出苛刻的、严格的修改意见。

江夏里：一座上海老房子见证的知青两代

龚晗倩

吴青青，13岁

1996年，吴青青来到上海已经三年了，从操着一口浓浓乡音到流利地使用沪语，她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能够和身边的人顺利交谈，并不意味着真正的融入。无论怎么努力，她终究是不被接纳的，这一点，13岁的吴青青深深地知道。

来上海以前，吴青青一直和父母住在皖南的小镇，在那里度过了恣意妄为的童年，她没有想到命运会毫无征兆地垂青于她，让她走出小镇。

其实上海对于吴青青并不陌生，从记事起的每年春节，父母都会带吴青青来上海玩几天，因为这里有好公好婆（常熟方言，指爷爷奶奶）、娘娘（姑姑）、叔叔。每次过年吴青青都能吃到好多新奇的零食，像叔叔从国外带回的巧克力，用牛油纸满满装了一大袋，还做成有趣的汽车形状，迫不及待地送入口中，顿时被醇厚香浓的可可味道填满。吴青青觉得乡下的金豆巧克力除了廉价的甜味，就不剩下什么了。

吴青青怀揣着兴奋与得意告别了乡下的小伙伴们，在众人艳羡的目光中来到了上海这座大城市生活。父亲带着吴青青住进了好公好婆位于虹口区苏州河边上一个里弄的老房子：江夏里。

江夏里大约20世纪二三十年代建成，除弄堂口附近的几户人家沿袭了石库门的青瓦砖雕和圆瓦顶、两扇厚重的黑色木门配以铜质门环以外，里面的门洞都是简易的单扇门面。在狭窄的弄堂里拐几个弯，沿着木门上的绿色铁牌上的数字找过去，便来到那个熟悉的门洞。

进门是公共厨房，门边是石头水槽，水槽上方高低错落着三个水龙头，属于住在这栋房子里的三户人家。靠墙立着两个摇摇欲坠的架子橱，里面摆满了锅碗瓢盆、瓶瓶罐罐。每次经过厨房，青青都尽量轻盈地“飘”过，以免沾上架子橱和煤气灶上的油垢与灰垢的结晶物。由于是公共区域，大家都很好地推脱了清洁打扫的责任。所以整个厨房的色调是暗沉的黑色，细看连窗棂上都厚厚的长了一层黑褐色“绒毛”。

穿过厨房，是一条只容一人通行的窄道，几只洗澡用的大木盆竖起来斜靠在墙上，还有一些杂物堆积墙边。通道的尽头左手边是一扇门，里面住着一家三口，再往前就是天井院子和铁门，一般由一楼人家出入，住在楼上的自觉地从前门进出。后来一楼住户在天井里搭建了卫生间，从此摆脱了“马桶”。

靠厨房一头有一段接近80度的楼梯，每一级阶梯都只有半只脚宽，上楼下楼必须侧着身子斜脚踩上去才能站稳。左手边有一截贴墙的栏杆，落了几十年的浮尘，偶尔站不稳拉一把就满手灰。

右手边是一间五六平方米的亭子间，住着一位阿婆。门是推拉木门，年代久远的木槽没有滑轮，每次都要使劲往上抬一

下，才能拉动打开。进去后需要弯着腰，因为层高只有1米左右。里面没有窗，只有一个通风口，漆黑一片。阿婆在这间无法站立的“鸽子笼”里住了一辈子。

楼梯上去是一个半平方米左右的平台，左手边是一间大一些的亭子间，可以直立行走，窗下能看到下面的弄堂，这间小房间住着阿婆的女儿女婿外孙一家。

平台的右边有五六级台阶，上去后正对着的房间是好公好婆的卧室，右手边是饭堂间。卧室朝南，每天清晨有阳光洒进来，透过淡绿色百叶窗的缝隙，把黑色的木地板镀上一层光，能看见蓬起的尘轻轻浮在光线里。

吴青青刚来时好几次想进去晒晒太阳，和好公好婆玩一玩，悻悻地发现门上了锁，进不去。也对，好公好婆不会讲普通话，和孙女鸡同鸭讲，毫无意义。所幸吴青青很快学会了上海话。

后来吴青青想看班上同学说得神采飞扬的动画片，敲门进去，好公好婆在看苏州评弹，电视机里坐着一男一女，男人一袭黑色长衫，女人身着艳丽的旗袍手持琵琶咿咿呀呀地唱着吴侬软语。每天晚饭后的评弹是好公好婆的保留节目。傻傻地听他们唱完已是9点多钟，动画片也结束了。吴青青怅然地回到自己的阁楼。

从二楼上到阁楼，需要放下墙上的黑色木头挂梯，在通往阳台处转身爬另一段更窄的楼梯。每一级木板之间是宽大的空

隙，吴青青总是担心自己会一脚踏空掉下去摔死。

在好公好婆的房子里有严格的规矩，比如食不语，好婆告诉青青，吃饭时讲话会咒死娘。吓得吴青青一句话也不敢讲。

有一次吴青青实在太想看动画片，便想端着饭碗去卧室边吃边看，被好公严令喝止：“吃饭不许看电视！没规矩！”吴青青也气急败坏了，吃完饭老人要睡午觉，下午和晚上他们都要看评弹节目，凭什么电视机只能被好公好婆霸占，凭什么自己不能看动画片！她冲着老人直嚷嚷，还和好公推搡了一把，赌气地爬上阁楼，把木门“砰”的一声甩上，重重地将小板凳砸向地板，发泄了一番终于怒气消退了一些。

过了一会儿，好婆喊青青：“下来吃饭吧，肚子饿坏了可不行。放心吧，我们不打你。”她喊了好几声，吴青青下去了。知道自己刚才有点过分，她低着头刚想认错，好婆一拳打在吴青青的鼻梁上，鲜血流淌下来，点点滴滴的猩红像落下的凤仙花瓣。吴青青蒙了，她哭着跑回阁楼，吓得把自己反锁在屋子里，一整天都没有下楼吃饭。

后来好公好婆再也没有动手打过吴青青，因为她变乖了，从来不会提出要求，只是坐在那里安静地吃饭，然后回到阁楼，也不再吵闹着看动画片。她像一块木头，没什么反应。她终于认清了自己的位置，不是撒娇卖萌的小孙女，而是寄人篱下的乞讨者。在大上海，有一个屋顶遮风挡雨，有不用发愁的一日三餐，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奢求呢？

有一段时间，吴青青总想着出走，到了晚上，收拾几件细软放进包里，像一只壁虎一般沿墙上的挂梯爬下去，可每次都被好公听到响动，跑出来抓个正着，她耷拉着脑袋又回到阁楼。其实也没有目的地，不知道还能投奔谁，娘娘和叔叔都对她们很好，但毕竟那是别人的家，不是她的家。

后来吴青青不再背着细软，而是等到过了12点，轻装上阵爬下挂梯，终于成功了，没有被任何人发现。她走出老房子，来到马路上，苏州河就在一旁静静地流淌，散发出阵阵腐烂的臭味，桥上没有行人，她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便又回到弄堂里。

吴青青走进江夏里隔壁的经纬里，这条弄堂靠近马路的一段很宽大，给人一种安全的感觉。而且这一段有路灯，照亮着脚下，走到一百米处的夹竹桃树下，一桌上身赤膊的男人饶有兴致地搓着麻将。吴青青不懂搓麻将，便转弯进了狭窄的支弄。

支弄里没有路灯，漆黑一片，和白天的嘈杂相反，听不见说话声、电视机声、收音机声，吴青青不禁怀疑，这么多的屋子门洞里面真的住了许多人吗？还是到了夜晚，所有的人都去了另一个世界。

越想越害怕，越害怕越不停地走，吴青青觉得自己来到一个没有尽头的迷宫，所有的路都相连，一条刚走到头，马上出现了另一条路。路上的景象都很相似，黑色木门，旁边有方形的石头水槽，水龙头上反罩着一只易拉罐，有的还上了锁，门

的另一边有时会凸出来一间私砌的水泥房当作底楼某户人家专用的卫生间或厨房。

心跳到嗓子眼的吴青青飞快地走着，不时回头看有没有黑影跟着，到后面索性跑了起来。终于七拐八弯转到了一个极其狭小只容一人通过的不起眼的小巷，竟然通到了马路上。吴青青长舒了一口气，辨认出这是海拉尔路，路上随处可见垃圾和脏水坑，不远处是三角地菜市场。

弄堂探险从此成了吴青青的秘密，她从未如此期待黑夜的到来，虽然怕黑，但夜色中的弄堂迷宫有一种无法细说的魅力，让人想一探究竟。吴青青一遍又一遍地走过那些宽宽窄窄的小路，试图记住每一家门口的特殊标记，找出每一个通往外界的出口。过了很多年以后，她才猛然发现，这几个相连的弄堂加起来也就是一个街区，绕着街区完整地走一圈也不过是十几分钟的时间。

住在“鸽子笼”的阿婆时常关心吴青青。每次看到她，都会和气地问长问短，吴青青很羡慕亭子间的哥哥，有这么和蔼可亲的外婆，所以常去亭子间玩，还能看到动画片。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吴青青觉得不太对劲了，阿婆常常拉着她一遍遍地问什么时候来的上海，父亲现在在哪里之类的事。后来吴青青总听到亭子间的阿姨破口大骂：“死不掉的，又拉屎拉在身上也不说，臭得要死。”这才知道阿婆得了老年痴呆，经常忘了洗澡换衣，大小便失禁也不自知。

吴青青最后一次听到阿婆的声音，是一个冬天的清晨，时针指向6点，外面的风刮得生猛，像是能卷走地上行走的一切活物。

“鸽子笼”的阿婆吵着要出门，却不知大门在哪里，在老房子里迷了路。她敲打着好公好婆的门，大声叫着开门，她要出去。好公一直没有开门，在里面回答她：“你走错了，门在下面，这里是二楼。”亭子间的阿姨也被吵醒了，叫嚣着：“你怎么不去死！你去死掉好了！”阿婆找到了离开的路，走出了老房子，再也没有回来。

后来，吴青青听说亭子间的阿姨在外面找了好多天，一直没有找到阿婆。“鸽子笼”成为堆放杂物的空间。

吴青青的阁楼也有至少一半是用来堆放东西的。靠近阳台的那一半屋顶是个45度角的斜坡，好婆把多余的被褥、箱子、杂物都堆在这里，用一块发黄的麻布盖在上面。吴青青曾在箱子里翻出许多包着牛皮纸的脆弱泛黄的书，那些是上一任主人叔叔留下来的，她津津有味地读完一本又一本。她喜欢在这个角落待着。

有一次，同学来阁楼玩，指着那块脏兮兮的麻布说，这下面像一具棺材。

吴青青晚上有些睡不着，倒不是害怕棺材，而是隐隐觉得，这里一定埋藏了什么。

吴世人，14岁

1968年5月，江夏里搬来了一户人家，老老小小八口人。

吴世人跟着父母在弄堂里左拐右转进了一扇木门，他踩着吱吱呀呀的楼梯一直上到了顶层的阁楼。阁楼不足8平方米，进门需要弯腰，阁楼的木门高不过一米，屋子中央有一个四方的玻璃窗，由一根木棍撑起。屋顶有一个大斜坡，斜坡下的地板便是接下来一千多个日夜的栖身之处。

吴世人排行老大，又是男孩，主动要求和两个弟弟打地铺，两个妹妹跟着外婆睡在大床上。对于吴世人来说，这是他期盼已久的、小小的、拥挤的却难得的容身之地。

这一年，他14岁。

从出生起，吴世人就开始了他奔波流离的人生。几个月大时便被父母送往常熟老家隔壁村的人家寄养，5岁多的时候才被接回父母身边，与几个弟妹挤住在静安区的一个弄堂口搭建出来的不足10平方米的狭长房子。几年以后，父亲在工作的机床厂分了一间房，吴世人和弟妹们迁往杨浦区。两年以后，全家又搬至虹口区塘沽路上。住了一年多，再次搬家，这一次，他来到了苏州河边的江夏里。这房子够大，有一个二楼朝南的卧室、一个饭堂间，以及一个阁楼。

不断搬家的那段时期正好是“文革”爆发之时，街上经常看到有人被批斗，戴着高帽子游行。吴世人在小学里也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红小兵”。

与红卫兵不同，“红小兵”没有荣誉袖章的标识，走在路上也没有趾高气扬的底气。当时学校不怎么上课，喊口号和背毛主席语录占据了大量的时光。

吴世人常常闲得无聊，与同学们晃到鸭绿江路的车站坐公交车玩，那时的公交车班次少，车上的人挤得前胸贴后背，一群“红小兵”蹿上车不买票，还热烈地给乘客们高唱宣传歌曲，惹得公车司机不胜其烦，乘客们虽不堪其扰，但为了显示政治正确的态度也不便出言喝止，只能劝说着：“唱累了吧，下车去喝口水吧。”

搬到江夏里的同年，吴世人到溧阳路的新沪中学就读，学生们已经闹着复课学习知识，批斗的浪潮渐渐退去，语录被翻来覆去地唱着，也失去了昔日的激昂之情。初中三年平静如水，第四年开始学工学农。

吴世人的班级50多人全部被分配到苏州河畔香烟桥路的益民食品厂，厂子很大，学生们分别入驻了不同的食品车间，有冰激凌、巧克力威化、罐头等，吴世人被安排在了软糖车间，他的工作是站在流水线包装机器前，盯着一个一个牛奶糖、花生牛乳糖从裸露着粉嫩的玉体到穿上薄薄的糖果纸，这份工作对他来说实在是不容易。

幸好有些糖果纸包裹得不够服帖或是歪歪斜斜的，吴世人便将这些衣着不得体的糖果拣出来，糖果的命运就此改变，逃脱了被装箱存储仓库的集体生活，却被装进了少年的口袋，最

终进了全家人的肚子。有时候糖果太多，便被吴世人拿来与同学们交换肉罐头、冰激凌和巧克力威化。

幸福的日子只过了半年，与糖果的纠缠到此为止。吴世人在那个冬天与十几位同学去了崇明岛的堡镇。带吴世人的农户家里有一片广袤的油菜地，完成每一次翻土、播种、施肥、收割均需要一个星期时间。在一片片明黄得刺眼的油菜花丛中穿梭来去，手持镰刀从根部割下一株株结了籽的油菜杆，把收割的油菜杆和累趴下的自己摊晒在田埂上发呆。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未知的命运一天天逼近。

从堡镇学农归来，到了毕业分配之际。不似20世纪60年代末的“一片红”（全部下乡），吴世人毕业那年面临四个选项：当地工厂、郊区农场、外地工厂、上山下乡。

然而，吴世人仍然是被选择的那一个。同期毕业的学生家中有哥哥姐姐已经下乡的，学校会优先安排这些学生进当地工厂和郊区农场作为照顾和补偿，次之外地工厂。轮到老师来找吴世人时，只剩下了上山下乡这一个选项。而一旦下乡，便意味着永世不得回城。吴世人不愿意，他想去工厂，当地或外地都行。老师一次次来做思想动员，去工厂不可能，只有下乡一条路。吴世人是长子，只有他下乡了，下面的四个弟弟妹妹才能有更好的出路。

1972年12月寒冬，学校把打包好的被褥、席子、棉袄、夏衫统一发往十六铺码头，吴世人登上逆流而上的江轮，把青春的记忆全部埋葬在了江夏里阁楼的斜顶下那个曾经让他得以安

身的角落。他奔向更加广阔的天地，却不知何处是归巢，也许注定一辈子流离失所，随波逐流。

吴青青，20岁

亭子间的阿姨一家搬走了，住进来一位神秘的女租客。年龄四五十岁，褪色的黄头发在脑后高高束起极短的一小撮，面色如多年没有翻整过又经历了暴晒的泥土，又干又黄。

从她搬进来的第一天起，亭子间便响起了“叮叮叮、咚咚咚”的敲打声。短马尾女人把沿着弄堂的两扇窗用一根根铁条装起了栅栏，窗子关得死死的，再用透明的厚塑料严严实实地堵住缝隙，形成了密不透风的空间。

她从早到晚敲个不停，隔壁邻居老孙有意见了，嚷嚷道：“敲什么敲？白天敲晚上也敲，还让不让人清静了？”短马尾女人一声不吭，老孙见她来接话，也不敲了，便当没事了。谁知过了几日，一天晚上，短马尾女人突然大声喊道：“不要脸的臭男人，偷看老娘洗澡，没看过女人吗？不要脸！”隔壁老孙吓得不敢回话，他还是单身，怕一接话就扯不清楚了。

住在老房子里，洗澡是一件麻烦事，江夏里建造的时候没有设排污系统，所以屋子里没有卫生间。洗澡只能在进门处的公共厨房解决。一个人洗澡，所有人家都不能烧饭，也不能进出。夏天洗澡很闷热，对着弄堂的窗子总是不会关紧，而是留一条缝。吴青青多次在洗到一半时，被亭子间的阿姨叫开门，

让放学回来的哥哥上楼写作业，她只能光着身子躲在门背后让哥哥穿过厨房。

在夏天的厨房里洗澡最可怕的事，不是被人偷看，而是一盆水浇上身，溅起水槽里蟑螂无数。后来吴青青再也忍受不了，转而深夜在露天阳台上对着月亮沐浴。

短马尾女人偶尔开门出来，吴青青便闻到从亭子间的密室里飘出来一股浓烈的说不清的味道，不是单纯的臭味，更像是一座古墓封闭千年以后被打开时散发的毒气，能把人熏得晕死过去。幸好吴青青平时在学校住宿，周末才回来，得以避而远之。

母亲何秋平来上海找活干，在姑父介绍的纸箱厂当工人，晚上睡在阁楼里。她睡眠很差，极易惊醒。连续几夜，何秋平听到有人在凌晨一两点钟窸窣窸窣地摸上楼，待在阳台上好一会儿，又极轻地下楼。清早起床去阳台上一看，晚上晾在窗檐下的衣服上有一口淡黄色的痰渍。

有一天，何秋平在厨房做饭，遇见了短马尾女人。短马尾女人向何秋平借梅花起子，何秋平说没有。短马尾女人转身问隔壁的张大叔借到了。此后短马尾女人嘴里就不干不净，骂骂咧咧：“垃圾，一家人全是垃圾。”吴青青起初不以为意，以为她只是发泄而已。

一个周末的晚上，吴青青上楼时经过亭子间，又传来了短马尾女人的声音：“垃圾！死老公的寡妇，寡妇命，生赔钱货

的命，垃圾……”吴青青瞬间明白过来，脱口而出骂了女人“傻×”，这一骂就像按下了“发射”键，短马尾女人箭一般冲出亭子间，刺鼻的气味把吴青青熏得踉跄，女人的叫嚣声一浪盖过一浪：“你骂谁傻×？小小年纪就骂人，有什么样的娘就有什么样的婊子女儿……”

何秋平操起一把扫帚挡在吴青青前面，用高亢的声音压过短马尾女人，引得左邻右舍都来观战，她属于得理不饶人的，平时说话细声细气，一旦惹恼了她，母老虎的架势就出来了。何秋平原先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听到短马尾女人骂归骂，不理她就是了，这次短马尾骂到女儿身上，便愤然反击，并且要让所有邻居评理。邻居们了解吴家的安分守己，都站在了何秋平一边。

这一役之后，短马尾在亭子间的门上又加了一把锁，“垃圾”时刻挂在嘴边，何秋平发现阳台上的衣服多了许多痰渍。于是她带着吴青青去居委会，让工作人员转达房东赶走短马尾。后来亭子间的阿姨过来看见窗上密密的铁栅栏，吓坏了，这还是房间吗？这是牢监啊！她也怕短马尾精神有问题，闹出什么更严重的事来，便让她赶紧搬走了。

秋天过后，何秋平也离开老房子回到了皖南，她的妹妹拉着她一起做服装生意。吴青青的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一潭死水。寄宿于校园时还能和同学室友说说心里话，到了寒假，所有人都回家与亲人待在一起，吴青青失落地回到空荡荡的老房子，这个她从来不认为是“家”的地方。

好公几年前去世，好婆每天忙着去公园健身聊天、寺庙烧香、听电视里穿着长衫的男人拉二胡唱评弹。

吴青青总是一个人。

她渐渐地不想起床，觉得阁楼里冷极了，头顶上的窗外是灰蒙蒙的天，看不到一抹云彩，只见到窗下蓬起的灰尘。及腰高的木门缝隙大得很，风嗖嗖地灌进屋子。屋顶上一道道黑色裂缝纵横交错，蜿蜒着布满了整片石灰墙顶，下暴雨时总能接满一脸盆雨水。床边的矮桌上躺着一本从弄堂口书摊上借来的书，吴青青几经纠结，终究没有伸出手拿书，外面太冷了，把手捂在被窝里压在屁股下面，才能保留一点余温。

好婆房间的钟敲响了12下，吴青青还是没有起床，她憋住了尿意，好像极度寒冷时把尿保存在体内也能感觉更暖和一些。时间一秒一秒地流走，窗下的灰尘还在起舞，它们不觉得饿，也不会累。吴青青觉得自己就像这微光下的尘埃，不吃不喝也不会饿、不会累，轻轻地来，悄无声息地走，无人关心，无所留恋。

她睁大双眼，抬头只能看到不足半平方米的一片天，外面的世界那么宽广，她却无力走出禁锢住自己的这一张床、一方阁楼。她与世界无关。

里尔克说：谁此刻孤独，谁就将长久孤独。

吴青青控制不住地想念皖南小镇，想念父亲的自行车后座，想念母亲的轻声细语。那些爬在桑树上摘桑葚、在田野里

奔跑的记忆仿佛是发生在上个世纪了。

下午3点，吴青青忍到了极限，拖着发软的双腿坐到痰盂上，屋子在头顶旋转，身子轻飘飘的，有那么一刻，她不确定自己是生是死还是升仙了。起床后吴青青去饭堂间找到好婆留下的冷饭，在微波炉里热热，吃了一顿也是这一天唯一的一顿饭。

这个寒假的大多数时间，吴青青都在不想起床和抵抗尿意中度过，假期快结束时，她生病了。本来可以憋尿达18个小时，却突然尿频到几分钟一次，去药房买了三金片吃，不管用，后来发展到每尿一滴都伴随着疼痛痉挛。吴青青继续忍到了学校开学，医务室的医生看着量杯里浅浅一层浑浊发红的液体说：这是血尿啊，你再晚一点来，就要得肾炎了！

在医生和室友的照顾下，吴青青的病好了，从此不再憋尿，只是不想起床这个毛病，却是治不好的了。

吴世人，21岁

徽州小镇，瓦垄红旗公社，五名来自上海的知青住进了生产队。这个生产队由近百名当地农民组成，生产队长让五位知青分别轮流跟着农户们下地干活。

早上天麻麻亮的时候，生产队长一声哨响，吴世人起床洗漱，吃稀饭咸菜，然后背着工具劳作，见月亮时才从地里回生产队。春节后翻土，谷雨时插秧，赤着脚把裤腿卷到大腿，一

天下来总是能收获几只水蛭，在腿肚子上吸得牢牢的，用力拔下来一甩，皮肤上留下一抹血迹。

春天播种，秋天收获水稻、小麦、高粱、山芋、油菜，还有黄豆、绿豆、赤豆。种山芋最容易，因为不用打农药也不用施肥。黄豆次之。家家户户都存了好些黄豆准备过冬，年前把豆子拿到豆腐作坊磨成豆面，再做成豆腐，放在凉水里浸着，这样豆腐就不会坏，能吃一个冬天。

农村里吃时令，四季豆、辣椒烧茄子、山芋、大白菜是桌上最常见到的小菜。有时候吃不饱肚子，几个知青会从农民的地里挖几颗大白菜来炒着吃。冬天的大白菜快有膝盖高了，一颗可以吃好多顿。农民发现后心疼这些大白菜，又对知青不忍心，于是常隔三岔五地送几片大白菜最外面一圈的菜叶来。

吴世人身体瘦弱，挑担挑不好，农活也做不动。在农村，施肥主要靠浇大粪，从粪池挑两大桶粪到地里，一根长扁担，肩挑两头，一歪一扭地走，边挑边撒，后来吴世人学聪明了，把粪桶装得浅浅的，就是要来回多挑几次。他咬咬牙坚持了下来。同时下乡的一位知青一年后就逃回了上海。

第三年，生产队长不知是出于怜悯还是嫌弃，将吴世人派去看山，从此他摆脱了粗重的田地农活。在吴世人看来，与其说是流放山头，不如说是自由自在的美差。

连绵的群山中一座不高的山头是属于红旗公社生产队的，当地人叫它“金山”，不过山里并没有金子，只有高耸入云的

密密的松树、从整片深深浅浅的绿中钻出来的一簇簇的映山红，以及杂草中零零落落的野菊花。

吴世人每天早上绕着金山走两遍，下午再绕山两圈。常有农民来砍松树回去做个木头家具或是当柴火烧，他的职责是阻止私自砍伐。有时会遇到放牛娃，抽着手中的鞭子吆喝着，吴世人会停下来，随意聊两句，看到牛啃树也要喝止，再继续上路。猛兽没碰到，獐子倒是见过，长得有点像雌性梅花鹿，短小的耳朵极为灵敏，一听到响动便轻盈地跳入灌木中。

很多时候，吴世人在山中走了一天一个人也没有见到。他每天更换不同的路线把金山的角角落落都走了个遍，走累了就躺在山坡上望着蓝得发白的天，太阳照在身上暖暖和和的，连心底最深处的孤独都被热烈地感化了。

夏天太热的时候，吴世人会钻进松树林里，躺在泥土表面厚厚的一层松叶上，软蓬蓬的，头顶是被树梢枝叶割划得支离破碎的天空，心里是芜杂无章的思绪，不知道如何诉说，向谁诉说。偶尔有鸟儿飞过，远处一声鸣，惊醒这一山的死寂。

21岁的吴世人，越发沉默。他与世界无关。

看了一年山，镇上开始招工了。同来的知青王大勇凭着一贯的踏实肯干和头脑活络最先找到了广播站（相当于现在的地方文化局）的工作，几个月后吴世人在邻镇的信用社谋得出纳一职，户口也从农村迁到了城镇。信用社虽小，却承担着银行

的责任，吴世人每天在窗口为生产队买化肥、农药的批贷款，以为一辈子也不过如此了。

1979年，知青大返城，吴世人在绝望的平淡中看到了一道亮光。当时有一个顶替的政策，也就是下乡知青的父母在上海企事业单位上班的可以提前退休，让子女接班。当时吴世人的父亲在机床厂，母亲在纺织厂，但两人商量后谁都不愿意退休，反正吴世人在农村也待了7年了，就让他烂在那里一辈子吧，只当没生过这个儿子。

心灰意冷的吴世人不再乞求，也不像其他的知青削尖脑袋地搞病退回城，他接受了流放的命运，反正从出生起就已经如此了。

直到两年后的冬天，何秋平来到了信用社的窗口，吴世人死水一般的生活才发生了点变化。每天下午4点，何秋平结束供销社的工作，带着当天的营业款来办理存款业务，就这样结识了吴世人。

供销社就在信用社隔壁的大院子里，分设了食品柜、五金柜、布匹柜、百货柜。平时空闲，节日期间人流络绎不绝。农村一年三大节——五月节（端午）食品柜前买绿豆糕的客人排起长龙；八月节（中秋）买月饼的人又是熙熙攘攘；春节更是热闹，农村订婚提亲男方要到女方家“看节”送礼，礼品不外乎是洗发膏、香水、肥皂，还有布匹。

何秋平负责百货柜台，白天卖日用品，晚上所有同事帮着布匹柜台数布票（当年凭票扯布），遇到三大节常一数数到深夜。空闲的时候，何秋平和几个同事会跑去隔壁信用社的院子里看电视，当时镇上只有信用社一台电视机，到了晚上，把电视机抬到院子里，摆放好一排排椅子凳子，俨然是露天电影院。

有一次，何秋平和同事去得晚了，椅子坐满了，她们只得站在最后一排。吴世人见此情景让出了椅子让两位年轻姑娘坐，何秋平第一次对这个来自上海却一口乡音的知识青年产生了好感。

每天下午4点，何秋平准时来到信用社窗口，两人开始闲聊。有时吴世人手边放着一本书，多是一些外国小说。何秋平爱问，看的什么书，多半没看过，便借来读。第一本是《茶花女》，后来又陆续借了《羊脂球》《安娜·卡列尼娜》等。每次还书前，何秋平总是小心地包一层书皮，在书脊上一笔一画写上书名。

那个夏天，一种炽热又甜蜜的气息在一借一还的书页中散发出来，飘荡在两个相邻的院子里。中午闲暇休息时，吴世人跑到供销社的百货柜台一站两个小时，就是为了见何秋平一面，说说话。也是奇怪，平时沉默得要钻进地底的人，在何秋平面前，却有那么多温情软语。

又过了两年，他们的女儿出生了，取名青青。

女儿青青从小精力旺盛、顽劣不堪，却为平淡的生活增添了不少趣味。直到知青子女回城的政策传来，吴世人心想，自己是回不了上海了，起码得让女儿回去，有了上海户口，就能在上海读书工作，可不能像自己一样在不知名的小城镇上蹉跎一生。

江夏里

毕业之后，吴青青迫不及待地搬离了老房子，决绝地与厨房水槽的蟑螂、阁楼里乱窜的老鼠以及那个曾给她慰藉的披着麻布的角落划清界限。她在高楼的群租房里度过了一年光阴。

进门处的走道嵌了一面大镜子和一根顶天立地的钢管，身材曼妙却膝盖乌青的妙龄女子傍晚时分会缠绕或倒挂在钢管上舞蹈，晚上她的短发女伴骑摩托车带她转几个酒吧场子，同时保护跳舞女子不受男客人骚扰。吴青青每次路过钢管舞女郎的身旁都会忍不住仔细打量，她看到的不是性感和撩人，而是不屈的力量和坚毅的眼神。她甚至动过拜师的念头，询问下来要3000元学费包学会，想来想去没舍得花钱。

阳台上搭出来的一间房住着一位其貌不扬的年轻女子，不知道白天做什么工作，但到了晚上经常带不同的男人回来过夜。

吴青青的房间靠近公共厨房，群租房有十个住户，有人做了饭不洗碗，就放在水槽里过夜。那个夏天她见识了成百上千只黑色蟑螂如地底石油般涌出，成年蟑螂甚至张开翅膀飞向屋

子的角角落落，原来蟑螂不仅生存于破旧的老房子，它们无处不在。

有天晚上，吴青青梦见打网球，对打的那个人是另一个自己，这是一个极其精彩的多拍，来来回回地不知打了多久，吴青青感觉筋疲力尽，都已经跑不动去接球了，可是球却神奇般地每次都接了下来，她想把拍子扔掉，却像粘在了手上，双腿则不听使唤地继续跟着球的方向跑动。

就在她坚持不住要放弃的时候，男友拍醒了她：“你怎么了？你在抽筋啊？”男友发现吴青青睡觉时不停地抽搐，往上翻得只剩眼白的眼珠还骨碌碌地转，便觉不对，叫也叫不醒，只能重重地拍打。吴青青恢复意识后发现自己呼吸不了，她死命吸气，大口大口地，每次吐气都伴随着呻吟，总算活过来了，摸了摸床单，全湿透了，裤子也是湿的，她小便失禁了。

房间里的窗是半开着的，门的上方有一个方孔，通向外面的厨房。除了煤气泄漏，找不到其他引起窒息的可能性。

当晚吴青青就搬出了群租房，她又灰溜溜地回到了江夏里。

一年后，吴世人与何秋平也回到了老房子，这一次，他们不走了。吴世人办了提前退休，响应知青退休后回沪投靠子女的政策。

四十年过去了，一切都没变，墙上的挂梯、阁楼里的天窗、屋顶斑驳的裂缝，甚至是那张木板大床，都念旧地保留着

吴世人离开前的样子。

一切又都变了，阁楼里新装了空调，多了一台电视机，还有网络。电视机下面三只叠起来的樟木箱子装着一好婆的旧衣物，斜坡下的地板上堆着一好婆的被褥杂物，用一块发黄的麻布盖在上面。看来是不能睡人了。

吴世人让何秋平和青青睡阁楼的大床，自己找了个锈得看不清颜色的折叠行军床往二楼的饭堂间一放，晚上便睡在上面。冬天还好，夏天把所有门窗都打开，还是被涌入的热气钻进皮肤里的每一个毛孔，汗衫上黏糊糊的，任电风扇怎么吹都感觉不到一丝凉意。窗外的阳台上有一只空调外机，肆无忌惮的热浪配上轰鸣声，恨不得把人掀翻。

对于吴世人来说，没有什么难以忍受的，他早已习惯了以逆来顺受的方式来对待生活赐给他的一切，能够回到故乡上海，回到江夏里，与家人守在一起，便是命运对他最大的恩赐。当年与他一起挤在阁楼里的四个弟弟妹妹，早就通过努力奋斗，在各自的领域混得风生水起。吴世人当年下乡的决定在某种意义上是有价值的，只是他个人的运气来得稍晚一些罢了。

吴青青的心情很复杂，她既为与父母重聚而欣喜，又因为彼此长时间不在一起生活而充满了矛盾和陌生感，看着父亲蜷缩在行军床上的瘦弱身躯，她久久不能平静，便又一次搬出了老房子。

再次回到江夏里，是2011年的冬天，母亲何秋平把亭子间和“鸽子笼”租了下来，找人装修了亭子间，在阳台上砌了一间不足两平方米的水泥房，可以洗澡和使用电马桶。吴青青住进来时，亭子间的窗棂被短马尾女人装铁栅栏留下的钻孔已经填充得看不出痕迹，刷的油漆是凋落的玉兰叶色，地上铺了一层胡桃木色的地板。吴青青坐在新买的松木床上想，一家人总算齐齐整整地在一起了。

一楼的公共厨房享受到了市政府的旧房维修翻新福利被整修一新，地上和墙上都仔细地刷了水泥和石灰，蟑螂已无处遁形，从此消失了踪迹。

底楼的租户是来自四川的三口之家，女主人抱了只野猫回来，凶得很，是能抓老鼠的厉害角色。自从野猫来了，老房子里就再也没有老鼠敢露出脑袋来。

一个夏天的晚上，吴青青回家看到一楼过道靠着墙的大木盆边沿上躺着五只小猫，它们都是野猫刚生下来没多久的小崽子，有一只猫的毛是黄色的，其他四只都是白色的，它们闭着眼睛懒懒地睡着了，肉肉的小爪子轻巧地搭在盆沿上，一副乖乖的样子。

小猫长得足够大的时候，学会了爬楼梯，便喜欢钻进亭子间、饭堂间和阁楼。何秋平每次都会留一些饭菜给小猫们吃，它们吃完了会靠在何秋平脚边打瞌睡。有时也会钻进吴青青的鞋子里睡觉，好几次吴青青出门穿鞋，一脚踩进去是湿的，凑近了闻，一股猫尿的骚味。

后来，又有了新的烦恼。

猫主人平时工作和家务繁忙，没时间给猫洗澡，小猫又喜欢到处跑来跑去，在外面惹了一身跳蚤回来。跳蚤咬得吴青青两条腿上全是红色肿块，数一数有三十多个包，连成一圈。最可恨的是，它越抓越痒，不得不狠命地抓破皮见血为止，刚刚红色褪下去一些，又开始痒，反反复复，足足痒了三四个月。

虽然蟑螂和老鼠都不足为患了，老房子还是迎来了新朋友：白蚁。

何秋平第一次发现白蚁，是在阁楼的屋顶上，她看到有些小东西在动，白乎乎的和屋顶的石灰色差不多，一群群从裂缝中钻进钻出。屋顶上是泥土坯和檩木，白蚁应该就是从檩木中生出来的。成年的白蚁很难抓住，它们黄黄的，长着翅膀会飞。

就在何秋平担心白蚁把屋顶蛀塌的时候，居委会传来了江夏里所在的街道路段动迁的消息。家家户户都兴奋地互通小道消息，并赶在冻结之前把所有能迁的户口都迁进来，以获得更多的拆迁补偿。

众盼所归，动迁组入驻了海拉尔路一间废弃的小厂房。签约那天窄窄的街道上挤得像是新年守岁的外滩，人们在破旧的老房子里待得太久了。

逃离老房子，曾是吴青青这么多年的渴盼。从壁虎般爬下挂梯的那一刻，她便知道这是自己要完成的使命。只是没想

到，会是以这样的方式。

一次次地出走，一次次地回归。老房子静谧地待在那里，用松动透风的门窗，用满是裂缝和白蚁的屋顶，用不言语的残败身躯接纳了三代人的命运。离开的那天，吴青青望着即将灰飞烟灭的江夏里，这一次，是真的不再回头。

（注：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本文所有人物均为化名。）

两位西方85后，把中国乡村清朝宅邸打造成“老家”

王云

1

浪石村位于广西阳朔县，约有两百村民，随着壮年男性进城打工，常住人口不足百人。虽然这里离把漓江游客像集装箱一样打包的漂流上客点杨堤港口很近，但至今尚未通路，进出小村须走水路。当年绑船的竹子都改成了硬质塑料管，船上也都装上了马达，他们仍称这交通工具为竹筏。

“老家”是浪石村里一幢翻新过的清朝宅邸，你可以说它是个民宿，但它又超过普通民宿的定义。

这幢爱彼迎上的明星房源在开张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接待了来自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名访客，这些来自全球的访客背景千差万别，唯一的共同点，他们都是希望避开拙劣旅游景点、渴望体验真实而美好的中国旅游者。

“老家”如它的名字，是一个回归传统村落和文化的小尝试，有着现代乌托邦的理想和对乡土的尊重。它以一种安然、不带野心的方式融入浪石村，不仅留住了将被废弃的老宅，还影响了村民对于祖辈传承下来的老房子的看法：人们不再拆老房子了，老物件也不丢弃了，这是他们第一次由衷地以自己生长所在的这个有些隔绝的小村子为傲，山里的人无须走出去，

外面的人（更不用说无数的国际友人）怀着羡慕和向往纷至沓来。



图像

这个偏远民宿的建立者竟是两位85后的西方年轻人：一个是荷兰人Maarten，中文名康毅；另一个是美国人Eric，中文名安睿。

2

Maarten是我2012年在上海做爱彼迎房东时的房客，当时他刚大学毕业，在复旦大学做交换生并短暂停留。他行李很少，瘦且有礼貌，偶尔我打开他客居的卧室收拾打扫，床铺总是理得整整齐齐，台灯前摆着睡前阅读过的英文佛教书籍，这种清静让人心生好感。

由于会讲些中文，Maarten曾在上海2012年喷涌而出的初创公司中的一个作为实习生供职，但很快因为觉得有违自己的兴趣而辞职。

这比当时同样年轻但为了谱写自己看似完美的简历而在职场上忍气吞声的我要勇敢得多，我暗生敬佩，于是悄悄观察他。他在我家共待了一个月，使我碰巧见证了“老家”项目的邂逅期和考察期。

那时Maarten去桂林旅行，机缘巧合，被相熟的向导领去了漓江边这个不为人知的浪石村。

对于一个在中国颇有游历的外来人，这里的景象不可思议：喀斯特地貌群山环抱下的小村子，清澈的漓江水从村前擦肩而过，村子的入口是一片最具中国传统风味保存良好的传统宅落，远处是当地传统的果树和蔬菜的田园，村民们在河边捶洗衣服，在河畔山前种庄稼，在屋前的厨房洗菜切菜准备食物，一切自然而祥和，远胜过漓江附近著名5A景区的粗制滥造。

村民们友好而羞涩的真诚让Maarten印象颇深，这儿的居民和中国大部分城市里忙碌、自我、重商的人们非常不同。

村民毛师傅看出Maarten的好奇，带他去参观村口不远处一栋清代建的古朴秀丽的老宅。

这个宅邸建于250年前，里面居住的人家正打算搬迁——老宅经年累月已经破旧不堪，对于这里的人来说，逃离老房子，搬进新盖的方正两层水泥楼才是光耀的新生活。

伫立于这个老宅的院落，Maarten异常兴奋，他一直希望寻找一个具有传统中国之美又真实贴近自然，远离喧嚣的地方，这个宅子和这个村子简直就是梦境再现！他暗暗下决心要立刻回来，租下并改建这处古宅，把它变成可实践他一直以来理想生活的地方。

回到上海，Maarten联系了两周前刚刚认识的朋友Eric。年轻的Eric和Maarten一样，是冥想和佛学理论爱好者，关注永续的生活方式及自我探索，两人一拍即合，很快回到浪石村。

两个并没什么积蓄的年轻人果敢地签下20年的租赁合同，确立了他们对“老家”建设的承诺和决心。

后来的日子，他们这家房东的女儿小莫成了“老家”的厨师，而小莫的丈夫也成了帮助他们接送客人和朋友的竹筏船长。

3

像几乎所有的改建项目一样，Maarten和Eric远远低估了两个外国人在偏远漓江边翻修一幢老宅的难度，原本以为三个月就能完成的装修，却花去了大半年的时间。

翻修最初，他们得到了亲戚朋友的支持——Maarten的母亲、Eric的父亲，以及一位在荷兰做建筑承办商的朋友都前来帮忙。

一月的漓江湿冷如冰，早失去了Maarten和Eric来隆重签约租老宅时漓江钟灵毓秀的温婉。

这个由五个外国人组成的小团体在淡季的漓江上格外显眼，他们住在江对岸杨堤堤口附近的快捷酒店里，每天迎着刀子一样的江风和湍急的冷水乘船到对岸，缓慢地开展老宅的翻新工作。

两个月，一切进展缓慢如蜗牛：购买正确的工具和材料，清扫布满蜘蛛网的破旧房顶和覆盖着厚厚黑炭熏烤痕迹的油腻

的墙壁，重新归位洗手间、厨房排水管道等的基础工作都花费了大量时间。

一群本就不太懂行的外国人去市场采购材料更是艰难，不仅要面对语言障碍和熟悉物资的缺乏，还频繁受到被商贩调侃和虚设价格的困扰。

无限制的讨价还价往往令人恼火，小市场材料商人也竟坦诚而狡黠——“你们是外国人啊，不收你们高价收谁高价？”对于这些，Maarten大多能坚持原则，用他锻炼得越来越纯熟的汉语耐心反驳，拒绝被差别对待，可也有些时候，他心累气恼，就直接走开，希望寻觅到下一个能平等沟通的商人，或者养好了心情再回来。

很快，这行人就变成了杨堤口人人知道的外国人。在一次一次的交往中，当地人对他们的态度也渐渐融化而缓和。

Maarten和Eric的家人朋友们在帮工一个月后，纷纷离开回归自己的正常生活，剩下的却是更大的工程。三月气温转暖后，他们让木匠打了两个简易的床放在老宅二楼阁楼，在县城里买了电饭煲、简单的中式餐具、被子和床单，用Maarten的话来讲，“就像你看到的中国任何一处建筑工地上的民工一样”搬进了翻修中的老宅子。

他们雇用浪石村所剩不多的男性村民为帮工，一同开展翻新工作。与这些帮工（是一群平均50岁以上的“大叔”）朝夕

相处后，他们开始面对村民们对西方生活方式的各种疑问。很多问题让他们哭笑不得——

比如，有人问，他有次开竹筏的时候看到漓江上有一群裸泳的外国人，中间竟有女孩子，这在西方是不是很正常？

更多的问题集中在他俩身上：

“你们为什么要来这里？”

“你们是不是很有钱？”

“你们的工作是什么？”

“你们看上这个穷地方的什么？”

.....

一段相处后，村民们终于可以接受这两个外国人就单纯是因为爱上了这个在偏僻山间被村民们抛弃的老宅和中国田园般的生活方式，以自己全部的时间和精力（甚至连女朋友都还没找好！——这对村民来讲可是一辈子的大事）在这儿装修房子。而这，就是他们的工作。

Maarten和Eric的私人空间——这个被西方人视为生活中重要底线的东西——顺理成章地被村民们打破：他们在一天劳苦生活后会一起聚到老宅的前院，随意地拿取Maarten的茶叶冲大碗茶、吃他们厨房里的花生，随时随地闯进他们家的任何区域“打扰”他们的私密时间和空间。

而同时，他们越来越把这两个外国人当自己人，教他们浪石方言，邀请他们尝试各种当地人喜欢的食物。在这个村落中，人们相互紧密依赖，讲“私人空间”是生分的表现，也正因为这种紧密联结，浪石村才能够即使远离城市，仍代代繁衍。外国人研究中国，“关系”文化总会被施以浓墨重笔，到了浪石，Maarten才切身经历了这样紧密的相互依赖。

得益于这群山人村民的智慧和支 持，老宅的后期翻修工作顺利展开，Maarten毫不吝 嗷地称他们为“老家”翻修工程的真正救星。虽然Maarten和Eric也不停地参与到建造中，和水泥、扛沙袋、打磨木头、上泥子等每个细节，但娴熟程度远不如这群乐观而单纯的村民大叔。工作之余和大叔们的闲聊帮助Maarten和Eric了解到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当地风土人情：

比如，附近有座观音菩萨山，如果女人喝了足够多的山上的圣水，就一定能生出儿子；

比如，他们租的这个宅邸原本属于一个清朝的富庶乡绅，而这个乡绅竟有九个老婆——这让留守村里的一些年老仍然单身的男子们羡慕而想入非非；

比如，“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曾经一起参与“破四旧”，把坐落在如今小学位置的一个美丽的庙宇给毁了——他们现在都啧啧后悔，但毕竟时过境迁，也再无多念；

再比如，美国总统克林顿90年代来访阳朔的时候，政府曾考虑把浪石村作为总统走访地之一——虽然后来政府变更了决

定，选择了位于下游的另一个村庄，可是就算只是被考虑过，浪石村的人们也就足够骄傲了。

大多数的村民并不太了解漓江之外的生活，桂林已经算是他们偶尔前往的最大的城市了，他们也不关心政治，或者谁是现在的领导人。他们是绑在这个山边的人，见过无数在江上来来走走的游客，但与他们息息相关的还是这片土地的阴晴。

4

我第一次去走访“老家”是2014年的4月初，算是较早前往“老家”的访客。

从桂林坐车到达杨堤，我按Maarten的指示，穿过一拥而上售卖“竹筏游漓江”的各种船托，再略过小批迷惑而仓皇的拍照游客团，由指定的村民船夫接去浪石村——就像回故里被亲戚从火车站专车接了一样。

从竹筏下来，沿着窄窄的石阶走上去，没几步就到了落成后的“老家”了。老宅的翻新装修做得很克制，在理解原来设计元素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原状，没缀添现代垃圾。我正仰着脖子站在客厅赞叹环视，Maarten招呼我和他一起去和他们村里的几个朋友问好，这些朋友正是从翻修工程中建立起深厚感情的那几位。他带着我挨家挨户，敲敲虚掩的门，等对方露了头，便介绍道：“这是我在上海的朋友，来我们这儿玩。今晚你们来我家喝茶。”得到对方肯定后，再到下一家。

这个荷兰人以中国乡村最传统但我这个中国人已不再熟悉的方式顺理成章地向这个村子介绍着朋友的到来。这令我产生了一丝难以名状的错乱，这种错乱融化后，从没拥有过乡下老家的我，欣觉久别重逢。

“老家”提倡素食主义，房东女儿小莫按需求为客人准备简单而新鲜的当地素食。

厨房是开放可使用的，也鼓励访客自己烹饪，在大宅子的前厅大家可以一起吃饭，像久别重逢的家人。村子很静，步调缓慢。

白天还能隐约听到过往船只的汽笛，傍晚只有细听才能隐隐听到游丝一样的山音和水声，星斗在鬼魅的喀斯特地貌上如迷如幻，江水汽随着桂香静静弥漫，一觉睡到天亮，是被鸡鸣声唤醒。从城市来，我好久不曾像此时一般，清澈感受自己的呼吸了。

在“老家”的几日，我开始慢慢熟悉他的这些村中朋友。

暨生，50多岁的羊倌，有近20只山羊。他每天早晨上山把羊从羊棚里赶出来，傍晚再漫山喊羊，把羊集中赶回山上的羊圈。

没有结婚的暨生性格像儿童，喜欢和外来人打交道，熟悉上山的各种崎岖小径。暨生爱聊天，即使遇到语言上完全不通的外国人，他也不放弃，路过野生沙田柚树，他就会指着说“沙田柚”，并要求对方模仿他的发音。到了下一棵，他再

重复一遍，再让对方跟着念。一山的沙田柚，陪他上山放羊一趟，所有访客都被迫认识了各种形态的沙田柚，无论你的母语是什么，都能准确发出“沙田柚”的发音。

让Maarten百乐不厌的还有傍晚前暨生喊羊归圈的方式：浩大山谷中放了一天的羊有时候走太远了，暨生必须要放开嗓子，用山里的土话，像骂孩子一样吼那些不争气还没到家的山羊，一句一句，回荡在山间。言语糙粗愠怒，而他脸上却是透明的笑容。这些土话在Maarten的中文课本上没有，暨生喊得像山歌一样，充满了稚趣。

小滴，是Maarten在每个客人来的最初就会温和警告注意的“坏孩子”。他和哥哥一起住在另一幢老旧的宅子里，没有工作，性格孩子气，颇有些周伯通的意味。

小滴曾经果断把院子里的一面砖墙拆了卖砖换钱，至今住在只有三面墙的院子里——用他自己的话说：“院子只有三面墙不也还能住嘛！”他从不长期打工，而只要赚到点钱，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去买新鲜肥美的漓江鱼大吃一顿，“及时行乐”是他的座右铭。

村民们觉得他游手好闲，是个害群之马，不愿理他，可“老家”却和他也成了朋友。Maarten说，他常觉得中国南方人的性格似乎更迂回拐弯，但小滴坦率而直接，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小滴在“老家”找到了存在感，常常溜到老宅，毫不吝惜时间地与访客们闲聊，或者声称提供“导游服务”，通过邀客人们去山边的岩洞游玩赚些零花钱。Maarten在“老

家”手册上提醒来访客人不要怪罪他的小聪明，他是老宅的自由常客，只是别被他的小把戏诓骗了就好。

海波，是个30多岁的村民，Maarten称他“有金子一般的心”（a man with a heart of gold），是他在浪石村最信赖的朋友。

海波是少有的仍然留在村里的青年男性，乡村医生，女儿已经9岁了。得知有外国人常住村里后，海波主动上门希望Maarten和Eric能够教他英文。海波谦逊努力，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便向我展示了他的英语学习笔记——一行行像抄经文一样整齐的英语常用语句，认真标着用汉语拼音拼出的读法。

后来，当Maarten和Eric不常在村里后，海波成了老宅爱彼欢迎的“大管家”，并凭着这时打下的英文基础和持续接待外国人的经历，练就了流利的英语。海波觉得，Maarten和Eric的出现改变了他的生命——不仅仅学了新的语言，因为“老家”而接待了世界各地的人们，还因为被外来人认可，得以重新审视自己的家园，并为之骄傲。

这些村里的朋友是“留守分子”，没像同乡一样到城镇去打工。

但在Maarten和Eric的眼中，他们的“落后”似乎更逍遥简单，而“老家”希望提供这样的一种途径，让愿意参与的留守村民能接触外界，并从这些接触中快乐地赚取合理的报酬。暨

生、小滴、海波等都会因为他们提供的“服务”——无论是当导游、接待客人或者为来访者做饭而得到合理的报酬。

Maarten觉得，这也是“老家”之所以特殊的秘诀之一：普通的民宿为了方便往往只和一两家服务提供者发生联系，而“老家”则尽量让更多的村民参与到运营中。这不仅因为访客们更喜欢能在这段经历中跟更多的当地人接触和互动，从多方面了解和体验这个村子，同时也尽可能使得因民宿而产生的周边消费能惠及更多的村民。越多的当地人参与到“老家”，他们就越会把“老家”当作共同生活中的一部分。

几年下来，浪石的村民们因为“老家”感到了自信——大量的外来人拜访过这里，并亲密地向当地人表达对这里的喜爱和尊敬，浪石是漓江上“小而美”的珍珠。让Maarten和Eric惊喜的还有，今年他们发现有些生活条件好的村民自发地在重修自己的老宅了。从浪石外来访客的眼中，他们看到了自己破旧老宅的美好，他们也半认真地告诉Maarten，他们修好旧宅院以后，如果“老家”需要，他们也愿意腾出空间。

5

我来浪石“老家”的真实原因，是在上海生活的疲惫感。每天，周遭都更新着新的商业术语，朋友们急忙晒出旅行的图片、感想、自拍，大量看似先锋的概念被提出，无数的项目捷报和成功故事在翻新快传，但在真实世界里的每个人却都焦灼、忧虑、疲惫。

大家似乎都靠着某种自我催眠来生活，一边惶恐着社会当下的处境，一边因惧怕落后而更深卷入生活的旋涡中。

Maarten是我遇到的同代人里使我感到镇定的，他似乎身体力行着自己的信念，我来这里，是想看看他在选择这个“非主流”的人生后，真实的情况究竟是什么样的。

Maarten的兴趣没有什么变化，他继续坚持内观冥想、关注食物、有规律的作息——继续学习中文、慢跑、在网上阅读。在浪石的时间让他可以从容地思考什么是自己笃信的，什么生活是想要的。平日，和村民们一起做做村里的事，和访客们互动也占据了他大量的时间。他说他从村民身上学到了一些宝贵的品质，比如，毛师傅的乐观和行动派、海波的纯良等，村民们拥有的很少，但他们从没停止以有限的资源获得更好的结果。

同时，他也诚恳地透露对久居浪石小村的生活感到一丝不安——“毕竟我并不打算这么快就过上隐士的生活”。

这时，我问他一个那年我问过好多朋友的有些陈词滥调的抽象问题——“你觉得你人生中最重要东西是什么？”

想了一会儿，他轻而认真地回答说，是“compassion”吧。

compassion，中文通常翻译成同情心、慈悲，其更确切的含义应该是因目睹他人困难而希望能够参与并帮助减缓痛苦的一种感情。

他的答案让我心中升起一种很久没有过的感动和清明。利己主义和个人成功追求在我身边的人群中如此理所当然，眼前这个也同样将近而立之年的外国人，却安心而踏实地在中国的乡村做了个“老家”，联结了这个村子里的人们，同时也治疗着我们这些城市漂泊者的乡愁。没有任何词语比这个更能解释他的行动了。

6

那次离开“老家”之后，2016年10月，怀孕期间的我又联系Maarten。我想念“老家”，也想让即将成为孩子爸爸的另一半体会这里的乡村，并思考我们将来生活的选择。我的丈夫幼年也在乡村长大，而今我们都在上海，焦灼和疲惫感随着年龄而缓慢累积，日子有时过得像个恶性循环。

Maarten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在上海的一次短暂停留中遇到了他的未婚妻，一个可爱的台湾女子，她也是在乡村长大的姑娘。他们打算去台湾的乡下结婚。Maarten经过三年的思考，想要在运营“老家”的同时，重返大学学习心理治疗，对此我毫不奇怪——医治就像他的本能。

此时“老家”有了很多新变化。2016年6月，在原有老宅的基础上，第二栋“老家”和一栋“老寨”已相继开放入住。第二栋“老家”就在第一栋“老家”的后面，两宅连通。“老寨”则在桂林以北大山里的瑶族深寨。这两栋新址都是Maarten和跟他价值观相仿的青年中国人合伙建设的。前者的合伙人叫

乔华，原是个在北京咨询行业工作的白领，后者的合伙人叫永发，是个在桂林市机关单位工作的年轻人。

这两处新的“老家”也雇用了土生土长的村民进行管理。前面提到的浪石村乡村医生海波负责浪石村两幢“老家”，安排客人的起居和他们在村里的各种活动，而“老寨”的房东瑶族老夫妇则亲密地参与到访客的饮食起居中，访客们可以参与到诸如磨豆腐、下溪抓鱼、编草鞋等各种本土活动中。

像以往一样，每一处“老家”都尽可能发掘所在村落里可以分享的民俗和热情好客的村民，让“老家”成为他们新生活中有机的一部分。

2016年底，他们还第一次发布了按照古法还原土地后种植的贡米和红米——很多访客都曾参与了用中国传统方式收割水稻和舂米的过程。

离开老家的前一天，海波跟我说了浪石和杨堤附近的很多变化。浪石要通路了，可是当地政府的政策和管束越来越多，很多都不见得合理，这里已经开始变得越来越商业化，对村民来说形势喜忧参半。“老家”的知名度在这一年里节节攀升，它接待的访客中，中国人的数量开始增加，能与“老家”朋友们毫无语言障碍交流的人越来越多，加上有了中国的合伙人，沟通也变得越来越容易。

然而，海波仍然很想念最初与Maarten一起建设老家的时光，他说：

“Maarten才是个真正爱这种乡村生活的人。他很少会待
老宅一直上网，他和大家一起放羊、挖土豆、摘沙田柚，围着
村子跑步，上山露营，和大家一起乘凉划夜船侃大山。他改变
了我的人生，这我是知道的。他现在往前走了，有了他的新生
活，可我却总想回去。”

抛下一切，到新疆当军嫂

何金果

那辆租来的皮卡货车缓缓驶出汉人街时，我新买的棕床垫躺在完全敞开的货车后厢里，我穿一条及膝蓝色连衣裙，脚蹬8厘米高跟鞋，摇摇欲坠地坐在床垫上。

我双手紧扶同样崭新的衣柜，生怕一个颠簸向我砸来，脚下躺着的是我的十几件行李以及匆忙采购的锅碗瓢盆、被褥若干。

6月的伊宁市，就算全部暴露在太阳下也感觉着实清冷，我使劲理了理裙角，不让呼啸的风撩起它。

这件颇有职业感的裙子，是我2012年3月出差米兰时在杜莫大教堂附近买的，后来，我又穿着它穿梭在国内不同的城市，参加不同主题的高峰论坛、答谢晚宴。上一次穿它还是一年前的夏天，我去了世界三大办公家具展之一的芝加哥办公家具展。

而此刻，坐在货车车厢行李上的我正以皮卡的节奏穿过汉人街。裹着头巾穿民族纱裙的大婶招呼同伴们向我看过来，引来更多错愕惊讶的侧目。车已经走远了，她们还在向我张望。我倒没觉得难为情，反正这个城市也没一个人认识我，索性拿出之前做过的功课冲她们大声喊：“阿依古丽，亚克西！”

为了体验老公第一次来新疆时走过的原路，也为了给未知的新生活多省下点钱，几天前，在一个有雨的傍晚，新婚一周的我离开家乡小镇，带着十多件行李登上一辆蓝色的长途大巴，踏上了军嫂之路。

紧紧地盯着车轮穿过平原，翻过秦岭，再到巍巍昆仑，直到苍凉的戈壁滩上一排排的风车出现。我知道，这是通往新生活的路。

两天一夜之后，我在睡梦中被司机沙哑的声音吼醒，揉了揉眼，灯亮了，操各种口音的人陆续提着行李下车。

我告别了以往的一切生活，搬到新疆伊宁，开始以一个边防军嫂的身份生活。

皮卡穿过阿合买提江路和军垦路，然后钻进解放路一个幽深的巷子里，一个独门小院进去，有一排楼上楼下的红砖平房，院子里的苹果树花开得正好，一簇簇热闹极了。

有着深邃酒窝的回民房东阿姨微笑着帮我打开大门，说：“欢迎！”

从此，我生活中唯一的英雄主义，是跑向那些我不熟悉的土地，只因那里有一个熟悉的人。

或许新生活并不累，也并不难，试着去适应它，我有信心喜欢上这座城市，就像喜欢上这里的空气。不会转身的人，又

怎能拥抱新生活？我深深呼吸了一口凌晨3点钟冒着些许清冷的空气，一头扎进新疆这片土地。

随军家属

终于安顿好了，我坐大巴车去看老公，从伊宁市出发到昭苏县城要200多公里，大巴车需要连续坐4个小时，在我河南南阳镇平县的老家，坐4个小时大巴已经可以跨两个省了。

大巴从小城出发，路两边全是在建的规模庞大的住宅小区，再往里走是隔壁荒野，走到100多公里后开始是巍巍高山，不时有骑马或骑摩托的哈萨克族牧民在车窗外一晃而过。

信号变得不好，老公焦急地打来电话问到哪里了，通话变得断断续续，到后来则完全没有了信号，我索性关了机，欣赏两边扑面而来的风景。

天蓝得实在不像话，宁谧洁白的云朵像永远地定格在那里，两边的油菜花田绵延到天边，宛若画中游。

终于到达昭苏县城，县城实在太小了，跟我老家的一个乡镇发展水平差不多，老公在那儿接我，要给我接风。在一家餐馆里，我看着食谱上的面肺子、拉条子、辣皮子、过油肉、野蘑菇、椒麻鸡……实在好奇，无法想象这些名字作为食物是什么样子。

老公帮我点了一份辣皮子拌面、半只椒麻鸡、四串烤肉，这些在新疆最家常的食物后来一直伴随着我。

在一条宁静的小路尽头，老公指着一个结实高耸架着电网的高墙给我看，“这就是我们军营了”。出租车围着院墙转了大半圈，最后在侧面一个哨卡前的路障边停下来，军营到了。

军营招待所是一个干净肃穆的两层平房，穿军装的战士进进出出，看到我这个异性愣生生地闯入，兴奋又热情：“嫂子好！嫂子好！”晚上他们送来一大堆水果和零食，有专门的后勤部保障来探亲的家属。

稍事休息后，老公就回去上岗办公了，留下我新奇地打量着一切。忽然哨声响起，楼道里都是紧密急促的脚步声，战士们很快就在楼前排起了队，整队、训话、唱着歌列队往食堂去。我第一次在部队开餐就这样有仪式感。这样的阵势使我不敢去食堂吃饭，老公在食堂飞快地扒了几口饭后打了饭送到招待所。

新奇之余，最大苦恼是部队招待所没有女卫生间，只能去每个楼层中间区域的公共洗手间，不分男女，外面是洗漱区，里面隔断出来一个个独立卫生间，但门没有锁。

当时的厕所设计一定没考虑过女性需求，所以我每次只能趁老公在的时候，叫他领我去，他把一扇扇门推开看，确定里面没人时再招呼我进去，然后就在门口把风。后来他找到一个更简单的办法，像侦探那样猫下腰跪在地上，用眼光迅速扫下门里面有没有脚，确定都是空的才赶紧招手放我进去。

不得不感慨，部队卫生间真干净得不像话，地面被擦得一尘不染，一丁点异味也没有，有时候我在里面蹲得久点，老公就拦在门口跟要进来的小伙子聊天：“等会儿啊，你嫂子在里面。”再扭头朝我喊：“别掉进去了啊，快出来。”

驻军当地的气候是强对流空气，上午烈日暴晒，中午山雨欲来，暴雨说来就来，雨后天地豁然开朗。我通常会躲在招待所昏睡。

有天老公打电话让我快点走到窗户边，我以为出了什么大事，他指挥我抬头看。天啊，我看到了两道极其清晰的双生彩虹。美！美得让我倒吸一口冷气！有时老公不执勤的时候，我们牵着手，在空气中流着花蜜的油菜花田散步，金黄色油菜花绵延至天边，霞光之下，雪山永恒，屹立不倒。

那天听老公说要带队去边境线上巡逻，我缠住他把我也带上，老公以为我开玩笑：“真的很远很枯燥的，你平时活动量太小，全程压根儿走不下来，我有任务在身也背不了你啊。”

“开玩笑，还怕我拖你后腿啊，我好歹高中也得过校运动会女子长跑组冠军啊，学校还奖励了一个大大的不锈钢饭盒。”我铁了心想去前方看看巡逻到底是怎样的，最后老公被我缠得没办法，去请示领导。

领导答复：“你家属勇气可嘉啊，这么支持我们的工作。想去就一起去吧，看看咱们是怎么工作的，以后也多体谅我们啊。路上多照顾，保障好后勤。”

于是他们在常规装备之后，特意去炊事班领了几个苹果、几个土豆，我们就列队出发了。

战士们要拿出警惕的眼光察看边境线上发生的一切：是否有可疑人员，沿路的摄像头是否正常，防护网是否完整，国境线附近是否有什么异常……

而我作为编外人士在队伍后面保持20米的距离，贪婪地看着路两边的风景。中哈两国边境线上人烟稀少，以山为界，山色苍翠，有一种无人打扰被外界遗忘的静美，这里人迹罕至，偶尔能遇到几个赶着滚滚羊群的哈萨克族牧民飘过。

不知不觉，我们在边防线上绷着神经已经走了两个多小时，我没有了最开始的兴奋好奇，越来越感到枯燥。

在雪地上走路完全不同平时，我的体力渐渐不支，越来越累，跟不上队伍，老公只好从前面队伍折返回来，把落在几百米后的我接上，他捡起一根杨树枝让我握紧，在前面牵着树枝把我拖着拽着往前赶。

等我到达终点和战士们会合时，他们已经拾起荒野的柴火烧起了一堆旺火，有个战士从包里掏出苹果和土豆，把土豆围着火堆放了一圈，十来分钟就闻到诱人的土豆香。

有个马上要退役的战士，也许想着这可能是他离开部队前最后一次出勤了，想多留一点军营的记忆，于是整理了下军装，摆正了帽檐，端着枪笔直站立在国碑前。身后是高高耸起

的边界防护网，再后面是苍茫草原构成的哈萨克斯坦，同行的战友帮他把这一镜头咔嚓咔嚓抓拍了下来。

我拍了很多照片甩在朋友圈，很多朋友表示了羡慕。前老板也打来电话，问近况可好，真的不回去上班了吗？

大学毕业后我就去了广东东莞工作，作为家具产业核心板块的珠三角，我任职的某集团公司旗下有十几家分公司，围绕着家具行业提供服务。我为杂志采写稿件，推销杂志的广告版面，做杂志市场发行推广，也做国际家具展位销售，或是邀请国内的企业主去全球顶级展会上考察学习。

在广东的每一天，事件密集得像打仗，早上在东莞采访完某家具厂老板，中午赶到佛山签一个合同顺便收齐另外一个客户的签证资料，下午可能又在深圳或广州送参展团去全球最知名的某专业展会参展。

我在2008年和老公相识于郑州，在一个老乡聚会上得知他和我来自同一个小镇，两家之间的距离只有十几分钟的车程。我从来没接触过军人，也没见过他那么憨厚质朴的人，好奇心作祟，想探究下他是怎样的人。

我以为自己虚晃一枪撤退还来得及，反正当时的我没考虑过以后，更没考虑过当军嫂。我想我跟“军嫂”这个身份八竿子也打不着，因为我完全不是这个性格。可我不知道，有的人太认真了，是不能撩的，好奇心害死猫，我一点一点被他套牢。

2009年毕业后，我直接去了东莞工作，他还留在郑州读军校，学校的环境和社会大不相同，我们的争吵也渐渐多起来。主要是我跟他吵，他沉默着等我吵完，又像没事人一样，我们经历过很多次分分合合。

那是我们认识以来最尖锐也最失败的一次争吵，我决绝地提出分手，恶狠狠地发泄着，牙齿咬得咯吱作响。他沉默许久，开口说：“我啥都不怕，就怕有一天当我脱下这身军装时，已不见你，我该怎么办。”

我们都感到疼痛，而在这份疼痛之上，我们能感受到对方比自己更痛。

“还是彼此静一静先不要联系了。”

他说好。

分开后的这段时间，我在想星星之火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点一点地燎起来的？何必装出无坚不摧、冷酷无情的样子，就算肝脑涂地，也掩盖不了依然爱他的事实啊，不是吗？

隔了大半月，终于接了他的电话，他一句“想你了”让我潸然泪下。

当决定再次和好时，我知道，这个决定非比寻常，它意味着我得告别多年的朋友圈和工作圈，放弃得心应手能长各种见识的工作，和那个阶段的自己说再见。

时间把我带到了最正确的人身边，与其顾虑过多，不如敞开怀抱冲上去给未知一个拥抱。

地摊生涯

在驻地的招待所住了快一个月，我彻底松弛下来，完全陷入了庸常的军嫂大军中。好山好水好风景，也慢慢看腻了。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轨道上忙碌，日子每天复刻前一天的版本。这里的节奏跟我过去相比，太过于缓慢了。

在10分钟就可以绕城区跑一圈的边境县城，军嫂群体的选择有着极大的局限性，有人去事业单位当公务员，有人在部队旁边做起小生意，有人选择在家当家庭主妇，有人异地分居留在原籍照顾孩子和老人。

更多的时候，她们关心自己的老公这个月工资有没有涨，有没有捕捉住某个契机升个职调个岗位，孩子期末考得不怎样要不要补习，老家的老人要不要接过来照顾，某个购物网站的大型促销活动是不是开始了……

她们还有梦想吗？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吗？会为未来担忧吗？

她们的心理我不知道，但我开始充满了焦虑。生活一直在继续，而我被遗弃了，成了生活之外的人，没有目的，没有方向，这种感觉让我抓狂。

一切看上去都那么的理所应当，司空见惯，符合想象，但藏匿于血液里的不甘平庸却汨汨喷涌而出。我必须回到伊宁市，展开新的奋斗。

告别老公，返回伊宁后，在市区晃荡了大半个月，小城的角角落落基本也都造访过了，看着口袋越来越干瘪，我开始想着怎么开源节流。之前在广州做外贸的朋友问我，他仓库里有些外贸积压货，要不要试下？我一时也没有太好的选择，就让他发了些货过来。

十多天后我拆开货，倒抽一口冷气，全是些吊带裙，吊带衫，超肥超大不合时宜的货底儿。这个小城素来保守，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等民族聚集，最热的夏天走在大街上，也鲜见穿吊带衫的女性。

有一次路过菜市场时，我看有人在那儿摆摊卖衣服，灵机一动，想着也许可以来碰碰运气。于是我从五金店焊接几个钢管做成可拆卸的货架，就去练摊了。

我第一次意识到城管的存在，是第一次摆摊后10分钟。一个块头超大的制服大哥伸过手来收费，夜市一个摊儿收10元，一排收过去他就收工下班了。

当时属于夜市时间，周围的居民刚下班或准备回家做饭。通过菜市场的主干道上，一排货架立在路中间，把路分隔成两个方向。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开口叫卖，就守在自己的摊位上，

干站着。好在逛市场的人发现了我这刚出现的新面孔，很自然地凑过来问价格。

我参考了旁边摊位的定价，也入乡随俗，10元一件，15元两件。也许第一次新鲜，加上衣服质量本身不差，很快接钱装衣服我一个人就忙不过来了。天黑得看不见时，周围陆续收摊，我也跟着收起来。一个多小时卖了将近500元，貌似比周边几个摊儿火爆些。

初来乍到，要和旁边的摊主保持友好关系，我打了招呼，然而对方并没有理我，从她的眼神里我读到了她把我定义为了竞争者。小贩们沉默地收着东西，整个夜市上汹涌的人流已经散去，到处散发出烂菜叶子的浓郁的味道，以及不远处强烈的辣椒孜然的面筋味儿。

我买了些烤面筋，递了几串给刚才对我含有敌意的摊主，她撸了一下，含糊不清地说：“嗯，歹歹的，攒劲儿得很。”

没过多久，我就已经可以自然地像周围摊主那样，挥舞着手里的衣物大声叫卖了。

出摊了几次，渐渐衣服甩不动了，喜新厌旧的法则在哪儿都适用。听周围相熟的摊主阿龙说，除了夜市，他们还赶这个城市规模最大的一个早市，可以帮我占位，问我愿意去试试不。从没去过早市的我表示愿意去开开眼界。

早市在开发区，摆摊儿的货和货架，阿龙早在前一晚上就已经装在他的三轮车上。第二天早上5点多，整个城市还在酣

睡，我早早起床赶往那个市场，之前没去过，只能慢慢往黑暗尽头有一点光亮的地方靠近。

光线越来越亮，我在支摊儿的人群中找到了阿龙，他很仗义，给占了个不错的位置。等到天完全亮起来，小区门口的人才渐渐多起来。第一天运气还不错，入账600多元，第二天对半，第三天直接没开张。

但也不是没收获，和周围的一个菜贩混熟了，她给我装了半麻袋各种时令蔬菜，我送了她几件衣服，各自欢天喜地。

我已经体验够本了，想着迟早都要结束摆摊，拿着零蛋这个光辉战绩，悲壮地结束吧。

开店梦魇

结束摆地摊的生涯后，总结出来点经验：练摊是挣不到钱的。

就像很多女孩都梦想过要开个花店、开个服装店、开个咖啡馆一样，我决定开个服装店。从来没有做服装零售的经验，甚至连怎么把自己收拾打扮漂亮都不会的我，说干就干，就开了服装店。

在决定干之前，我和老公商量：“如果开好了当然好，开糟糕了也不要责怪我，无论干得好坏，日后都不要有怨言。”老公的态度是不管我干啥，他都无条件支持。

没想到一语成谶，我们为了这个决定背负了几年的债务，老公确实没有半句怨言，默默在背后支撑我走过来。

最终选择的商铺在一个新开发的地下街，开发商描述的蓝图很美，招来了小城里很多浸泡在服装零售行业多年的老板。我本来想搭上他们的顺风车，能获得在此稳定扎根的物质基础，没想到居然栽了个大跟头。

在老家的姑姑听说我要开店，派表妹朵朵过来帮忙。那段时间多亏了表妹，我们从出租屋到店铺，结伴而行相依为命，手头的积蓄已经不够，开始借钱往里面投，想着开业以后一周转就好了，从来没想到会亏本或不挣钱。

终于挨到了9月底整个商场开业，现实情况始料未及，货并不好卖。商场第一天开业时，我没有卖出一件衣服，这让我所代理品牌的工厂惊讶到不敢相信。我缺乏流动资金，这边货还没卖动，公司按节奏又要催着打款，定下个季度的货品。

雪上加霜的是，开业十天后商场因为消防问题没有通过验收，被强制关门整改。200多家商户，被迫在十一黄金周和民族同胞最重要的节日古尔邦节前夕，强制关门。

一开始，商场管理人员还接我电话，后来直接关机，商场除了封条什么也看不到。最要命的是，我手头并没有卖出去多少货，老公的工资一发就用来填之前的窟窿，生活费都成了问题。我只能把生活控制得极为简单，并安慰表妹，等整顿完开业后就好了。

没人知道，那时我在早市上，像个老婆婆一样在菜市场一圈一圈地徘徊，几个萝卜对比，拿起又放下。当家才知油盐贵，我开始体验到生活最真实的滋味。

我和表妹待在出租屋里绝望地等待着，也没心情出去玩，心里充满说不出的苦闷。

有一天醒来，我感觉头疼欲裂，我像平时一样慢慢咀嚼食物，食物却生生地卡在喉咙处，上下不得。更糟糕的是，说话出现了困难，发音开始变得不完整。我会把吃饭说成“吃ban”，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语言。

一开始我没在意，那天很冷，出租屋的暖气还没来，我决定出门买条黑色的打底裤。在摊位面前站了半天，我想不起来“我想要条打底裤”怎么表达，花了两分钟在心里默想，说出来的却是“我想要打底gu”。

那一刻我害怕到了极点。曾经的我不是这样的，从小到大都听大人夸我会说话，语言表达能力强。此时此刻，在伊宁这座小城里，我成了完全失去武器的困兽，简单的一句交流都需要在心里打半天腹稿。

朵朵说，姐你生病了，要去看医生。我说没事的，好着呢。但我又对剧烈的头疼产生怀疑，轻轻晃动下身体，大脑就会闷痛。这么多年身体都很棒，这次的信号不太正常。我嘴上说着没事，心里想这下真要挂了，我已经接受了随时要离开的准备，甚至准备着手给至亲每人写一封作别信。

我终于去了医院，感觉很陌生，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走廊里到处都是人，医生先是怀疑我天然气中毒，后来排除了。医生建议我去做脑部CT和核磁共振，检查结果一切正常。全部体检费花了500多元，我的异样也没好转，但好在没恶化。

终于等到了商场重新开业的消息，那已经是一个月以后的事了。虽然错过了黄金周，但绝处逢生，到底是开业了啊！我开始搞卫生、烫衣、挂板、陈列。低着头把全部心思放在店里忙活了几天。

表妹发现我的病痊愈了，同时她也发现这个商场没救了，这个店也活不过来了。第一次离家这么远这么久，她想回家了。

她让老家的妈妈给她打钱过来当回家的路费，我内疚得说不出一句抱歉的话。我已经拖垮了老公，拖累了几个至亲，如今表妹不远万里而来帮了这么久的忙，而我还付不出妹妹几百元的路费。

我来回翻着手机通讯录里熟悉的、不熟悉的几百个名字，我跟谁都张不了嘴，跟谁张嘴都让我觉得耻辱。我心一横，双眼一闭，手指划动通讯录，决定喊停时手停留在哪个名字上，就跟谁张嘴。

睁开眼睛，看到手指停留在久未联系的高中时代的班长的名字上。我东拼西凑着零散语句终于哆嗦着开了口，他很干

脆，钱很快就打过来。我硬塞给朵朵。

朵朵回老家那天我们一起走出出租屋，她在路口买了两个新疆烤馕，几瓶矿泉水往包里一塞，抬头告诉我，我给她准备的那些路费压在我枕头下，然后就走了。

我赶去店里开门，极度压抑、自责，眼泪滑下来。

破釜沉舟

踌躇满志开的第一个店，却让我陷入崩溃的边缘，我也束手无策不知道怎么起死回生。但真正让我决定放弃这个店的，却是一次讨价还价。

有一次，一个很魁梧的男士跟我就他老婆看上的衣服讨价还价。那天很冷，熬了一天快下班了还没开张。为了图个开张，那件平时卖150元的加绒打底衫，进价85元，我给他开价100元，他还到95元。

不能接受可以不买啊，明明他老婆已经穿在身上，让我帮她剪掉吊牌了，我却在跟他为了5元钱僵持着，心里有一千句“我不卖了，你赶紧脱下我的衣服哪儿远去哪儿”。

可是我实在洒脱不来，我不争气地想着，能卖一件是一件，无论如何要开个张，多少也能收回点本钱。

接过那个男人递过来的钱后，我感到极大的屈辱，真被自己气坏了，憋得半天呼吸困难。不远千里来这里，我图什么？

再一次，我不知道自己出现在这个城市的意义，我对自己失望透顶。为了5元钱，我抿着嘴，眼泪从脸上滑过。商场循环播放着邓紫棋的《泡沫》，直到现在，这首歌我都不敢再听。

我压根儿不喜欢这样的生活。有顾客时，我招架不了顾客无下限的砍价，没顾客时，摊主喜欢聚在一起聊，无非聊谁抢了谁客户了，谁又不要脸抄了她家的爆款。我没有加入交谈的愿望，也有意识地跟她们保持距离，闲下来的时候我更愿意看几页闲散文字。

花光所有积蓄，还负担了外债，我对自己和老公都没有交代，在纠结中往前煎熬着度日。当陆续有店主关门时，我好像得到了鼓励，说服自己也放弃，开始逃跑计划。那时才开店半年，剩下有半年房租和一店铺的杂货，我表婶帮我过来清仓甩货。

但我能干什么呢？找一个地方打工？每个月3000元左右的工资，不知道何时才能还完8万元负债。

我想起被搁浅的空间香氛。来新疆的第一个月，我就拿着一台样机，几瓶香味样品到处去推广过，但没有任何进展。当时我的判断是，这个业务在新疆无法做，人们没有这样的消费理念或没有这样的消费市场，所以转而把精力投入服装店。现在，香氛却成了我的救命稻草。

我在伊宁市，把大大小小的陌生酒店拜访过一遍，完全没有打开市场的迹象。拜访者的态度要么是闻所未闻，要么是喜

欢但价格接受不了。

就在这个时候，进过样品的供应商打电话过来，说乌鲁木齐有客户咨询，问我是否愿意跟进。我想抓住最后一根稻草，怀揣样品连夜坐火车来到乌鲁木齐。

虽然那个客户最终因为各种原因并没有和我合作，但这一趟让我接触到了乌鲁木齐这个市场。我眼前一亮，为何不来这个更大的市场呢？

不过这样一来，和老公距离更远了，大家见面的困难更大了，如何经得起时间、距离的考验，这是个难题。和老公说出我的想法和顾虑后，他出乎意料地很支持：“你想干的，我都支持。”

2014年4月，怀揣老公刚发的热腾腾的一个月工资，带着感动和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悲壮，我只身一人来到乌鲁木齐，当天就租到了房子，和一位回族姑娘二房东住在一起。

老公在五一之前休假赶到乌鲁木齐，帮我安顿下来。五一是我们结婚一周年纪念日，在逼仄的厨房里，老公烧了几个平时我们喜欢吃的菜。快开始吃饭时，他突然跑下楼，回来时手里多了瓶红酒。那是我们在一起的第一个纪念日，也是婚后三年来在一起过的唯一一个纪念日。吃完饭他又辗转回到驻地上班，留下我一个人。

老公走后，我又被打回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在仅有的十几平方米卧室里，我在这里吃饭睡觉，也在这里办公，早上带样

品出去，天黑回来。那两个月，用手机导航，我把乌鲁木齐星级酒店走访了一遍，没有多余的钱打车，更多时候是坐公交外加走路。

有时候我想，为什么要把自己置身于这样的环境里？

我怀念南方的一切，就坐上公交去大巴扎转转。大巴扎在维吾尔语中是集市的意思，是乌鲁木齐保存最完好、最具民族特色的小商品交易中心，是外地游客必来的景点。有时我会在那儿转一圈，从游客热烈兴奋的口音中捕捉粤语软糯的调子。

在广东生活的几年，一直没学会粤语，但是一直被这种熟悉的腔调包围着。现在一听到熟悉的粤语，我浑身热流涌动，感觉还浸泡在南方熟悉的氛围中并没有走远。我贪婪地吸收着他们悠长的软语，追随着他们消失在视线之外，又捕捉下一批熟悉的声音，鼻子发酸。

有时候坐了半天，什么南方口音也没捕捉到，就买路边巴郎的无花果，10元一打，真甜到心尖上去，满足地吃完，再坐公交车回家。我想自己真是个太奇怪的人。

乌鲁木齐的夏天太长太毒辣，走在太阳下，能听到皮肉吱吱作响的声音。没事谁愿意在太阳下漫步呢？而我就是要在太阳下疾步走过的人。走得越久，太阳越烫，心越凉。我最难受的不是客户直接拒绝，而是客户有时已经在心底拒绝了你，但是不直说，只说“考虑下、商量下、跟领导汇报下”。这满怀希望后的落空，不能和老公说，也不能和妈妈说。

一旦诉苦，他们肯定叫我回伊宁，回老公的身边待着去。“一个女孩子家，你老公一个月的工资也够你花的，何苦要这么瞎折腾，看你平时丢三落四又东西南北不分，别钱还没挣到，人就走丢了啊。”

还有一个同是军嫂的40多岁的大姐，因为祖籍同是河南，她对我尤其照顾。“你跑到乌鲁木齐那么远干吗啊，你想干的生意压根儿干不成，那压根儿不是你一个女人家能干的事啊，你看昭苏的黑土多肥，你回来咱俩去部队旁边垦块儿地，种点土豆或大蒜，收了再卖给部队食堂，今年街上大蒜都卖到1元一个啦，你何苦要跑那么远啊。”

我能做的就是苦笑一下，礼貌而克制地拒绝了用各种方式喊我回去的亲友。好不容易下定的决心，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说回头就回头呢。

万万没有想到，香氛的第一个订单是在伊宁完成的，就在我当时开的服装店门口，一个新开业的四星级酒店。

谈成了之后，我盯着那叠钱好久好久。

乌鲁木齐的冬季，大概是从9月底开始，以一场大雪的出现为标志，一直蔓延到第二年4月中旬。漫长的一个冬季过去，人也如同死去活来一般。

有时我接到客户的咨询电话，收拾行李说走就走，买不到坐票就站一宿。第二天，车到目的地，我去宾馆洗把脸就出发拜访客户。得益于原来到处出差的经验，我提前制订周全的计

划，每天都有要完成的工作量。等既定目标完成之后，沿路的酒店、饭店、汽车4S店、售楼中心、婚纱摄影又成了我地毯式的开发对象。到了晚上，我开始主攻夜场。

有朋友感慨我这么拼，虽然自己单位用不了我的产品，但会推荐朋友给我。他拿着手机通讯录抽出来一大串电话号码，告诉我每一个号码和他的关系，我应该怎么跟进。于是，从这个朋友这里告别，我在街头飘着鹅毛大雪的昏黄路灯下，打出去一个个推销电话，通常等收工提着样品回到酒店时已经午夜一两点，最晚一个成交的订单是在凌晨3点的奎屯。

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没有成交绝对不打道回府。

2014年隆冬，我提着个行李箱揣着张站票从乌鲁木齐出发，经石河子，到克拉玛依，辗转到库尔勒、阿克苏、和田、喀什等城市，把每个城市潜在的客户群拜访了一遍，没有成交绝不离开。我在这几个城市盘桓了20多天回到乌鲁木齐，病倒了，但带回来了可观的订单。

有一次出差到库尔勒，雪下得越来越大，我坐着公交车来到停在半山腰的终点站，又走了一里多路才走到物流园提货。

我在偌大的园区走来走去，没发现我的货。雪太厚，一个跟头滑倒，头埋在雪里半天动弹不得。一个路过的面包车司机看到了我摔倒的这一幕，摇下玻璃说：“丫头，你这是用生命在提货啊。”

我抹开已经粘在脸上的雪，试图挣扎着爬起来，跟他搭个顺风车。

但还没来得及张开口，面包车吐着一串尾气消失了。

军嫂生活

南疆走一遭回来的第二天，我意外接到新疆空军某军总政治部的邀请电话，他们请我给他们系统的军嫂做一个军嫂创业分享。

活动那天，当主持人介绍完掌声响起，我深呼一口气安抚了下心脏，哆哆嗦嗦走上讲台，这话筒也不是平时的话筒了，字都是一个个炸出去的，大脑嗡嗡响，自己说了什么，一句都不记得了。

自发响起了三次掌声，有几十个姐妹找我咨询，不少人我们至今还在保持联系。其中一个军嫂姐姐说，“你成功是因为你还没有孩子拖累，我们是因为有孩子，没有办法走出去。”直到两年后，我有了儿子皮皮，回想起来那位姐姐当初说过的话，也许是吧，我想，但也许不是。

那次演讲之后没多久，有纸媒来采访，还有新疆电视台“晚间新闻”来报道，我们在办公室里录了一上午，最后剪辑成3分钟镜头。在电视上看见自己瘦小的身影，有一些恍如隔世。

其实，对军嫂生活不太清楚的我，为了多点了解参考，曾通过一些聊天软件试图加一些军嫂群，潜水进去了解下她们的真实生活状态。

没想到进去几分钟，我就被轰炸得有点惊悚，整个群里乌烟瘴气，离婚、声讨公婆的声音此起彼伏。又加了几个群，都是如此，吓得我赶紧退群，再也不窥探别人的生活常态。

每个人都要独立走完属于自己的路，为什么一定要参考别人的模式，我注定是不同的。

如果我千里迢迢去看老公，唯一接待我的就是招待所，因为他很忙。所以更多时候，我们就这样分隔在两个不同的地方，横跨700多公里。别人家是男主人操心，而我，自告奋勇地把心操得稀巴烂碎。我还能期待什么呢，他已经竭尽全力了，我什么也不期待，只期待他能早点回来。

“快了，快了，马上就回去了……”通常这是大部分通话的主题内容，重复着这样的期待过去了几个月，他还在复述着。我常对他说的是：“嗯，懂，懂，我都懂。”想想看，眨眼又过去了一天，离他回家的日子又近了一天，这样一想，日子会好过很多。

我也不敢随意生病，连一个最稀松平常的感冒也不行。节日里见路上的姑娘有人陪伴，笑着，我不敢去看，怕这种对比过于强烈而心生悲切。当大家在欢度节日，相互祝福，交换礼物的时候，我也只能疯狂地想念。

我们的联系也变成了单向联系，我永远打不通他电话，有时候电话猝不及防地打过来：“想你想疯了，我刚下岗，上上下下满山跑，终于找到点信号给你拨通，你，吃饭了没……”

有一次老公被派到更远的山沟里蹲点执勤，他惊奇地发现了周围水潭里有鱼。水潭是周围的天山融水积蓄而成，水温太低所以鱼不大。他拿起吃饭的碗一碗一碗地舀水，捡起这些约莫手指头长的冷水鱼，趁着正午阳光强烈，晒成鱼干。

他把一半撒了盐做成家常版的，把另一半撒了足够多的辣椒面，做成了香辣版的，如果太阳足够好，两个小时就能晒成干脆可口的鱼干。他委托下岗下山的战友将鱼干带下去再转几个快递寄出。两周后，我在乌鲁木齐收到了老公制作的这些神奇的鱼干，感到不可思议。我紧紧捧着这些鱼干，脑海里想着老公捉鱼时的专心，感觉他有点像《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的派。

有一天匆忙中接到老公的电话，说要马上回家看我，我当然不相信是真的，他就打开视频挥舞着手中的火车票给我看：“媳妇在的地方就是家，我想回家了。”

原来他接到一个任务，要赶到乌鲁木齐接几只从北京训练基地领回来的军犬。军犬有编制，并且每月有固定的军饷。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军犬，威猛又温顺，后来去老公驻地探亲，我专门去犬舍里看它们，像看久别重逢的亲人。

回一次乌市的家，就意味着老公的一次战役。

老公平均三个月可以休一次假，遇到军区领导检查、考核训练这些大事件，他的休假就自动往后推移。如果一切都正常，从领导批假条算起，一个季度休假连带返回签到共9天。

老公从接到假条就风驰电掣般地往车站赶，包一个拉客的私家车往伊宁市赶，再打车到郊区的火车站赶上去乌鲁木齐的末班火车。每一个环节都无缝衔接才能在第二天早上赶到乌市的家。任何一个环节的耽误，就不知道要在路上浪费多少时间。

等他在人头攒动的车厢中站了一夜，背着光，出现在我面前时，好像从时间的光影里披荆斩棘而来。每一次回来，我都觉得他又瘦了。

吃过早餐，老公就开始忙活，他要趁回来的这有限的时间，能分担多少就尽量分担多少。送车去保养、交天然气费和水电费、换灯泡、一袋米一袋面一桶油扛回来做好生活物资的供应。在他身上，总能体会到办事效率之高。实在没事可做时，他围裙一系大勺一挥：“媳妇儿你想吃啥老公给你做，前段时间我在炊事班又学了一招儿，一会儿给你露一手啊。”

我们争分夺秒掰着指头，把在一起的每一天充分用一个个事件填满。但时间太快，休假的后几天，他开始焦虑：“不会吧，时间过这么快，感觉昨天才回来啊，咋明天又要走了啊。”走之前，他开始喋喋不休地重复：“媳妇儿，老公就要走了，真的要走了啊，你舍不得？”

王洛宾在三毛走后说：“你走后，人间就冷了。”来难来，去难去，恨时短而言未尽。这种别离的痛楚，我们也经历过。

老公站起来和我拥别，这是我们每次分别的仪式，他在我后背和肩膀重重拍了几下，说：“照顾好自己！”转身背起硕大的军用迷彩包大步快跑消失在我视线中。完了，好日子这么快就完了，留我在一场梦中，单曲循环着《永隔一江水》。

有一次老公和一个战友小聚，我也在场。当时离光棍节不远，酒过三杯后我笑着问他打算什么时候脱单，我以为他会说缘分未到，请我帮忙介绍。

但他端起酒杯和我的水杯碰了下后，红着眼睛定定地看着我说：“说实话，我佩服你，我如果是个女人，眼瞎了也不会嫁给军人。”我默默地听完，红了眼睛，在暗处握紧了拳头，拼命地忍着。

久未联系的老同事在联系上我后很惊讶：“原本想着你去新疆后，就成了标准意义上的军嫂了，老公孩子热炕头地转，早就在琐碎生活中埋没了，没想到你还挺能折腾。”

好电影讲究颠沛流离，情节离奇饱含戏剧性，但真实的生活并不如此。很多人把自己当作弱者，不敢去挑战，不敢选择吃苦。直到我开始愿意为自己的人生负起责任，去看一看，究竟“活出来”的奥秘是什么，我才意识到，那些活得全然尽兴的人，并非有多成功，而是生活得很真实。

我和老公并肩作战，用了一年半时间，还清了所有债务，买了车和房，在乌鲁木齐把根扎了下来。

一晃眼，成为一名边防军嫂已经三年多了。未来会以想不到的速度，很快就来。

到那个时候，我可要再坚强一些啊。